民主的理論與實踐

鄧初民

鄧初民著

民主的理論與實踐

圖書館 重慶分館

文治出版社印行

民主的理論與實踐目錄

自序……………………………………一
一、怎樣研究政治與政治學……………………………………一
二、怎樣研究民主政治……………………………………一一
三、民主政治的新趨勢……………………………………二四
四、民主政治的歷史範疇及其特質……………………………………四二
五、論政治與民主……………………………………七〇
——以蘇聯的政治為例——
六、民主憲政與憲法的關係……………………………………八五
——兼論幾個民主憲政國家的類型——
七、清末民主革命與清室的對策……………………………………一〇四
——從清末統治者羣的沒落所見歷史的本質——
八、清末的立憲……………………………………一二六

九、辛亥革命與民主政治……一四二
十、抗戰三年來的民主運動……一五五
十一、略論民主……一八六
十二、論民主的具體內容……一九一
十三、中國的民主革命與民主共和國……一九八
十四、論中國憲政的類型……二一五
十五、論現階段的中國民主……二四一
十六、如何實現民主及實現民主的具體辦法……二六三
十七、只有人民是最後的公斷者
——讓人民的聲音被大家聽見——……二七一
十八、人民的世紀……二七八
十九、人民的政權……二九三

附錄

一、論古代宗教及其他意識形態之政治作用……三一三

二、論古代天道觀念之政治作用……三二〇
三、對於中國古代倫理的政治評價……三二九
四、論中國政治上的禮治主義……三三七
五、略論傳統的官僚政治……三四五
六、俄國民主革命及沙皇制度的崩潰……三五六
七、從政治上觀察蘇德戰爭……三七〇
八、蘇聯抗戰一週年與中國抗戰五週年……三八三
九、世界現勢與中國……四〇〇

自序

我把從神聖偉大的抗戰爆發以後——尤其是從南京，武漢失陷，轉進陣地到陪都重慶以後所陸續發表的關於論民主的許多論文搜集起來，印成這麼一本書與讀者見面，我要在這裏說幾句話，把它介紹一下。

首先，是它的命名——因為這許多文章，雖然都是關於「民主」的，但有些文章是偏重在闡述民主的理論方面；有些文章是偏重在鼓吹民主的實踐方面，所以題名為「民主的理論與實踐」。

其次，是它的內容——內容與命名，本來是有着不可分的聯繫

的。因爲『名者，實之賓也』，名字既標爲民主的理論與實踐，則內容也就必然要包括這兩方面。不過理論與實踐還有它本身所具有的內容。就民主的理論來說，它的概念及其根本定義如何？它的發生、發達、沒落的歷史規律如何？尤其是它的當前的新趨勢如何？而且民主之廣義的歷史範疇，可以說自人類開始過政治生活以後，就有民主政治這一形式，所以有古代的民主，有中世紀的民主，及近代的民主之分。民主之狹義的歷史範疇，則把發展了的民主形式，只限於是近代社會經濟的產物，然即在近代這一歷史階段，亦有舊型的民主，新型的民主，最新型的民主之別。所以理論的闡述，決不是很簡單的一個問題。至於民主的實踐形態，亦甚繁複，

由於歷史，民族的特點，自然要產生各種不同的民主國家的類型，例如在近代舊型的民主國家方面，有英法的類型，有美國的類型，有德日的類型，在新型的民主國家方面，亦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所產生的新民主的歐洲，亦有法蘭西的類型與南斯拉夫的類型之不同。——一一加了論列，更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本書則儘可能的涉及上述理論與實踐之各方面，希望能把它的內容體現出來。

其三，有它的主旨——本書的內容，曾如上述，希望做到儘可能的涉及理論與實踐之各方面，其主旨當然不在闡發民主之一般的理論與實踐，而是在闡發了民主之一般的理論與實踐以後，把它和民主之特殊的理論與實踐結合起來，亦即和中國所需要的民主理論

與實踐結合起來，中國現階段的民主是什麼民主呢？中國憲政的類型是什麼類型呢？本書亦有所論及。但因環境上的特殊困難，未能暢言，讀者當能舉一隅而三反也。

最後，是它的小小貢獻——印刷紙張油墨人工都這麼貴，這本書印出來有什麼用處呢？區區之意，以為當此民主潮流高漲，人民力量開始抬頭，尤其在中國今天，非民主不能團結內部，非民主不能動員人民力量，非民主不能澈底擊潰日寇，非民主不能獲取最後勝利的情況之下，這本書對於想知道民主的理論與實踐之粗淺知識的讀者，或不無一點小小貢獻。不過大多數讀者，都有這麼一種心理，對於一本新著的有系統的書，以為無論如何，總還可以一讀，

假若是搜集已經發表了文章，好像就將它陳舊零亂，不大感興趣，但本書雖是已往發表過的論文之搜集，却不是破磚架瓦，隨便堆積起來的，它在骨子裏仍有它一貫的系統，例如從理論到實踐，從抽象到具體，從一般到特殊的敍述，讀起來總會有這麼一根線索在牽着，再則一本有系統分章節新著的書，雖有它的長處，但遇着一個節目，一個問題，需要多說一些，才能澈底明白，然而往往為章節篇幅所限，不能暢所欲言，這種論文集，倒反而有一個論題在此文未詳者，却又見於他文，而能把一個不易理解的論題或需要多發揮的論題，重複於許多論文中闡發之，讀者如能耐性讀完這一本書，或亦有此感覺。不過附錄各篇，則多係雜文。然仍屬有關現實

政治的，此外各文中亦間的讀來不甚連接一氣者，則因檢查删節之故。著者學識淺陋，謬誤之處，一定很多，諸希讀者教正！

民國三十四年、七月一日，於陪都半山私寓。

5-71.6
372-2
2

一 怎樣研究「政治」與「政治學」

突然向一個沒有什麼社會科學素養的人，提出什麼是「政治」或「政治學」的問題，一定是會要感到有些莫名其妙的。但我們說，任何人都要穿衣吃飯，都要生活（包括物質生活，精神生活）。在整個生活過程中，某些人爲要生活上控制另一些人，便需要一種力量——一種帶強制性的力量，或一種帶有強制性的權力，這種力量表現在下列一串東西——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司法機關，乃至憲兵，警察，海，陸，空軍等等——上面，便成爲一種公權力或政權。這種公權力或政權，正是帶有強制性的，強制人們做什麼，或不做什麼。

這種帶有強制性的權力的使用，在歷史上是多種多樣的。有時，是少數人強制多數人。例如在奴隸社會，強制者是少數奴隸主人；被強制者是大多數奴隸。在封建社會，強制者是少數封建領主；被強制者是大多數農奴。在資本主義社會，這種強制力量可能握在少數大工商業家或金融寡頭手上，也可能握在工人，農民和小有產者及一部分進步的工商業家之聯合手上。有時，是多數人強制少數人，例如在近代民主革命初期，一時

重慶市圖書館

都有大多數革命人民起來壓倒少數反革命統治者之勢。尤其是在俄國十月革命成功以後，強制者可以說是多數工農，被強制者是少數地主，資本家，沙皇舊官吏等。等到社會主義建設已經成功的現在，國內被強制的人更是少數了，可以說是幾乎沒有了，而這種掌握在最大多數——幾乎是全體人民手裏的強制力量，則只是用以自衛的，或是強制外來少數強盜的。

這種強制者與被強制者的相互關係，就是政治關係，這種強制者與被強制者的相互活動，就是政治活動。所謂政治關係與政治活動，是以兩種力量的互相反撥爲其基本內容的。這種力量的表現形態，就是整個國家機構，或整個政治機構，做一句話說，就是「政治」。以政治爲對象，而研究其運動發展規律之學，就是『政治學』。

但在這裏我們要集中注意一點，卽這種政治上的強制與被強制，不是徒然的；而是某些人爲要在生活上以及各自不同的利害關係上控制另一些人。用一個術語來說，就是某些人爲要在「經濟的」各自不同的利害關係上控制另一些人。因此，「政治是經濟之集中的表現」這句話，便有了眞理性。不是人在開始生活時，就需要這種強制力量，而是生活發展到一定階段，也可以說是要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才需要這種強制力量。那時，在經濟上有了佔有者與不佔有者，因而在政治上才有了強制者與被強制者。因此，

「政治是經濟之上層建築」這句話，又有了真理性。

以上簡單解答了什麼是「政治」或「政治學」的問題。然則我們應該「怎樣研究政治學」呢？

我以爲首先要將政治學作客觀的歷史的考察。政治是歷史中的一定現象，即是一定的歷史過程中「經濟之集中的表現」，又是「經濟之上層建築」。所以歷史的考察，就是要從歷史上考察它（政治）是如何產生的，如何發展的，現在成了什麼樣子，將來要往那裏去，例如它在氏族社會崩潰後，經濟上有了佔有者與不佔有者的時候，就產生出來了。由古代奴隸社會的政治，發展到中世紀封建的政治，又到近代資本制的政治，將來經過社會主義之歷史的發展，又可能爲歷史所「揚棄」等等，便是它發生，發展，沒落之必然的史序。我們爲要不迷惑於政治上之許多複雜現象或非常急劇離奇之變化中，便要不忘記這種政治發展過程之基本的歷史聯繫。

但這裏所謂客觀的歷史考察，和通常所謂「歷史學派」的歷史考察，僅僅亂雜無章的堆積一些歷史事實者完全不同，而是要根據歷史事實之分析，綜合而探求出歷史之一定的規律性來。這種對於一般歷史規律性或政治歷史規律性之了解，對於一個政治實踐者或政治家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政治家在平時不了解一般歷史的規律性或政治歷史的規

律性，他就不能科學的，主動的，決定平時的國家政策；一個政治家在戰時不了解一般歷史的規律性或政治歷史的規律性（包括戰爭的規律性），他就不能科學的，機動的，應付這一支配全國家全民族生死存亡命運的戰爭。

我們為把政治學放在正確的研究領域裏，不僅要把政治作客觀的歷史的考察，而且要把它（政治）作最具體的分析。因為只有具體的研究政治的基本內容及其發展過程，才能了解政治學上的許多概念或名詞，對於政治學之空洞的概念的了解，是與對於政治學之實在的具體的了解不相容的。那麼，對於政治學之具體的分析或具體的了解，究竟怎麼着手呢？

我以為第一：首先就應當具體考察政治所由產生的社會經濟基礎，在具體的分析某一時代，某一國家的政治狀況時，首先就要具體的分析某一時代，某一國家的經濟狀況。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政治體制，是決之於各該社會的經濟體制。換言之，各該社會的政治體制，都是各該社會經濟體制的上層建築。再則中國政治狀況，美國政治狀況，乃至其他各國的政治狀況，都是決之於中國，美國，乃至其他各國的經濟狀況的，換言之，各國的政治，都各有其一定的社會經濟基礎。不具體考察政治所由產生的社會經濟基礎，決不能具體了解政治的基本內容及其發展規律。

根據政治所由產生的社會經濟基礎，還須注意下列幾點：

（一）應注意一定國家的經濟，是處在什麽歷史階段之內，它是封建制的歷史階段，是資本制的歷史階段。即在資本制的歷史階段，還要問它是壟斷以前的資本主義，還是資本主義最後階段的帝國主義。不同歷史階段經濟的具體特點，一定表現為不同歷史階段政治的具體特點。以政治運動之民主革命來說，發生於壟斷以前的資本主義時代的民主革命與發生於帝國主義時代的民主革命，顯然是有各自不同的特點的。

（二）應注意一定國家經濟的複雜錯綜狀態，而探求出究竟什麽是其主要矛盾，什麽是其次要矛盾。無論在自然界或人類社會，「純粹的」現象，是沒有的，而且也不會有。純粹這個觀念的本身，就表明人類認識本身含有或許狹隘性或片面性的，而沒有徹底瞭解客觀的現象所有的複雜性，例如世界上就不曾有過，而且也不會有過「純粹的」資本主義。而始終在資本主義內就參雜着封建制，小資產制或其他某種經濟制度的成份。在瀕於崩潰的封建主義經濟中，有封建經濟，資本主義經濟，小商品經濟等等的錯綜：在某些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經濟情形，更為複雜，因為其中有帝國主義所經營或控制的經濟，封建半封建經濟，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小商品經

濟，[illegible]經濟等等形式的錯綜，可是最重要的，是在這樣錯綜之間，探求出其主要的矛盾，是工人與資本間的矛盾，還是農民與農奴制的矛盾。否則就不能決定在政治上控制者是少數人或多數人，則不能決定在政治上企圖解脫控制者是少數人或多數人，而其控制和反控制成功失敗的根據在那裏，也無從指出。

（三）關於注意在經濟分析中，指出經濟危機及羣衆經濟狀況問題。因爲這一問題，是與政治上的反控制最有密切關係的問題。因爲沒有全國的經濟危機所引起的政治危機，同時，沒有廣大羣衆的經濟狀況之不安所引起的革命行動，多數人的反控制是不可能的。所以為着徹底了解革命的客觀環境及其客觀條件，對於經濟狀況的分析，尤其是經濟危機的產生與發展，以及羣衆的生活狀況，是不能不作最密切的[illegible]與最具體的分析的。

以上是[illegible]對政治所由產生的社會經濟基礎所須注意的三點，但這只是最重要的三點，而不是把對於經濟的考察只限於這三點。這一步：具體的分析與具體的了解政治學，其次就應當具體考察在一定經濟基礎之上的各階級及各政黨的力量對比，在政治上有嚴重的異民族壓迫的國家內，當然還要具體考察壓迫民族與被壓迫民族的力量對比。不問那一個國家內各階級間的各自不同的利害

關係及其相互關係，不闡明一個國家內各政黨的本質，則無由決定政治上之控制者與反控制者的各自不同的政治任務，更無由決定其政治鬥爭上的戰略與策略，由於各國社會經濟狀態的不同，因而其階級力量的對比，及各政黨所代表的階級利益，也各不相同。在政治上兩種相互反撥力量發到尖銳化時，或者說控制者與反控制者的鬥爭尖銳化時，某些人是革命的，某些人是反革命的，某些階級或民族，是壓迫的；某些階級或民族，是被壓迫的。乃至某些人是革命的主要敵人，某些人是革命的主要力量，某些人堅定，某些人動搖，都決定於一定經濟基礎上的一定的階級關係。階級關係，才是理解政治關係的前提。

第三：爲着具體的分析，了解政治學。除了經濟基礎及階級關係的具體考察外，還需具體考察社會生活的其他各方面。雖然經濟是政治的下層基礎，階級關係是理解政治關係的前提，但經濟基礎與階級關係之外的政治本身（包括政治制度，政治思想）乃至社會意識等等；都不能不作具體的明白的分析。這就是說，我們必須對社會生活其他的各方面，作全面的考察，才能對於政治關係，政治活動，乃至對於各種實際的政治問題，有一個完備而具體的了解。

第四：爲着具體的分析了解政治學，更必需嚴格的注意各國不同的特殊條件。因爲

每一民族，每一國家，都有各自不同的社會經濟狀況，階級關係，政治制度，意識形態等等的特點。要具體的了解某一國家的政治，就必需具體的了解某一國家許多或同或不同的特點。尤其是一個政治學家和實際活動的政治家，應該把在一切政治鬥爭中，亦即在一切控制與反控制的場合，由各國經濟，政治，文化，民族特點，宗教派別等等所形成的具體差別，加以估計，使鬥爭正確的適合於各國的特殊情況。而且各民族間和各國家間的界限，一日存在，一個實際的政治家，決不能排除此種特異之點，也不在取消此種民族，國家之界限，更不能抹殺此種特異之點和此種界限，而是要正確的具體的考察此種特異之點與此種界限，使政治活動與政治鬥爭不犯錯誤。

第五：對於政治學之具體的分析了解，還必要從政治運動的過程中去切實考察。政治是以兩極互相交撥的力量為其基本內容的，所以它是各種階級或民族力量的運動過程。只有詳細的分析政治過程中每一階段每一時期的具體經濟情況，階級力量，政治現象，以及社會意識之具體狀況等等以後，才能很恰當的了解政治，決定政治鬥爭的戰略與策略。尤其是在政治運動的過程中，往往某一階段某一時期所認識的真理，在另一階段，就成為不對，時期可能變成錯誤。因此，一個實際的政治家，如不能細察政治運動的過程中，在各個不同階段，不同時期具體分析社會生活的各方面，要具體的了解政治，是不可能的

能的。

以上所述——一、具體考察政治所由產生的社會經濟基礎；二、具體考察在一定經濟基礎之上的各階級及各政黨的力量對比。三、具體考察社會生活的其他各方面。四、嚴格的注意各國不同的特殊條件。五、從政治的運動過程上去切實考察——是把政治學作具體的分析的五個要點，但這只是五個要點，也不是把對於政治學之具體的考察只限於這五個點。

總之，我們研究政治學的方法，是要把政治學作客觀的歷史的考察；同時，還要把政治學作客觀的具體的考察。由社會政治經濟及階級情況之歷史的具體的考察來決定政治學上各個問題的概念，意義，及其實踐性，這是科學所採取的方法。惟其是歷史的考察問題，便不會顛倒錯亂政治之發生，發展，及其沒落之必然的史序，而把封建政治在封建主義的範疇中交代清楚，把近代政治在資本主義的範疇中交代清楚。更能明確的指出政治之昨天，今天，明天來。惟其是具體的考察問題，便不會迷惑眩暈於政治上之五花八門的名詞概念，及其多種多樣的制度典章，以為只要是民主，我們便再不問是「為誰的民主」；以為只要是獨裁，我們便再不問是「管着誰的獨裁」。而且要一定辨析出我們陣中的和平與敵人口中的和平，有着本質的不同；有些國家的警察，是對付強

要的，有些國家的警察，却是對付良民的。而主要的，根本的關鍵，是看掌握強制力在手的人是什麼人，即有權強制人們做什麼，或不做什麼的人是什麼人。

最後，我們要特別指出，科學的方法，是從實踐中抽出來的，歷史的具體的研究政治學的方法，是從實踐中抽出來的，沒有外於實踐的方法，一切方法都是爲着實踐，方法與實踐是對立的，同時，又是統一的。今天在基本上我們用科學的方法來研究政治學，就是要由中國社會政治經濟及民族特點之歷史的具體的考察來決定當前實際政治問題之各個概念，意義，及其實踐性，而今天中國之惟一的迫切的共同的偉大的政治實踐，就是努力抗戰建國之最後完成，與促進世界民主大家庭之迅速實現。

二　怎樣研究民主政治

在一般方法論上，要求我們在研究任何一個問題時，第一、對任何問題要作歷史的考察，第二、對任何問題要作具體的考察。

所謂歷史的考察，就是在研究問題時，要把問題放在一定歷史範圍之內，它是怎樣產生的，怎樣發展的，怎樣沒落的。同時，還要注意這一問題與那一問題及其他許多問題的基本的歷史聯繫，而且它爲什麼剛剛產生在這一歷史階段之內。這就因爲任何問題都有它歷史上的限制，決沒有一個東西是超時間的。研究任何問題要作歷史的考察，研究民主政治，也要作歷史的考察。

所謂具體的考察，就是在研究問題時，除了說明它的歷史條件外，還要注意在同一歷史階段裏產生出來的同一東西，它們之間有如何不同的具體的特點，再把它的特點加以分析研究，而得出具體的與其他的東西不相混淆的結論。這就因爲任何問題，都有它空間上的限制，決沒有一個東西是超空間的，研究任何問題要作具體的考察，研究民主政治，也要作具體的考察。

研究民主政治，如果要作歷史的考察。那首先就要明確的分析古代奴隸社會的民主政治，中世紀封建社會的民主政治，近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民主政治，（民主政治的發展形式或其支配的絕對的優勢，作為一個歷史階段的代表形態者，當然只有近代才有），蘇聯社會主義社會的民主政治。從大體上說，奴隸社會的民主政治，只是奴隸主人的民主政治，對於大多數奴隸，則是專制政治。古代希臘、羅馬的歷史，恰恰證明了這一事實。封建社會的民主政治，只是封建領主的民主政治，對於大多數的農奴，則是專制政治。中世紀各封建國家的歷史，恰恰證明了這一事實。資本主義社會的民主政治，只是資本家的民主政治，對於大多數勞苦民衆，則是專制政治。近代（十八九世紀）英、美、德、法的歷史，恰恰證明了這一事實。社會主義社會的民主政治，就不同了，它對於大多數工農民衆是民主的，而對於任何企圖反工農，反人民的人們，則是鎮壓的，蘇聯建國二十餘年的歷史，恰恰證明了這一事實。

在我們中國，一直到清末，即在國父中山先生領導民主革命以前，實在是沒有什麼民主政治的。儘管在政治學說上，有所謂「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民猶水也，可以載舟，可以覆舟」的精神說法，而究竟不是民主制度。民主政治是反映社會關係，社會階層力量對比

的一種制度。制度不立，則實權不存。至於有人（像鍾瓊之流）在中國歷史上看見了有布衣則相或所謂宰相制度等等，就認為兩千年來的中國政治，都是民主政治，是顯然沒有一點科學上的根據的。

研究民主政治，如果要作歷史的考察。其次，就要明確的指出古代奴隸社會的民主政治，中世紀封建社會的民主政治，近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民主政治，蘇聯社會主義社會的民主政治之間的基本的歷史聯繫。譬如我們可以說近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民主政治，是從古代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的民主政治發展出來的，蘇聯社會主義社會的民主政治又是從近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民主政治發展出來的。這就是它們的歷史聯繫。

最後，還要問古代奴隸社會的民主政治，中世紀封建社會的民主政治，近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民主政治，社會主義社會的民主政治，它們各自是如何產生的，發展的，沒落的，這種考察，尤為歷史的考察民主政治的方法上之重要步驟。它們的產生，發展，沒落，自然都要求之於它們各自不同的社會經濟背景，以及由社會經濟背景所反映出來的社會階層力量對比，乃至社會意識及其社會生活其他各方面的變化。

研究民主政治，如果要作具體的考察，首先就要研究古代奴隸社會的民主政治，中世紀封建社會的民主政治，近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民主政治，蘇聯社會主義社會的民主政

濟之間的各自不同的社會經濟基礎（亦即實際），各自不同的社會階層及其政黨上（亦爲是近代的）力量的對比，各自不同的社會意識（學術思想）及其社會生活其他各方面。古代奴隸社會的民主政治，是建築在農業，手工業，生產技術尚極低下的社會經濟基礎上，其社會階層有主要的兩方面：一面是少數奴隸主人，另一面是替主人勞作的大多數奴隸。其學術思想，亦即其社會意識形態，也是爲少數奴隸主人服務的神話，宗教，哲學，而顯占支配的優勢，凡不利於奴隸主人的學術思想，是被禁厭着，被統制着的。中世紀封建社會的民主政治，是建築在農業與手工業結合的自然經濟佔優勢，生產力更低下的社會經濟基礎上，其社會階層的主要兩方面，一面是少數的封建領主諸侯，另一面是大多數農奴，其學術思想，亦即其社會意識形態，也是爲封建領主服務的宗教神話。凡不利於封建領主的學術思想，是被禁止着統制着的。近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民主政治，是建築在大規模的機器工業，大工廠工業，生產技術較高的社會經濟基礎之上，其社會階層也有主要的兩方面：一面是資本家；另一面是勞動者。其政黨也有主要的兩黨：一黨是代表資本家利益的資產階級的政黨，另一黨是代表勞動者利益的無產階級的政黨。其社會意識形態，也是爲資產階級服務的學術思想佔支配的優勢。

社會主義社會的民主政治，是建築在大規模的機器工業，大工廠工業，乃至電氣化

工業、生產技術更高的社會經濟基礎上，其社會階層，則漸被消滅，還存在的，只是廣大多數的工人、農民、工農化的知識分子、技術人員；而資本家、地主、乃至富農、貴族已都被消滅了。其社會意識形態，也只有為工農大眾服務的學術思想，才能存在，從這些各自不同的具體情況——各自不同的社會經濟基礎，各自不同的社會階級，政黨利益，各自不同的社會意識形態——所產生出來各自不同的民主政治，自然是有它們各自不同的具體的特點，而不容絲毫相混，鬍子頭髮一把抓的。所以古代奴隸社會的民主政治，中世紀封建社會的民主政治，決不同於近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民主政治和社會主義社會的民主政治，反之亦然。如果我們研究民主政治的人，不分青紅皂白，把甲作乙，認丙作丁，就是錯誤。

研究民主政治，如果要作具體的考察，其次，還把同一階段的民主政治，還要作具體的分析，譬如在近代資本主義社會這一歷史階段內，雖然由於民族的特點，即國度的不同，而提出不同的民主政治的類型，因此，同一資本主義社會發展階段的民主政治，大體可分為如下幾種類型：一、英、法是一種類型；二、美國是一種類型；三、法西斯政府的德國又是一個類型。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產生的土耳其，更是另一種類型。此外還可分為先進國家如英、法、美、德的類型，落後國家如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類型

。我們如同不能把近代的民主政治當作古代的民主政治一樣，也是不能把英、法兩國的民主政治，當做其他民主國家的民主政治的。因爲同一歷史階段的民主政治，也有其一般性，同時也有其特殊性。我們不能單從其一般性來把握它，也不能單從其特殊性來把握牠。辯證的把握問題，是一般與特殊的統一。

研究民主政治，如果要作具體的考察。最後，還要注意同一歷史階段內的小環節。譬如同一近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階段，由於工業資本主義與財政資本主義還有各自不同的歷史上的小環節，小段落。把整個資本主義歷史階段分成壟斷以前的資本主義階段與帝國主義階段（亦即壟斷資本主義階段，或垂死的資本主義階段）。壟斷以前的資本主義階段的民主政治，是屬於舊範疇的民主政治，亦即舊型的民主政治；帝國主義階段的民主政治，是屬於新範疇的民主政治；亦即新型的民主政治。新型的民主政治所不同於舊型的民主政治的區分點在那裏呢？就在舊型的民主政治，是資產階級起來革封建貴族地主階級的命，掌握了政權以後，實行資產階級一階級的專政，儘管在法律條文上大書特書上，規定了自由、平等、民主等權利。所謂資產階級一階級專政，就是在政治領域上，或國家的權力行使上，是大體上或主要由資產階級一階級來領導行使的。正如國父中山先生所說：「近世各國，所謂民權制度，往往爲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爲壓迫

經濟的壟斷所要求於政治的壟斷（法西斯獨裁）以期挽救經濟政治危機於萬一者，則終究陷於此路不通。於是不能不轉而乞靈於擴大的民主政治，把政治的領導或獨權力的範圍，由資產階級一階級專有者，擴大爲與工農小資產階級等等所分有。正如孫中山先生所說：「一若國民黨之民權主義，則爲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也。」一言以蔽之，舊型的民主政治，是資產階級一階級的民主政治，新型的民主政治，則是各階級各黨派的共同政權。此其一。再則舊型的民主政治，只有政治的民主，沒有經濟的民主，同時，只有國內的民主，沒有國際的民主。新型的民主政治則不然，把民主的領域，從政治的民主擴大到經濟的民主，從國內的民主擴大到國際的民主。就是說，一國人民在國內不僅在政治上是平等的，在經濟上也是平等的。而且只有獲得經濟上的某種平等，才能獲得政治上的某種平等。在這裏，形式的民主，漸漸走向實質的民主。在這裏，實質的民主還不能徹底，因爲在這裏，民主政治雖然是新型的，但依然是資產階級性的。這就是說，包括經濟的民主的新型的民主政治，究竟沒有走出資本主義的範圍，不會徹底打破私有財產制。所謂經濟的民主一特徵，只是意味着進步的資本主義。再則，一個國家，對內是民主的，無論在形式上，在實質上，在政治上，

經濟上，都有了某種平等，因而它對外，也要求在國際上的平等獨立，即國際的平等，民族的平等，亦即國際的民主。國際的民主，是由國內的民主換來的，這就是說：只有國內的民主，國內的平等確立了，才能有權利力爭得國際的民主，國際的平等。在這裏，國際的平等，或說國際的民主，也是有限的，因為在一國內還不曾取銷經濟私有制，則在全世界範圍內也不能取銷國家民族的界限以進於世界大同。所謂國際的民主的一特徵，也只是當時看這種有限的意義。舊型的民主政治，只有政治民主，國內的民主；新型的民主政治，則把民主的領域，擴大到經濟的民主，國際的民主了，此其二。

一般方法論上的所謂歷史的考察，具體的考察，二者當然不是各自不相關的，它是一物的兩面，一物的兩種看法。我們不僅要應用它來研究一般的民主政治，而且更要具要應用它來研究中國的民主政治。

中國的民主政治，在歷史的考察上，當然不是古代的奴隸社會的民主政治，或是中世紀封建社會的民主政治，也不是蘇聯社會主義社會的民主政治。它的歷史範圍，是和近代資本主義社會民主政治相當的。但它的特點又不是屬於壟斷以前資本主義階段的舊範疇，而是屬於帝國主義時代的新範疇，即新型的民主政治。新型的民主政權，是革命的反帝反封建的各階級各黨派的共同政權，其典型的範例，則有如歐洲新產生的一[illegible]

大戰的砲火之下新生出的意大利、法蘭西、南斯拉夫、希臘、捷克、波蘭、羅馬尼亞、保加利亞、比利時各國的各階級各黨派聯合組織的共同政權。

中國的民主政治，在具體的考察上，當然不是英法類型的民主政治，也不是美國、土耳其各國類型的民主政治，它的民族特點，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因而它應屬於帝國主義時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種種特徵所組織成所必然要反映出來的一種特殊類型的民主政治，而且它正處於抗戰到了八年的一種具有特殊的，非常的，多變的，複雜的條件之下，它的具體形態，也不免於是特殊的，非常的，多變的，複雜的。

它無疑是，它一面是舊型的民主政治，另一面是屬於殖民地半殖民地落後民族的特殊類型的民主政治的兩面的一面，應該是什麼？它的具體形態又應該是什麼呢？」

關於前者（「一般的理論根據」）國父中山先生早已經規定出來了。其特徵：一、他以爲中國的民主政治，應該完全是以人民（各階層民衆的聯盟）的意志爲依歸的民主政治，國家大事，對各種政治問題，人民可以而且應該起決定作用。所以他曾經指出：「政府要做什麼樣的工夫，都要隨人民的志願，就是政府有了大權，一經發動做工夫之後，可以發生很大的力量，人民要停止它便停止它。」「如果管理政府的方法很完全，政府就

最有大力，人民只要把自己的意見在國民大會上發表，對政府加以攻擊，便可推翻；對政府加以頌揚，便可鞏固。」「總而言之，要人民真正有直接管理政府之權，便要政府的動作隨時受人民的指揮。」（民權主義第六講）

二、他以爲中國的民主政治，是要使大多數人民真正能參與國家政治的管理。所以他說：「要人民真正有直接管理政府之權」，「要人民有充分的政權，可以直接去管理國事。」「要四萬萬人來做皇帝」（民權主義第六講）。其[illegible]：一，由[illegible]給[illegible]」。

三、他以爲中國的民主政治，是人民用四種直接民權來實現人民對於國家的管理。他攻擊歐美資產階級民權制度是「一個[illegible]」，在[illegible]資產階級[illegible]成爲壓迫平民的工具」。因此他主張除選舉權外，還應該用複決、罷免、創制四權來管理國政，以[illegible]。故對於人民之知識能力，政府常訓導之，以[illegible]使其選舉權，行使其罷免權，行使其創制權，行使其複決權（建國大綱第[illegible]條）。至[illegible]四、在[illegible]之下[illegible]新[illegible]民族主義[illegible]國際[illegible]民族平等的精神，他說：「對於國內之弱小民族，政府當扶植之，使之能自決自治；對於國外之侵略強權，政府當抵禦之；並同時修改各國條約，以恢復我國際平等，國家獨立。」（建國大綱第四條）也不[illegible]。

[illegible]民生主義，實行[illegible]平均地權，節制資本。」而其具體的措[illegible]大[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為，是：『建設之首要在民生，故對於全國人民衣食住行四大需要，政府與人民協力，共謀農業之發展，以足民食，共謀織造之發展，以裕民衣，建築大計劃之各式屋舍，以樂民居，修築道路運河以利民行。』（國建大綱第二條）

六、他不僅注意在政治上，憲政上關於人民權利之規定，而尤其注意在政治上，憲政上關於人民權利之保障。他說：要『實行普遍選舉制，廢除以資產爲標準之階級選舉。』『確定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國民黨政綱對內政策）

後者（具體形態）的諸特徵應如下：

一、中國民主政治的具體特徵之一，是全民性的民主，是在全民族利益高於一切的原則下，全民族一致抗戰建國的民主。試看日寇法西斯的砲火，把中華民族立即推到了一個『生』與『死』的十字街頭。這時，工人、農民、小資產者、知識份子、地主、資產階級、甚至半買辦階級，不管那一個階級的要求，利益；這時，漢族、蒙族、回族、藏族、甚至苗、猺、黎族，不管那一民族的要求，利益；這時，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不管那一個人的要求，利益；這時，……不管那一個黨那一個派的要求，利益，都匯合起來，巨流似的匯合成一個總的河流，來反對共同的敵人——日寇法西斯。這是殖

民地化的深刻民族危機的新歷史階段。新歷史階段要求全民性的新民主政治。

二、中國民主政治具體特徵之二，它在一國範圍內，是全民性的，亦即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全體表徵；它在全世界範圍內，是與各國人民和國際工農大衆反法西斯，反侵略，反戰爭，爭取民主保衛世界和平不可分的一部分，亦卽全世界民主統一戰綫之一部分。因之，它不能不與世界民主主潮相配合，而成爲新型的民主政治之一形態，成爲與戰後民主世界，如像法蘭西、義大利等國的民主政治一形態。

三、其具體特徵所要求於中國民主政治之最低限度的任務，則在於立刻採取一切具體辦法，把抗戰建國綱領全部，即刻見諸實施，尤在「於抗戰期間不違反三民主義最高原則及法令範圍內，對於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與以充分之保障」。「發動全國民衆，組織工農商學各職業團體，改善而充實之，使有錢者出錢，有力者出力，爲爭取民族生存之抗戰而動員」。此外，則爲國民參政會前後通過之「切實保障人民權利案」，「切實保障出版自由案」，「加速民族主義的實施並擁護民意以利抗戰案」，「確立民主政治制度以奠定建國基礎案」等等，即刻予以切實施行。

四、其具體特徵所要求於中國民主政治之最低限度的任務，尤在於使民主的施行能與抗戰之具體要求密切貼合。抗戰到了第八個年頭，應該是要由於民主設施的發展來督

促誘導抗戰力量的發展，如像在盟邦的蘇、美、英一樣從艱苦的抗戰過程中，把抗戰的力量，新社會因素生長起來。這種抗戰力量，新社會因素，包括各方面，例如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教育各方面改進因素的發展。這種本身自力方面不斷的改進，才是抗戰最後勝利的主要決定條件。不幸在今天我們還沒有做到這種自力更生的起碼條件，使得我們不僅不能執行有計劃的反攻，而且幾乎難於抵住敵人的打擊。而今天擺在我們面前的絲毫不容躲閃的鋼一般的事實，卻是敵人來打我們要能抵得住，一切抗戰的具體要求，我們要能担負起來，這就要求我們在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各方面有「庶政一新的新政策，……。這就要求千真萬確的政治民主化，這就要求如國父所說「要用四萬萬人來做皇帝」。

三　民主政治的新趨勢

對於「民主政治」這一概念，我不願多搬弄詞句，以眩惑讀者的耳目。所謂民主政治，可以說就是一切都要以人民爲主體的政治，或者說一切都要由人民自己作主的政治。這當然不是說所有不相聯繫的個人，過着都毫無組織的張開口來，伸出手來，而是要在一種特定的社會裏，建立一種特定的制度，使人民或者直接的能有機會爲自己的利益，說自己要說的話，作自己要作的事（直接民權）；或者間接的能有機會爲着自己的利益，說自己要說的話，作自己要作的事（間接民權）。美國已故大總統林肯下民主的定義爲：「民有、民治、民享」，其義要不外此。國父中山先生引申其義，說：「這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國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其義更爲明確。

此爲民主政治之根本定義，亦即其真實內容。然而它的發展形式，亦即其制度的表現上，則有人人所熟知的選舉制度、民意機關等等，令人一般想到民主，便往往以選舉制度，民意機關等等爲其特徵，嚴格的說來，僅有這些，是不能真正符合於「民有民治

民享」的民主定義的，眞正有效的民主，名符其實的民主，必須要把民主精神，廣大而深入的滲透於全國人民各部分的生活中去，由政府機關到工廠、農場、商店、學校、乃至軍隊，家庭；由政治到經濟、文化、教育、乃至診療衛生；凡是與一般國民生活有關係的，無不在民主原則之下進行着，即在國民生活的每一角落裏都無不有民主原則的運用與實踐。

因此，民主不是片面的，僅有政治的民主，而沒有經濟的民主，則民主決不能徹底，所謂「貧窮的人決不是自由的人」。（見羅斯福國會咨文）民主不是懸空的，孤立的，離開工廠、農場、商店、學校、換言之，離開了一般的國民生活，也沒有民主。而民主原則的運用與實踐，即端在處處照顧人民的利益，使得大多數人民在各方面的利益，例如「在國內商店，農田，或礦場獲得既有益且有利的權利，有賺得足夠生活費，以供衣食娛樂的權利，每一農民生活所得，足以使他本人或家屬，獲得適當生活的權利，每一商人，不論大小，有免受國內外不合理的競爭和獨佔性的併吞而得的自由交易的權利，每一家庭有獲得適當居住的權利。人民有獲得適當診療和發展享受健康機會的權利，免受經濟恐懼，老年疾病，意外及失業，而有充分保障的權利，以及獲得良好教育的權利。……」（同上）離開了人民的利益，更沒有民主。

以上是我對於「民主政治」這一概念的簡單的說明。

除了民主政治這一概念外，還有「民主主義」，「民主政體」，「民主國家」這樣幾個概念。我以爲民主主義，是就民主政治之理論體系而言，「民主政體」，「民主國家」，是就民主政治之表現形式而言，他們都不能離開實踐的具體的民主政治之真實內容而獨立存在或獨具意義。

但一切都不能是超時空的，因之科學無條件的要求，我們把任何問題的研究放在一定的歷史範圍之內，民主政治也是某一特定歷史階段的產物，因此，也必須把它放在一定歷史範圍之內來研究，所謂近代民主政治，它是怎樣產生的，怎樣發展的，它的趨勢又這樣，這是我們這裏所要研究的主題。

在人類歷史發展的最早時期中，亦即人類開始有了嚴格的政治生活以後，就有了各種不同的政治制度，例如君主制，貴族制，民主制。試看古代奴隸社會，及中世紀的封建社會，有了君主制，貴族制，也就有了民主制。不過古代希臘，羅馬的民主制，是完全建築在奴隸制之上的，中世紀封建領主的民主制，也只承認地主社會的被選者之或多或少的參加。而且不論其形式上的區別如何，即不論其爲君主制，貴族制，民主制，不同的國家形式，決不能變更其所代表的階級內容，例如奴隸社會所有形式的國家，都不

外是奴隸主人的國家，封建社會所有形式的國家，都不外是封建領主的國家。因此，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的民主制，也決不能變更其所代表的階級內容（形式是民主的，實質（內容）是專制的。

即以形式而論，古代和中世紀的民主形式，也不是發展的，完全的形式，而較發展的，較完全的民主形式，實開始形成於近代資本主義社會。因此，我們在這裏所研究的民主制，只是近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民主制，而不是古代和中世紀時代的民主制。古代和中世紀的民主制，屬於各該時代的一定的歷史範圍之內，近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民主制，如又是一種歷史範疇，不能明確其經濟一定的歷史範疇，即不能指出關於各自獨具的特點與其歷史發展的特殊規律性，因而其發生，發展，沒落的全過程，也不免要被顛倒混亂不可思議了。

由於歷史對於任何問題的制約性，所以儘管在中國古代文獻上，早就有了「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的民主思想，然而古之民主，究非今之民主，儘管在中國古代史實上，早就有了厲王出奔，周召二公輔政，號曰「共和」的說法，然而古之共和，究非今之共和，儘管在中國古代學派或政派上，早就有了所謂法家，提倡法治

，如說：「故治民無常，惟法爲治」（韓非語），「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爲教」，「釋法術而經心治，堯舜不能治一國；去規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輪」（均同上），然古之法治（不過人主之法術耳），究非今之法治。古今歷史範疇不同，因而其政制，學說，雖在其形式上有某些近似之點，而在其根本內容上，則具有各自不同的實質與特徵。「科學無條件的要求我們把任何問題的研究放在一定的歷史範圍之內」，其理由正在此。

我們這裏所研究的民主政治，如前所說，不是古代和中世紀的民主制，而是近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物。歷史發展到近代資本主義社會，它便必然有其與古代奴隸社會和中世紀封建社會不同的經濟結構，政治制度，乃至社會意識等等，試看自中世紀封建制開始崩潰，資本主義開始抬頭的時候，整個社會關係，便起了一次大的變革。而這種變革，首先是在經濟結構上，發生了產業革命，因而促進了商品經濟，營利制度的發展，以致產生了近代資本主義社會，而中世紀的農奴制度，閉鎖經濟，亦即以自然經濟爲主要特徵的封建經濟，便不得不起根本的變化。近代資本主義的主要特徵，可以說就是商品經濟，而商品經濟，則是以生產商品，賺取利潤，以實現其剩餘價值之剝削爲基本形態，由此基本形態，便使生產，交換，乃致一切經濟活動，都只成爲實現剩餘價值的附屬

，亦即成為營利主義之附屬，由營利主義帶來的利已的狹隘的個人主義，便要求打破封建制的『身分』差別，及一切束縛，而承認個人之自由平等，俾不但其自身可以從封建制之壓迫下解放出來，以便從事於營利之自由，而且企圖把一切人都捲入商品經濟之下，以實現其資本主義王國，無限制的展開其資本主義發展的前途。所以資本主義對之封建制是富激的。這樣，便在政治制度與社會意識方面，也開始發生新的變化了。（註一）

（註二）我們可以說這種要求打破封建制的『身分』差別及一切束縛之個人主義，亦即發展商品經濟，實行營利自由之營利主義及其帶來的利已的狹隘的個人主義，實為產生政治上的民主自由或民主主義之最基本的根據，由民主主義產生民意機關，選舉制度等等，形成民主政治之基本形態或初步形態，由此而各個人之一切自由，如人身、居住、遷徙、營業、買賣、信仰、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等之自由，苟非違反國家利益，與公共法律發生抵觸，不得干涉，尤其私有財產之神聖不可侵犯權，成為保障此種權利的一切法律之最重要規定，根據此種精神所表現出來的社會意識，亦即由於營利主義的經濟特徵，因而由於個人主義的政治特徵所表現出來的社會意識，便不得不以實利主義，個人主義、實際個性主義、自由主義等等為特徵，由此特徵表現在學術思想上的，便傾向於以自然科學為骨幹的機械觀，表現在方法論上的，便傾向於注重個人之感覺經驗，及歸

中於客觀對象之孤立的認識的歸納法。而其根本特徵，則爲自由發揮其思想，研究學達一切猶從實用或實利打算。所以在資本主義所支配的政治制度及社會思想，並向其經濟結構一樣，較之封建制是高級的，而民主政治在此時也就成爲較完全較發展的形式。

同時，由於資本主義社會之成立，商品經濟之發達，打破了地方經濟，閉鎖經濟的割據狀態，把一些言語，文字，社會習慣不同，乃至地域不相聯屬的許多個人或種族，也以資本主義的商品經濟作紐帶，進行着國民統一和種族同化的運動，形成一種新的民族。這種溶化各種族而成的民族，其自然的特徵（如膚色）雖不能一時化除之，而社會的特徵（如共同的經濟關係，語言，文字之共同等等）却成爲支配全部國民生活的重要因素，他們爲儘量發展其商品經濟，爲無限制的展開其資本主義發展的前途，必然要求着國內市場的統一，國外市場的開拓，因而必然要求着一個獨立自由組織堅強的民族國家。所以在這個時候，民族主義運動，抑或國家主義運動，也就勃然興起，形成一種與民主主義運動相互并存的潮流，或者說成爲一種與民主主義運動相互並行的支流。所以一個資本主義社會的成立，它必然一面是反封建的；另一面是反異民族壓迫的，而民族民主革命，便成爲資本主義出生的產婆。

因此，所謂革命之基本意識，並不是單指一般所描寫的屠殺與斷頭機，鬥爭與恐怖

命乃是指的某種歷史階段或某種社會構造之一系列的變革，包括從經濟結構到政治制度，到文化思想一系列的變革。所以民族之民主革命，或單言民主革命（因民族運動常常是民族運動的一部分）都是具有一定經濟及政治內容到一定文化思想內容的革命總稱。而這種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其最基本的特徵，則為摧毀封建制的農奴經濟，掃除資本主義發展的障礙，建立近代的資本主義社會。由民主革命到民主政治的實現，由民主政治的實現到民主共和國的建立，這是一串必經的過程。

如前所說，民主政治之較完全較發展的形式，是近代歷史的產物——是近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物。然則所謂近代或近代資本主義社會，究從何時開始呢？我們可以說它的開始約在十五世紀，即在中世紀之末，當時發現了新大陸，世界貿易急速發展，封建制的經濟開始崩解，資本主義的經濟開始生長，因而產生了十六世紀的尼德蘭的民主革命，產生了十六世紀的德國宗教改革運動——這也是一種適應新興市民要求的民主革命運動。接着有十七世紀中葉的英國革命，十八世紀後半期的美國獨立運動與法國的大革命，更有十九世紀五十年代的德國革命及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的德意志、意大利的統一運動。從十六世紀一直到現在，這一民主革命運動，可以說還沒有結束，由於在世界範圍內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民主革命在時間上有先後，其發展過程與表現形式，也並

不一致，惟從其發生到現在，確已有了將近四百年的歷史，所謂『近代』就是指這將近四百年的歷史說的。

雖然近代的民主制，就其形式說，是較發展較完全的，但它也同古代奴隸社會中世紀封建社會的民主制一樣，不同的國家形式，決不能變更其所代表的階級內容，如果古代和中世紀的國家，不論其爲君主國或共和國，都是奴隸主人和封建領主的國家，則近代資本主義的國家，也不論其爲君主立憲國或民主共和國，將都是資本所有者的國家，因而所謂近代民主政治，仍然只是少數人的民主，不能與我們開頭所標舉的民主概念全相符合。就其形式說，成爲近代民主之特徵的東西，就是規定國家組織，機關職權，人民權利義務等等之一大套憲法及其他保障私有財產權之一大套公私法律條文，在法律條文上，我們可以舉出下列基本規定，如一、法律之前，萬民平等；二、人民在法律上享有如下各種權利，如人身、居住、遷徙、貿易、營業、信仰、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等之自由權；三、國家主權，屬於人民全體；四、國家最高權，由人民選舉之立法機關行使之（民意機關代議制度）；五、人民制定國家根本大法（憲法），全國上下，皆須與同遵守……。然這些都不過是民主之現象形態，形式騙局，法國號稱民主制的母邦，雖曾於臨死時痛呼：「共和國滅亡了，強盜們勝利了！」「理想的王國」，不過

過（資本主義的王國）。仍然可以說，形式是民主的，實質（內容）是專制的。所以資本主義對封建制的革命，其目的並不在取消爲封建制服務的僧侶貴族專政，取消封建關係的榨取制度，只企圖改變榨取形式，把榨取的特權從一種人的手裏轉移到另一種人的手裏罷了。所以近代民主制的國家形式，並不根本破壞封建制的國家機構，只是改造這國家機構，加強這國家機構，使適合於資本制的需要罷了。等到資本主義實質的專政，由隱秘的形式發展到公開的法西斯獨裁的時候，便更加要把昨天的敵人——王公貴族，當做朋友，要把昨天的友人——人民大衆，當做仇敵，公然的回轉頭去寶貝那些僵死的落後的中世紀的封建殘渣，甚至採用宗教裁判等野蠻屠殺，焚書坑儒等殘酷暴行，把世界歷史硬拉回到民賊獨夫的黑暗世紀去。

這是因爲近代資本主義社會，雖然由於產業革命所引起的經濟變革，產生了近代的民主主義，同時也產生了民族主義，可是民主，民族問題，不但未因資本主義的發展獲得解決，反而生長了新的內容，新的矛盾。例如資本主義社會的民主，在表面上（亦即在法律條文上）承認法律之前，萬民平等，但在實際上卻以財產的差別，納稅的差別，教育程度的差別，抑或男女兩性之差別等等，自己否定了自己，這等於從左手給出去的東西，用右手收回來。其於民族主義的矛盾，則尤顯然，在其內部，既因經濟上的不

等，引起民族的分裂（同一民族分成有產者與無產者）；而在其對外關係上，則因資本主義的對外發展，引起民族間的衝突（強大民族與弱小民族間的衝突）。等到資本主義發展到了最後階段，亦即帝國主義階段，所有民主問題，民族問題，不但未曾解決，其矛盾衝突的程度反益加尖銳化，嚴重化起來了，那些資本主義發展不成熟，或者先天不足，或落後太不良的國家（既無良好的資源，又無良好的市場，更無廣大殖民地供其榨取，因而民主政治，原來就不十分發達，內部階級矛盾，無從緩和，外而又受強大帝國主義之威脅——這即是所謂資本主義最弱之一環），一遇特殊事變（如世界大戰），或則爆發社會革命（如舊俄），或陷在夾攻中（內有社會革命危險，外有淪爲強大帝國主義之附屬的夾攻中）走上公開專政的法西斯之路（如德意日）。這可以說是近代資本主義社會歷史發展法則的必然結果。

但這並沒有否定近代資本主義社會及其表現在民主，民族問題上的進步因素。例如資本主義社會較之封建社會，確實在歷史的軌跡上進了一步——它提高了社會的生產力，取消了農奴制超經濟的剝削，造成了資本主義社會轉化爲更高級社會的條件，其表現在民主，民族問題上，特別是民主問題上，雖然也只是形式的民主，但其形式與內容之本質的規定，與其有著某些對立的一致（法律如果規定了工人的選舉權，工人總有可能

投一票），而且形式的民主也曾開闢了有限性的某些自由平等的園地，使得人民大衆的解放鬥爭，更加容易。爭取解放的人民大衆，懂得戰略戰術的革命政黨，向來不會因爲資本制民主的有限性，虛僞性，或在某些地方確乎是徒具形式，而拒絕使用這一武器，或輕輕放棄這一武器，抑或藐視這一武器（形式的民主這一武器）。

（況且一切都是發展的，近代資本制的民主政治，也在發展。在發展中加深民主，民族問題的矛盾，同時，也在不得不走向緩和矛盾，乃至消滅矛盾的路途。事實很明白的告訴我們，除非有資本制的根本改革，像俄國十月革命一樣，法西斯主義是絕對不能消滅民主，民族問題的矛盾，乃至緩和矛盾的，事實很明白的告訴我們，民主制度的缺點，只能由更廣泛更純粹的民主來補救，這就是說形式的民主的缺點，只能由實質的民主來補救。隨着資本制民主的發展，其形式與內容對立的不一致性也在展開。試再就歷史的軌跡加以一番追尋，我們便知道近代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到了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便顯示出兩個主要不同階段：在這以前，是產業資本階段，亦即自由競爭與有支配性的階段；以後是財政資本壟斷一切的階段，亦即帝國主義階段。兩個階段的資本主義，自無實質上的區別，因而其民主制，也都未能完全達到實質的民主，換言之，資本制的民主，總是資本所有者的民主。但不能因此得出結論說，資本制的民主，不能在其發展的

階段上，使其統治權力，政治領導有所改變。事實很明白的告訴我們，資本制度發展到了帝國主義階段，民主，民族問題的矛盾愈加尖銳化，嚴重化，使得某些資本主義國家（如德意資本主義最弱的一環），不走向社會革命，就走向法西斯獨裁，而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如英、美等資源較豐富，市場較擴大，殖民地較多，階級矛盾尚不尖銳，因而民主政治亦有其基礎的國家，其統治權力或政治領導的執行，除資本所有者外，使不能分潤到非資本所有者，或小資本所有者，乃至一切社會階層的利益，使其民主缺點得以補救，而使其政治基礎得以擴大，使其所受於法西斯野蠻侵略的威脅得以消除。因之在這種情形之下，民主，民族問題的矛盾，便轉化或總結為民主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矛盾，由於法西斯主義之內而恐懼社會革命，極端仇視社會主義的蘇聯，外而要求殖民地與世界市場之再分割，極端仇視英美，而企圖以極野蠻的無人性的，較之中世紀尤為黑暗的統治，強固其少數金融寡頭地位，壓迫工農人民，反對民主、自由，挑動戰爭和準備征服世界，遂爆發為此次全世界民主主義反法西斯主義的大戰。由於民主主義反法西斯主義的戰爭，必然是民主統一戰線的（在國際不分蘇聯與英美，在國內不分階級、黨派、宗教、種族、民族、性別的民主統一戰線），所以其本身已不能不由形式的民主逐漸走向實質的民主，即資本所有者一階級的統治，便不能不照顧到社會階層的各方面

主，而那些從法西斯侵略解放出來的新國家中，便在民族戰線，民主戰線，愛國戰線的名各民主黨派[illegible]古典的議會民主的一個的形式下，各黨各派各社會階層的聯合政府[illegible]統治，各黨各派之聯合參加政權，即是由各黨各派各社會階層聯合執行統治權力，政治須導，不提倡一黨專政，在形式上（法律條文上）規定國家主權屬於國民全體，而在實質上則是資本所有者一階級專政。因此，凡屬資本所有者一階級專政的民主政治，可以說是過去的舊型的民主政治；凡屬各黨各派各社會階層的聯合政權，則是今天與有支配性的新型的民主政治。

但當然，我們絕對不能看掉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已經有了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國家，它所行的是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多數人民對於少數貴族、資產者等的專政），而在實際上是一個社會主義的民主國家（最大多數人的民主）。所以它的民主政治是無產階級的民主政治。它的最大特徵有二：一、是國家政權，確實掌握在最大多數的無產階級手中；二、為實行沒收土地及一切生產機關為國有（取消私有制），才消滅了社會上的階級之對立；因此，它對於大多數的工農說是民主的，對於少數地主資本家說，則是專政；可是這種專政，并不是以擴大民主，民族問題的矛盾為目標；而是以最後消滅階級矛盾，因而最後消滅民主，民族問題的矛盾，以建設社會主義乃至共產

主義社會為目標。因而其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五日所通過的新憲法，便實現了由形式的民主到實質的民主之社會主義的更高級的民主政治，根據這個新憲法的規定：（1）它實現了以社會主義經濟為基礎的經濟平等——例如取消凡足以造成剝削他人的私有權；同時，并積極促進社會主義，生產及消滅一切階級。（2）廣泛的確立以工農為中心的無男女，種族，宗教信仰等差別之公民權，并以各種積極條件保證之——例如其公民的工作權，即以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保證之；其公民的休息權，即以減少工作時間，休假給薪，建立多數的休養所及療養所等保證之，（3）其政治組織，採取直接民主制，對於創制，複決，罷免等權，既可充分行使，且以立法機關為中心，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權之統一制，而最高權力機關，則以聯盟會議與民族會議相并行，一面保證全聯盟之集中運用，一面保證各民族之平衡發展。（4）實行公民之普選制，不拘教育程度，居住年限，社會出身，財產狀況（這與前述資本制的選舉正相反），凡十八歲以上之公民，皆有選舉與被選舉權，且於選舉時，採秘密投票制，以上僅略舉其主要之點，已充分證以看出它與過去的一切民主制相較，是更高級的民主，只有在這種更高級的民主制下，民主與民族問題的矛盾，才徹底解決了。這種更高級的民主政治（社會主義的民主制）可以說是最新型的民主政治。

舊型的民主政治——新型的民主政治——最新型的民主政治，還是民主政治發展之必然的史序。舊型的民主政治，它是資本主義發展到一階段的產物——自由競爭資本主義階段的產物，其根本特徵，爲其統治權力，或政治領導，掌握在資本所有者階級手裏；新型的民主政治，它是資本主義發展後一階段的產物——壟斷資本主義階段的產物。其根本特徵，爲其統治權力或政治領導，掌握在資本所有者，小資本所有者，或非資本所有者的各社會階層聯合手裏（其所謂聯合政權的重心，反而是由非資本所有者所支撐着）；最新型的民主政治，同樣是壟斷資本主義階段的產物——帝國主義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前夜。其根本特徵，爲其統治權力或政治領導，掌握在非資本所有者，亦即無產階級一階級手裏（但其最後目標，在消滅階級，因而消滅一切矛盾）。

這樣，舊型的民主政治，可以說已經失去了它的黃金時代，這裏我們可以不必多論。最新型的民主政治，雖然在社會主義國家的蘇聯已經實現，而且是無疑義的要成爲將來一定時期中之世界的政治統治形式，但在今天還不可能在全世界範圍內一下子形成；這裏我們也可以暫置不論，至於新型的民主政治，則正是當前「天之驕子」，歷史的「寵兒」，我們却不能不在這裏加以申說，略加探索。新型的民主，它在這次民主主義反法西斯主義戰爭以前，就在歐洲政治舞台上，已經有過若干嘗試，例如納粹攫取

德國政權以前，德國人民大衆爲了阻止德國大資本所有者絞殺民主的陰謀，而組織的人民革命政權、就是一例；一九三六年西班牙反法西斯的民衆陣綫的共和政府，又是一例；一九三六和一九三八年，以法國各階層人民聯合組成的民主陣綫爲支柱的反法西斯反獨佔資本的勃魯姆內閣，是第三個例子，然而因爲當時客觀主觀條件都不夠，它們都不能不歸於暫時失敗，只有經過這次全世界民主主義反法西斯戰爭的砲火，亦即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砲火，於熊熊之火的大洪爐中把它燃燒起來了，把它熔鑄成器了，而且鍛鍊得更結實，更強大，更具體，它的一往無前的波瀾壯闊的精神，和其新鮮活潑光輝充實的理論系統，表現在一九四一年八月十四日羅斯福大西洋憲章裏面，表現在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二十六國共同宣言裏面，更表現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一日莫斯科會議公報及四國普遍安全宣言，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一日德黑蘭會議公報及其宣言裏面。從德黑蘭到克里米亞，到舊金山會議，都是一貫的精神。它的各黨各派聯合政府或聯合政權，亦即其壯大，結實，具體的新姿態，則表現在法蘭西、意大利、南斯拉夫、羅馬尼亞、保加利亞、波蘭、匈牙利等所有新從法西斯侵略解放出來的各國政府形式裏，至於它的真實內容，亦即新型民主之「新」的特點，概括的說，則完全符合於我們開頭所標舉的「民主概念」，亦即符合於『民有、民主、民享』之真諦，具體的說，則是它將要從政治的民

主擴展到經濟的民主，從國內的民主擴展到國際的民主。要儘可能消滅（至少是緩和）民主與民族問題的矛盾。所以它處理民主問題的根本方針，是廣泛的民主自由（政治的平等）；處理民族問題的根本方針，是徹底的民族自決（民族的平等）；處理人民生活問題的根本方針，是普遍的民生幸福（經濟的平等）。同時，更其重要的，成為政治的民主，經濟的民主，國內的民主，國際的民主之決定環節的，是它的統治權力或政治領導，將不再為資本所有者一階級所掌握，而是共同掌握在小資本所有者，或非資本所有者，乃至各個社會階層手裏，即在於它是人民大衆的或全民的（且是以勞苦羣衆為重心），而非少數財勢分子的；是接近於實質的而非徒具形式的，是表裏一致的而非虛偽矇人的；是不斷進步的（必然進步到最新型的民主），而非保守倒退的。這樣包括這麼多新的特點的新型的民主，正是當前支配世界普遍政治生活的主潮，亦即當前民主政治的新趨勢。

四　民主政治的歷史範疇及其特質

近人因為中國歷史上有宰相制度和布衣可以拜相等等事實，就說中國幾千年來的政治，都是民主政治。又有人說中國的民主政治，只有將近五十年的歷史，這五十年來的中國，已是民主政治的中國，現在還有人來爭民主，是反動派別有用心。再則有人說，當前中國以及世界的主潮，還是民族革命，並不是民主革命。這都顯然是站在各自認為有利的主觀立場，隨意對於民主政治的一偏說法，藉以為現實開脫，辯護。此外也不少真心擁護民主政治的人，把當前民主的需要，單純從人與人應該平等的一種政治道德論出發。把民主政治看作超時空的倫理範疇；而不是一定的歷史發展過程產生出來的歷史範疇。這樣就會使得民主政治的特質或本質不確定，不具體，而民主政治的現實性，也沒有什麼必然性。本文對於上述各種意見，并未各別提出，加以批判；甚至沒有一字一句觸及這些問題的邊緣。但讀完了本文以後，卻可能對於這些問題得到較為正確的理解。

一、從封建制及其特點說起

民主政治，是一定的歷史發展過程上的產物——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物，所以它必然有其一定的社會經濟內容。如不先從產生它的一定的社會經濟內容分析開始，決不能正確的了解這一問題。資本主義社會，是直接承繼封建社會而起之一歷史階段，得要說到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生（它是產生近代民主政治的主要經濟內容），也就不能不涉及封建社會的各方面及其特點。這樣，才能說到資本主義社會，怎樣從封建社會的母胎內產生出來，而又怎樣發展下去。

封建社會，是直接繼承奴隸社會而起之一歷史階段，在經濟上，它所表現的特點：第一、是自然經濟的統治。第二、是直接生產者的農民分有生產手段這些生產手段裏面，主要是土地，農民即固着於土地：第三、是農民或農奴對於封建領主的依存性。總而言之，即爲生產力的低下與封建剝削的苛重。因此，那時的生產技術，是農業與手工業的結合，商品交換不發達，自然經濟佔統治地位。稍後，在逐漸成長起來的城市中，發展了手工業的生產，於是開始了手工業與農業的分離，然而生產力仍是低下的。在這種生產力的基礎之上，便產生了一種適應這種生產力的生產關係。在這種生產關係裏面

，是封建領主擁有廣大的土地，而直接生產者的農民，則很少土地或甚至沒有土地，并且還把生產者束縛在土地之上（農奴制度），施以超經濟的剝削，於是形成封建領主與農奴之尖銳的對立。不過在農奴與封建領主之間，也還存在有某些自由農民與手工業者的生產手段之私有，以及利用自己勞動力的小經濟。這種小經濟，亦即細小的個人生產，生產手段只適於個人使用，自然是簡陋的、細小的、效能有限的；但其發展的前途，便已有着或包含着未來的資本主義生產之萌芽。

在封建社會內，主要生產的目的，原是為着生產者自己或封建領主之直接消費。但在生產有了超過直接消費的剩餘之時，剩餘之生產品，便要拿去出賣，拿去交換。隨着商品交換的增加，遂漸發展了城市。在城市中又發展了手工業，手工業主為保護自己的特權，更組織了一種行會。這種行會，一方面對外排斥競爭者；另一方面對內壓制幫工與學徒，於是又形成手工業主或師傅與幫工學徒之尖銳的對立。然而由於商品經濟在手工業經濟之下發展的結果，便產生出來了近代工商業家或企業家，亦即所謂市民階級。前述這些市民階級，自然就是由城市的手工業主或商業資本家蛻變而來的。

這樣便從封建經濟基礎之上，建築起來一種封建的政治制度，其特點當然就是封建領主（包括僧侶、貴族、國王）對於農奴或農民之直接壓迫。手工業主（包括師傅、工

頭」對於幫工，學徒之直接壓迫，而其壓迫的主要手段。則爲封建的國家機構。這種國家，在形式上，有帝制的，有共和的，帝制形式的封建國家，承認一人專權，共和形式的封建國家，則承認地主社會的被選者多少參加政權。但無論採取何種形式，這種國家的，都是代表封建領主的利益來統治農奴或農民的。

在這樣的經濟政治條件之下，廣大的農奴或農民羣衆，物質生活當然非常痛苦，精神生活，更無從發展。因此，在封建時代，也就充滿了農民的起義及農民對於封建領主的反抗。但由於農民在經濟上、政治上、和文化上，都不能單獨領導一種反封建領主的革命，因而不能把封建社會推向前進一步，展開一個歷史上的新階段。

二、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生

由於封建社會內部分工的發展與商品經濟繁盛，自然要產生一種商業資本出來。不過單純的商業資本，并不代表一種特殊的生產方式，即它不能產生一種有以異於封建制度的生產方式。但它可能在農村封建的自然經濟中，在城市行會把持的閉鎖經濟中發生一種協助作用，促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的條件。城市發達了，市場擴大了，商業資本就要抬頭，商人居於手工業者與直接消費者之

間，把手工業者的生產品，轉賣給消費者。這樣，商人及商業資本就可能使手工業者依附於自己，而佔取手工業者一部分剩餘勞動。更進一步商業資本家就可能侵入手工業生產過程的本身，創設手工業工場，使自己成爲工商業家，而控制其餘手工業者，并使大批手工業者陷於破產。同時，由於手工業者要依賴商業資本家，因而要受商業資本家剝削。於是爲取償起見，手工業者又要轉而加緊剝削其幫工、學徒，使大批幫工學徒成爲無產者。在這種情形之下，某些或少數不大依賴商業資本的自製自賣的手工業中間，也可能產生富有者。這些少數富有者，也可能逐漸擴大自己的企業，變成資本主義的企業家；一方面從破產的手工業者與幫工學徒中間，產生近代資本主義社會無產者的前身；另方面從商業資本家，手工業主中間，並生出近代資本主義社會有產者的前身，這便是城市中的情形。

在農村中，也是一樣，商品經濟與貨幣經濟，不斷在前發展，因而刺激了封建領主的貪欲，使他們需要外來的奢侈品，使他們需要購買奢侈品的貨幣（現錢）。那麼，貨幣從那裏來呢？封建領主們，便只有加重對農民的剝削，加重賦稅和地租；他們不僅加重地租，而且還把物品地租改爲貨幣地租，苛捐雜稅，更是層出不窮。這樣，農民也需要貨幣（現錢）。那麼，農民的貨幣又從那裏來呢？他們便只有把農產品拿到市場上去

實——「三月賣新絲，五月賣新穀」，正是爲此。這樣，農民生活，便日趨痛苦，其中極大一部分農民，便更趨貧困化，最後便不得不變成無產者或半無產者。但另一方面，也不乏少數的殷實者，在大部分農民貧困化的條件之下，可能在農村中投機致富，並且用錢購買自己的封建義務，因而成爲自由農民，且成爲農村中的富農。總之在農村中，由於商品經濟與貨幣經濟的發展，使得舊的封建經濟，也不能繼續下去，於是農村中的資本主義也隨之產生了。

三、資本主義產生的前提及其發展階段

產生資本主義歷史的前提，可以說有兩個；一、是相當數量貨幣的積累；二、是除了出賣勞動力別無生活方法的自由勞動者之存在。

至於資本主義的發展經過，可以說有下列三個階段；一、是小商品生產的階段；二、是手工業工場的階段；三、是機器大工業的階段。這三個階段，首先在技術上是各不相同的。例如小商品生產，應用非常原始的手工技術；手工業工場集合工作者在一起，開始採用分工制度，但個別的手工業生產還是繼續存在；只有大工業採用機器，才引起技術上急劇的改變。

在這三個階段上，由於技術不同，因而生產狀況也不同。譬如在小商品生產中，已開始發生了某些資本主義關係（例如已經有了某些僱傭工人的作坊），但還沒有發展，還沒有形成生產關係中各階層尖銳的對立。在手工業工場中，較大資本與較多之無產者階層就形成了，生產手段所有者與工作者之間的距離就擴大了。可是小作坊的衆多（在小商品生產與手工業工場兩個階段，都是主要的小作坊），對於土地關係的保留，以及生產上、生活上，舊傳統的保留，造成手工業工場中生產手段所有者與工作者之間的許多中間成分，阻礙着這兩極分化的發展。到了機器大工業階段，生產規模就更大，社會對立的兩個極端——少數資本家與大批無產者兩個極端，便達到高度的發展了。

在這三個階段本身由於技術不同而生產發展的性質也就各有不同。譬如在小商品生產中，手工業生產者，雖已開始與農業分離，但大部份還是從事耕種，小手工業與小農業還是有很深的聯繫。因之當時市場也很狹窄，生產者與消費者中間的距離不大，人口也很少流動，只須小規模的生產，就能適應很少的本地需要。所以這種小商品生產[illegible]，即小手工業生產，表示某種固定性；同時也表示出技術的停滯，以及包含很多封建殘餘的宗法社會關係的保留。在手工業工場中，手工業生產者與農民的分離，已經擴脹，一方將獨立的手工業者，形成了好些中心城市，而且手工業生產者的主要代表，已經資——

固[illegible]的是工場手工業[illegible]入，開始方面是手工業者的與[illegible]與[illegible]的技術[illegible]
業者的[illegible]場[illegible]是適合於它的生活水平與文化水平。這時手工業工場，已是發着它的[illegible]
性而發展[illegible]有時[illegible]還是帶着全國市場而進行生產，於是生產的逐漸發展不固定性
也不過[illegible]手工業工人[illegible]在一定區域內[illegible]的流動性還是不大。到了大機器工
業時代，就是大工業生產便是最後把工業與農業分離開來，造成了與農民分離的產業工
人，而他們與農民有不同的生活方式，有不同的家庭關係和不同的物質的及精神的需要。各地的
人聚集於[illegible]不同[illegible]被吸收到工廠中來了。因此，如果在小商品生產（小
手工業生產）上，與手工業工場的階級，我們還看到宗法社會關係與個人經濟關係的殘
餘的話，那麼在大工業機器工業生產的階級上，這種殘餘被消滅了，大城市與便利的
交通工具會[illegible]的[illegible]來。人口的流動性，激烈的加起來，工業已經不是單為本地
生產[illegible]而是為全世界生產[illegible]。在這種情形之下，一大批小生產者漸漸破
產而流為無產者。工業生產表現出極大的不固定性。繁榮之後，發生危機。危機帶着週
期性，不斷的把生產者，時而吸收於工廠之中，時而拋棄於工廠之外，巨大的失業工人
即成為產業後備軍，巨大的產業後備軍，形成資本主義大工業存在與發展的條件。
這樣，從封建社會內部產生出來發展起來的資本主義，就明顯的表示出來是一種新

的社會制度。

四、資本主義發展的障礙之一——封建殘餘

但資本主義的發展，并不是沒有障礙的。此種障礙之一，就是封建殘餘，它在許多國家中，曾經嚴重的存在過。而且在許多比較落後的國家，現在還存在着。

在封建制度之下，廣大的土地，都掌握在封建領主手裏，封建領主，不僅是憑藉自已所掌握的土地，而且還憑藉超經濟（經濟外的權力的強制）的權力來剝削農奴或農民。封建制所不同於資本主義的，有如下主要三點：一、封建經濟是自然經濟佔統治地位，而資本主義經濟，則是商品經濟。二、在封建經濟中，剝削手段是將生產者的農民束縛於土地之上，使生產者能有自己的農具與牲畜，除為地主工作外，并經營自己的一小塊份地。無地，無農具與牲畜的農民，是不適於封建制或農奴制的剝削的。而資本主義經濟，則要使生產者脫離生產手段。因為資本所有者為要剝削勞動者，為要獲得利潤，正需要無地，無農具與牲畜而自由出賣勞動力的工人。三、在封建制度下，生產者個人與農奴對地主，他們是在強制之下為地主工作的，這即是所謂超經濟的剝削。這樣的經濟制度，主要便是經濟外的權力的強制，亦即農奴制度，在這種制度之下，法律上的不平等

，貴族，僧侶的特權，人民的無權利等，乃是必然要產生出來的事。而理想的資本主義，則是資本所有者與勞動者在自由市場上完全自由訂約，法律之前，萬人平等。這種封建農奴制的存在，當然是要障礙資本主義的發展的。農村中的情形，固然如此，由着商品經濟的發展，完整的農奴制的剝削關係，當然要受到一些分解，但如果不有劇烈的徹底的變革，封建殘餘形仍然會嚴重的存在，障礙着資本主義的發展，以至於影響到城市。

在城市中，資本主義的生產，直接遭受封建關係障礙的是行會制度。行會制度，保證手工業主的特權，因而它不許未加入某業行會的人從事該行職業的生產，而且使加入行會時有種種困難。它用嚴格的繁瑣的章程與經濟外的強制辦法，來管轄生產，禁止各行業間的自由競爭，同時，在行會內存在有嚴格的等級制度（即不平等的身分關係）。這種城市中的封建性的組織，是對於資本主義生產發展的桎梏。如要打破它，也需要有劇烈的徹底的變革。

三

可是成爲資本主義發展的桎梏的封建的經濟結構，是有封建勢力的政治統制爲其後盾的，這種政治統制的封建性，是嚴格的等級制度，特權上層等級的專權，人民的無權，例如大革命前的法國亦即封建性的法國，其內部的等級顯分三等：第一個等級，是天

貴族、教會及其僧侶，他們佔有大批土地，擁有大批財產，自己不負任何租稅義務，而卻從人民徵收一什一稅。第二個等級，是貴族，他們坐享特權，不負擔國家任何義務。第三個等級，是平民，其中包括近代資產階級及近代無產階級前身的城市貧民與農民。他們是沒有任何權利的，尤其是城市中的貧民與農民。再如在沙皇制度的俄國，其無限制的最高權力的統治形式，也完全屬於沙皇及其官僚嬪侯。沙皇頒佈法令，任命官吏，聚斂全國的財富，使用人民的血汗錢，而人民不能有權參加立法機關以及對於國家的管理或監督。所以沙皇專制的封建統治，就是官吏與警察之絕對專權，人民之絕對無權。這種統治形式，保護着過去舊的等級特權，壓迫剝削廣大人民，當然對於新生產力的發展是極大障礙，這種障礙不除去，資本主義的發展則不可能。

封建統治的另一種表現，是封建的割據狀態與封建國家內部的不統一。在一個封建國家內，許多封建領主，各據一方，自有封建軍隊，自有封建政府與法庭。在各封建領主的割據狀態下，橫着許多關卡壁壘。交通、貨幣，乃至度量衡制度，都是不統一的。即使各封建領主擁戴一個大封建領主為國王，實際上全國還是分崩離析，各不相下，封建領主間的戰爭，更是層出不窮。例如大革命前的法國，雖然國王在名義上擁有全國的國土，當時國內分為三十五省，各省管理各自的經濟，政治與軍事等等，互相割據，並

建形成一個眞正統一的國家。再如德國，在一八四八年革命以後，全德仍有三十六個封建割據的大小國家（包括獨立的王國、公國、獨立城市等），互爭雄長，勢不相下，因之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德國並不是一個統一國家，國內也沒有統一市場。

這種封建割據與國家不統一狀態，也正是對於資本主義發展的一種極大障礙。因之，經濟上的封建剝削關係與政治上的封建勢力統治及封建割據狀態，如果不肅清，資本主義就不可能自由的暢快的發展。

五、資本主義發展的障礙——民族壓迫

資本主義的發展，除了封建殘餘的障礙以外，在某些國家，還遇到異民族壓迫的障礙，這種障礙較之封建殘餘的障礙，更爲不易掃除。

資本主義在西歐的產生，不僅把本國的農民與手工業者分散的生產手段，轉變爲集中的生產手段，把多數人零細所有的財產，轉變爲少數人集中所有的財產，使他們成爲消費了自己的勞動力外別無生活方法的無產者，而且它還以更加殘酷的方法，侵奪殖民地及他國人民的財富。「美洲金銀產地的發現，美洲土著居民之被剿滅、被奴化、被埋於礦內，東印度之被征服與劫掠之開始，非洲之被轉化爲黑人貿易的獵奪場……等等事

所」，這都表示了資本主義生產時代的曙光」。（見資本論第一卷中文版六四二頁）這種對於美洲、亞洲、澳洲各殖民地兇暴的掠奪，不但曾是原始資本積累的主要因素，而且是在後資本主義發展以至帝國主義勢力的主要因素之一。早在十七世紀，資本制度的荷蘭，就已對殖民地展示了一幅極度無信義、賄賂、虐殺、卑劣的圖畫。這種殖民地，對當時歐洲資本主義的發展，是有極大影響的。它對當時在萌長中的手工工場業，提供市場，與依市場的獨佔，引起加強的資本積累。在歐洲外部，直接由劫掠、奴役、屠殺等等手段所積累的財寶，都流到母國轉化為資本。

這樣，早起的資本主義國家，不但從剝奪本國農民與手工業者（小生產者）的血汗中，而且還從劫掠殖民地及外國人民的血汗中成長起來。

西歐早起的資本主義國家，不但劫掠歐洲以外的殖民地的土人，而且還千方百計侵凌與壓榨歐洲的弱小民族與殖民地的本國移民。例如英國對於愛爾蘭民族的壓迫與對於北美殖民地的壓制（美國未獨立前）等等。在愛爾蘭，英國的貴族，曾掠奪了愛爾蘭人民的土地，曾是愛爾蘭最大之地主，而英國的資產階級，則把愛爾蘭當做英格蘭的一個農業區域，供給英格蘭以羊毛、家畜，並供給英格蘭以產業上軍事上的新兵（指工人與兵士）。這樣，英國的貴族（稍後成為資產階級化的貴族）與英國的資產階級，用了種

種方法打擊榨取愛爾蘭民族，阻礙愛爾蘭本身資本主義的發展。在北美，一七七六年美國未獨立以前，英國資產階級的殖民政策，也是將它作為一個農業區域，使它只能成為英國的市場與原料供給地。英國這種殖民政策，也就成為美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障礙。美國與愛爾蘭為要發展自己的資本主義，就不能不推翻英國的殖民地統治而宣佈獨立（愛爾蘭獨立運動，直到現在，還未成功）。

在資本主義開始發展的時期，歐洲還有一些新興資本主義國家反而處在外國反動的封建君主專制之下，不能發展本國的資本主義，這是封建的落後的民族對於新興資本主義國家之壓迫，新興資本主義國家要求推翻這種異族壓迫以發展自己的資本主義。例如十六世紀的尼德蘭，曾是歐洲當時工商業最發達的國家，可是它卻處在西班牙王朝封建專制壓迫之下，因之，尼德蘭為要發展自己國家的資本主義，便不能不起來推翻西班牙封建專制的壓迫。再如十九世紀的意大利，它既受奧國壓迫，又受法國壓迫，加以國內四分五裂，資本主義的發展，也受着很大阻礙，不打破這種阻礙，意大利資本主義的發展是不可能的。

因此，資本主義的發展，在這種情形之下，顯現着好像是一種矛盾的現象——一方面造成經濟政治生活的國際化；另一方面造成強烈的反對異民族壓迫，建立民族國

家的鬥爭。

早起的資本主義國家，是如何吮吸着殖民地民衆的血汗以自肥，又是如何破壞被壓迫民族的新生產力，并阻礙其新生產力的發展，我們在上面已經約略指出。等到帝國主義時代，由於殖民地的瓜分已經完結，先進的帝國主義國家，則加緊壓榨殖民地來發揚出本國生存條件對於殖民地死活的依存性；後起的帝國主義國家，更須要急待的提出重分殖民地的要求，並加緊侵略和壓榨半殖民地。這種帝國主義的殖民政策，自然要更加殘酷的阻止殖民地半殖民地新生產力的發展。雖然帝國主義要輸出此資本到殖民地半殖民地去，但是它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所建立的，主要只是些輕工業，或原料粗製工業，或以及一些便於殖民地統治與商品販賣企業。例如交通運輸以及供給殖民地軍隊與政府需用的某些消耗品等。在這種情形之下，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資本工業化，是說不上的；同時農業的衰落與農民的痛苦，更是驚人。這些被壓迫民族，亦即這些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經濟的發展與政治的獨立，都受到帝國主義横暴的阻礙。可是如說在資本主義還未發展到帝國主義時代，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及其人民，還不會有充分自覺的而相當有組織的反對民族壓迫運動的話，那麼，到了帝國主義時代，情形就不同了。

帝國主義的殖民政策，雖然是更加殘酷的阻礙殖民地半殖民地資本主義的發展，但

隨着帝國主義本身壓迫剝削的需要，却又不能不在客觀上造成殖民地半殖民地資本主義發展的某些條件。例如對於殖民地半殖民地舊的自然經濟的破壞，商品經濟的發展，國內市場的增加，交通設備，水運，陸運，郵政，電報等的進步與土著資本的某些積聚，及殖民地勞動力的供給等等。這樣，在許多磨折與困難中，終究也產生了與發展了工業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資本主義，因之也就產生了這些國家內的民族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由此不可避免的得出如下的結論，即帝國主義一面滯落了殖民地國家中資本主義的發展，同時也就擴大了與加緊了殖民地民族與帝國主義間的鬥爭，而帝國主義從與自身適應中，不得不產生民族戰爭。這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反對民族壓迫的鬥爭以至民族解放戰爭，在帝國主義時代，亦即壟斷資本主義時代，正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因為世界革命，不可能是世界上一切國家無產者的統一行動，資本主義的發展是不平衡的，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和大多數人民，決不能在一個時候或一天都發展到資本主義階段，又約定在一個時候或一天統一舉行暴動起來發動世界革命，但在資本主義國家已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無產者反對資本制度的國內戰爭，成了支配世界革命的行動時，則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壓迫民族的反民族壓迫的反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運動，便成了與世界革命運動不可分的一部分了。國外壓迫民族壓迫的鬥爭，不僅是爲着求得本國民族的獨立解放，而同時也是爲着求得本

國民族統一的必要條件。因爲資本帝國主義之壓迫其他民族，不僅是利用自己雄厚的經濟政治力量，而且經常還採取分割統治挑撥離間的辦法，造成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自身的隔閡與分裂，以便於自己的控制與操縱。所以在某些國家裏，民族的不統一，不僅是由於封建關係的障礙，而且是由於資本帝國主義的壓迫與分裂政策，在這些國家裏，民族壓迫的推翻，便成爲實現民族統一的一個必需條件。

因之發展資本主義的必需條件，除了肅清封建殘餘外，還要推翻民族壓迫。

六　剷除兩種障礙的革命是民主革命

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資本主義這種新社會制度的產生（雖然它是另一種剝削的社會經濟制度，雖然它內部包藏着深刻的諸種矛盾，雖然它到一定歷史階段還要讓位於其繼承者），和其他一切新生的東西一樣，當其陣痛臨盆，呱呱墮地時，也是多災多難受着種種障礙的，這種種障礙的剷除，不能用和平的方法達到，而需要經過激烈的鬥爭的，這種鬥爭的行動，就是革命的行動，這種革命行動，就是反民族壓迫的民族革命與反封建統治的民主革命。這種民族，民主革命，亦可統稱爲民主革命。

爲什麼呢？因爲民主革命的主要內容，是剷除資本主義發展的障礙，造成資本主義

順利發展的條件，而資本主義戰勝封建主義的整個時代，是一個民主革命時代，歐美的民族運動，不過是當時資本主義戰勝封建主義的民主革命運動的一個旁枝罷了，所以一切民族運動的趨向，不外是要組織最能滿足現代資本主義要求的民族國家。資本主義要求發展國內市場，要求領土統一完整，要求語言統一等等。因而要求本民族脫離異民族壓迫而獨立。尤其是在西歐大陸上，從一七八九年起，到一八七一年止的這個時期，可以說是西歐民主革命的基本或代表時期，同時，恰恰又是西歐民族運動民族建國時期。民族革命運動在這裏，更是很明顯的表現出它不過是民主革命運動的一部分，所以民族，民主革命，實際上可以總稱為民主革命。

革命就狹義來說，是尖銳的鬥爭，是被壓迫階級或被壓迫民族對於壓迫者達到最殘酷程度的你死我活的鬥爭，沒有這種鬥爭，封建殘餘與民族壓迫決不會除去，而資本主義社會，也決不會產生。因之，民主革命（包括民族革命）的主要內容，就是剷除資本主義發展的障礙，造成資本主義順利進展的條件。因之這種內容，主要是經濟內容。任何革命，就其真正的重要的意義說來，如無經濟綱領的解決，是不能想像的。封建專制主義的傾覆，其內容是封建經濟的傾覆。拋去革命的經濟綱領，就等於拋棄革命的基本原因，就等於拋棄革命者所要求的真正利益（經濟利益），這種利益，是推動在困苦恐

於黑暗中的人民，進入偉大空前自我犧牲鬥爭中的槓桿。

然而任何革命同樣也不能沒有政治內容，革命本身就是一個偉大的政治行動。民主革命的經濟內容，需要經過政治行動來實現。民主革命的政治內容，是要打破封建貴族的統治，建立新興市民的統治；是要破壞封建貴族的法律、規則，建立新興市民的法律、規則；是要摧毀封建貴族的國家機構，政治組織，建立新興市民的國家機構，政治組織（同時也包含思想革命）。總而言之，民主革命是要在政治上掃除封建勢力，建立民主政治。

所以民主革命的經濟內容，是掃除封建經濟建立資本主義社會；它的政治內容，是掃除封建勢力，建立民主政治。所以民主革命的成功，產生了資本主義社會，也產生了民主政治。民主政治，是一定歷史過程上的產物，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物。

從上面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民主革命和民主政治，決不是在任何一個歷史時期中所能產生的，而是要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即資本主義已經發展並要求剷除資本主義發展的障礙時期，才能產生出來的，所以在資本主義尚未產生以前的封建社會，雖曾發生過許多次的農民革命，但這種革命，因爲農民在經濟上，不能代表歷史上一定生產方法的新要求，在政治上，文化上，不能有獨立的政治主張，文化政策，只得隨起隨倒，無法

完成其使命，並且不能具有近代民主革命的性質。只有在資本主義產生以後，或者說，具有歷史的階段已進入資本主義時代以後。在這一時代某些落後國家的農民革命，如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發生在中國、俄國的農民革命，才成為民主革命之一部分。同樣，在資本主義尚未產生以前的殖民地國家內，由於異民族壓迫所引起的民族革命，也不能算是民主革命。因為在那些國家裏，例如在非洲的某些落後國家，那些差不多沒有或完全沒有無產工人，大多數人民，還生活在部落狀況下，還保存着古老的氏族社會之殘餘，民族資產階級，也差不多沒有或完全沒有，外國壓迫者或帝國主義者，若要出現為掠奪土地的武裝佔領者，在這些地方，土著人民反外國民族的鬥爭，當然也還不是民主革命的性質。只有在資本主義時代，或帝國主義時代，被壓迫民族內已有了開始發展的資本主義，而外國壓迫者，不是主要成為掠奪土地的武裝佔領者出現，乃是為的在被壓迫民族內，輸出商品，輸出資本，吸收原料，因而客觀的刺激或助長了被壓迫民族內的資本主義的發展，因而產生了被壓迫民族內的民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因而引起了被壓迫民族反外國帝國主義的民族戰爭。這種戰爭，才具有民主革命的性質，成為民主革命之一種或一部分。

七　民主革命的性質

革命的性質，是指我們根據某一革命的社會經濟內容而下的一種確切概念，因為革命的性質，是由革命的社會經濟內容來決定的。例如糖的性質是甜的，因為它具有甜的化學內容，鹽的性質是鹹的，因為它具有鹹的化學內容。如果我們要決定某一革命的性質，是資產階級的性質，或另外的一種性質？也就要決定於其具體的社會經濟內容，如前所說，民主革命的主要內容，亦即其具體的社會經濟內容，是剷除資本主義發展的障礙，造成資本主義順利發展的主要條件，因而我們可以說，民主革命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性質，不是另外的一種性質。資產階級性質的革命和另外一種性質的革命，它們各自佔領一個革命的歷史階段，是絲毫不容相混的。

如果某一革命的歷史階段，是民主革命階段，或主要是民主革命階段，則其民主革命，無論進行得如何徹底，或其革命並不是由資產階級來領導來完成，它仍然是資產階級性質的革命。因為任何民主革命的經濟內容，都是根據生產手段的私有，或不超出生產手段私有的範圍，在生產手段私有的基礎上進行的。所以即令進行得很徹底，它並沒有取消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制度，而且還由於它剷除了資本主義發展的障礙，在客觀上

便得資本主義更可能自由的發展。所以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革命，可以歸總的說，是這樣的一種革命。這種革命是不超越資產階級的，不超越資本主義的社會經濟範圍的。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革命，表現着資本主義發展的要求，它不但不消滅資本主義的基礎，反而擴大這個基礎。

但這是否在說民主革命的經濟內容，就只限於發展資本家經濟這一點呢？因爲，民主革命要造成資本家經濟發展的有利條件，如在某些國家的民主革命中；但另一些國家的民主革命，尤其是像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俄國的民主革命，則主要的不是造成資本家經濟發展的有利條件，而是要造成小商品生產者——小農業及手工業的小商品生產者，主要是農業小商品生產者的有利條件。因爲俄國當時民主革命的主要問題，是農民爲土地而鬥爭的問題，主要是農業小商品生產者，反對封建地主的大土地所有制，要求自己經濟的發展。那麼，這種農業小商品生產者要求自己經濟發展的運動，爲什麼還是資產階級的性質呢？

這是因爲在農民小商品經濟中間，經常要產生資本主義經濟。另外有一個很簡單理由，即在這種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革命中，農民要求土地和自由，也是幫助資本主義發展的。得到了自由，它就排除地主和官吏在國家管理中的統治，得到了土地，它就把地

主的土地，轉移給農民。這樣既不能因掠奪地主，就至於消除本有的商品經濟；也不能消除在俄國村社土地上，在社會化了的土地上的私有農民經濟；更不能消除在多馬多中的富農與僱農雇工之間剝削的鴻溝。做一句話說，農民對地主掠奪之勝利，只是消滅一切農奴制殘餘，而不是消滅資產階級的經濟制度，不是消滅資本主義，不是消滅社會中富人與窮人分立的現象。因之站在私有商品經濟基礎之上的農民，反對封建殘餘的革命，仍是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革命的一種形式。不過這種革命的經濟內容也不只是限於發展資本主義經濟這一點罷了。

另外一點，還需要指出的，就是民主革命的勝利，固然造成資本主義發展的順利條件，但是並不是說，民主革命的勝利，在帝國主義時代，一定要有極長時期的資本家大經濟的發展，如[illegible]國那樣。在帝國主義時代，由於世界資本主義總體的趨於沒落的階段，由於在世界帝國主義經濟這一整個體系中，已經有了革命的客觀條件存在，自不容許資本家大經濟過長期的發展。雖然有某些國家的工業還很落後，也並不能成為無產階級性質革命的不可征服的障礙。所以帝國主義時代民主革命的勝利，並不一定形成過長時期的資本家經濟的發展。因為在一個資本主義多少發展了的國家內，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革命，必然會和非資產階級性質的革命接近起來。所以我們根據長

主革命的經濟內容，雖然確定民主革命的性質是資產階級的性質，但也不能死板的機械的來了解這一性質。

八　民主革命產生民主政

民主革命，是資產階級反封建反異民族壓迫（亦即反帝國主義）的革命，因之它的基本任務，就是奪取政權，建立一種政治，使這政權和政治適合於現有的資本主義經濟，這種適合於現有資本主義經濟的政權和政治，就是民主政權和民主政治。

這種民主政權和民主政治，有些什麼特點呢？

第一、這種民主政權和民主政治，取消了舊時封建的等級制度，而代之以平等。如前所說，在大革命前的法國，是把法國人分做三種等級。第一等級是僧侶，第二等級是貴族，第三等級是平民（包括近代資產階級近代無產者兩身的城市貧民及農民）。這三種等級，在地位上，權利上，都絕對不能平等，現在的民主制，則在形式上承認一切公民的平等，承認一切公民都有平等的權利來決定國家的建設與管理。也就是說，一切人民在法律前面都是平等的，不管他擁有什麼資本，什麼土地，什麼私有財產，或者他是一貧如洗的人。

第三、這種民主政權和民主政治，廢除了封建統治對於人民的一切束縛與奴役關係，而代之以自由。如前所說，在封建的農奴制度之下，農民是附着於土地的，同時是依存於地主的。農民與地主的關係，不是平等的契約關係，而是等級的主奴關係，因而他們（農民）沒有住居的自由，沒有遷徙的自由，沒有脫離地主成爲自由人之自由。在城市的行會束縛之下，學徒不能自由升爲工匠，工匠不能自由升爲師傅，行會以外的人不能自由入會，行會以內的人不能自由出會。結果，也是沒有職業的自由，沒有營業的自由，沒有脫離行會成爲自由人之自由。此外就是國王對於諸侯，諸侯對於大夫，大夫對於家臣等上下關係，在權利與義務上，亦有嚴格的明確的規定，絲毫不能自由變更。在這種情形之下，人們當然不能參加國家管理，而有選舉被選舉之自由，當然不能參加任何會議與組成任何社團，而有集會結社之自由，尤其是由於成爲封建統治之有力工具的宗教束縛與神學支配，人們當然不能說自己要說的話，想自己要想的事，寫自己要寫的文章等等，而有言論、出版、信仰等等之自由。在資本主義開始發展，新興市民，亦即第三等級的平民起來反對封建統治時，是以自由的口號，進入戰鬥的，因之現在的民主制，則把一切的自由——住居自由、遷徙自由、營業自由、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信仰等等自由，都千篇一律的清楚明白的寫在革命後的憲法上了。尤其把私有財產權

之不可侵犯，也載在民主制的憲法中。

第三、這種民主政權和民主政治，改變了舊時的封建的專制政治機構，而代之以新的資本主義的民主制的政治機構。封建的專制政治機構，是由封建君主的官吏、警察、憲兵等等構成的，他們是治者，人民是受治者。所謂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人民絕對無權過問國家大事。現在資本主義的民主制的政治機構，則除官吏、警察、憲兵等等外，還有許多代表民意的機關。如國會、省議會、縣市議會等等，還有些執行政責任的官吏，亦由人民選舉、罷免。在形式上，則有所謂君主立憲國，民主立憲國；在制度上，則有所謂總統制、內閣制、有所謂三權分立制、二權分立制，有所謂直接選舉制，間接選舉制，有所謂限制選舉制，普通選舉制，有所謂區域代表制，職業代表制等等。

以上三者，不過擇其大體而言，然已不勝其五顏六色了。不過其共同特徵，可約如下述：一、承認在法律上一切人都是平等的（且由身分的平等，漸走為人類的平等，男女的平等，宗教的平等，職業的平等等等）；二、規定人民之自由權（如身體自由、居住自由、職業自由、財產自由、意見自由、信教自由、書信秘密之自由、集會自由、結社自由等等），乃至社會權（如生存權、勞動權、教育權等）；三、國家主權，在形式上俱

屬於全體國民；四、國民在直接或間接上，得掌握其國家之政權，而其政府機構，須依國民所定之法律程序組織之，其中央政府乃至地方政府負責人員，須經人民之選舉（直接的或間接的）或監督之；五、立法權或隸屬或顯爲其政權構成之中心；六、由國民按照一定程序，制定國家的根本大法（如憲法，成文的或不成文的），以使其全國上下，一同遵守；七、私有財產權之不可侵犯（由絕對的到相對的），而其國家的私法乃至公法等，均以確定此種財產權爲中心任務等等。但其最基本最主要的所不同於封建制的特徵，則爲其進側的政治機構或國家，已爲資產民主的國家（不管其實質形式如何）爲資產階級民主制的政治機構或國家，則爲資本所有者的國家（不管其形式如何），爲發展並保障資本主義階段其國家權力的行使或政治領導，已不限於單純的資本所有者了。[illegible]而由此，進而民主政權和民主政治，較之封建統治下或異民族壓迫下的專制政治或奴役政治，自然是一個大進步。而且在資本主義的初期，亦即民主革命和民主政治開始作爲第三等級對封建統治革命的公開政治號召時期，上述種種特徵，確爲第三等級之共同要求；又由於革命初期第三等級內部分化，尚不明顯（即第三等級內部的利害衝突，尚未劇烈），上述種種特徵，也曾經在短期內（亦即革命初期）部分的實現過。雖資本制對封建制的革命，在資本主義的初期或資本主義的上期，亦即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時代，是由近

代資產階級領導的，近代無產者的前身之城市貧民及農民，在實際上自不免爲當時有力領導革命的階級所利用，而革命勝利的果實，自然也不能平等分配於一切參加革命者。尤其是因爲上述種種特徵中具有「私有財產權之不可侵犯」一點，便可能使得各個人民的平等自由權利，徒具形式。且由於資本主義之繼續往前發展，資本主義內部之諸矛盾日益加深，隨之而往前發展的民主政治，也不能不加深其名實不符的虛僞性。不過一到壟斷資本主義時代，民主政治又勢要以新型的姿態出現了。即舊型的民主，便爲新型的民主所替代。

五　論專政與民主

——以蘇聯的政治為例——

「蘇聯的政治」這一標題，似乎是過於空疏、寬泛、一般，而且說明起來也有感於「一部廿二史不知從那裏說起」之苦，但是「政治」這一概念，不外是人們過着「國家生活」的一種表現，人們自古（自有國家以來）迄今，就過着各種不同的國家生活，例如專制的國家生活，民主的國家生活，亦即「專政」或「民主」的政治生活。而專政與民主，又是國家生活或政府的一種形式。大英百科全書解釋民主說：「民主是政府的一種形式，在這裏面，人民可用下面兩種中任何一法來管理自己——或是由於直接自管，例如希臘小城市國家，或是通過他們的代表。」那麼，反過來說，專政便不外是採用被人管（不是自管）或管人的一種方法來組成的政府形式。本文的任務，就只在把「蘇聯的政治」這一標題，拘限在指出蘇聯的國家生活或政府的一種形式究竟是什麼。

有人說：這不是很明白嗎？蘇聯早經自己公告：它是普羅專政。但自蘇德戰爭爆發

以來，由[illegible]很明顯的屬於民主國家之一員，這也是事實。然則它究竟是專政，抑是民主呢？

這我們可以很肯定的答覆：它是專政，同時，又是民主。因為專政與民主原為同一政治制度的兩面。例如希臘城市國家，對於希臘少數市民（即自由民）來說，是民主，對於大多數的奴隸來說（因為當時希臘是奴隸社會），則是專政。如果我們只提起希臘城市國家的民主，而不指出這種民主，是為誰而存在的，這是要使人迷惑的。如果我們單只注意希臘城市國家的沒有任何政治權利的奴隸存在，是希臘城市國家的民主所由建立的原因，如對大多數奴隸專政，是對少數自由民民主的原因，而就抹殺了它的民主，這也是要使人迷惑的。所以這裏的主要問題是：「為着誰的民主？」——「管着誰的專政？」

蘇聯在這一點上，可以說恰恰與希臘城市國家相反。它對於在蘇聯佔極少數（百分之五，就十月革命以後不久來說）的剝削人（地主而言），是專政。對於在蘇聯佔極大多數（百分之九十五，也是就革命初期說）的工農而言，卻是民主的。如果我們只提起蘇聯的對於剝削的專政，而不指出這種專政，是為誰而存在的，這是要使人迷惑的。如果我們單只注意蘇聯大多數人民民主的存在，而忽視了它對於少數人的專政，這也是要使人迷惑的。

所以這裏的主要問題，也是應該要問一問：「爲着誰的民主？」「管着誰的專政？」

我們據此必須肯定蘇聯的政治是專政，但是「管着少數人的專政」；我們也必需肯定蘇聯的政治是民主，但是「爲着大多數人的民主」。在這一點上——它是眞正大多數人的民主這一點上，蘇聯不僅與希臘城市國家相反，且也與近代其他民主國家相反。這一特徵，集中表現在它的政權組織或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一種嶄新的獨特的形式上，即集中表現在它的蘇維埃政權上，它不同於近代民主國家的政權組織或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的「議會」或「國會」，而是「蘇維埃」，它是眞正大多數人的民主。蘇維埃政權的本身，就意味着眞正大多數人的民主。

那麼，我們就必需對於「蘇維埃」這一名詞還須加以銓釋，并一述其史的發展。「蘇維埃」這一名詞，大家都知道，在俄文裏常被用來表示任何一種會議，例如「軍政會議」，「閉幕會議」，都叫做蘇維埃。其他許多種的會議，也拿這個名詞來表示。至於這一名詞演變爲今天的意義，即表現爲一種政權組織的新形式，它的歷史來源，則由於一九〇五年初期，在俄國一個紡織城鎮，各工廠工人成立了一個委員會，作爲調整工人內部和與僱主交涉的集體組織。自此事發生，便在一九〇五年中，俄國各處工人爲着要求改善生活狀況，或發生罷工和其他運動，都各在他們各自的城鎮裏成立了他們各自的委

自會或代表會議，這些會議就被稱為工人代表蘇維埃。這種蘇維埃，除對僱主要求改善生活狀況等等外，并提出關於言論、出版、和集會、結社等自由的政治要求，而且在某些地方，在實際上取得全都市政權，變成了一種新式的市政權力。此後十餘年，即到了一九一七年，蘇維埃的組織，不僅限於城鎮裏的工人；在鄉村裏，農民也選出他們自己的代表，組織農民蘇維埃，通過這一組織，要求立刻沒收土地，分給農民；在軍隊裏，士兵也選出他們的代表，組織士兵蘇維埃，通過這一組織，要求立刻停戰，實現和平，進而管理他們自己。這樣，自一九一七年二月至十月之間，俄國的工人、農民、士兵、便成立了許多蘇維埃，在全國佈滿了廣大的蘇維埃網，這個蘇維埃網的結構，從表面看來，也好像全世界上其他工人組織的結構（工會）一樣，在各本地有直接選出的蘇維埃，在全國有各處選出來的代表組織代表最高權力的蘇維埃。但在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它比通常工人組織廣泛得多，它不但代表工業工人，它還包括鄉村農民與士兵。它幾乎包括了全國人民的大部分，所以它的本身就是一個意味着眞正大多數的嶄新的獨特的形式。沒有參加蘇維埃的，便只有地主、僱主、舊俄政府時代的高級官吏，及與他們有關係的少數人而已。因此，十月革命一發動，俄國便成立了一個蘇維埃國家。這個嶄新的蘇維埃國家，它是眞正大多數人的一個民主組織。它在那時（革命初期），即已實現了全

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所享到的民主，為前此任何民主國家（無論希臘城市國家或近代民主國家）所從來沒有過的；其他，不及全人口百分之五的人，即那些向來掠奪不勞而獲的人，便不再有參加政府的權利了。

我們從蘇維埃之史的發展來看，可看取如下兩個特徵：第一、蘇維埃之所以成為今天的政權組織，並不是一個政治家立法家的預定計劃，而是廣大要求革命的人民，在革命的過程中——革命的長期考驗中，由革命鬥爭的經驗逐漸產生出來的。第二、工人代表蘇維埃，原是多數工人對付少數僱主的組織，農民代表蘇維埃，原是多數農民對付少數地主的組織，士兵代表蘇維埃，原是多數士兵本身的組織，換一句話說，蘇維埃本身就意味着大多數；蘇維埃政權就是為着大多數人的政權。

因此，蘇維埃在蘇聯是人民本身的直接組織——是最民主而又最有權威的組織，是最能發揚人民革命的積極性，最能把廣大人民吸收來參加國家管理的組織。因此，蘇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五日通過的新憲法，就明白規定：蘇聯的政治基礎，是人民代表蘇維埃，蘇聯的全部政權，屬於城市與農村的人民，即大多數的人民，而表現於人民代表蘇維埃上。而在新憲法中，國家的名號，也就被稱為「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我們把它簡稱蘇聯，這都充分說明蘇維埃政權，是「為大多數人的民主政權」；專政只是

不管實少數人的一。但還有一件事，值得我們特別注意，即根據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五日通過的新憲法，就是關於那些少數人參加政權的限制也撤銷了。因為由革命初期（一約自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三六年，蘇聯經濟和社會生活，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由於社會主義經濟的確立，僱主、地主、在蘇聯都不能再成為一個階級了，帝俄時代的僱員和官吏，也有的死了，有的出國了，有的和平轉變在蘇維埃各機關工作着。例外的只有約五萬的牧師，即令他們得到完全的政治權利，也不能阻礙蘇聯的進步，所以對於他們的政治權利也不再加以剝奪。

在這樣一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一俗稱蘇聯的國度裏，根據新憲法，它是一個由好多平等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自願聯合而成的聯盟國家，以前加盟的只有七個，以後新憲法規定為十一個，即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阿才拜占、喬治亞、亞美利亞、土克曼、烏茲別克、達吉克、卡沙赫、吉爾吉斯。（被略）各加盟共和國，（被略）有的還包括有各自的自治共和國，或自治特別區。這些國與區，又各有各的憲法，各有各的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各自獨立施行國家權力。（被略）惟依據憲法，外交問題，宣戰媾和問題，國防問題，對外貿易問題，國民經濟計劃問題等等，則必需歸於全聯邦處理。這可以說是它的國家構成。根據新憲法，聯盟的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屬於聯

盟的最高蘇維埃（原為全聯盟蘇維埃大會）。最高蘇維埃分聯盟院民族院兩院。聯盟院是按選舉區由一切成年（十八歲）的公民選舉的，每三十萬居民選代表一名，民族院是由各加盟共和國，自治共和國，自治特別區的一切成年公民選舉的。計每個聯盟共和國選代表二十五名；每個自治共和國選代表十一名；每個自治特別區選代表五名。兩院是平等的，一切法律都需經過兩院。最高蘇維埃——在形式上等於近代民主國家的國會——每年召集全體常會兩次。在全體常會閉會期間，聯盟的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為兩院聯席會議所選出的主席團。主席團對最高蘇維埃負責。主席團之下，則有人民委員會——在形式上等於近代民主國家的內閣——為國家權力的最高執行和命令機關，亦即蘇聯政府，也由最高蘇維埃舉行兩院聯席會議選舉，它的一切活動也對最高蘇維埃並對主席團負責。各加盟共和國，自治共和國，自治特別區，各邊區，各城鎮，各鄉村，都各有各自的蘇維埃，即各級的蘇維埃。各級蘇維埃由下而上的聯合而成為一種最民主的政權系統。這可以說是它的政權系統。

這一點民主的政權組織，根據新憲法，一切蘇維埃乃至聯盟最高蘇維埃，都是根據於普遍、直接、平等、秘密的投票方法選舉出來的。所謂「普遍」的意義，就是凡年齡達到十八歲以上的一切公民，不論民族，信仰如何，不論教育程度，社會出身，居住地

方，財產多寡及過去行動如何，都有選舉與被選舉權（神經病患者及被法庭褫奪公權者當然除外）。所謂「平等」的意義，即是任何公民只有一票選舉權——任何公民是在平等的基礎上參加選舉的。所謂「直接」的意義，就是一切人民代表蘇維埃的選舉，自鄉村與城市人民代表蘇維埃起到蘇聯最高蘇維埃止，都是由公民用直接選舉的方法來進行的。所謂「秘密」的意義，就是採用不記名投票方式，一任選舉者之充分選擇其候選人。這是蘇聯人民的選舉權。除選舉權外，根據新憲法：「一切公民，都有勞動權、休息權、養老權、參加各種社會團體之權以及疾病和失去工作能力時的生活保證權。根據新憲法：「一切公民，都有信仰的自由同時也有反宗教宣傳的自由，自然更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通信的秘密等自由。此外，憲法保證個人人格的不可侵犯性，住宅的不可侵犯性，以及某些外國人士為了保護人民的利益，或是為了科學的活動，為了民族解放鬥爭而受拘捕的外國公民的托庇權。自然，在一切活動的領域上，蘇聯的婦女與男子也是享有同等的權利的。」

這些權利與自由，都有深厚的經濟基礎和政治基礎作保證。例如勞動權有它社會主義國家的國民經濟的計劃性，經濟危機的排除，失業的消滅，社會生產力不斷的提高作保證。休息權有勞動時間的縮小，假期內工資的照發，休養所、俱樂部等設備的廣佈作

保障。養老權及疾病治療，有國庫舉辦的社會保險，免費的醫藥的服務等作保證等。教育權有初級小學的普遍入學，各級學校的免費入學，學校用本民族語言的授課等等作保證。其他可由此類推。這是蘇聯人民的各種民主權利。

除人民的權利外，根據新憲法，同時規定蘇聯一切公民應負擔各種義務：遵守法令，服從勞動紀律，忠於社會職責，嚴守社會共同生活規則，保護並鞏固社會主義財產，保衛社會主義祖國等等。新憲法特別規定：「保衛祖國是蘇聯每一公民的神聖義務。」這可以說是它規定在憲法裏的人民的權利與義務。

由此可知蘇聯是一個真正大多數的民主政權民主國家，專政只是對少數人的。並且由於約自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三六年社會經濟所發生的變化，國內少數剝削者，都沒有了。新憲法所反映出來的，不僅是大多數，而且可以說是全民（由工人、農民、新型的知識分子所合組的全民）。

在這樣一個真正大多數乃至全民的民主政權民主國家裏，亦即嶄新的蘇維埃政權、蘇維埃國家裏，我們顯然看出種種新的生活，新的寄精在發展着，在那裏每個公民都有機會參加各種生活——經濟、政治、文化、國防、生產、娛樂等生活；每個公民都有機會表現發揮各自的能力，盡量顯出各自的本領，亦即發揮個人的創造力；每一公民都享

有充分的權利與自由，尤其是言論、思想、出版等自由，及參加國家管理、對政治提供種種意見乃至辯護政權等權利。這都充分顯示蘇聯的民主是最徹底的民主，最高級的民主。所以有人說：「普維列塔利亞的民主政治，是比任何布爾喬亞的民主政治，更民主千百萬倍；蘇維埃政府是較最民主的布爾喬亞共和國更民主千百萬倍。」（見第三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綱要）

然而或許有人就從此發生懷疑：民主愈徹底，必然就愈會損害專政。換言之，民主就是專政的削弱。抱這種懷疑態度的人，不僅不曾充分瞭解「民主與專政原是一種政治制度的兩面」這一根本論綱，而且也不曾瞭解「為着誰的民主？」「為着誰的專政？」這一前提條件。要知道專政「集中政權或強有力的政權（不論是對國內少數人的或對國外侵略者的）的力的泉源，就是真正大多數的民主，乃至擴於全民的民主。在這樣高級的廣大的民主之下，如前所說，每個公民都有機會參加各種生活——經濟、政治、文化、國防、生產、娛樂等生活，所以他們親切的感覺到國家是他們自己的，政府是他們自己的，領袖是他們自己的，軍隊是他們自己的，一切物質建設，文化建設，無一不浸透着他們自己的血汗，他們對於一切的一切便都不能不發生熱愛——從心坎上發出來的愛（正與從心坎上發出來的恨有關聯）。這才使「祖國」在蘇聯變成一個神奇的字眼。「

保衛祖國是蘇聯每一公民的神聖義務。一這也才使蘇維埃政權，得到更進一步的鞏固。蘇聯的民主并沒有削弱它的專政，恰恰相反，民主使蘇維埃政權，更加集中而強有力了。在這樣高級的廣大的民主之下，如前所說，每個公民，都有機會盡量發展各自的能力，盡量顯出各自的本領，亦即發揮個人的創造力，這是有事實可以佐證的。由於蘇聯對於人類創造力的鼓勵，科學家、探險家、工作人員、不斷的榮膺勳章與英雄的稱號，是蘇聯常有的事，因此他們親切的感覺到，一切力量的支出都是爲了自己的祖國，爲了社會主義的建設，亦即爲了自己本身。這才使得社會主義制度在國民經濟所有部門中確立，使得農業與工業在蘇聯并肩發展，使得五年計劃，四年完成，使得生產量斯泰哈諾夫運動的奇跡出現，使得人民大衆物質生活日趨改善，使得國民一般的文化水準提高，尤其政治水準——政治的積極性提高，亦即蘇維埃政權更加鞏固。蘇聯的民主并沒有削弱他的專政；恰恰相反，民主使蘇維埃政權更加集中而強有力了。在這樣高級的廣大的民主之下，如前所說每個公民，都有充分的權利自由，尤其是言論、思想、出版等自由，及參加國家管理，對政治提供積極意見，乃至掌握政權等權利，這由於蘇聯社會主義制度在國民經濟所有部門中的確立，蘇聯已沒有互相敵對的階級，而少數的僱主，地主也已消失了。而剩下來多數的幾於全民的構成社會主義社會的工農及知識分子，可能在親

密合作的基礎上生活着工作着，而取得精神上政治上的一致。在這個絕對一致的基礎上，種種的民主自由，種種的民主權利，不能不會妨礙政權的集中行使，反而只有增加各民族間的友誼，只有增加工農知識分子間的團結，只有進一步把政府與人民融成一片，只有更加把蘇維埃政權鑄成一塊鋼鐵。容我再說一遍：蘇聯的民主並沒有削弱它的專政，恰恰相反，民主使得蘇維埃政權更加集中而強有力了。

在這樣高級的廣大的民主之下，憲法中規定的人民的義務，做一句話說：國家所課人民的紀律——遵守法令，服從領導，忠於社會職責，乃至納稅、當兵等等，也就成爲識的紀律自覺的紀律了。在這樣一種國家內，種種新的生活，新的奇蹟，平時則不斷的表現在生產上，建設上，例如斯泰哈諾夫運動等等。戰時則不斷的表現在前方的作戰，後方的勞動上。例如當此次蘇德戰爭發生時，蘇聯的前方與後方，由於政治的民主和內部的團結，顯得比任何國家更爲堅強，使得納粹侵蘇碰着了舉世無比的堅強抵抗，使得抗德戰爭顯現出許多可歌可泣的奇蹟，使得「祖國」——這個神奇的字眼，它可使每個男子變爲士兵，每個女子變爲工人；它可使孩子們因嫉妒而痛哭，爲了他們不是男子漢，使老人們因嫉妒而痛哭，因爲他們不能夠再肩起抗戰的武器……」（見蘇聯P巴甫連珂致郭沫若先生信）而在蘇德戰爭的一週年，眞理報社論也說：「在偉大愛國戰爭的

一年間，紅軍已經變得更有組織更強大起來了。它的士兵們，指揮員們和政治工作人員們，全部已經在戰爭的火燄中百鍊成鋼了。他們所表現的集體英雄主義和自我犧牲精神，勇敢和剛毅，堅定和英勇，在歷史中是無所比倫的，已博得了愛好自由的人類無限的讚美。蘇維埃經濟，已對全世界證明了它的組織力和對困難的情況的適應性。我們人民已懂得了從心坎裏從靈魂深處憎惡敵人，對於致命的危機的認識，已使前後方的戰士們的力量增加了十倍。蘇聯所有各族人民不可分離的大家庭，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前方戰場上的英雄和後方勞動中的英雄，團結在布爾塞維克黨——對德國侵略軍鬥爭的組織者的周圍，團結在蘇維埃政府的周圍，團結在斯大林的周圍，已達到空前的程度了。全世界決沒有一種力量能夠打破這種團結的。——這種團結的堅固，正是由於政治的民主來的，這種不可摧毀的堅強力量，也是由於政治的民主來的。所以民主決不是專政的對，而且是專政的力之泉源。沒有真正大多數的民主，決沒有真正的專政。

於此我們便可以很肯定的做出如下的結論：蘇聯的政治制度或形式，毫無疑義的是普羅專政，同時，又是實質的民主——真正大多數的民主，最徹底的民主，最新型的民主。

但這種真正大多數的民主政權，不是懸空的，而是建築在它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上

。因此，它的政治任務端在完成社會主義建設，其對外政策，也就是路人皆知的和平外交。而此次反希特勒匪軍的侵略戰爭，其目的也正如斯大林所說：「我們進行着解放的愛國戰爭，正義的戰爭，我們并沒有定下侵略外國和征服外國人民的目的。我們的目的是很正確而高尚的。我們要從德國法西斯惡棍的壓迫下，把我們蘇維埃土地解放出來，我們要把我們的烏克蘭同胞，摩爾達維亞同胞，白俄羅斯同胞，立陶宛同胞，拉脫維亞同胞，愛沙尼亞同胞，卡累利阿同胞，從德國法西斯惡棍使他們所受的玷污和屈辱中解放出來。」（見斯大林五一文告）

這種政治的任務，和平外交，戰爭的目的。在長時間的考驗中，在各種嚴重的考驗中，使它在愛好自由的各國人民中，民主陣線的各個友邦中，尤其是在英國與美國，具有政治遠見的領袖中，樹立了深厚的信義。因此，於本年五月二十六日和六月十一日，先後簽訂了有重大的國際意義與政治意義的英蘇美蘇兩個互助協定。由於英美蘇三強協定的締結，更加強了蘇英美三國間的聯繫，同時，也特別增強了整個民主陣線各友邦間的聯繫。一方面，奠定了民主陣線最後致勝的具有決定性的堅實基礎，同時，自然也奠定了蘇聯對希魔最後致勝的具有決定性的堅實基礎。甚至於可以說：戰後將是一個甚麼樣的世界的輪廓也由蘇英美三強的互助協定，尤其是英蘇戰後二十年的互助協定把它明

體的描畫出來了。

在這裏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的，是不管蘇聯的和平的外交也好，蘇聯的戰爭的目的也好，都是由蘇聯的政治（最高級最廣大的民主，同時又是最集中最強有力的專政）像一根紅綫似的貫串着的，也就是說都是由蘇聯的社會性質決定的。

因此，我們可以完全肯定的說：表現在蘇聯平時的各種建設，各種奇蹟，各種新的生活，不是別的，是蘇聯政治的集中表現；表現於蘇聯戰時的各種奇蹟，各種可歌可泣的英勇行爲，尤其是它百折不撓，顛撲不破，舉世無比的堅強，也不是鋼鐵鑄成的，而是政治鑄成的！

六　民主憲政與憲法的關係

——兼述幾個民主憲政國家的類型——

任你怎樣說。如說：「憲法是一個根本大法」，如謂「憲法是人民權利的保障書」乃至於說：「憲法是規定政府組織及人民與政府間各種權利與義務的根本規則或法律」等等，都只說明了問題的一半或一部分，或只觸到了問題的表面與現象，而不會把握問題的核心與本質，因此，另外一個憲法定義，值得我們把它從滿天雲霧的層層包裹中剝撥出來，它具體的規定如下：

一，憲法即「組織」，「制度」，「基礎」，「規則」之意。

二，國家憲法即國家制度的意思。

三，國家制度是由各種社會力量之互相關係，即各社會階層的相互關係所決定的。

四，國家制度表現於成文憲法，所謂成文憲法者，便是關於某個國家組織最重要的或基本的法律。

這個憲法定義的最大長處，是它首先揭出憲法就是制度，組織等等，國家憲法就是國家制度的反映，或由國家制度所表現出的一種形式，而所謂國家制度，即是國家機構的體制，即是某一國家是以一些什麼社會階層作主體構成的一種體制，所以說：「國家制度是由各種社會力量之相互關係，即各社會階層間的相互關係來決定的」，由「國家制度表現成成文憲法」，因之憲法只是形式和條文，而其具體內容則是國家制度，是某一國家拿一些什麼社會階層作主體來構成的一種體制——是貴族地主階層，是工商業者階層，還是工農大眾階層？

祇有把這一點弄明確了，憲法才有着落，國家根本大法的根本才有着落，憲法所保障的權利才有着落。不問表現於成文憲法裏是什麼國家制度，不問國家構成的體制，是以什麼社會階層作主體，而單從憲法的條文來研究憲法的好壞，長短，優劣，有如一般學院式的憲法學者單從憲法修改手續的難易把它分成剛性憲法和柔性憲法，單從憲法的制定來源把它分成欽定憲法和民定憲法，單從憲法規定的權限把它分成三權憲法和五權憲法……從而是甲非乙，右丁左丙，將一無是處。

憲法是變的，因為國家制度是變的，因為構成國家體制的社會階層是變的，更具體的說，因為任何社會經濟結構是變的，整個歷史是變的，憲法怎樣變呢？它必需變得更

加適合於其所反映的國家制度，纔得更加適合於其所反映的現階段的各社會階層間的相互關係，纔得更加適合於其所反映的現階段的社會經濟關係。這樣，就把憲法從其他的普通法律條文區別出來了，具體的說，就是把「憲法」從「綱領」區別出來了。任何憲法起草委員會，在它起草新憲法草案的時候，它的出發點必須認識「憲法」是不能與「綱領」混淆的。因為綱領是要說還沒有的東西，是要說應當在將來達到和爭取的東西；相反的，憲法應當說已有的東西，說現在已經實現達到和爭取到了的東西，綱領主要是指明將來，而憲法是指明現在。換言之，憲法是表現已經走過的道路的總結，已經達到的勝利的總結，已經爭取到手的各種權益的總結。因此，它是記載和用立法的方法鞏固事實上已經達到和獲得的東西，它不像綱領和宣言的空頭文字，只是宣揚將來的勝利或規定將來要爭取達到和實現的目標。

正因其如此，所以凡屬不是記載事實上已經達到和獲得的東西的憲法，儘管規定得十分周到，十分革命，十分進步，十分好聽好看，都將是一種具文，法國一七九三年的憲法，雖法國人都公認為最好的一部憲法，但從未實行。就是我國的臨時約法及民國二年國會擬成的天壇憲法草案也不算壞，但一樣是白紙上的黑字，毫無用處，至於事實上已經達到和獲得的東西，如果應該接受這些東西成果的社會階層，無力保持這些已得的東

西，儘管由於一時的勝利而把這些勝利品已經記載在憲法上了，而這種憲法也是要被人扔在字紙簍裏去的。法國一七九三年的憲法之所以從未實行，就是由於當時法國代表小資產階層的山嶽黨的失敗，中國臨時約法及天壇憲法之一樣成爲白紙上的黑字，就是由於當時　國父所領導的國民黨的失敗。而且再明白不過，袁世凱操縱的約法會議所制定的「中華民國約法」，袁死了，他的中華民國約法也殉葬。曹錕的賄選憲法（他美其名曰「雙十憲法」），也只是曇花一現，這還不足以證明憲法是「記載和用立法的方法鞏固事實上已經達到和獲得的東西」這句話的實在嗎？不僅此也。它還證明什麽社會階層的憲法是反映什麽社會階層的利益；袁世凱的中華民國約法是反映袁世凱及他那一集團的利益的，曹錕賄選憲法是反映曹錕及他那一集團的利益的。

這樣，我們要觀察某一國或某幾國的憲政，還是應該從它的憲法的條文和其形式去觀察呢？抑是應該從它的憲法背後的國家制度，社會階層力量的相互關係即其實質去觀察呢？毫無疑義的應該從後者來觀察，這不是貶低憲法的價值，這正是提供正確的認識憲法及其價值的方法。

爲著真正獲得正確解答問題的可能，而不爲許多學院式的定義以及一切不着邊際的五花八門舞弄字句所迷惑，社會科學告訴我們：無條件的要求把問題放在一定的歷史範

圍之內，這就是說在觀察每一個問題時，要問歷史中的一定現象是如何產生的，這一現象在自已的發展中經過那些主要的階段。並且從它的發展的觀點上去觀察它現在成了什麼樣子，那麼，憲法，憲政國家的產生，自然是歷史中的一定現象，有其一定的社會經濟基礎，有其一定的社會階層作背景，而且從它三四百年（從十七世紀英國革命算起到現在，或從十六世紀的尼德蘭革命德國宗教改革運動算起到現在）的發展史來看，顯然經過了兩個主要階段：一，是壟斷資本主義以前的階段；二，是壟斷資本主義階段亦即帝國主義階段，因此，我們要觀察某一國或某幾國的憲政，首先就要問某一國或某幾國憲政的產生，是處在那一階段——壟斷資本主義以前的階段，抑是帝國主義階段？歷史階段不同，某一國或某幾國所具有的民族特點不同，亦即各國所具有的社會經濟狀況，階級力量對比不同（是社會經濟狀況，階級力量對比等等決定民族特點，不是民族特點決定社會經濟狀況，階級力量對比等等），跟着它們的國家制度——憲政——憲法也不同。

我們在這裏勢不能把所有憲政國家，都拿來一個一個加以論列；也不能把所有憲政國家，不問其所處的歷史階段，籠統的拿來一個一個加以論列而是選擇其有代表性的幾國，更因其所處的歷史階段不同，把壟斷資本主義以前的英，法，德，美，壟斷資本主

論的階段，亦即帝國主義階段的俄國——蘇聯，土耳其，當做幾個憲政國家的類型論列於後。

首先，我們來看英國，如果說國家憲法就是國家制度的意思」，「國家制度是由各階級社會力量之相互關係，即各社會階層的相互關係來決定的」，那麼，英國的憲政，也就應由其革命過程中及革命後各社會階層間的相互關係來決定。英國革命的主要階段，約自一六四〇到一六六〇年。所謂主要階段的意思，即人們說到英國革命時總是指的這一時期。這一時期的大事件是克林威爾領導大革命開始，查理士第一被判死刑，英國一時成為共和國，後經一六八八年的第二次革命（某些史家稱之為「不流血革命」或「榮譽革命」），追走詹姆士第二，迎威廉第三為王，後經一八三二年的選舉改革運動，它的革命任務，是反對封建殘餘的統治，建立統一的民主的民族國家；它的革命動力，是城市平民（無產者的前身），農民，小資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它的革命領導權，是落在當時資產階級手裏；它的革命結局，是資產階級與貴族地主妥協，國王與貴族的統治形式被繼承下來，可是資產階級却實際的支配了全國的政治，於是就形成了資產階級民主內容的君主立體制度。（妥協性的濃厚，是英國資產階級一個極大的特點。它不但與地主貴族妥協，以後還以「妥協」「改良」來影響工人階級的上層分子，培養貴族工人，防

制工人革命運動的發展。）這就是一直到現在爲止的英國憲政，亦即英國的民主政治這種憲政的具體內容，才反映爲英國不成文憲法，如所謂「國會一權制」「內閣制」等等，嚴格的說：英國是一個無憲法的國家，要勉強說有，它的憲法只是寄託在一二一五年的「大憲章」，一六二八年的「權利請願書」，一六八九年的「權利法案」三大文件，以及許多國會的法案，法院的判例，乃至一些政治成規，社會習慣裏面的，所以我們只能從英國的憲政來看英國的憲法；不能從它的憲法來看憲政，憲政的具體內容才是實質，憲法只是抽象的形式與條文。

法國革命的主要階段是一七八九年，這是大家都知道的，革命爆發後的大事件，是打破「巴斯的」監獄，處路易十六世死刑，成立共和政府，製定有名的一七九三年的憲法，後經一八〇四年拿破崙稱帝，一八一四年路易十八復辟，一八三〇年七月王政（路易費立浦繼查理士第十爲王），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六月暴動，一八五二年路易拿破崙稱帝，一八七〇年路易拿破崙失敗，第三共和開始（這次共和一直維持到維琪政府出現以前）。它的革命任務，是推翻君主專制政體及貴族與教會權力，取消封建等級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國：它的革命動力；是城市平民，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它的革命領導權，開始落在資產階級手裏，但積極革命的人民大衆至少有一個時期把温

和的怕事的資產階級推到後面；它的革命結局，是經過了七八十年廣大民衆反對復辟爭取民主的鬥爭之後，才建立下比較民主的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制度。這即是一直到維琪政府出現以前爲止的法國憲政，亦即法國的民主政治，這種憲政具體內容，才反映爲法國的成文憲法，尤其是一八七五年的法國成文憲法（它是法國第十二次制定的憲法，也是它實行至今的最後一次憲法），所以我們也只能從法國的憲政來看法國的憲法；不能從它的憲法來看憲政。否則法國革命七八十年，製定憲法不下十二次，而且就其內容來說，一七九三年的憲法是最好的一種，而一八七五年的憲法（即十二次亦即最後一次的憲法），則條文簡單，並沒有把法國著名的代表人民革命要求的「人權宣言」列在篇首（以前有幾次的憲法是把「人權宣言」列在篇首的）。那麼，如要從法國的憲法來看法國的憲政，則有莫所適從的困難；這以鐵的事實證明憲政的具體內容是國家制度，是各社會階層間的相互關係，而不是白紙黑字的憲法條文，憲法條文只是記載事實上已獲得或已爭取到的東西的一種記錄。

十八世紀法國的大革命與十七世紀英國革命相較，正是第一次實行鬥爭到底，直交戰的一方（貴族）被消滅，而另一方（資產階級）完全勝利」又如說：「在法國，革命完全與過去的傳統斷絕關係，掃除舊封建制度的最後遺跡……」而「在英國則革命

前的制度與革命後的制度並存，地主和資本家妥協……但英法兩國革命的任務，動力，領導權，乃至革命的結局，在大體上都表現根本的一致，因此，英國的憲政與法國的憲政，可以當做一個類型看。

德國革命的主要階段，是在一八四八年。革命爆發後的大事件，是三月十八日廣大遊行，示威群衆，逕與軍警發生衝突，國王發表告柏林民衆諭，正式允許召集會議制定憲法，後爲一八五〇年普王威廉第四頒布憲法，實施憲政，一八六二年俾斯麥任普魯士宰相，一八六六年普奧戰爭，擊敗奧大利，一八七一年普法戰爭，戰勝法蘭西，俘虜拿破崙第三，成立德意志帝國，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失敗，一九一九年八月十一日公布實行「威瑪憲法」，一直到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執政爲止，它的革命任務，是反對封建勢力的統治，封建的土地佔有與封建的割據狀態——因爲一八四八年革命前的德國，還是一個封建勢力佔統治地位的國家，是一個四分五裂的封建割據的國家，它的革命動力，基本的是工人與農民，其次，城市小資產階級亦在革命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它是時常動搖的，至於資產階級，則大部份是反革命的；它的革命的領導權，與英法兩國相較，亦呈現了另外一種姿態——這是由於當時德國資產階級已害怕革命，無產階級尚無力領導革命，所以當時的德國革命就沒有一個強有力的階級的領導，這當然就會影響到

德國革命的結局，因此，它的革命結局，可以說是失敗了，它沒有推翻君主專制政體，沒有摧毀農村中的封建剝削關係，沒有實現德國的統一，所以有人說：一八四八年的德國革命，是沒有完成的，流產的，半途而廢的革命」。此後德意志帝國的成立，是由不少代表封建勢力的鐵血宰相俾斯麥用自上而下的方法來實現的，惟其如此，所以我們可以說目前希特勒法西斯的野蠻統治，在某些意義上也是繼承了德國舊時封建殘餘的許多殘酷暴虐的傳統的，以上就是一直到希特勒執政以前為止的德國憲政，這種憲法，顯然自成為一種德國的類型。

美國革命主要階段，是由一七七六年到一七八三年。革命爆發後的大事件，是發表宣言，宣布美國十三州獨立；同時，擬定「聯邦規則」，成為美國第一次非正式的憲法，獨立戰爭開始，根據「聯邦規則」，建立臨時革命政府，獨立戰爭勝利，「巴黎和約」成立，英國根據和約承認美國獨立，後經一七八四年，費城開憲法會議，草定新憲法，一七八八年各州正式承認新憲法，一七八九年，根據新憲法成立聯邦政府，舉華盛頓為第一任大總統，一八六一年南北戰爭（解放黑奴戰爭），一八六四年，北方獲勝，解決了美國民族統一任務，一直到現在為止，它的革命任務，主要是民族獨立與統一；它的革命動力，是城市平民，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它的革命領導權，被資產階級所攫取

；它的革命結局，形成資產階級統治的民主共和國，可是較其他的憲政國家遠爲進步的民主共和國。同時，由於它消滅了英國對它的民族壓迫的障礙，並且其新大陸的本土沒有很嚴重的封建關係的障礙，所以它的資本主義的生產力，能夠得到迅速的暢快的發展，到得帝國主義時代，它便爲第一個最富有的帝國主義中間的民主國了；以上就是一直到現在爲止的美國憲政，這種憲政，又自成爲一種美國類型。

因爲它們的主要革命階段，都發生在壟斷資本主義以前，所以以上英、法、德、美四國，都是壟斷資本主義以前的幾種憲政國家的類型。

在說明了壟斷資本主義以前的幾個憲政國家比較標本的類型之後，我們就來說一說壟斷資本主義時代（亦即帝國主義時代）幾個憲政國家比較標本的類型。

這我們首先就要說到俄國。俄國民主革命的主要階段，一般的是指俄國一九〇五到一九一七年二月的革命，這是帝國主義時代的一種民主革命，這一革命具有許多新的特點，這首先由於當時民主革命所由發生的俄國，是一個軍事封建帝國主義國家，革命爆發後的大事件，是一九〇五年一月二十二日，聖彼得堡工人，因受廠主開除而罷工，同時俄皇尼古拉第二召集立憲會議，結果發生「赤色星期日」慘案，同年，八月十九日，尼古拉第二宣佈明年一月召開國會，一九〇六年尼古拉第二被迫召集第一次國會，又

被解散，同年十一月召集第三次國會，一九一二年改選第三次國會，成第四次國會，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成功，俄羅斯帝國毀滅，同年「十月革命」成功，民主革命便轉變爲社會主義革命了。就其民主革命的特點來說：是在於俄國民主革命的中心問題是土地革命，革命動力是無產階級與農民，革命的實現方法，是工農民衆的武裝起義，革命的領導權，是落在無產階級手裏，革命的結局，是推翻沙皇制度，建立了工農民主專政。這是帝國主義時代民主歷史的特點，較之壟斷資本主義以前的民主革命是不同的。尤其在俄國「十月革命」成功，把民主革命轉變爲社會主義革命以後，全俄蘇維埃大會便決定把俄國改爲「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簡稱蘇俄，一九一八年一月，第三次全俄蘇維埃大會發表「勞動者及被剝削人民權利宣言」以爲將來蘇俄憲法之重要組成分。同年七月，第五次全俄蘇維埃大會通過「蘇俄憲法」，一九二二年，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成立，簡稱蘇聯，一九二三年七月六日第二屆全蘇維埃大會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蘇聯憲法」，現稱蘇聯舊憲法，一九三四年公佈施行。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五日，第二屆蘇維埃全體特別大會通過「蘇聯新憲法」，亦稱「史大林憲法」，蘇聯新憲法，可以說是對於蘇聯憲法的修改，其理由最主要的有二點：一，是在確定憲法的社會經濟基礎，使憲法適合於蘇聯現階段力量相互關係；二，是把憲法與綱領區別出來，

綱領誠皆言是宣揚將來的勝利的東西，而憲法則是表現已走過的道路的總結，已經達到勝利的總結。因此，它是記載利用立法的方法鞏固事實上已經達到的和獲得的東西。這是蘇聯的憲政，社會主義國家的憲政，它與英美德法各國的憲政相較，是完全嶄新的一個類型。

由英美德法各國反映出來的憲法，較之由蘇聯的憲政所反映出來的憲法，亦存如下不同的幾點。

一、英法德美各國的憲法，是從資本主義制度牢不可破的信念出發，憲法構成的主要基礎，就是資本主義原則，對於私有制度，對於大私有者的特殊權利等等，把它反映在憲法裏面，即把它用立法的方法鞏固起來。蘇聯的憲法，則是從社會主義制度勝利的事實出發，憲法構成的主要基礎，就是社會主義原則，對於社會主義所有制，對於工農大衆的權利等等，把它反映在憲法裏面，即把它用立法的方法鞏固起來。

二、英法德美各國的憲法，雖未經明文規定，實際上包藏有各民族的不平等，有享有完全權利的民族，也有無完全權利的民族，甚至還存在着第三種的民族或種族，例如它所屬領的殖民地，所有這些憲法，仍是狹隘的民族主義的憲法，蘇聯的憲法，則是富有國際主義精神的憲法，它認爲一切民族或種族，不管它們的過去和現在的狀況怎樣，

不管它們的強弱文野程度怎樣，不管它們的膚色和語言怎樣，都應當在一切經濟的，社會的，國家的，社會文化生活的範圍內享有同等權利。

三、蘇聯的憲法與英法德美各國憲法另一不同之點，還有它一貫的，徹底的民主主義，從民主主義的觀點看來，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憲法，雖很少或沒有直接否認公民平等權利和自由，甚至還標榜民主主義的原則，但是却加上一些條件與限制，使得民主權利從左手拿出來，又從右手收回去，蘇聯的憲法，就在於它把一切條件與限制都取消了。

四、最後，蘇聯憲法與英法德美各國憲法不同之點，就是後者的憲法通常僅限於規定公民形式上的權利，而不注意實行這些權利的條件，如說公民平等，可是忘記了如果金融家，實業家和地主在社會上掌有財富和政治勢力，而工人與農民被剝奪財富和政治權利，他們之間是不能有真正平等的，又如說言論出版集會等等自由，可是如果忘記了工農大衆沒有可能支配的好的印刷廠，充分的紙張，適當的會場等等這些權利，也就變成了空話，蘇聯憲法的特點，就在於它不僅規定了公民的形式上的權利，而且把重心放在保障這些權利，放在實現這些權利的物質條件的問題上，它不是簡單的宣布公民的平等權利，而是用立法的方法鞏固已把剝削制度消滅了的事實，一切公民已擺脫了一切剝削的事實來保障公民的權利平等，它不是簡單宣佈勞動權，而且用立法的方法鞏固

在蘇維埃社會沒有經濟危機的事實，消滅失業現象的事實，因此，很明顯的，蘇聯憲法的民主主義，不是通常的一般的民主主義，而是社會主義的民主主義。

社會主義的民主主義，社會主義的憲政，自然是另一種完全嶄新的一個類型。

再我們說到土耳其，土耳其的革命，是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三年的革命，這也是帝國主義時代的民主革命，土耳其在革命以前，是有名的近東病夫，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而且其國內封建勢力異常濃厚，土地大部分集中於回教王與大地主手中，土皇政府就是建築在回教主勢力之上的軍事封建統治，在這樣一個半封建國家內，工業極不發達，因之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勢力均不強大。尤其是自十六世紀以來，列強勢力逐漸侵入，造成許多不平等條約，例如外人在土享有種種政治經濟的特權，土國對外商業及金融事業，大部分操在外人手中，交通如電信鐵路，亦多為外國公司所經營，海關不能自主，使在事實上成為列強所支配的半殖民地，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失敗以後（當時土國參加德國方面），土耳其政府於一九二〇年與協約國訂立極端屈辱的「色佛爾條約」，協約國軍隊，當時已控制首都君士坦丁堡，希臘軍隊也乘機佔領其在小亞細亞領土（士麥拿一帶），在此時，土耳其已處在完全亡國的威脅之下，於是以基馬爾為代表的土耳其民族資產階級，主要是民族的商業資產階級（由於工業不發達，工業資產階級

很少），一面集合土耳其革命青年，若干組織土耳其國民黨；一面訓練軍隊，準備與敵人一戰，革命爆發後的大事件，是一九二〇年，土耳其國民黨提出「國民公約」共六條，力言須依據民族自決之原則保全土耳其領土，要求君士坦丁堡之安全。最後宣言斷然反對在政治上，司法上，財政上阻礙土耳其發達的任何限制，同年三月，基馬爾正式宣告不承認君士坦丁堡的舊土皇政府，四月二十三日召集昂哥拉會議，稱國民議會，議定根本組織法二十三條，一九二一年三月與蘇聯締結協定，并取得其切實援助，一九二三年七月二十四日簽定「洛桑條約」，洛桑條約的結果，恢復了土耳其喪失的若干舊領土，并廢除了一切不平等條約，同年十月國民會議宣言實行共和制，推基馬爾為大總統，一九二四年四月，制定土耳其民主共和國憲法，到此為止，它的革命任務，是一面反對帝國主義，爭取民族獨立，一面反對封建殘餘，實行土地革命。因此，它的民主革命在各觀上有兩個階段；一是以民族解放運動為中心的階段；二是以土地革命為中心的階段。可是由於其革命動力與革命領導的特點（後面就要說到），使得它的革命尚停頓於第一階段，而第二階段則沒有實行，其次，它的革命動力，是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但因它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工業不發達，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都不強大，以基馬爾為代表的民族資產階級，還大半是商業資產階級。復次，它的革命

領導權，是落在以基馬爾爲首的民族資產階級手裏，可是他在革命中的領導，表現了兩個特點：一是一方面領導工農小資產階級向敵人作戰，另一方面又害怕民衆力量抬頭，採取了好些壓迫民衆的辦法；一是由於民族的商業資產階級陣營內，包含了一部份自由主義的地主，遏阻了土耳其革命，從第一階段（民族革命階段）發展到另一階段（土地革命階段），表現了革命的有限性與不徹底性，最後，它的革命結局，經過了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二年的反英，它的民族獨立戰爭的勝利，經過了洛桑會議席上的鬥爭，使得土耳其能在一九二三年十月決定建立民主共和國，但由於土耳其只實行了民族革命的一個階段，而沒有轉入土地革命階段，使得土耳其農民及工人，還要忍受嚴重的封建關係的壓榨，使得土耳其社會的往前發展，還要受到這種關係的很大障礙，這是土耳其的憲政，亦即土耳其的民主政治，它是產生在壟斷資本主義時代，亦即帝國主義時代的一個憲政國家，它有它的民族與時代的特點，它自然也成爲一個新的或另外的一種類型。

在壟斷資本主義時代，亦即帝國主義時代，代表着一種另外的民族特點，值得我們特別重視的新類型的憲政國家，本來還有我們中國，我們絕對不可把它忽略，尤其是在世界民主潮流高漲，我們正在準備實施憲政，開始民主動員，爭取抗戰建國最後勝利的時候，我們更應該重視它，從它的社會經濟的具體分析，到社會階層間相互關係的具體

分析」，一直到社會生活的其他各方面，例如現行政治制度和社會思想，把它作全面的瞭解，藉以掘發出其憲政的本質來，這是自然的，惟其我們特別重視它，我們便只有把它留下來另作專篇論述。

不過從上述各種憲政國家的論述裏面，不管它是屬於那一歷史階段——壟斷資本主義以前的階段，或壟斷資本主義階段亦即帝國主義階段，不管它是屬於那一類型——英法的類型；或德國的類型，美國的類型，乃至蘇聯的類型，土耳其的類型都證明了「國家憲法就是國家制度的意思」，「國家制度是由各種社會力量之相互關係，即各社會階層間的相互關係來決定的」，同時，也證明了「憲法」與「綱領」不同，綱領或宣言的只是宣揚將來勝利的東西；而憲法則是表現已經走過的道路的總結，已經達到的勝利的總結，已經爭取到了的各種權益的總結，因此它是記載和用立法的方法鞏固事實上已經達到和獲得的東西的記錄，憲政的具體內容才是實質，憲法只是抽象的形式與條文。我們只能從憲政來看憲法，不能從憲法來看憲政，因而是有怎樣的憲政才有怎樣的憲法。重要的是憲政的實質，不是憲法的條文，要有良好的真能保障人民大衆利益的憲法，必需先有良好的真能顧到人民大衆利益的憲政，人民大衆必須把真能顧到人民大衆利益爭取到了，才用憲法把它鞏固起來，用立法的方法把它鞏固起來，這卽把事實上已經達到

和獲得的東西總結出來的憲法，這種由人民大衆所爭取由人民大衆所手製的憲法，才是良好的憲法——不論它是剛性柔性的也好，不論它是成文不成文的也好，不論它是內閣制總統制也好，不論它是一院制兩院制也好，否則將一無是處。

所以我們必須懂得人民大衆眞正的利益是什麽？此時此地需要的是什麽？那怕是一尺布，只要當前可以禦寒；那怕是一粒米，只要當前可以療饑，最好拿着了再說，在啼饑號寒的時期，放棄了布與米不要躺在床上去做憲法夢，他們的快樂，當然只能是在夢境逍遙的時候。

我們也必需懂得，只有不敢去解決，也不願去解決啼饑號寒各種實際問題的人，討喜歡專門討論只限於抽象的形式與條文問題。

七　清末民主革命與清室的對策

——從清末統治者羣的沒落所見的歷史本質——

歷史是一體本劇，它法則性的一幕一幕在下演，而且一幕有一幕的主角，一個下台，一個上台，就世界史的劇幕說它已演過原始氏族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社會四大幕，現在正把社會主義社會這一幕搬上舞台繼續演出，在演原始氏族社會這一幕時，是以氏族成員全體為主角，在演奴隸社會這一幕時，是以奴隸所有者，即奴隸主為主角在演封建社會這一幕時，是以封建領主為主角，在演資本主義社會這一幕時，是以資產階級為主角，現在開演不久的社會主義社會這一幕，則是以工農大衆為主角。

不幸中國史還在鑼鼓喧天不曾演完封建社會這一幕時，世界史已在演資本主義社會這一幕了，而且因為資本生產制度的世界性，侵略性，歐美列強都來侵佔中國史的舞台，使得中國史的封建社會這一幕演不下去，且由於世界侵略資本對中國封建社會起的作用，在中國也生長了資本主義社會這一幕的主角，雖然還是很無力的，但他們接受了資

本社會近代的影響，也起來要打倒封建社會，使中國史的這一幕演不下去。

清末封建的統治者羣，便正處在這內外兩面夾攻中，在這種兩面夾攻的情勢下，它本身如果不起質的變化（這種質的變化是很少可能的），其沒落乃是必然的命運，但任何歷史上的統治者羣——任何歷史上要沒落的社會成分，都不曾見有自願放下一切的，因為它在沒落之前，必然有一番盲目的愚昧的絕望的掙扎，清末統治者羣就正是如此，因為它是處在內外兩面的夾攻中，所以它的掙扎，也是兩方面，一是對外，一是對內。

先說它的對外方面，處在世界資本主義社會包圍中的中國封建社會，好比密封固閉在真空玻璃箱中的「木乃伊」一經空氣就會腐爛消滅，所以當真正資本主義生產制的外貨侵入，各國請求與中國通商的時候，清末統治者便一反過去中國史上與大秦波斯等國通商的傳統，採取了閉關鎖國政策，因此自十七世紀以來，中國的通商口岸，事實上只限於廣州一個，廈門、甯波諸港，雖間有允許通商者；但均課有高昂的關稅，而在廣州，外用種種苛法限制外商自由，最有名的是「公行制度」，即所謂廣州的「十三行」，外商買進賣出，均須由公行經手，一概不准直接，公行上下其手，使外商多感不便且受嚴重損失，此外如規定外商除交易時不得至廣州，如定一年交易限期為四十日；如外商至廣州不得攜帶家眷，如外商只准寄寓公行所備辦的商館裏，如外出不准乘轎，如外商進

裏只准公行轉遞，如中國人不准與外商服役，尤其不准外商僱傭中國婦女（如公行商館不准用歐式建築，即中國店號不准用夷字，如不准內地人民私住夷館等都是，這才眞是中國所給予外商的不平等條約哩！公歷一七九三年，英王喬治曾派遣使臣到中國來，請求清廷對於通商限制酌量取消一些，但清乾隆皇帝的答覆，毫無結果，中有「昨據爾使臣以爾國貿易之事稟請大臣轉奏，皆更張定制，不便准行——若經此次詳諭之後，爾國王或誤聽爾下人之言，仍從那將商貨艤駛至浙江，天津地方，欲求上岸交易，天朝法律森嚴，各處守土文武，恪守功令，爾國船隻到彼，該處文武必不肯令其停留，定當立時驅逐出洋，未免爾國夷商徒勞往返，勿謂言之不豫也，其懍遵毋忽！」這樣才眞是天國上朝對藩屬的態度哩！但骨子裏却是清廷深恐在資本制生產方法下生產的商品輸入中國，則將破壞其封建王朝藉以存在的小農經濟的原故，試問這種不平等條約，這種傲慢態度，歐洲資本，尤其是英國資本能忍受嗎？決不能的，等到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發生，跟着而有一八五六年開始的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之役），接着而有一八八五年的中法戰爭，接着而有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戰爭，清朝的對外掙扎就完全失敗了。

再說到對內方面：那時中國內部的政治力量可分兩派：一是革命派；一是改良派。革命派的活動當自太平天國說起。一八五〇年發生的太平天國革命運動，是與過去中

國史上的農民革命運動有些不同的，因爲它的革命內容包含着反滿反列強的民族成分，反對地主的民主成分，同時，還有反私有財產的原始共產制的成分。換一句話說，它是近百年來中國民主革命的開端，這自然是對於淸末統治者要命的當頭一棒，淸廷必需要把它壓下去，結果是成功了，這因爲參與太平天國革命的社會成分，不過還是一些在滿淸封建統治下的貧地農民，城市貧民，及破壞的手工業者，缺乏强有力的市民層，缺乏集體的有組織的鬥爭力量，再則因爲執行這一成功任務的不僅是滿人而且有漢人，也不是完全靠了自己的力量，而且還借助了外人的力量，那時曾國藩的湘軍與李鴻章的淮軍及在英法二國幫助下所組成的常勝軍（洋槍隊）。都是它成功的重要因素。不過民族因素，也非曾、李所敢於蔑視。曾國藩當出兵抗太平軍時，明知太平軍的反滿號召深得一般漢人同情，他那討太平軍的檄文，所以不單根據什麼君臣之義的傳統，斥爲叛逆，而乃專攻太平軍新政策的弱點，惟歷數其擾亂民生，毀棄禮教，而尤聳人聽聞的，便是那：「農不能自耕以納賦，而謂田皆天主之田，商不能自賈以取息，而謂貨皆天主之貨」的幾句話。這樣，爲保地主豪紳商業資產者利益所組織的湘軍、淮軍、常勝軍，便更願作殊死戰了。太平軍自一八五〇年起義到一八六四年敗亡，前後共計十五年。

太平軍敗亡後若干年，繼之而起，明確代表市民層的革命黨，聯合會黨、新儒，乃至

一般的知識分子，形成一革命勢力以致力於革命事業，屢仆屢起，亘數十年不衰，而卒以顛覆滿清，創建中華民國的是　國父孫中山先生，先生生於清同治五年（公歷一八六六年太平天國敗亡後二年）當齠齡時，同鄉人談洪楊故事，即以洪秀全第二自任，所以他是繼承太平天國革命傳統，走上近代革命正軌，轉變中國歷史方向的唯一革命領導者，他對於清末統治者羣自然更是眞正要命的打擊，清庭更需要把它壓下去，在革命運動發軔及其發展的過程中，清庭的高壓也可以說是成功的。

任何革命的過程，都是艱苦的過程，孫中山先生自清光緒十一年中法戰爭之年，即公歷一八八五年，亦即先生誕生後二十年，始決傾覆清庭之志，開始以學堂爲鼓吹之地，借醫學爲入世之媒，但因那時革命的客觀條件還很欠缺，遲至一八九四年——甲午中國戰敗之年（即中法之戰十年），始有最初的革命團體興中會之組織，然而在檀香山發起興中會時，所得的同志，不過他的胞兄孫德彰和鄧蔭南等十餘人，興中會組織的第二年，即一八九五年，孫率領陸皓東，鄭士良在廣州起義，人數太少，自然要被清庭壓下去，次年，即一八九六年，先生再往檀香山、美洲，并英國各埠去擴大興中會的組織，願加入革命團體的，每埠不過十餘人或數人，是年，先生即在倫敦被拘入駐英清使館，獲釋興中會在日本橫濱有了分會，加入僑商亦不過百餘人，庚子年，即公歷一九〇〇年

临有惠州之役，革命黨以寡敵衆，打了幾回勝仗，但因為外交方面情勢中變，先生潛入內地及武器接濟的計劃不成，終於失敗，還犧牲了一位日本同志山田良政，同時，史堅如在廣州謀炸粵督德壽亦失敗而死義。庚子以後約五年間，即自一九〇〇年到一九〇五年間，革命的客觀條件較成熟，國內的革命運動亦現出若干轟轟烈烈的事跡，壬寅年（一九〇二）有章炳麟、蔡元培，黃宗仰等在上海創立中國教育會；旋又組織愛國學社，成為革命思想的匯集所，同時上海張園，成為革命的演說場，蘇報成了革命的機關報，癸卯年（一九〇三）春間，有張園反對桂撫王之春的大會，是年四月又有張園的拒俄大會，同年五月有所謂蘇報案的發生，章炳麟，鄒容因此入獄，乙巳年（一九〇五年）吳樾炸出洋考察五大臣，但這都大概是個人或少數人的行動，并非革命黨有組織的行動；換言之，那時一切反政府的事端，都是局部的，散漫的，沒有統一團結中心組織的，即興中會也很算不得統一全國的中心組織，正當清政府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時（一九〇五年七月），中國同盟會即於日本東京成立，從此便有了統一的組織的革命行動，從丙午年到戊申，即從一九〇六年到一九〇八年，便有下列屢起屢仆的革命事變，如一、丙午（一九〇六）萍醴之役。二、丁未（一九〇七），潮州，黃岡之役，三、丁未惠州之役，四、丁未安慶之役。五、丁未欽廉防城之役。六、丁未鎮南關之役。七、戊申黃岡

之後，然其結果，鄂被清庭高壓下去，革命黨屢經失敗，破壞最精銳之機關，失去最利便之地盤）。甚至陷入衣食行動之際，亦成問題，因此在武昌起義前三年（即一九○八、一九○九、一九一○年），革命黨活動見於表面的事實，反比較宣統前三年（則一九○六年、一九○七、一九○八年）爲少。然而從宣統到武昌起義前（即一九○八、一九○九、一九一○年前）仍有下列諸役：如一、戊申（一九○八）十月二十六日熊成基發難於安慶。二、庚戌（一九○九）正月初，廣州新軍變亂。三、庚戌[illegible]汪精衛黃復生等謀刺載灃。四、辛亥（一九一○）三月二十九日黃花崗之役，結果也是失敗的，但辛亥八月十九日的武昌起義，畢竟一舉而推翻了滿清佔據中國達了凡二百六十八年之久的統治交替一期，以上所述，是革命黨由屢次的小失敗而得到了最後的成功，清廷則由屢次的小試動而終於不免最後的總失敗；總之它的對內，也同對外一樣，苦苦支持掙扎了許久終於失敗了。這種沒落的社會成分——清末的統治者羣本身不能起質的變化，失敗可以說是必然的命運。

但清末的歷史劇，是帝國主義者從外面來叫它下台，革命黨從內面來逼它下台；但清末統治者羣中，也未嘗不有人想從改良入手來挽救自己的危機，也就是說未嘗不有人想把封建機構本身徐徐加以質的變化，對於時代迎頭趕上去來挽救自己的危機。這種改良

運動與革命運動不同，革命運動是逼它下台，改良運動，卻是爲它穩定台柱。

改良運動，可以說是發軔於曾、左、李的洋務，太平軍之役，李鴻章以淮軍與李秀成相持於長江下游時，上海各國富商所募以防太平軍的常勝軍，及英法駐在上海的防軍，常助淮軍攻取上海附近各城，後來常勝軍且改歸李節制，李因有羨於西人槍砲之銳利及其兵法之嚴密，因效歐美兵法訓練淮軍，隨時購用西洋械彈，并隨營設局仿造，他兼任通商大臣時（清同治二年，公歷一八六三年）延聘設外國語言文字學館於上海，以期精研西人「測算之學，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法」，是爲李鴻章講求洋務之始；同時有廣東人容閎游學美國歸，也想輸入西人學藝於祖國，曾往見太平軍干王洪仁玕陳述七策，干王不能用，後於太平軍敗亡前一年，以算學家李善蘭華衡芳之介，見曾國藩於安慶，時曾幕頗多天算機器之專門學者，慫曾設西式機器廠，曾因以購辦機器之任委容閎，太平軍亡之明年（一八六五年），容購機器歸，時曾因剿捻駐徐州，李鴻章督兩江，李遂將此項機器與其前此專造軍火的機器局合併，設江南製造局於上海之龍華，時爲清同治四年，公歷一八六五年，是爲中國有規模粗具的機器之始；容旋力慫曾派遣學生留美，曾因與李合奏於清政府，派送幼年學生赴美，并派容爲監督，曾先死（死於同治十一年，公歷一八七二年），此後對洋務的重担，便由李一人肩負，綜計李一生所

辦洋務，有學校工廠，輪船、電線、鐵路、鑛務，不一而足。在清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年）內，有人提議停辦製造輪船局，李鴻章的覆奏中有一段說：

「臣竊維歐洲諸國百十年來，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國，闖入邊界腹地，凡前史所載，亙古所未通，無不款關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與立約而通商……合地球東西南朔九萬里之遙，胥聚於中國，此三千餘年一大變局也。西人專恃其槍砲輪船之利，故能橫行於中國；中國向用之器械，不敵彼等，是以受制於西人。居今日而曰攘夷，曰驅逐出境，固虛妄之論，即欲保和局，守疆土，亦非無具而能保守之也。……士大夫囿於章句之學，而昧於數千年一大變局；狃於目前苟安，而遂忘二三十年之何以創鉅而痛深，後千百年之何以安內而攘外？此停止製造輪船之議所由來也。臣愚以為國家諸費可省，惟養兵設防練習槍砲製造兵輪之費萬不可省。求省費則必屏除一切，國無與立，終不得強矣……」。

這就是李鴻章站在清庭的立場，講求富國強兵之策，想以改良的洋務來鞏固清庭的統治，本是對於清末統治者極有利的，然而亦不爲清庭所接受。試看清光緒元年，公歷一八七五年李因台灣事變又上過一道奏摺，中說：「今日所急，唯在力破成見，以求實際而已！……臣於洋務涉歷頗久，見聞較廣，於彼長短相形之處，知之頗悉，而環顧

嘗時餉力人才實有未逮，又多拘於成法，牽於衆議，雖欲振奮而末由。」又看清光緒三年，公歷一八七七年，郭嵩燾在倫敦與李鴻章書，責他派遣留學生只知講求兵法，而未能注重講求政制原理謀歸國爲根本的改造，書中有云：「購兵者末也，各種創制，皆立國之本也」的時候，李鴻章的答書則說：「鄙人職在主兵，亦不得不考求兵法……欲舍此別圖其大者遠者，亦斷不得一行其志，」就可見皮毛的洋務尚行不通，而根本的改造當然更不可能了。

此外郭與李來往的書札中，還有兩篇，可以證明就是皮毛的洋務，也爲清廷所拒絕的，茲節錄如下：郭與李書云：「前歲入都，本意推求古今事宜，辨其異同得失……諫勸爲一書，上之總署，頒行天下學校，以解士大夫之惑……道天津，亦曾爲中堂陳之，及至京師，折於陪隨之口，噤不得發，竊竊中國人亦有萬不可解者……鐘表玩具，家皆有之，呢絨洋布之屬，遍及窮荒僻壤，江浙風俗，至於舍國家錢幣而專行使洋錢，且昂其值，漠然無知其非者，一聞修造鐵路，電報，痛心疾首，羣起阻難，至有以見洋人機器爲公憤者，曾劼剛以家諱乘南京小輪船至長沙，官紳起而大譁數年不息……辦理洋務三十年，關吏懵無知曉，而以挾持朝廷曰公論，朝廷亦因而遷飾之曰公論。……寘身七萬里外，未及兩月，一參再參，亦遂幡然自悔其初心，不敢復爲陳論矣。李答郭

書云：「西洋政教規模，弟雖未至其地，留心諮訪，考究幾二十年，亦略聞梗概，自同治十三年，海防議起，鴻章即瀝陳煤鐵必須開採，電線鐵路，必應仿設，各海口必添洋學格致書館，以造就人才。其時文相（指當時軍機大臣文祥——編者註）目笑存之，廷臣會議皆不置可否，王孝鳳，于蓮舫獨痛詆之。曾記是年冬底……叩謁梓宮，謁晤恭邸，極陳鐵路利益——邸意亦以為然，謂無人敢主持，復請乘間為兩宮言之，渠謂兩宮亦不能定此大計。從此遂絕口不談矣。……鄙意鐵路須由開煤鐵礦作起，興此大役而練習須臾，職自海外，絕難告成。目下雞籠煤礦，已有成效，武穴池州，均甫開局，魏温雲亦在寶慶衡州等處試採煤鐵；但官紳禁用洋法機器，終不得放手為之。凡此皆鄙人一手提倡，其功效茫如捕風，而文人學士，動以崇尚異端，光怪陸離見責，中國人心真萬不可解者矣……。」從這兩篇書扎看，排斥洋務的阻力，還不僅在於清廷，而且是從一般文人學士，士子紳縉，亦即君子們發出來的，也就是說從整個的社會輿論發出來的。但是郭說：「辦理洋務三十年，疆吏全無知曉，而以挾持朝廷曰公論，朝廷亦因而獎飾之曰公論」，這仍是朝廷挾持公論阻止洋務，李說：「曾記是年冬底赴京叩謁梓宮，謁晤恭邸，極陳辦路利益……邸意亦以為然，謂無人敢主持，復請乘間為兩宮言之，渠謂兩宮亦不能定此大計……」這又可看出朝廷無辦洋務決心，不肯定此大計，而以公論為

抵觸，總之清末統治者羣，適站在清廷的立場，講求富強之策，以穩定其統治的改良辦法都不能接受，等到甲午（公歷一八九四年）中日一戰，海軍敗潰，李鴻章的洋務也歸於總失敗了。

同一站在清廷立場，想用改良辦法，一面使統治者羣本身鞏固，一面藉以穩定清末統治，繼曾左李洋務而起的；則有康梁的變法，然而這種改良的變法，仍不爲清廷所接受，何以說康梁的變法，是繼曾左李之洋務來的：康有爲在甲午（一八九四年）作了舉人，次年趁着會試，就在北京發起，「公車上書」，「痛陳改革救亡的辦法」，書中雖不忘，「列祖列宗及我皇上深恩厚澤涵濡煦育數百年之恩」，而其開闢新向，既說：「竊以爲今之爲治，當以開創之勢治天下，不當以守成之勢治天下」，「這不與李鴻章「今日所急，惟在力破成見」」一樣嗎？惟以前此上書，終不得達，其變法運動（亦稱維新運動），至戊戌年（公歷一八九八年）春夏之交，始有些進步。是時由楊銳打通了高燮曾，上疏稱薦，於是光緒帝始諭令王大臣傳康至總署，詢問變法事宜；王大臣始取其上年呈請工部代奏之書以上；帝覽之，指其篇中「求爲長安布衣而不可得。」及「不忍見煤山前事」等語，謂軍機大臣曰：「康某何不顧生死乃爾，竟敢以此言陳於朕前，」帝覽嘉，不惟不見罪，反命嗣後康某有條陳，當即日呈遞。毋許代格，於是不久因徐致靖，楊

深秀的先後奏請，於戊戌四月二十三日，下詔定國是，從此所謂新政開始了，其犖犖大者，如一、命自下科始，鄉會試及生童歲科各試，向用四書文者，改試策論，二、賞舉人梁啓超六品銜辦理譯書局事務……三、命删改各衙門則例；四、命於京設立農工商總局；五、下裁汰冗官令等等，然所以有此結果，一由於清末統治者羣中的光緒帝有點覺悟，同時，讀生文人的士大夫階級，也有一部分人因甲午戰敗起了反省，所以康梁的變法運動可以說（一）設法抓着皇帝，作他的傀儡，（二）向士大夫階級裏面廣求同志着手。因此康上皇帝書至七次之多，而在士大夫階級中，也得到了梁啓超這樣的弟子，并得到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御史楊深秀，給事中高燮曾，以及楊銳、林旭、劉光第、譚嗣同、張蔭桓、李端棻等一羣同志，甚至督撫中的張之洞、陳寶箴，官僚中的袁世凱，也是他的同情者。所以從戊戌年四月到八月的百餘日內，算是變法運動的高潮時期。然那時光緒皇帝雖設然行新政，而朝臣多反對者，手握重兵的榮祿實爲其領袖，嵩登職權的西太后實爲其背景，再則大多數經生文人的士大夫階級，也是因爲要一假道求合」以「衛道自任」，硬指康有爲的惟新學說，爲褻瀆聖典，甚至把他看作妖魔鬼怪。試看那時一個以參劾李蓮英受處分的朱一新，就說：「法可改而立法之意不可改，……今能素王改制之文，以便其推行新法之實，無論改制出於緯書，未可盡信，即舉八果有是言

，亦欲質文遞嬗復三代聖王之舊制耳，而豈用夷變夏之謂哉？」朱還算是平心討論，沒有辱罵他，翁同龢本是主張變法的人，等他看到了康的孔子改制考，就向皇帝說「此人居心叵測」，此外則有湖南曾濂上皇帝書，說：「康有爲可斬」葉德輝說：「當可以魏宗實配享孔庭，使奸人知特豚之足貴，斷不可以康有爲擾亂時政，使四境聞雞犬之不安……。」湖南嶽麓書院裏的先生們，那時與着時務學堂裏的一般人，簡直無異「洋奴」「漢奸」，在這種情況之下，所以變法運動，雖有戊戌四月到八月百餘日的高潮，而終於爆發了戊戌八月初六日的政變，由此西太后那拉氏仍垂簾訓政，同時下諭抄捕南海館，康雖先日離京，梁亦走避日使館，而張蔭桓、徐致靖、楊深秀、楊銳、林旭、劉光弟、譚嗣同及康弟廣仁，却一齊被捕下獄，除張徐二人一戍邊，一永禁外，餘六人旋被殺，是之謂「六君子」，八月十一日，光緒帝所裁汰的冗官衙門一律恢復了，同日，禁止士民上書，廢官報局，十三日，揑造光緒帝病重之說，豫備廢立。二十四日，恢復八股取士之制，廢農工商總局，查禁報館，嚴拿主筆，由是而禁止結會集社，并復武試弓刀石之制，所有維新以前的改革無不繼從其舊，而康梁變法又歸於失敗。也就是說改良的變法和改良的洋務一樣，終不爲清末統治者羣所接受。

不惟不接受，自戊戌政變以來，且加緊進一步的反動，那拉氏既因反對新政而臨朝

稱制，於是對內則重用頑固舊臣如載漪、剛毅、徐桐、啓秀、趙舒翹等等，謀廢立以絕後患；對外則利用拳民以快宿怨，而招致庚子年（公歷一九〇〇年）八國聯軍入京之禍。兩宮蒙塵，國運垂危不必說，而海關銀四百五十兆兩的賠款，至今還壓在我們老百姓頭上，所以自第一，第二，鴉片戰爭中經中法戰爭，以至中日戰爭，外人之侵侮中國，固然可算得一步緊一步，把中國本身的弱點也完全暴露出來了；但是中國大多數人士，還祇感覺外人的可恨可惡，對於清廷，有時還加以曲諒，自經拳變大禍之後。帝國主義者對於中國老百姓，倒頗具一點戒心，因之也稍稍變了它們的侵略方法，而中國的大多數人士以及中國的老百姓，都把憎恨外人的心理完全移到清庭身上來了，越感覺外人的可惡，就越感覺清廷的不可恕，在此時期內，便有一種特殊情勢逼得清廷再不能以拒絕變法來對內，而要以接受變法或假變法，甚至要以假立憲來對內了，其實對於眞變法眞立憲仍是拒絕的。試看庚子八國聯軍入京後，西太后在出走的途中便下詔罪己，下詔求直言，在庚子年十二月，便在西安下詔變法；到辛丑年（一九〇一）三月又命設立「督辦政務處，」爲籌辦新政的機關，彷彿眞是要變法了。實則不過因爲自己闖了一場害國病民無面目對人的大禍，付出了海關銀四百五十兆兩巨大的代價，知道爲衆國上下所不可恕，想拿假變法來緩和國人的心理罷了。所以那時的變法，新政設施的條款雖多，大

抵不出劉坤一、張之洞、袁世凱三人的主張，那拉氏還是一味的縱樂，新派的人士，甚至光緒帝還是處於幽囚狀態中，不能問政。劉坤一不久棄世，那時的變法及各種施設，似乎是以張袁爲中心，袁與繼李鴻章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形勢便利，地位的重要更在張上。因爲清末的政治節目，站在清廷的立場企圖改良的，除了曾左李的洋務，康梁的變法以外要算有袁世凱的一幕。他們的這一幕說起來也是很艱苦的。

的確，袁世凱原是李鴻章所識拔而自結於榮祿和奕劻的一個會做官的官僚，所以那時他所主持的新政，表面上雖好像和戊戌康梁所舉辦的差不多，在實質上完全是假的，不料他假藉清廷來主持假的還是要排斥，因爲那時清廷正處在不得不假變法，甚至假立憲來穩定自己的時候，即是說不能不以假變法、假立憲來排斥它認爲不可靠的人或異己的時候，也就是說拿假變法，假立憲來對內的時候。

當時自從庚子亂後，國人把一切責任都歸之於滿清，革命勢力日益高漲，逼得它不能不以假變法假立憲來應付，尤其是因爲乙巳年（一九〇五年）日俄戰役的結果，日本以君主立憲國而勝俄國以君主專制國而敗，於是戊戌變政失敗後的立憲論者益發振振有辭，當日俄和議尚未成立時，以狀元而首倡辦實業的張謇，便勸告袁世凱主張立憲，駐法公使孫寶琦，也居然上書那拉氏請立憲。因此又由變法而轉到了立憲，而立憲的唯一基本

，便是一部日本的憲法，清廷的親貴和官僚，看見日本的憲法，有些地方不但無損於皇室的尊嚴，甚至還可以利用來尊皇室，行集權。於是在清光緒三十二年，即公歷一九〇六年，清廷也居然頒下了預備仿行憲政的詔令。而「仿行憲政」的第一步，卻是什麼「釐定官制」第二步便是「收攬兵權」。

清代官制，沿明代之舊，中央以殿閣大學士爲宰相，以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尚書分掌政務，而以都察院掌監察之權，後來設了軍機處，又奪了大學士的實權，地方則以總督巡撫爲行政長官，握有行政司法軍事的大權，當初中央的大學士和六部尚書，規定爲滿漢並設，大學士滿漢各二人，尚書滿漢各一人，軍機處大抵多用滿人，太平軍興，漢人也有入軍機處的，太平軍以後，因曾左李有中興之功，曾李大概都以中央大學士兼地方總督，居然中外緊望，權出政府上，因此，漢人政治勢力日張，地方權亦日重，此次所謂釐定官制之主要目的，即在假仿行憲政之名，打破這種局面，試看載澤等五大臣考察回國，陳說改革官制之必要，即以「循此不變，則唐之藩鎮，日本之藩閥將復見於今日」爲理由，於是召集御前會議，決定四大方針：（一）十年或十年後施行立憲政治；（二）大體效法日本；（三）廢現制之督撫……財權軍權悉收回於中央；（四）中央政府組織略與日本現制相等。這就是想以預備立憲，卽假立憲便其私圖，然廢督撫把軍權財

權收回中央，那時還礙於袁世凱的不願意，一時通不過，不得已而思其次，於是把中央官制來了一番莫明其妙的改革，如把巡警改爲民政部，戶部改爲度支部，兵部改爲陸軍部等等，各部均設尚書一員，侍郎二員；但特別加了「不分滿漢」四字，因爲有不分滿漢一語，當時有些人也不免癡心妄想，以爲滿清從此真要打破民族界線，直到新授各部尚書的支配，爲滿七，漢四，蒙古漢軍各一的比例，才恍然大悟這所謂釐定官制的用意。

清廷假借預備憲政的名義，釐定官制，是爲的想藉此打破太平軍以來外重內輕的局面，而尤其要緊的還在收攬兵權，原來清代的軍隊，當入關之初，本全賴滿洲的八旗兵，但是平三藩時，八旗兵驕惰不能用，便要全靠漢人統率的綠營兵了，從祕密會黨白蓮教等起事，綠營兵又屢敗，於是全賴團練收功，八旗，綠營，都算是國防軍，團練則屬臨時性質，所以兵事一定，清廷仍可收集權之效，直到太平軍之役，團練性質的湘軍，淮軍，實當國防的大任，且逐漸演爲軍官私有的軍隊，甲午中日之役，湘軍，淮軍又不能用，清廷便倣列強軍制，訓練新軍，袁世凱便在此時拜了督練新建陸軍的大命，以距天津七十里的新農鎮，即津沽間所稱爲小站的地方爲新建陸軍屯駐地，是爲北洋軍閥發軔的所謂小站練兵。到清光緒二十九年，即公歷一九〇三年清廷又設立練兵處，以總統

一全國兵權，營制餉章，悉出袁手，次年，袁遂以北洋大臣兼練兵大臣，結果全國兵力，反更集於袁氏一人之手；袁便以全國之力練成新軍六鎮；同時，張之洞在湖北亦將兩湖之力練成新軍一鎮一協，於是湖北與北洋儼然成爲全國的兩大重鎮，據其實權者仍皆爲任地方長官的漢人。清廷是時深感覺到統一全國兵權的計劃不能貫澈，因假借籌定官制預備憲政的名義，命滿人鐵良爲陸軍部尚書，將袁世凱所統六鎮兵力劃撥四鎮歸陸軍部直轄，這是清廷收攬兵權的第一步。清光緒三十三年，即公歷一九〇七年，又將握有重兵的袁世凱，張之洞，同時以軍機大臣的名義調歸中央政府，圖使中央重而地方輕，以便控制全國，這是清廷收攬兵權的第二步。但是袁張雖調歸中央，而逼處近畿的新軍，其將領都是袁的舊部。袁的勢力仍在；加以那時清光緒三十四年，即公歷一九〇八年，西太后那拉氏和光緒帝又先後一天死了，溥儀嗣位，載灃攝政，便不顧一切將袁世凱免職，并攝行大元帥事，派載濤訓練禁衛軍兼軍諮大臣（即今參謀總長），載洵參預政務大臣兼海軍大臣，並令邊畿陸軍統歸陸軍部直轄，將全國海陸軍權都收歸弟兄（灃，濤，洵，皆同胞兄弟）三人之手，這是清廷收攬兵權的第三步，而且是步步都告成了。

清廷用這種精神來籌備憲政，自然是假的，不過他們裝得很像。溥儀登極的宣統元年（即公歷一九〇九年）三月，下諭決行立憲，并限於當年十月各省諮議局一律要成立；更

於十二月頒布府廳州縣自治章程及法院編制法，宣統二年（一九一〇）九月，把代表全國半民意機關的資政院也成立了，而且於是年十月徇士民促開國會之要求，下詔縮短預備立憲期限，定於宣統五年召集國會，在國會未開前，再行釐定官制，先設立所謂內閣，然而新官制的內閣成立，閣員共十三人，其人數分配爲滿九漢四，而滿九人中，皇族又居其五，一時有皇族內閣之稱，政權的圈子，反而愈來愈縮小了，拿假變法假立憲來對內反而變本加厲了。

如前所說：中國歷史劇演到清末，從內部表現出來的政治力量原有站在清廷的立場，想以改良來繼續清末統治的改良派與根本不承認清廷可以走改良的路而乾脆就是把它推翻的革命派，而清廷在對內方面的掙扎，却是把革命派與改良派一視同仁，一律看做它的敵人，對於革命派的勢力固然是想從根本上消滅它，對於改良派的君憲主張也不接受，並且在萬不得已時，則以立憲之名行集權之實，以假立憲來處處對內，但那時改良派與革命派勢力的消長，却是成反比例的，最初是改良派佔優勢，漸漸革命派的勢力便抬頭起來了，尤其是在清廷假立憲的面目一天一天揭穿以後，革命派的勢力便更加高漲。辛亥年（一九一〇年）八月十九日的武昌起義，革命派便收了最後推翻清廷之殊功。

當武昌事起後，有幾件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的事：一是非革命派的黎元洪作了革命軍

的都督，立憲派改良的諮議局議長湯化龍作了軍政府的民政部長，而各省的響應獨立，立憲派人一概在那裏策動，而各省諮議局的立憲派分子也無不加入革命動作，二、是革命派發難最後推翻了清末統治，而南京臨時政府的組織并不與同盟會原來的革命方略和革命精神相符，而那時并不是按照軍法、約法、憲法之治的三種步驟來建立一革命的強有力的軍政府，而是即刻要建立和爭論適合憲政上的總統內閣制問題。三、是袁世凱的起用與清廷的逐步降服，正和清廷以假立憲而定官制收攬兵權的逐步成功成一有趣對照，武昌八月十九日起義，清廷即於八月二十三日起用袁世凱為湖廣總督會辦剿匪事宜，這是清廷第一步的降服，袁氏先託病不出，後經徐世昌徵服勸駕，清廷答應袁氏所提條件，後始出山，這是清廷第二步降服，迨九月九日清廷又下諭改組皇族內閣，開除黨禁，釋放汪精衛，宣布憲法十九信條，下詔罪己，這是清廷第三步的降服。但是無論如何降服都不免悔之已晚，真有康氏所謂「求為長安布衣而不可得」之苦。最後只有總降服了事。

中國歷史劇演到這裏，是清末統治者無論對外對內的掙扎都歸於失敗，而掙扎的所以一無效果，是由於歐美列強已在排演資本主義這一幕時，它還在迷戀封建骸骨，不能迎頭趕上，而只有為前進的侵略的外力所降服；國內的革命派與改良派的政治要求，

它又不分皂白一律加以敵視，所以也只有終於爲前進的革命的內力所傾覆。清末統治者羣的崩潰依照上述史實過程，可以證明下列幾項眞理：

一、歷史劇是一幕一幕往前演進的，跟不上時代，任何統治者都必然被歷史拋棄在垃圾堆裏。

二、任何落後社會成分（例如清末統治者羣）如果其本身不能起質的變化，其崩潰乃其必然的命運。

三、任何落後社會之成分，除了頑固保守一貫反動走到最後崩潰之路外，很不容易在本身起質的變化來挽救自己，有之只是例外，因此，歷史上改良道路是走不通的。

八　清末的立憲

中國近百年來的革命，是一種澈始澈終的民主革命。所以自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以來，國內政治分野，顯然就只有兩大派：一爲民主派，一爲反民主派，不過在民主派中，繼承兩個傳統：一爲太平天國革命傳統；一爲曾左李洋務改良傳統——發展爲兩種運動——一爲 國父中山先生所領導的推翻清廷的革命運動，一爲康梁所領導的幻想依附清廷的立憲的改良運動；而終結爲革命運動的勝利。

民主運動表現在形式上，便成爲立憲運動，有憲法的國家，雖然不就是民主國家，例如德日意；但民主國家必然要有反映人民公意之憲法以爲人民權益之保障。而且「立憲者當求之國民，不當望之君主」，當時「民報」已主張之。所以中國實質的民主運動，雖然鴉片戰爭以來就開始；而形式上的立憲運動，則只能說是肇始於一九〇四——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以後，這時正是中國甲子紀年的甲辰年到乙巳年，也就是清光緒帝的三十年到三十一年。

無論是實質的民主運動或形式的立憲運動，清廷——亦即反民主的統治者，當然都

是反對當時反民主的中心勢力，是西太后及滿族王公親貴以至大小奴才臣工，光緒帝和一班立憲論者，雖然贊成立憲，但是其目的却在立憲來緩和革命運動，甚至破壞革命運動的。試看梁啓超說：「數年前革命之說偏天下，自預備立憲之詔既頒，乃如湯沃雪，」一年立憲來緩和，破壞革命運動之心，不是昭然若揭了嗎？所以反民主派之反對民主，反對立憲，是當然的；在民主、立憲運動初起，其勢尚不甚張的時候，必然要用高壓手段，對於民主派加以禁錮屠殺，但到了民主、立憲運動普遍展開，其勢不是單靠禁錮屠殺所能遏止的時候，它也可能把民主、立憲的旗幟搶過去，抗在自己肩上，來一套騙局的「假立憲之名，行專制之實」，一以緩和，破壞革命運動，一以加強自己的奴役統治，這是反民主的統治者今昔如出一轍的。

中國在日俄戰爭以前，革命運動既未普遍，君主立憲之說，其勢亦不甚張，及日俄戰爭以後，因日以立憲小國而勝，俄以專制大國而敗。於是不僅向日之立憲論者振振有詞，即各方人士亦起而紛紛主張，如當時江蘇名士張謇作書慫恿袁世凱，要他主張立憲，駐外公使孫寶琦也在任內以立憲奏請政府，國內二三疆吏，亦相率建議立憲，中樞西太后及其滿族親貴，也知道立憲是無可反對的了，於是開始用「今茲未能，請俟之，月攘一雞」的辦法來拖延。其意若曰：「你們說立憲好嗎？好，我就派人往立憲各國去考察一

下了再說」，所以在一九〇五年的六七月，便有派戴澤、戴鴻慈、徐世昌、端方、紹英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的諭旨。（出洋考察憲政的五大臣，在北京正陽門遇吳樾之炸，結果，徐世昌，紹英退出，改派尙其亨、李盛鐸）。

自五大臣出洋考察後，清廷內外大吏，更時有奏請立憲的奏章上奏。到一九〇六年（即光緒三十二年）夏五大臣考察歸國，也相率呈請立憲，於是由御前會議決定，於本年（即一九〇六年）七月十三日下詔預備仿行憲政，首先從改革官制入手，這一面仍是拖的辦法，一面且是不惜拿立憲來破壞革命運動，并進一步排除漢人勢力。當五大臣出洋回國召對時，極言立憲規模，宜效法日本，並論官制改革的必要，謂『循此不變，則唐之藩鎮，日本之藩閥，將復見於今日。」於是御前會議的結果，決定立憲與改革官制的四大方針：一、十年或十年以後始施行立憲政治；二、大體效法日本；三、廢現制之督撫，各省新設之督撫，其權限僅與日本府縣知事相當，財政軍事權，悉收回於中央政府；四、中央政府組織，略與日本現制相等。原來，自曾左，打平太平天國有功後，漢人亦漸有擁大權者，尤其是在封疆大吏中，試看梁啓超說：『以今日論之，號稱第二政府之天津，坐鎮其間者，漢人耶？滿人耶？而北京政府諸人，不幾於皆爲其傀儡耶？兩江兩湖兩廣之重鎮，主之者漢人耶？滿人耶？（此暗指袁世凱，張之洞，劉坤一諸人，）

——平心論之，謂今之政權在滿人掌握，而漢人不得與聞，決非忠於事實也。」惟其如此，所以要假籌備立憲之名，改革官制，要假改革官制之名，剝奪督撫實權，這才是問題的中心，也是不易解決之難題，結果先議中央官制，把地方官制放在後面。

到本年（一九〇六年）九月二十日釐定官制的上諭發布了，其中具體辦法爲：「軍機處爲行政總匯，雍正年間本由內閣分設，取其接近內廷，每日入值，承旨辦事，較爲迅速，相承至今，尚無流弊，自毋庸改章。內閣之軍機處一切規制着照舊行，其各部尚書均着充參預政務大臣，輪班值日，聽候召對，外務部、吏部、均着照舊，巡警爲民政之一端，着改爲民政部，戶部着改爲度支部，以財政處併入。禮部着以太常、光祿、鴻臚三寺併入，學部仍舊，兵部着改爲陸軍部，以練兵處太僕寺併入，應行設立之海軍部及軍諮府未設以前，均暫歸陸軍部辦理，刑部着改爲司法部，責任司法。大理寺着改爲大理院，專掌審判，工部着併入商部，改爲農工商部，輪船、鐵路、電線、郵政，應設專司，着名爲郵傳部，理藩院着改爲理藩部，除外務部堂官缺照舊外，各部堂官，均設尚書一員，侍郎二員，不分滿漢，都察院糾察行政缺失，伸理冤滯，着改爲都御史一員，副都御史二員，六科給事中着改爲給事中，與御史各缺，均暫如舊。其應增設者：資政院爲博採羣言，審計院爲核查經費，均着以次設立。其餘宗人府，內閣、翰林院、欽天

監、鑾儀衛、內務府、太醫院、各旗營侍衛處，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倉場衙門，均毋庸更改。……」

這種新官制發布後，立憲論者固大失所望，如當時上海時報社評說：「此次之改革，不過換了一個名目，淘汰幾個無勢力之大老而已，絕無他影響……」日本朝日新聞也覺得奇怪，它說：「此等內閣組織，眞各國所無有。……固然各國之官制，各有其歷史，清國政府列部，亦有外間不可想像之情形，然而此次新發表之官制，不免聲大而實小矣。」特其最令人失望的，尤在新授各官之分配：

一、軍機處：奕劻、世續、瞿鴻禨，

二、各部：（一）、外務部大臣奕劻，尚書瞿鴻禨。

（二）、度支部尚書溥頲。

（三）、禮部尚書溥良。

（四）、陸軍部尚書鐵良。

（五）、法部尚書戴鴻慈。

（六）、郵傳部尚書張百熙。

（七）、理藩部尚書壽耆。

（八）、民政部尚書徐世昌。
（九）、農工商部尚書載振。
（十）、學部尚書榮慶。
（十二）、吏部尚書鹿傳霖。

右新授十一個官中，只有四位漢人，前此六部堂官分爲滿漢平列，是滿三漢三，現在美其名曰不分滿漢，倒把漢人弄得很少了，於是滿漢大臣官僚大爲不平。當時有一個叫惲毓鼎的說：「章皇（指順治）初入關，朝廷大政事，皆范文肅、洪文襄所定，懲前溫氏以蒙古色目人壓漢人之害，制爲滿漢雙行之法，閣部卿寺分缺若溝澮，不相侵越。權將軍都統尋屬焉、而王公不親吏事；陽爲尊之，陰爲漢人保持仕進之路。辛丑回鑾，壽欽內慚，始特詔天下議改革，定新官制。少年新進，不深惟祖宗朝立法本意，第謂滿洲人士以八旗區區一部分與我二十一行省漢人對掌邦政，其事太不平，欲力破此局以均勢。滿漢之界既融，於是天潢貴胄，豐沛故鄉，聯翩而長部務，漢人之勢大張，乃不得一席地以自媛。」這段話可謂慨乎言之矣，但他不知道這就是滿清當時也贊成立憲的內幕。

中央官制，算是不聲不馬的來了這麼一套，但是地方官制中的督撫問題，才是滿清

政府的生死問題。他們雖然見到此處，但終不得一個痛快解決的辦法。到次年（即一九〇七年）五月才發佈了一個所謂外官制，將各省按察使改爲提法使，增設巡警勸業道，裁撤分巡出守各道。又分設審判廳，易增佐治員，命由東三省先行開辦，直隸江蘇亦擇地先爲試辦，其餘各省分年分地請旨辦理，統限十五年一律通行。但於督撫軍財大權，仍一無所動。後來他們想出兩種辦法：一面由陸軍部收儹各督撫軍權，一面設「清理財政監理官」吸取各督撫財權。更進一步將權勢最大的督撫調入中央，陽爲尊崇，陰實裁抑。於是有北洋四鎭改歸陸軍部節制的事宜，袁世凱、張之洞兩督撫，亦於一九〇七年（即光緒三十三年）七月同時調入軍機。而地方官制也算有些改革了。

這都是一九〇六年七月十三日下詔預備仿行憲政以後所幹的兩件大事——改革內官制與外官制。但這對於仿行憲政顯然是拖，而其仿行憲政的設施與陰謀也給大家看破了，尤其使立憲論者及當時立憲派人士大失所望。

不過就是在拖的當中，既然掛出了仿行憲政的假招牌，也多少給了立憲派人士一些較從前順利活動的餘地，於是他們對着清廷的拖行憲政，他們偏要求即刻實施憲政，而憲政運動，亦一時蠢動，一九〇七年（即光緒三十三年）前後，立憲派所組織之團體，有梁啓超蔣智由等之政聞社，有朱福詵、張謇、鄭孝胥、湯壽潛等之「預備立憲公會」

，有「湖北之憲政籌備會」，有「湖南之憲政公會」，有「廣東之自治會」等。在一九〇八年（即光緒三十四年）六月，曾由鄭孝胥領銜聯名向政府請願開國會；又以預備立憲公會名義，咨電湖南湖北憲政籌備會，廣東自治會，及皖、直、粵、川、黔等省人士，約於是年（一九〇八年）七月，各派代表齊集北京，向都察院遞呈請願速開國會書，要求都察院代奏（據說當時八旗士民也有參加的）。清廷迫不得已，因於是年（一九〇八年）八月二十七日頒從此頭九年預備完期（以前預備仿行憲政是無定期的，御前會議決定是十年或五年以後始施行憲政的），這便是有名的所謂九年預備立憲。並將他們欽定的憲法大綱及議院法選舉法也在此時發佈了。

這個憲法大綱純粹從日本憲法上抄來，關於君主大權比日本還無限制。試看它的條文說「一、大清皇帝，統治大清帝國，萬世一系，永永尊戴。」「二、君上神聖尊嚴不可侵犯。」「三、君上有欽定頒行法律及發交議案之權。（凡法律雖經議院議決而未奉詔令批准者不能施行）」「四、君上有召集開閉停展及解散議院之權。」「五、君上有設官制祿及黜陟百司之權。（議院不得干預）」「六、君上有統率海陸軍及編定軍制之權。（君可調遣常備軍隊，制定常備兵額及一切軍事，皆非議院所得干預）」「七、君上有宣戰媾和訂立條約及派遣使臣與認受使臣之權。（國交之事由君上親裁，不付議院議決）」「八、君上有宣告戒嚴之權

則（當緊急時得以詔令限制臣民之自由）……」這使立憲派人士更大大地失望。

就在頒欽定憲法大綱發布後的兩月，亦即一九〇八年（光緒三十四年）陰歷十月：光緒帝和西太后先後駕崩，溥儀（即宣統）嗣位，載灃（宣統之父，光緒之弟）攝政，對於立憲的籌備，表面上似乎更積極一些，例如它於一九〇八年的十一月，即其當國後的一月，即宣諭旨由軍機大臣副署制，這是仿照立憲國由國務總理副署共同負責的表示。到一九〇九年二月，即宣統元年二月，又特下一道諭旨宣示決行立憲的意思。一九〇九年十月各省諮議局一律成立了，十二月又頒佈廳州縣自治章程及法院編制法。一九一〇年，即宣統二年九月，資政院也成立開院了，十月又派溥倫、載澤爲纂擬憲法大臣。而且在宣統元二年兩年之內，還有一個陝甘總督升允因爲奏阻立憲而開缺，甘肅布政使毛慶蕃因爲玩視憲政而革職的。這是什麼道理呢？難道載灃真的是要實行憲政還政於民嗎？不是，決不是。實由西太后及光緒帝死後，朝局日非，滿漢矛盾益深，滿人地位更極危險，而他的操縱時政力維殘局的手腕，又萬萬不及西太后，於是更企圖以一紙憲論聳動天下人耳目，假憲政的美名，來保住皇族的大權，他不僅是要假立憲之名行專制之實，而且是要假立憲之名，行皇族集權之實。他的皇族集權的計劃，第一着就是把持兵權；一九〇八年十二月，「另編禁衞軍，由攝政王親統，派載濤（載灃之弟）、毓朗（皇

族）。鐵良為專司訓練大臣」一九〇九年正月，「派肅親王善耆、鎮國公載澤、鐵良，薩鎮冰籌備海軍，一九〇九年五月「監國攝政王暫行代理大元帥並先行專設軍諮處（即今之參謀部），以毓朗管理，嗣又派載濤管理。」一九一〇年八月，「命近畿陸軍均歸陸軍部管轄，裁撤近畿督練公所。」同年十一月，「改籌辦海軍處為海軍部以載洵（亦載澧之弟）為海軍大臣」。一九一一年四月，「設立軍諮府，以載濤毓朗為軍諮大臣。」

這都是他把一切兵權收攬於皇族手中的事實。試看載澧、載洵、載濤三兄弟，一個以攝政王代行大元帥親統禁衛軍，一個長海軍，一個長參謀總攬一切軍務，皇族可算是已掌權在握了，他們還以為是依照欽定憲法大綱「君上有統帥海陸軍及編定軍制之權」而行的，日本德國的君主也有如此大權，理直氣壯，一意孤行。殊不知憲政還沒有開始，而皇族集權倒更進一步了。

滿清立憲的反動設施及其專制獨裁和皇族集權的陰謀在進步，立憲派的活動及其運動也在進步。不是在一九〇九年十月已設立了各省諮議局，一九一〇年九月又成立了全國性的資政院嗎？立憲派人士得了法定的集合機關，有所憑藉比以前更好活動。在一九〇九年的十一月（即江蘇省諮議局成立後約一月），江蘇諮議局議長張謇，便以「外侮益劇，部臣失策，國勢日危，民不聊生，救亡要舉，惟在速開國會，組織責任內閣」等

請，通飭各諮議局，不久便有蘇、浙、皖、贛、湘、鄂、閩、粵、豫、桂、直、晉、奉、黑、吉十六省的諮議局，各派代表三人集於上海，組織一個「國會請願同志會」，約定須俟國會正式成立，始行解散。一九一〇年正月會集北京，一面由孫洪伊領銜，以請願書託由都察院代奏；一面歷訪各王公大臣，請求贊助，旋奉諭旨拒絕。這是宣統朝立憲派第一次請願。到一九一〇年四月，各省諮議局的代表，又聯合各省政團商會及海外僑商，推舉代表，組織「國會請願代表團」，舉孫洪伊等十八為議員，一面赴京辦理請願事務，一面派員向各處宣傳鼓吹。結果，同時以請願書託由都察院代奏者共十起，旋復奉諭旨拒絕，這是宣統朝第二次的大請願。一九一〇年九月，中央資政院成立，代表請願團又向資政院上書，請提議設立責任內閣，即開國會，同時，上書攝政王，旋資政院議決陳請；同時各省督撫也聯電軍機處，主張內閣，國會，同時從速設立，於是在一九一〇年十月初，詔將籌備立憲期限縮短，於宣統五年召集國會，在國會未開以前，先將官制釐定，設立內閣。這是第三次的請願。這次因為有資政院和各省督撫的幫助，算是得了一個縮短籌備期間和先設立內閣的小結果，然而仍繼有人謀為第四次的請願。雖經一度彈壓，抑止了國會請願風潮，但資政院開院後，屢有書質問軍機大臣的責任，軍機處公然以不負責任答之。於是一九一〇年十二月裏，資政院便具奏彈劾軍機大臣，

說「責任不明，難資輔弼」，奉諭旨：「軍機大臣負責任與不負責任……朝廷自有權衡，非該院所得擅預，所請著毋庸議。」但到了一九一一年（即辛亥年）三月載灃却也履行一九二〇年十月所許先設立內閣之諾言，頒布新內閣官制，設立新內閣。其新授各官之分配如左：

一、內閣總理大臣，以軍機大臣奕劻任之。
二、內閣協理大臣二員，以大學士那桐，徐世昌任之。
三、外務大臣，以外務部尚書梁敦彥任之。
四、民政大臣，以民政部尚書肅親王善耆任之。
五、度支大臣，以度支部尚書鎮國公載澤任之。
六、學部大臣，以學部尚書唐景崇任之。
七、陸軍大臣，以陸軍部尚書蔭昌任之。
八、海軍大臣，以郡王銜貝勒載洵任之。
九、法部大臣，以法部尚書紹昌任之。
十、農工商大臣，以農工商部尚書溥倫任之。
十一、郵傳大臣，以郵傳部尚書盛宣懷任之。

十二、理藩大臣，以理藩部尚書暫任之。

右十二個大臣之中，漢人也是佔頂四個，滿人佔了九個，而九個滿人中，皇族又佔了五個，因此，當時都呼之爲「皇族內閣」。這是皇族集權的大暴露，同時，也就是清末僞立憲的大暴露。立憲派人更爲失望，因在一九一一年（即辛亥年）六月，又以各省諮議局聯合會的名義，請都察院代奏，說：「以皇族組織內閣，不合君主立憲國公例，請另簡人員組織內閣。」奉旨斥以「黜陟百司，係君上大權，議員不得妄行干涉」（欽定憲法大綱如此規定）。這樣，立憲派人已走到窮途末路，清廷也走到窮途末路了。

由實施十年或十年以後無定期的預備立憲，到定期的九年預備立憲，由定期的九年預備立憲，到縮短於宣統五年召集國會，由改革官制到收攬兵權，由召開國會到先設立內閣，清廷總是「拖」「騙」，立憲派人總是「要求」「請願」，而革命黨人卻也在這一過程當中到處活動起義，斷肚折胸，屢仆屢起。而且清廷越在那裏「拖」得長一點，「騙」得多一點，革命的勢力更越在那裏長得「大」與「廣」一點。從一九〇六年（丙午）到一九〇八年（戊申）有下列的屢起屢仆的革命事變：一、丙午、萍醴之役；二、丁未潮州、黃岡之役；三、丁未惠州之役；四、丁未安慶之役；五、丁未欽廉防城之役；六、丁未鎮南關之役；七、戊申河口之役。從宣統嗣位到武昌起義，計有左列諸役：

一、戊申十月二十六日熊成基發難於安慶；二、庚戌正月初，廣州新軍發難；三、庚戌二月汪精衛，黃復生等謀刺載澧，四、辛亥三月二十九日黃花岡七十二烈士殉難之役。

以上各種革命事變，可看做武昌起義之直接導火線者，當然要算黃花岡七十二烈士死難之驚動全國的義舉，但把革命的火星引接於此導火線者，則爲辛亥秋間爆發的爭路風潮，爭路風潮起於清廷之鐵道國有政策，起於藉鐵道國有把借款讓爲私有，把權利送給外人，實則起於鐵道國有政策與各省（川、粵、湘、鄂）商人的權利發生直接衝突。清末的僞立憲，本來是革命派所極端反對，稍有政治認識者都不相信的。設革命黨倒，敢握兵權，顯與立憲不相干，至「皇族內閣」出現，不但革命黨人刻刻乘機待發，全國人民心早都已傾向革命，立憲派亦已由失望走到絕望，由絕望走到革命投機，在爭路風潮之下，一般商民又積憤無可伸雪，於是只須到辛亥（一九一一年）八月十九日（公歷十月十日）武昌起義的砲聲一響，愛親覺羅氏相傳二百六十八年的寶座，就此顛覆。等到辛亥九月九日，載澧再下諭，取消皇族內閣章程，改組內閣，命資政院立即起草憲法，解除黨禁，認革命黨爲正式政黨，下詔罪己，說是：「朕用人無方，施治寡術，政地多用親貴，則顯戾憲章，路事矇於僉壬，則動違輿論！」併頒布憲法十九信條，擇期宣示太廟。但這一切的立憲都做得太遲，不惟毫無效力，而且只在歷史的法庭面前作了清廷

三百年統治宣布死刑的葬曲挽歌。

這就是清末僞立憲的結局。

從清末僞立憲的結局，我們可以指出如下幾個特點：

一、中國近百年來的民主革命的本質，貫串着這一整個歷史階段的，原只是敵始敵終的民主派與反民主派的搏鬥，但在清末政治糾紛所表現出來的嚴重性，好像成爲清廷生死問題的，倒是一個滿漢問題，清末僞立憲的一切設施，都是集中力量在排除漢人勢力，不僅排革命黨，而且不相信立憲派，甚至不相信奴性已成的漢大臣官僚及各省漢督撫。因此民主派與反民主派的搏鬥，反爲滿漢問題所掩蔽。

二、清末的僞立憲，固然在假立憲之名，行專制之實，最後甚至走到皇族集權。但既已仍行憲政，雖然是假的，終於不能不有各省諮議局，全國性的資政院的成立，因而給了立憲派人一些「空子」，使他們有所憑藉，把立憲運動變成合法運動，把政府的法定機關變成與政府對立的機關，終於使清廷的反動統治力量不能控制。這便是清廷僞立憲也不肯痛快實現的癥結所在，而在某種條件之下合法運動也不爲革命者所忽視的道理。

三、清廷本來是想以僞立憲來延長它的統治，結果，是促成統治的加速崩潰；本際

是想以僞立憲來援和革命破壞革命，結果，是招致了革命，促進了革命。這可以說是一切反動的沒落的統治者必然的歸結。

四、清末僞立憲的一切設施，本是要把一切都抓到自己的掌心來，就是說走向專制集權，皇族集權，結果，權力越集中，統治的一羣便越孤立。無條件的反動的集權，排斥了敵人鞏固了自己，同時，又是加多了敵人，孤立了自己，這也是一切反動的沒落的統治者所不能解決的一個矛盾和一個死結。

五、清末僞立憲的失敗，是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的歷史裁判。凡是一個違反歷史規律，違反時代潮流的統治者，必然倒在歷史或時代的血泊中。清廷是倒在違反民主潮流的血泊中，因爲支配世界與中國的政治主潮，早已蔓延於三十餘年前清廷統治的時代了。

九　辛亥革命與民主政治

一

中國近百年來歷史上要求民族獨立，民族解放的運動，本質上都是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運動，都是資產階級要求開闢中國資本主義獨立發展的大道，一直達到資產階級的政治支配，亦即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確立，但因為封建制的基本矛盾，表現在階級上面，乃是封建領主或地主和農民之間的矛盾，所以在摧毀封建制的革命或鬥爭上，農民的鬥爭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此外都市勞動者——都市平民的要素，以及小商人，手工業者等小資產階級，在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的革命過程中，也是物理的力量的供給者。所以中國近代史上反封建的革命運動，也是常以農民暴動與農民戰爭表現出來的。太平天國戰爭與捻黨（捻匪）暴動，就是中國農民反抗封建制與封建統治的兩個革命巨潮。義和團的暴動，因為它一開始就給統治階級所利用，帶有濃厚的反動性；但本質上它卻是最被壓迫的農民與貧民反對奴役封建統治並扶植封建統治的帝國主義的鬥爭。

不僅此也，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能否完成，能否徹底，以及徹底到什麽程度，却都要由農民和都市平民要素及其他革命民衆的聯合革命運動，亦即反封建的統一戰綫所達到的程度來决定的。這因爲上昇的資產階級在它是封建的乃至半封建的要素的對立物這點來說，他仍然是進步的，但它的進步性不能不受其階級性的限制。例如，民主革命的過程中，小資產階級或農民（特別中農）及都市平民要素，都是反對各種的不平等而採取平等主義傾向的，這傾向不僅表現爲要求政治上的平等思想，而且表現爲要求平均財產或均分土地思想。這種傾向决不是什麽社會主義，原是資產階級民主的徹底形式，但因爲它觸及了資產階級的特權（財產上的特權）方面惟一特徵的東西，所以决不會爲資產階級所贊同，因此，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上領導權雖屬於資產階級，而實則勞動者，都市平民、農民、總是比較資產階級要革命得多。這在歐洲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歷史上，例如十七世紀的英國革命，十八世紀的法國大革命，十九世紀（一八四八）的德國革命，都可以找出實際的例子來證明。這些實例的教訓，便使得二十世紀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不得不表現爲都市平民要素和農民的提攜，即不得不表現爲「左派集團的戰術」。

這樣，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始終未能完成，未能徹底，也只有在農民和都市勞動者等參加民主革命的聯合革命運動所達到的程度中去找原因。自然，由於中國資產階

級民主革命的特殊性，此外或者還有其他特殊的原因。但在這裏，我們還必需力說的，即摧毀封建制度，農民的鬥爭雖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民主革命的能否完成，能否徹底，以及徹底到什麼程度，雖由於農民和都市平民要求參加革命的程度來決定；但資產階社會的樹立，亦即資產階級政治支配——民主政治的樹立，究竟要以資產階級本身的定成長爲前提。因此，農民及其他要素不能單獨摧毀封建制。

二

辛亥革命（一九一一年）是中國第一次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一般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所要完成的任務，是：「肅清封建制度，解決土地問題，獲得民族的統一，實現政治的民主。」而辛亥革命所需要完成的任務，亦即中國第一次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所需要完成的任務，是：「推翻封建制度和爭取民族獨立，客觀上是要求開闢中國資本主義獨立發展的大道。」這是由於當時中國社會經濟狀況所反映出來的；第一，當時，即辛亥革命前後，中國資本主義的生產雖由於外資的刺激而有相當的發展，例如紡織工業，繅絲工業及其他工業，然而一開始就受到帝國主義的阻礙。因爲帝國主義在這時期中不僅取得了在中國的各種特權，而且已經操縱了中國的經濟命脈，控制着中國舊時經濟中心

國資本主義不能順利的獨立的向前發展。例如中國關稅被列強所霸佔，只許可保證外國貨物的作用，中國的產業與商業反而受到國內厘金的束縛，其他鐵路建築權，內河航行權等爲外資所利用獨佔。都是阻礙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第二，滿清政府完全成爲帝國主義壓迫與剝削中國民衆的工具，實際是幫助帝國主義來絞殺中國幼稚的工業，例如滿清政府負着巨大的外債與賠款，爲應付這些外債與賠款，殘酷的，不顧一切的搾取民衆，倘使了又需供給一切龐大的官僚機關的揮霍，這樣，也只有殘酷的榨取民衆，結果摧殘了一切剛在生長的幼稚的工商業。這樣，就說明中國資本主義初步的發展，是一般的處於半殖民地與半封建的條件之下，說明當時生產力與生產關係已經發生衝突——生產力向前發展非打破舊有的生產關係不可。這一衝突反映到政治鬥爭上來，就是帝國主義，滿清政府，極力要求現狀的維持，舊有生產關係的保持，阻礙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另一方面，民族資產階級（華僑資本家），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尤其新官僚層，則要求打破現狀，打破阻礙生產力向前發展的舊有生產關係，也就是要求推翻滿清政府的封建統治與帝國主義在華的統治，開闢中國資本主義獨立發展的道路。在這樣的一種情況之下，也就是說明中國如要實行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一開始就要把顛覆封建統治與帝國主義壓迫的兩重任務聯繫爲一。這也就是說明中國資產

階級民主革命一般的任務，是：「反帝與反封建」。因為要使中國資本主義向上發展，須在政治上使中華民族得到徹底的解放，必需：「一方面驅逐帝國主義勢力出中國，粉碎其在中國之一切政治、經濟、文化的侵略；另一方面，剷除國內封建勢力，實現農民對土地的要求，徹底解放農民，實現自由平等的民主政治。」

三

十九世紀末中國既然開始有了資本主義的萌芽，即中國的新興資產階級亦漸把蓄積的資本投於國內的各種企業上，鐵路商辦正是當時中國工業資本開始活躍的一個起點。而不料滿清政府則突於宣統三年（一九一一年）託名借款築路，出賣築路權利於帝國主義，於是就爆發一九一一年的爭路風潮。在全國民衆反對滿清政府出賣路權的憤怒下，在滿清政府本身腐化動搖瀕於自行崩潰的情況下，辛亥革命爆發了。十月十日的武昌起義與各省之紛紛響應，滿清政權終於在革命火燄下焚燬了。民軍佔領南京後，即刻成立臨時政府，選舉孫中山先生為臨時大總統。接着南北議和，清帝退位，辛亥革命暫告一段落。

辛亥革命雖以爭路風潮為其導火線，但在這裏，我們還不能不檢討一下辛亥革命前

的各種革命運動，亦即民主政治運動。

因，首先是看下層的，辛亥革命以前，民衆反抗苛捐雜稅的運動到處發生。特別在一九〇五年（辛亥革命前九年），全國抗捐抗稅運動，計其數千百起，參加每次運動的人數，各在由數千到數萬。例如廣西數百餘村反對抽捐，河南葉縣萬餘鄉民反對加稅，山東十餘萬人因地丁而起的運動，都是反滿清專制的民主運動。此外由於滿清政府對於漢族的壓迫所造成的民族牢獄，激起當時帶着民族獨立性質的群衆秘密結社到處興起，這些組織均以反清復明，相標榜，首先就是三合會。三合會的活動，主要區域在廣東福建等省，後因清政府壓力太大，多逃往海外。一九〇〇年（辛亥革命前十一年）三合會曾與興中會聯絡共同起義於廣東之惠州。除三合會外，尚有哥老會的組織與活動，其性質大略與三合會同，主要活動地域則在長江流域，勢力頗大。以後在同盟會的領導之下，會不斷的參加革命鬥爭。在同盟會的推動下，新軍亦日益革命化。他們大都是破產的農民或失業手工業者，或遊民，他們對於滿清的統治充滿着仇恨，因而在辛亥革命前會不斷的組成會黨起義，至辛亥革命時，就成爲一支革命的軍事的主要力量。

其次，則有上層的改良運動，這可以拿當時的立憲運動作代表。當時一些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亦即開明官僚，到處進行立憲運動，組織立憲團體。首先是梁啟超組織東

京政聞社，接着上海一些紳士組織立憲公會，此外湖北有憲政籌備會的出現，湖南有憲政分會的建立，廣東有自治會的組織，江蘇有預備立憲公會的產生。當時力量較大的還要算張謇等所組織的預備立憲公會，其主旨都在要求滿清政府實行立憲政治，以挽救當時的危局，完全站在改良主義的立場上。

其次，則有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革命運動。這首先就是興中會與同盟會的出現。孫中山先生在同盟會時代，開始確立了三民主義的革命方案，并根據自己領導鬥爭的經驗，進一步的認爲三合會哥老會等民間秘密結社是當時最可依賴的革命力量，於是便在三合會特別在哥老會與華僑留學生中活動；另一方面則積極在滿清的軍隊（新軍）中進行工作。這種轉變顯然與上述改良運動的自由資產階級上層知識分子和紳士豪紳相隔絕的改良行動完全不同了。這便是辛亥革命所以能很快的推翻滿清統治的根據。在這裏，要特別補充一句的，就是辛亥革命前，興中會同盟會在各地進行的革命工作，都有華僑的積極參加。他們不僅在國外積極支持興中會同盟會的活動，而且紛紛回國參加直接的革命鬥爭。在興中會與同盟會的領導下，發動了不少的革命戰鬥，如興中會奪取廣州的企圖，一九〇〇年的惠州之役，一九〇四年的長沙之役，一九〇六年的湖南瀏陽之役，他如欽廉與鎮南關、河口之役。一九一〇年廣東新軍的譁變，最後廣州三月二十九日七十

二烈士死難之役。這些都是辛亥革命的序幕，中國「新精神」與「歐洲潮」的特殊發展，使得中國各種舊式的暴亂必然會蛻爲有覺悟的民主運動，即上述那些叛亂奮起的起義，結果匯合爲一個有力的暴風雨的革命的爆發。

上述各種下層的上層的革命運動乃至那些改良運動，都是辛亥革命的先行階段。辛亥革命前）中國顯然形成了革命與反革命兩個營壘的對立。一面是廣大的下層民衆：工人、農民、手工業者、貧民、游民、小資產階級、自由資產階級，華僑資本家，知識分子；另一方面是滿清政府與擁護滿清政府的腐敗官僚、大地主、舊軍閥。前者受到帝國主義和滿清政府的殘酷剝削和壓迫，因而積極要求推翻滿清政府而參加革命；後者則有的與滿清統治休戚相關，有的與帝國主義狼狽爲奸，企圖維持其對羣衆的榨取而積極擁護滿清統治，以各種方式來反對革命。這裏，我們要特別指出的，是各帝國主義對中國當時革命運動，形式上雖然表示中立，或個別的對於滿清亦有不滿之處，但實際上則從各方面幫助與支持滿清的封建統治，帝國主義與滿清統治在利害上早成不可分的了。

四

辛亥革命——中國第一次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具有中國革命極大的歷史價值的，

因爲第一，它動搖了中國長期的封建統治，開闢了中國乃至亞洲民主共和國的新時代。第二，它在當時中國人民反帝爭取民族獨立自主的鬥爭中，首先推翻了滿清在中國所建立的民族牢獄。明白了前者，我們才能知道爲什麽亞洲新起的反動堡壘——日本帝國主義當在辛亥革命時會那樣熱心幫助袁世凱消滅革命；後者的奏功，這在當時客觀歷史上，會是一個正確的步驟，因爲帝國主義者爲維持其在華的統治，正是要維持這中國國內自已爲滿清所建立的民族牢獄的。

但辛亥革命雖有其不能否認的歷史價值，實際是失敗了。封建勢力并未剷除，一切反革命力量仍然纏繞帝國。這就是說它并未能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務，更說不到資產階級政治的支配——民主政治的確立。

資產階級的民主，雖然一般是形式的民主，但它必然包含下列諸特徵：一、它根據「自然的」人權的基礎，排除一切身分特權，在複雜的法律體系之下（包含公法與私法），一切人對於法律——在法律之前，即在國家之前都是平等的。二，在國家之前，一切人平等的這個民主觀念，包含各人對於國家的活動，有平等發言權或決議權。因此，一完整的代議制的創立，必然是一個資產階級民主國家的特徵。三、法律的基本精神，一方面是平等，另一方面是自由，基本的自由權利——例如言論、思想、出版、集會、結

[illegible]徵求看辛亥革命後的政權形式，臨時政府成立不久，曾經製定了有名的南臨時約法，臨時約法的內容有如下各條：

第一條，中華民國由中華人民組織之。

第二條，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

第三條，中華民國領土為二十二行省，內外蒙古，西藏，青海。

第四條，中華民國以參議院，臨時大總統，國務員，法院，行使其統治權。

第五條，中華民國人民，一律平等，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區別。

第六條，人民享有下列各項之自由權：

一，人民之身體，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審問，處罰。

二，人民之家宅，非依法律不得侵入或搜索。

三，人民有保有財產及營業之自由。

四，人民有言論，著作，刊行及集會結社之自由。

五，人民有書信秘密之自由。

六，人民有居住遷徙之自由。

七，人民有信教之自由。

第八條，人民有請願於議會之權。

第九條，人民有陳訴於行政官署之權。

第十條，人民對於官吏違法損害權利之行爲，有陳訴於平政院之權。

第十一條，人民有應文官考試之權。

第十二條，人民有選舉及被選舉之權。

（約法全文，共五十六條，餘從略。）

然而臨時總統選舉的結果，因爲當時民清兩軍議和條件所限，袁世凱當選。袁氏當選後，便企圖掌握政府全部權力，實行總統個人獨裁，首先逼迫內閣總理唐紹儀辭職，以袁黨趙秉鈞組閣，繼而擴充反革命的武裝力量，向革命勢力大舉進攻，免國民黨三都督職。雖因此激起了國民黨的第二次革命，然終爲所克服，袁氏至此乃傾其全力向革命作最後的進攻。首先下令解散國民黨，取消國民黨議員資格，不久又下令停止國會兩會，解除兩院議員職務。各省省議會亦相繼被解散，另以袁氏御用的政治會議代國會。未後更組織約法會議，修改臨時約法，另製新約法。至是袁氏便從根本上消滅了民主的政權形式。所以在名義上中華民國雖然代替了大清帝國，而辛亥革命並沒有完成民主革命

的任務。即沒有推翻帝國主義與封建軍閥聯合的統治，開闢中國資本主義獨立發展的道路，建立近代的民主政治，而整個中國民衆，且由於北洋軍閥首腦袁世凱的進貢，依然幷進一步在帝國主義的剝削下，封建統治的壓迫下，度着黑暗悽慘的生活。

五

辛亥革命是失敗了，其所以失敗的原因：首先是由於革命統一戰綫的分裂。那時各種革命集團有一共同的弱點，即沒有明確的提出反帝的民權主張，亦即沒有明確的反帝意識。當時的革命的聯盟，僅僅是在反滿一點上有其共同點。因此，一到清帝一倒，革命聯盟便歸於瓦解，這恰恰給反革命勢力的進攻以最大的便利，而當時袁世凱的反革命政權正是從分化革命聯盟着手的。這一殘酷的教訓，實在是值得我們在每一革命階段中重溫的。其次，是革命勢力對反對革命勢力妥協太甚，即革命對那時的腐敗官僚軍閥制度，不但未加以破壞，而且反把政權讓給北洋軍閥首腦袁世凱。復次，辛亥革命，沒有明確執行反帝國主義的任務，革命政權既未能對內破壞腐敗官僚軍閥制度，更說不到對外取消帝國主義在華的一切特權。因此，使得帝國主義得以利用或幫助封建勢力來反攻幷消滅革命政權。而根本的原因，則由於沒有發動全國廣大的農民，都市勞動者，進行徹底

反封建勢力的鬥爭。很顯然的，辛亥革命對廣大民衆的反抗捐稅運動，就不會好好的組織與領導，而爭路風潮的羣衆革命情緒，更未充分利用。同盟會的活動，已經不像當時改良主義者——自由資產階級上層分子那樣和羣衆完全隔絕，而在貧民，游民，實即廣大農民的秘密結社的三合會，哥老會中，曾進行不斷的工作。

中華民國成立後，雖然中山先生曾到處呼籲民生主義，主張平均地權，但革命黨人則除不接受這一革命領導外反認爲高調，超時代。因此，封建的榨取基礎依然無恙的存在着，而廣大無土地的農民生活沒有得到絲毫改善，這就預伏了日後封建軍閥殘酷榨取長期存在的張本。自然，資本主義社會的樹立——亦即資產階級政治的支配，民主政治的樹立，究竟要以資產階級本身的一定成長爲前提。那時，這一前提顯然不夠存在；也不失爲辛亥革命失敗的原因之一。

辛亥革命的失敗，決不是中國革命的完結。恰恰相反，這種失敗的血腥的教訓，却會教育出更偉大的革命。偉大的民主革命的任務，正在對日英勇抗戰的偉大歷史中繼續着。我們將要如何爭取抗戰的最後勝利，將要如何最後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務，辛亥革命失敗的教訓，正在昭示着我們。

十 抗戰三年來的民主運動

一 由抗戰開始的民主運動新階段

中國近百年來的革命運動，毫無疑義的是國民革命運動——因爲中國近百年來革命的特點，基本上還是由革命運動的兩大巨流，即反封建殘餘的運動和反帝國主義運動匯合而成的。然而同一革命的民主運動，在同一革命階段中，往往由特殊的歷史條件或具體情況，賦以新的內容與新的要點，因此，儘管在近百年來的同一民主革命運動中，也有着辛亥革命與民十五北伐的特殊階段與環節，很顯然的，神聖偉大的民族對日抗戰，自然不能不開始中國民主革命運動的新階段了。

中國此次對日抗戰，不僅是中國民族解放戰爭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例如較之一八四〇年的鴉片戰爭，一八六〇年英法聯軍之役，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戰爭；而且是全世界民族解放戰爭歷史上最偉大的一次，例如較之十八世紀的美國民族運動，較之十九世紀的德國、意大利、波蘭等的民族運動，尤其是在帝國主義時代法西斯統治直接侵略弱小

國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戰爭日益擴大，普遍，發展爲反對法西斯強盜侵略而進行的決勝鬥爭這點上，有人說：「從偉大社會主義革命及其偉大勝利以後，從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三年歐洲革命運動以後，這種鬥爭（指中國抗日鬥爭，著者註，）是各國人民生活中的最大事變，這個鬥爭的意義是很巨大的，它牽制着侵略者的力量，它阻礙着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的繼續擴大，它使國際無產階級易於進行反對其剝削者的鬥爭，它給世界各國反法西斯運動以幫助，」（見曼努意斯基著：「國際形勢與反法西斯運動」一九頁）

以上是專就抗戰之歷史的意義說的，此外在抗戰發動的近年前由日本帝國主義所造成的事變，例如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年）九月，敵人佔領東三省，民國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一月進攻上海和吳淞，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春佔領熱河，特別是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以後，實際上侵奪了河北和察哈爾，積極準備佔領綏遠、山東、山西和綏遠，在武裝佔領區域內和實際佔有區域內實行公開的殖民地的強盜政策瘋狂地準備實現一九二七年田中奏摺內所提的併吞全中國和獨霸全世界的計劃。所有這一切日本帝國主義在抗戰發動前五年內造成的事變，引起了國內外環境上極大的變動，這種外部環境的變遷，首先是由於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不斷的侵略，不僅破壞了一九二一

年的華盛頓九國公約，而且造成對英美法在菲律賓群島、印度、澳洲、安南，以及整個遠東利益的直接威脅，這就不能不引起日寇與美英之間爲爭取中國和爭奪整個太平洋沿岸市場的鬥爭劇烈化，這樣，便把一般帝國主義與中國的矛盾，變爲獨特的日本帝國主義與中國的矛盾，使若干其他帝國主義與中國的矛盾，一時降爲次要地位，同時，它們與日寇的矛盾，因反而擴大。這種內部環境的變遷，首先是由於現在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直接威脅着中國民族的生存。在中國人民面前簡單明瞭地擺着兩條路：或者抗日，那就還能生存，或者降日，那就只有死亡，這就不能不引起中國社會內部相互之間關係的變動，就不能不引起中國各黨派相互之間關係的變動，其結果也就不能不使他們團結一切力量去反抗共同敵人。這樣，中日民族矛盾，使許多人，即感覺到本身存亡問題的人，都不能不開始轉變他們的政治態度。

由於這許多特殊的歷史條件與具體情形，現階段的民主革命運動，是不能不有着新的內容與新的特點了。它的新內容與特點，究竟是什麼呢？

一、是把一般反帝國主義的內容，變爲單純反日帝國主義的內容，且利用日帝國主義與其他帝國主義日益擴大的矛盾，爭取有力的外援，孤立敵人。

二、是把一般反封建殘餘的內容，變爲反漢奸的內容，即除漢奸敵探以外，包容所

有不願做亡國奴的人們，集中一切物力，財力，智力，人力，一致對日。

由於民主內容的任務之完成，亦即由於抗戰勝利之獲得，其結果，便是民主革命運動的完成，便是把中國的民主革命進行到底。便是統一的民主共和國的建立。而這一民主共和國，不是普通的歐美式的民主共和國，也不是特殊的蘇聯式的民主共和國，恰恰是民族獨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三民主義的共和國，換言之，這一民主共和國，不是一般的民主共和國，而是從「抗戰建國」的過程中產生出來的民主共和國——三民主義的民主共和國。民主革命是近百年來中國革命總的目的，亦即近百年來中國革命總的路綫，在這一總的路綫上，却也由於「抗戰」不能不產生許多新的特點：

一、民主革命是我們要達到的目的，可是在民族危機極端深刻的現階段，沒有抗戰——沒有神聖的民族解放戰爭，就沒有中國，也就沒有民主。在這裏，民主是目的性的東西，抗戰是手段性的東西。

二、沒有抗戰，就沒有中國，沒有民主；同時，沒有團結不能抗戰。在這裏，抗戰是目的性的東西，團結是手段性的東西。

三、沒有團結，就沒有抗戰，不能抗戰；同時，沒有民主——沒有政治上的民主化，亦即沒有政治上的進步乃至各方面的進步，就沒有團結，無從團結。在這裏，團結是

目的性的東西，民主是手段性的東西。

由於這些特點，便把『民主』『抗戰』『團結』，形成有機的聯繫着的三位一體，使得我們在基本的口號方面，不僅要把『抗戰第一』提出來；同時，『民主』也是第一『團結』也是第一。

二　民主運動新階段的準備或過渡階段

神聖偉大的民族對日抗戰，開始了中國民主革命運動的新階段，同時，賦與了中國民主運動以新內容與新特點，這一新階段在表面上看來，是從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七七』開始的。然而在實質上，這一新階段則從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便開始了。從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九日開始的中國民主革命新階段第一時期，至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三月國民黨三中全會時宣告結束。這一時期內的重大事變，是學生界、文化界、與論界的普遍全國的救亡運動，上海與青島等處的反日罷工，兩廣事變，綏遠戰爭與援綏運動，實際上起了承上啓下作用而成為時局轉變關鍵的西安事變，由於領袖崇高偉大精神及全國民衆和各愛國黨派之竭誠愛護而得到和平解決，最後則是南京國民黨三中全會。這些事變，完全由於準備開始實現全國性對日武裝抗戰，

圍繞着民主革命運動的新階段而發生的。

民國二十六年二月國民黨的三中全會，主要的包括兩部分問題：第一部分是對外政策問題，第二部分是對內政策問題，在對外政策中，主要包括下列四點：第一點，表示國民政府以往所實行的外交方針是：「決不容忍任何侵害領土主權之事實，亦決不簽定任何侵害領土主權之協定。」第二點，表示「此次全會對外方針，仍當繼承不變，且努力以貫其進行。」第三點，主要說明中日相互間的關係，第四點，主要說明中國對其他各國關係。在對內政策中，主要包括下列三點：第一點，是最重要而且最迫切的問題，即關於國內和平與國內統一問題，特別是對於中共關係問題。第二點，是關於決定在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國民大會問題，第三點，是關於經濟建設問題。這一時期民主運動的基本任務或其具體特點，是爭取國內和平，團結一切不願做亡國奴的中國人一致共同抗敵。

民主運動新階段的第二時期，即從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二月國民黨三中全會到同年（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開始實現全國性對日武裝抗戰時期。這一時期內的重要事變成史實，爲日本帝國主義對於中國不斷的侵略戰爭，正在加緊準備着，例如日德意同盟條約的訂立，二十八萬萬元預算的通過，議會的解散，軍備的增強，都是向着這

一目的。這就是說日本軍閥與德意在西方加緊準備的歐洲戰爭相呼應，它在東方也正在用盡一切氣力和確定的步驟上準備一舉滅亡中國的條件，即：國內軍事的，政治的，經濟的，思想的條件；國際外交的條件。那時所謂「中日提攜」與某些外交步驟的緩和，正是表示滅華前夜侵略政策的戰術上的必要。那時，中國正迫近着判定自己存亡關頭的關頭，中國的救亡抗戰，也不能不用燃眉的緊迫性與跑步的速度去準備，那時，中國方面，尤其是從盧溝橋事變發生至八月十三日日寇進攻上海前一時期，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為組織救亡抗戰，主要地曾採取了下列辦法：一、動員了十萬至十五萬軍隊到河北，察哈爾及山東去增援二十九軍；二、召集了第一次國防會議，出席這次會議的，不僅有廣西白崇禧，四川劉湘，河北宋哲元，山東韓復榘，山西閻錫山諸軍事領袖，中共朱德，周恩來亦代表參加出席，差不多全國各省重要軍事領袖均出席，三、在國母宋慶齡營救全國政治犯運動的領導之下政府很寬大的釋放了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分子七人及其他政治犯。四、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發表了有歷史意義的廬山談話；五、任命各路司令長官，這些事實，也完全由於日寇積極侵略中國，中國政府為組織全國性的武裝對日抗戰，圍繞着民主革命運動的新階段而發生的。

這許多辦法，較之第一時期，顯然是一個大進步，尤其是蔣委員長的廬山談話，即

確表示：「如果到最後關頭，便只有犧牲全民族生命以求國家生存，那時節再不容許我們中途妥協，需知中途妥協的條件，便是整個投降，整個滅亡的條件，——最後關頭一到，我們只有犧牲到底，抵抗到底，唯有犧牲的決心，才能博得最後勝利。」「現在衝突的地點已到了北平的蘆溝橋，如果蘆溝橋可以受人壓迫強佔，那麼，我們五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與軍事重鎮的北平，就要變成瀋陽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變成當日的瀋陽，今日的冀察，亦將成爲昔日的東北四省，北平若可變成瀋陽，南京又何嘗不可變成北平？」「如果戰端一開，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這一談話，在抗戰史中，亦即民主革命運動史中，成爲極有價值的重要文獻，正因爲由於它的號召，開始實現了全國性的對日武裝抗戰，開始向民主革命運動的展開又前進了一步，這一時期民主運動的基本任務或其具體特點，是實現全國性的武裝抗戰，爭取民主改革，以期盡量動員一切人力，物力，財力，智力，參加抗戰。

民主運動新階段的第一時期與第二時期，可以說都是走上或準備對日武裝抗戰的過渡階段。但沒有內部的精誠團結，就不會有全國性的武裝抗戰，如果第一時期國內和平的取得，是精誠團結的第一個必要條件；則第二時期，抗戰民主的取得，便是建立精誠

團結的第二個必要條件，在客觀的抗戰發展的規律性上，爲着抗戰救亡，爲抗戰建國，沒有國內的精誠團結是不可能的，沒有國內和平，尤其是沒有國內民主，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民主改革，配合着抗戰的需要，便成爲第二時期民主革命任務的中心一環。忽視了客觀上民主任務的重要性，因而降低了民主改革的努力，便將不能達到真正的團結，而抗戰的最後勝利，以及三民主義民主共和國的建立，也就成爲不可能。

三　全國性的武裝抗戰實現以後——七七以後的民主運動

（上）

民主革命運動的新階段，在實質上雖開始於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但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的盧溝橋事變，確爲開始實現全國性對日武裝抗戰的一個偉大事變。因此「七七」這一偉大日子，也成爲全中國乃至全世界婦孺皆知的含有偉大意義的縮寫名詞，將與一切偉大歷史節日永遠不朽。自「七七」開始實現全國性的對日武裝抗戰到現在——民國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年）七月七日，是整整的三年。民主運動在這整的三年中，我也想分兩個時期來敘述：一是從民國二十六年（一

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到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五日武漢失守；一是從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五日武漢失守到本年（民國二十九年）「七七」。

茲先述前者，在前者的過程中，亦即從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到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五日一年零三個月的過程中，關於民主改革方面，亦即團結抗戰方面，是有着許多措施的，例如：國防參議會的組織，　蔣委員長對中共發表共赴國難宣言談話，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及抗戰建國綱領，國民參政會第一次會議，民衆團體的興起等等。這些措施不是偶然的，它正是適應對日武裝抗戰及武裝抗戰的民主要求產生的，因爲武裝抗戰普遍於全國範圍以後，中國必須開始實行下列必要的民主改革。即在政治制度方面，必需要以國父的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即其全部民主理論作基礎，製定憲法，召集國會，選舉政府，執行民主政策，而在政治條件方面，必需要開放民衆運動，提高民衆的政治地位，允許民衆有言論、思想、集會、結社，種種自由。這在政府方面那時是相當做了的，這由上述各種措施可以證明，抗戰開始不久即在南京失守（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前，政府便召集國防參議會，後又增加名額，網羅各方人才（增加國防參議員爲七十五人），而各種抗日民衆團體則有如雨後春筍，

在南京失守，各方人才都集中在武漢時，相次成立的，有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全國學生救國聯合會，婦女救國會，海員救國會，文藝界救國會，中國青年記者學會等。但形成民主改革之重要步驟的，則爲下列數事：

（一）蔣委員長對中共發表共赴國難宣言談話——爲着敵人進攻的積極，爲着急謀內部的精誠團結抵抗敵寇，中共於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三日向全國宣言：「一，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爲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指共黨）願爲其澈底實現而奮鬥；二，取消一切推翻中國國民黨政權的暴動政策和赤化運動，停止以暴力沒收土地政策；三，取消蘇維埃政府，實行民權政治，以期全國政權之統一；四，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爲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統轄」。而第二天，即同年九月二十四日，蔣委員長即在全中國各大報紙上，發表了公開的談話，其要點謂：「此數年間，中央政府無日不以精誠團結共赴國難相號召，而國人昔日之懷疑三民主義者，亦均以民族利益爲重，放棄意見而共趨一致，足證國民今日皆已深切感覺存則俱存，亡則俱亡之意義，咸認整個民族之利害，終超出一切個人一切團體利害之上也，此次中國共產黨發表之宣言，即爲民族意識勝過一切之例證，宣言中所舉諸項，如放棄暴動政策與赤化運動，取消蘇區與紅軍，皆爲集中力量，救亡禦侮之必要條件，且均與本黨三中

全會之宣言及決議案相合，而其宣稱願為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更足證明中國今日只能有一個努力之方向。余以為吾人革命，所爭者不在個人之意氣與私見，而為三民主義之實行，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應計較過去一切，而當與全國國民徹底更始，力謀團結，以共保國家之生命與生存」。此其所以成為民主改革之重要步驟，乃由於國內革命力量真正團結，肇基於此，此後團結抗戰之民主改革的展開，亦肇基於此。

（二）國民黨臨時代表大會宣言和抗戰建國綱領——國民黨臨時代表大會於民國廿七年（一九三八年）四月一日閉幕，通過了許多重要案件，例如一，選舉、蔣委員長為國民黨總裁，二，設立三民主義青年團訓練全國青年，而特別重要的，是發表大會宣言和制定抗戰建國綱領。宣言和抗戰建國綱領，主要包括下列三點：第一首先對於堅持抗戰到底之方針，在宣言中有明確之指示，宣言中說：「吾同胞同志惟有併力以赴，不達目的，決不中止。」這對於蘆溝橋事變後，特別是南京失守後，堅定全國軍民抗戰的決心和勝利的信念，是有重大意義的。第二，在外交問題上，確立：「本獨立自主之精神」「世界和平不可分割之原則」「聯合世界上同情於我之國家及民族」「聯合一切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之勢力。」這對於抗戰時期的外交政策給予了確定的方針。第三，在內政政策上，首先關於民權主義，指出了發動民眾運動的任務，在大會宣言中說：「抗戰

組織民衆，訓練民衆，爲發展民力之必要工作，亦爲增強民權之必要條件。」除了發展民衆運動之外，大會還指出改善政治機構之任務，在大會宣言中說：「至於政治機構上，爲適應戰時之需要計，應就各機關組織加以調整，使之趨於簡單化，有力化，幷應設立國民參政機關，俾集中全國賢德之士，以參與大計。」此外在抗戰建國綱領中，確定「加緊軍隊之政治訓練，」「訓練全國壯丁，充實武力」「指導和援助各地武裝人民，保衛鄉土，幷在敵人後方，發動普遍的游擊戰，」「組織國民參政機關，改善各級政治機構，」「經濟建設以軍事爲重心，同時，注意改善人民生活，」「發動全國民衆，組織工農商學各職業團體，使有錢者出錢，有力者出力，」「對於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與以合法之充分保障」，「推行戰時教育」，等等。綜合臨全代會全部精神，不僅較之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二月國民黨三中全會有顯著的進步，而且可以說是最近十年來國民黨最有歷史意義的收穫，因爲不僅確定了抗戰的基本方針與抗戰時期的重要國策，不僅明白宣示了國民黨的抗戰建國綱領，而且使這一綱領成爲抗戰時期各黨各派必需共同遵守的政治綱領。這一政治綱領，在實質上是有國家根本法規的作用的——亦即民主憲法規的作用的。無怪在大會宣言及抗戰建國綱領發佈後，即引起全國人士之熱

烈討論與擁護，最有意義的是國母宋慶齡及革命先進廖仲凱先生夫人何香凝女士之擁護文獻。在這一文獻中，有最重要的三點值得指出，例如：「重振黨紀，嚴厲制裁一切偷生怕死，貪污舞弊，欺民枉法之負責黨員……二，尊重民意，實現民權，徹底取消一切有形無形壓制民意妨礙民權之法令。三，以民族國家利益為先，摒除一切不利民族國家之私見，停止任何方式之黨派鬥爭，務使全國人民一致精誠團結，」（見宋慶齡何香凝，「擁護抗戰建國綱領實行抗戰到底」一文，民國廿七年四月十四日於香港）

（三）國民參政會第一次會議——在武漢失守以前，國民參政會乃在抗戰一週年的前一日，即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七月七日前一日（七月六日）在武漢開幕。國民參政會，雖然在其產生的方法上，在其職權的規定上，還不是真正的人民的代表機關，但在抗戰劇烈的環境中，它的召開，顯然表示我國政治生活向着民主制度的一種進步，顯然表示我國的統一團結在抗戰中有了更進一步的進展，國民參政會開會的期間是十日，那十日工作的總結，可以說是成功的。其成功之點如下：第一，國民參政會第一次大會代表四萬萬五千萬同胞又一次的確定了「抗戰到底，爭取國家民族最後勝利」的國策！過去一切抗日黨派，農工兵學商各界同胞，雖然都一致擁護實行抗戰到底，爭取最後勝利的國策；但從沒有一個機會能把全國各黨各派各界代表集於一堂，共同表達出四

萬萬五千萬同胞堅決抗戰到底的公意和決心。於是窮兇惡極的敵寇及無恥漢奸到處散佈挑撥離間的造謠，說什麼抗戰到底，只是某方單獨的主張，客觀上恰恰給與敵人漢奸誘降，妥協的陰謀以便利，而今則大會宣言鄭重地宣佈：「中國民族必以堅強不屈之意志動員其一切物力，人力，為自衞，為人道，與此窮兇極惡的侵略者長期抗戰，以達到最後勝利之日為止，」第二，國民參政會第一次大會代表四萬萬五千萬同胞明白地宣佈了各黨各派各界合作的方針，過去國內各黨各派雖然早已宣佈誠意合作，共赴國難，但從沒有一個機會能把各黨各派各方面代表集於一堂，共同表達出精誠合作的誠意與決心，於是敵寇與漢奸，又到處散佈破壞團結的謠言，不是說中國各黨各派合作沒有誠意，就是說不能持久，客觀上又恰恰被敵人所利用。而今則大會宣言鄭重宣佈：「不但一般無黨派之國民更堅其擁護統一之心，即各黨各派亦咸捨小異而趨於大同，剴請統一，共同救國。」第三，國民參政會第一次大會宣言，鄭重宣佈：「確認本年四月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所製訂之抗戰建國綱領，作為國民政府抗戰時期的施政方針，共同在最高領袖蔣委員長領導之下，努力奮鬥以取得最後之勝利，而達到建國之成功。」而今則代表四萬萬五千萬同胞公意的國民參政會，鄭重的指出了國民政府在抗戰時期的對內對外的重要施政方針，必需根據抗戰建國綱領；同時，全國軍民必需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

，爲抗戰建國綱領一一見諸實施而奮鬥。第四，最後也是特別重要的，國民參政會第一次大會代表四萬萬五千萬同胞第一次的確定了「實行民主政治」的方針。過去，廣大人民雖然殷殷期望民主政治的實現，各方人士雖然都曾指出實行民主政治爲爭取抗戰勝利建國成功之必需；但從沒有一個機會能把各黨各派及全國各地各界的代表集於一堂，共同表達出四萬萬五千萬同胞爲民主政治堅決奮鬥的意志和行動。而今則大會宣言，鄭重宣佈：「在政治上需本抗戰建國綱領，力求庶政之革新，樹立民主政治之基礎，」而值得特別指出的，還有國民參政會第一次大會，根據推進民主政治的原則和精神，通過了「擬設立省市縣參議會，推進行政，完成自治，」一案，交請政府施行，這一議案的通過，卽下層民意機關的設立，是作爲樹立民主政治基礎的重要步驟的。

以上所述，是從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開始到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五日武漢失守這一時期民主運動的概況，這一時期民主運動的基本任務或其具體特點，是在全國性對日武裝抗戰開始以後，爭取堅決抗戰，爭取抗戰到底。這同抗戰未開始以前，民主運動的特點在爭取抗戰一樣。因爲只有堅持抗戰，只有抗戰到底，才能廣大的團結內部，力求政治進步，粉碎敵人的武裝侵略，展開民主運動，完成近百年來中國民主革命的使命。再則由於敵人在這一時期的進攻，是以軍

事爲主，政治爲輔，使得任何人無喘息偷地，在任何方面都只有前進，因此，這一時期的民主運動，是向前展開的，是進步的，是一步一步具體化的，是一天一天接近於民主的實質的。這也可以說是一個特點。這種進步，不單表現於民主運動方面，而且表現在各方面，這就是說，一年零三個多月的抗戰，我國軍民在蔣委員長和國民政府的領導之下。確實有了不少的成績與進步，概括言之，全國在政治上已統一在國民政府的領導之下，在軍事上已建立了統一的國民革命軍，各黨派，各階層，各民族也達到空前未有的精誠團結，全國各界人民達到空前未有的民族覺醒和政治覺醒，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也空前提高，全民族一切有生力量經受着空前鍛鍊而日益鞏固，政府與人民的關係日益改善，尤其是在我全體軍民英勇奮鬥中，消耗了敵人五十萬人以上兵力，消耗了敵人百萬萬以上的經費，并且在敵後方建立了許多抗日根據地，增加了敵人國內外的困難，提高了中華民族在國際上的威信和博得了一切前進人類對我之同情與援助。

四　全國性武裝抗戰實現以後—七七以後的民主運動（下）

從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五日到現在民國二十九年「七七」，這一時期的民主運動，也有許多重要表現。例如：省市臨時參議會條例的制定，及省市臨

時參議會紛紛成立，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次國民參政會的開會，憲政運動的展開等等。自廣州陷落，武漢相繼失守以後，一方面由於戰區擴大和敵軍增加，另方面由於沿海沿江最後兩個最大中心城市和重要交通線的損失，我國抗戰形勢已開始進入一個新的嚴重階段，此階段之特點，表現在各方面——軍事方面（軍力不敷分配），物力方面（軍火接濟等項困難），財力方面（收入減少，法幣，外匯感困難），均感到比前更多更大的困難，爲克服這種困難，不能不從各方面增加力量，尤其在政治方面，不能不力求進步，所以在武漢失守不久開的第二次國民參政會，是仍有着種種進步表現的。我們首先便從第二次國民參政會說起。

第二次國民參政會舉行之日（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八日到同年十一月七日），正我國抗戰嚴重困難發生之時，日寇，漢奸散佈悲觀失望情緒，企圖破壞團結，達到妥協投降目的。因此，國內外人士都睜大着眼睛期待着國民參政會第二次大會對基本國策問題的決議。十天熱烈討論的結果，終於表示出全國人民的團結，進一步的鞏固，抗戰到底的意志，進一步的堅決，擁護蔣委員長和國民政府的熱忱，進一步的發揚，雖然是在廣州，武漢相繼失陷，抗戰遭受新困難之後。

這次大會最重要的收穫，首先就是堅決無情地打擊了任何人在武漢失守以後對敵妥

協投降的企圖和迫切熱烈地擁護蔣委員長及其宣言（指二十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告全國國民書）所宣佈的持久抗戰，決不屈服的國策，關於這一點，國民參政會第二次大會，通過了下列各案：例如胡景伊等四十四人提「擁護蔣委員長持久抗戰宣言案」，張一麐等四十二人提「為抗戰到底宜由本會決議宣言請政府明令公佈以防反側而定人心案」，陳嘉庚等二十一人提「在日寇未退出我國領土前不得言和案」，王造時等六十六人提「鞏政會與發表宣言擁護蔣委員長告國民書（即二十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告國民書）號召全國同胞一致擁護繼續抗戰案」，陳紹禹等七十三人提「擁護蔣委員長和國民政府加緊民族團結堅持持久戰案」。綜合各案，合併通過了下列決議：「擁護蔣委員長所宣示全面抗戰，持久抗戰，爭取主動之政府既定方針，今後全國國民應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堅決抗戰，決不屈服，共守弗渝，以完成抗戰建國之任務」，這表示第二次參政會對於政府的基本國策是堅決擁護的，這次會議最大的成功，就是把堅持抗戰的基本國策更鞏固起來了。

再則這次大會還通過了許多對堅持抗戰爭取勝利的具體辦法，交政府施行，例如「嚴懲漢奸傀儡案」，「加強國民外交案」，「改良兵役實施法案」，「關於如何克服困難，渡過難關，持久抗戰，爭取最後勝利案」。

第二次參政會閉幕後剛一月，即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一日，國防最高會議規定根據本年首次國民參政會所決議「擬設省市縣參議會推進行政完成自治」一案，本年九月二十六日由國民政府公佈之「省臨時參議會條例」及「市臨時參議會組織條例」於本年十一月一日起施行，而各省市臨時參議會，亦已由行政院決議，限於明年（民國二十八年）一月一日成立。這說明中國民主政治在抗戰中已有了進一步的開展，開始着手部分的下層相當民意機關的建立。這對於堅持抗戰與全國的統一團結，將有很大的幫助，將更進一步鞏固政府與人民的關係。此後（約自民國二十八年三月起）各省市參議會人選已經在報上陸續公佈，而各省市參議會，例如浙江、福建、四川、陝西、甘肅、廣東、湖南、廣西、雲南、山東，河北各省參議會，乃至重慶市參議會，亦陸續成立。戰時各級民意機關的設立，其目的當然是在反映人民之意見，親密政府與人民之關係，這就必需各級參議會的人選，能充分包括各黨各派與各界，加強國民對抗戰工作之熱情和努力。然而在這一點上，就各省公佈人選看來，是較之國民參議會的人選略有遜色的。

第二次國民參政會閉幕後，經過了幾個月（三個月）的時間，又舉行第三次參政會了。第三次參政會是有不同於前兩次參政會的許多特點的。第一，是汪精衛響應日寇近

衛聲明，發表降敵豔電（民國二十七年十二月廿九日）後，已經褫奪其國民參政會議長之職，由於這一特點，將使這次參政會，在堅持抗戰的基本國策上，內部的意見更能團結一致起來。第二，汪逆去議長職後，由蔣委員長親兼議長。由於這一特點，將使參政會有利抗戰設施的意見，更能迅速的反映給政府與軍事當局，以避免議案輾轉延緩不能迅速實現之弊。第三，這次參政會正當抗戰進入新階段之際，即從第二次參政會後，關於堅持抗戰，加強團結，克服困難，渡過難關，增長新的力量，爭取最後勝利，這些基本問題，都在上次參政會有了基本的問答，而這次（第三次）參政會的責任，又加上了新的。即這次參政會的責任，不僅在堅持上次決定的基本原則，而且在進一步的找到具體的方法來實現這些基本原則。

）第三次國民參政會，是在民國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二月十二日開幕的，到同年二月二十一日閉幕，繼續開了十天的會議。它的最大收穫是什麼？便是在蔣委員長親自領導之下，全國一致堅決打擊了敵寇近衛，漢奸汪精衛誘降的企圖。本屆大會在全場一致的熱烈空氣中，更堅決地，親密的，團結在抗戰國策的周圍，又通過了擁護政府國策案。即：「鄭重決議，抗戰已定方針必須支持到底」，並號召全國國民「堅其信心，齊其步伐，一心一德，徹始徹終，以復我領土主權與行政之完整，而完成抗戰建國之大業

」。其次，則爲又一次的通過了推進民主政治的各種提案，例如周覽等提「確立民主法治制度以奠定建國基礎案」，羅文幹等提「實行選賢與能以澄清吏治案」，董必武等提「加強民權主義的實施，發揚民氣以利抗戰案」。此外，關於改善政治提案還有多起，在蔣議長在閉幕詞中，大聲疾呼的說：「本會的歷史使命，是要建立民主政治的基礎，尤其是建立永久的真正的民主政治的基礎。」

在這一時期，即從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五日到現在（民國二十九年七月七日），這一時期的民主運動值得特別指出的，當是第四次國民參政會。

第四次國民參政會於民國二十八年九月九日開會，九月十八日閉會，在它開會的那一時期中，國際間各種力量在重新結合，歐洲大戰已經展開（德波戰爭正酣），中國國內各種力量也顯示了新的發展趨勢，這就是妥協投降的力量，以汪逆精衛爲代表更加露骨無恥地在破壞抗戰與團結，而日寇則正在利用目前的情況加緊「以華制華」，「以戰養戰」的陰謀。在這一新的國內外環境之下，擺在全中國人面前的任務，就是要明確認清新的國內外情勢之各種特點及其各種可能的發展趨勢，堅持抗戰到底國策，反對中途妥協；力求加強全國團結，反對各種分裂；推進全國政治進步，反對一切後退現象。第四次國民參政會通過應國內外情勢迫切的需要，在短短十天的工作中，可以說是有它重

列，的收獲與成績的。第一，它重要的成績，表現在張一麐等五十六人，董必武等二十三人，鄒韜奮等二十九人，王卓然等三十五人，郭英夫等二十六人的五件討汪和反投降分子的提案，參政會根據全國同胞的公意，再一次昭告抗戰到底的國策，一致通過聲討汪逆的通電，這一政治意義是非常重大的。因爲這些提案明白地回絕了日寇和汪逆的投降誘謀，打破了國際上某些企圖逼誘中國對日妥協投降分子的妄念，澄清了那時宦奸所散佈的和平息戰的妖氛。第二，它重要的成績，表現在通過了許多鞏固團結，推動進步，加強抗戰力量的決議案。這些議案當中，第一個意義最重大的，就是關於定期召集國民大會，實行憲政，保障人民合法權利及集中人材改革行政機構這一決議案。這個決議案是根據七個提案合併討論通過的，其原文如下：「（甲）治本辦法：一，請政府明令定期召開國民大會製定憲法，實行憲政；二，由議長指定參政員若干，組織國民參政會憲政期成會，協助政府，促成憲政。（乙）治標辦法：一，請政府明令宣布全國人民除漢奸外，在法律上其政治地位平等。二，爲適應戰時需要，政府機構應加充實並改進，藉以集中全國各方人才，從事抗戰建國工作，爭取最後勝利。」這二決議的每一條文，特別是治本第一條，治標兩條，均有嚴重的政治意義，自此案通過後，便掀起了舉國上下風起雲湧之憲政運動。不久，國民黨六中全會又決定在今年（民國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二

日國父誕辰正式召開國民大會通過憲法，實施憲政。這不能不說是民主運動在這裏是以具體的形態提出了。

因此，憲政運動，不能不是民主運動過程中的一件大事。自第四次國民參政會及六中全會通過上述決議案後，憲政運動便大為展開。在重慶、成都、昆明、桂林各處，有各界憲政問題座談會，有婦女界憲政問題座談會，有新聞記者學會憲政座談會等團體的產生，加緊促進憲政。而在促進憲政運動中所注意之點，大約不外下列三舉：一、召集國民大會問題；二、製定憲法問題；三、實行憲政問題。蓋召集國民大會為實行憲政之開端，製定憲法為實行憲政奠下法律的基礎，而認真實行憲政，則為國家政治生活的完全民主化。對實行憲政問題的根本要求，便是實行民主政治。而民主政治的特徵，至少應表現於下列各點：一、人民有言論、思想、集會、結社等民主自由；二、各抗戰及擁護民主共和國各黨派有合法存在的民主自由；三、全國需有各級真正民選的代表民意機關。這些問題，確是憲政運動，亦即民主運動中的幾個中心問題，不能不為全國同胞所注意。抗戰以後中國實際政治生活情形，是：不堅持抗戰，則民族無以生存；不加緊內部團結和不實行動員廣大人民，則無由爭取抗戰建國之勝利；而不實行民主政治，則團結內部，動員民眾，均不可能。所以與民主運動密切不可分的憲政運動，在抗戰過程中

，不僅關係於我國的政治進步與倒退，而且關係於整個民族生命的存亡，這一運動的情況及其前途，是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的。

在第四次國民參政會閉會的六個月，即在民國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年）四月一日，第五次國民參政會大會又在首都重慶開幕了。當第四次參政會閉　　時候，正是國際上發生重大事變（歐戰展開）的時候，正是日寇滅亡中國的毒計愈凶，企圖用政治陰謀，用扶持汪逆傀儡政權的陰謀來達到日寇軍事上所不能達到的目的的時候，而且正當國內團結，在總的方向上，雖然還在繼續，但由於各種原因，卻在個別問題上留下不少陰影的時候。在第四次參政會所通過的重大意義的實施憲政的決議，在其閉幕後，展開了如上所述的廣大深刻的憲政運動，這充分證明參政會所有適合民衆要求的決議，一定是能得到廣大民衆的擁護的。由四次參政會到五次參政會，時間雖只有六個月，但是在國際國內斷然又發生了新的問題，值得五次參政會嚴重注意。放在五次參政會面前首要的任務，便是要徹底反對汪逆傀儡政權，擁護國民政府。這一反汪任務較之以前提出的完全不同，它是由汪逆政權已在日寇則力支持之下登台這一新的事實產生出來的。因此，這次對於反汪具體辦法，必需明白詳盡的提出。放在五次參政會前面同樣重要的任務，就是加強團結，使抗戰內部個別不應有的現象在最短期內廓清，因為團結的鬆懈，就是反

日反汪力量的減弱。最後，憲政問題，仍然是擺在第五次參政會前面的重要任務，憲章如何修改，國民大會代表如何補充，大會職權如何規定，都是急待提出討論的，關於這些，我們從蔣委員長的開會詞中，可以得到解答。

蔣委員長在開幕的大會上，總結了四次大會以來六個月來工作，並指出了今後努力的方向，這次汪逆在敵人刺刀下傀儡登場，恰恰證明了敵寇還好滅亡中國的陰謀，隨着其日益困難的增長而加緊，所以蔣委員長在其開幕詞中指出：「敵閥從汪逆登台，又無異告全世界說，他的野心是一不做，二不休，定要滅亡中國，驅逐列強，獨霸東亞，進而宰制全世界」，這就是說祇有堅持抗戰到底。任何幻想都是不能有的。又指出：「兩年九個月來全國一致奮鬥，將士民衆的英勇犧牲，好容易建立了我們勝利的基礎，這個基礎需要我們大家來愛護它，鞏固它」，需要「我們格外努力，格外奮鬥，格外要共同負責，加緊我們政治、經濟、軍事各種力量」。來戰勝敵人，這就是說，僅僅是反汪，堅持抗戰，是不夠的，必須具有爭取抗戰勝利的條件，要加緊政治、經濟、軍事各種辦法，要格外共同負責，要精誠團結，打下勝利的基礎。最後，蔣委員長以很大的號召，極端的真誠說：「我們兩年前頒佈的抗戰建國綱領，經過本會決議，是我們全國一致遵守的信條，我們同人要根據這個共同信條，開誠佈公的來檢討一下，我們已經實行的成績，

不論對於政府，對於地方，對於社會，乃至對於每個團體和個人，都要考查一下，是否忠實履行了這一個綱領，以我們的熱忱和公意，來督促這個綱領的實現」。這就是說，要具有爭取抗戰勝利的必要條件，就必需認真實行國民黨臨時代表大會通過的抗戰建國綱領，這不僅參政會本身，即全國人民，都必需在蔣委員長這一號召之下努力，抗戰建國的勝利才有把握，所以正當國際形勢緊張，日寇已唯陰謀誘致汪逆精衛登場，國內外發生了許多新問題的時候，第五次國民參政會的開會，又是有它相當的政治意義的。

此外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川康建設方案討論，各級行政機構的調整，尤其是新縣制的實施，都對於民主運動的展開有過相當作用，或即為民主運動之組成部份，不能詳述，總之這是從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五日到現在（本年七七）這一時期民主運動的概況，如果前一時期民主運動的基本任務或其具體特點，是在爭取堅持抗戰，爭取抗戰到底，則這一時期民主運動的基本任務或其具體特點，則在爭取如何堅持抗戰，如何抗戰到底的具體條件。因為在抗戰開始的第一時期，亦即抗戰之第一階段，只要堅持抗戰，反對妥協，便能決定一切；但是隨着武漢失守，隨着敵人的政略戰略的逐漸轉變，隨着抗戰逐漸轉入第二階段——相持階段，中心的戰鬥任務便更加繁重複雜了，當然，在這裏，堅持抗戰，反對妥協，仍然是首要的任務，沒有這一前提仍舊是

什麼都不放的。但在抗戰更艱苦，更要接近於最後勝利的相持階段中，僅僅是堅持抗戰，反對妥協這一任務是太不夠了。卽是說這里的中心問題，是逐漸從是否繼續抗戰下去變爲如何抗戰下去的問題了。加以敵人這一時期的進攻，是轉變到以政治進攻爲主，軍事進攻爲輔，因此，爭取抗戰勝利的必要條件，爭取時局的好轉，乃成爲中心任務，而這一時期的民主運動，雖然在外表上是進步了具體化了，而實際上的困難，各種政治問題的困難，反特殊嚴重，特殊深刻，這一點，也可以說是這一時期的特點。

五　抗戰三年來民主運動的總檢討及其前途

汪逆的漢奸派，在抗戰未開始前，則大唱其「抗戰必敗」的邪說，在抗戰開始以後，又大唱其「再戰必亡」的謬論，而每當抗戰進入較嚴重階段之時，則多方散佈悲觀失望情緒，多方製造挑撥離間謠言，企圖達到中途妥協，賣身求榮的目的。例如南京失守之後，徐州失守之後，尤其在廣州陷落，武漢相繼失守之後。在武漢失守不久（二十七年十月二十八日）開的第二次國民參政會，汪逆及其奸黨，本來想把他們中途妥協，賣身求榮的無恥企圖，透過第二次國民參政會從側面而透露出來的，不料受了大會全場一致，也可以說是受了全國一致的打擊，汪逆計無所出，乃於同年十二月敵寇近衛誘降聲明

發表談話，隻身出走，謄電響應，公開做了叛黨叛國叛民族的較之劉豫、張邦昌、秦檜、還要奸險的胆大的頭號漢奸。直到本年（民國二十九年）三月，汪逆在敵寇刺刀支持之下傀儡登場以後，他更自以為躊躇滿志，進一步助敵滅華有所憑藉了，於是益加配合着敵寇政治進攻的陰謀，濫造謠諑，挑撥離間，分裂抗戰內部。

最高統帥蔣委員長在抗戰未開始以前，則率先組織抗戰，發動抗戰；在抗戰開始以後，則堅持抗戰，爭取抗戰到底；在抗戰發生嚴重困難時，則除堅持抗戰外，并進而爭取繼續抗戰乃至抗戰勝利的條件。而每當國內外情勢不利於堅持抗戰，動搖妥協分子開始抬頭，或敵人軍事進攻政治進攻加緊時，則與以應有的打擊和機斷的處置，制於事先，防於未然。試看南京失陷，妥協動搖分子，開始散佈和平謠言，企圖破壞抗戰，那時蔣委員長則發表其告全國國民書（廿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大申抗戰到底之堅決意旨。其言曰：「此次抗戰，開始迄今，我前線將士傷亡總數，已達三十萬以上，人民生命財產之損失，更不可數計。犧牲之重，實為中國有史以來抵禦外侮之所罕覩，中正身為統帥，使國家人民蒙此鉅大犧牲，責無旁貸，中心痛苦，實十百倍於已死之將士與民衆。一息尚存，惟有捐靡頂踵，期以貫澈抗戰到底之主旨，求得國家民族最後之勝利……」又再看廣州陷落，武漢相繼失守以後，漢奸企圖利用時機，達到中途妥協目的，而多

敵人士亦不免失去抗戰勝利信念，蔣委員長又於此時發表告全國國民書（廿七年十月卅一日），其言曰：「吾同胞須認識當前戰局之變化與武漢得失之關係，我國抗戰根據本不在沿江沿海淺狹交通之地帶，乃在廣大深長之內地，而西部諸省，尤為我抗戰之策源地。此為長期抗戰根本之方略[卅]，亦即我政府始終一貫之政策也。」「——第二，吾同胞應深切記取我抗戰開始時早已決定之一貫方針，從而益堅其自信。所謂一貫方針者：一曰，持久抗戰，二曰，全面戰爭，三曰，爭取主動。……」「故一時之進退變化，絕不能動搖我國抗戰之決心。」而後又於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駁斥近衛聲明，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二日，昭告國民，實行國民精神總動員，二十九年（一九四〇）一月二十四日痛斥日汪協定，特別是在汪逆偽政權於本年（二十九年）三月三十日傀儡登場於我淪陷的首都南京以後，蔣委員長於第五次國民參政會的開幕詞中，又一次的予以痛駁[卅一]，他說：「汪逆他們喪盡廉恥，甘作奴隸，出賣祖國，自然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是我們國法所必懲，民眾所必誅。」

這就是民主運動與反民主運動之恰相反對的對比。尤其是在汪逆傀儡登場以後，除為敵人在軍事方面鞏固其侵佔地，在經濟方面加緊其「以戰養戰」的榨取外，首先必然要配合着敵人的政治進攻的種種陰謀，進一步的進行其對我抗戰營壘的分化與誘降，我

們只要一看其偽組織的一切，都在「繼承法統」名義下一仍舊貫，漢奸報紙南華日報且著論作了所謂「希望在重慶政治統治下的人們，共謀統一的完成，」之公開的號召，就可知其陰謀之毒了。伴着這些而來的還有許多政治上的騙局，例如他在傀儡戲開鑼之日，也宣布了一套「對外和平」，「對內民主」，「進而實施憲政」，「復興國民經濟」的所謂政綱，然而這還是明白欺騙。

我們是堅持抗戰，團結，進步；而漢奸則堅持投降，分裂，後退。在民主運動的過程中，尤其在抗戰三年痛苦的經驗血腥的教訓中，國內一切民主力量，必然有充分的可能與條件去戰勝漢奸的反民主力量，這就因為堅持抗戰，團結，進步的民主力量，是能得到全國民衆，全國抗日黨派，全國抗戰軍隊擁護的，這種民主力量如能充分發動起來，充分聯繫起來，為堅持抗戰，團結，進步的民主路線的徹底勝利而奮鬥，民主革命的完成與民主共和國的建立必然是有把握的。

十一 略論民主

中國近百年來的革命，是民主革命。我們艱苦堅持了七年多的抗戰建國，是民主革命的繼續戰鬥，是要建立一個三民主義的民主共和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兩條戰線，也是民主主義反法西斯主義的戰線；中國且成爲民主戰線裏面主要之一員。曾記民國三十年七月十六日美國駐華大使卡爾在陪都公開講演民主政治，他說：民主政治是「思想清新的人的一種高尙理想，此理想如烽火，數千年來從未熄滅過。」他又說：「民主政治所追求者乃生命、自由、幸福；其中尤以自由爲生命，幸福的磐石。無自由，則生命幸福皆不足輕重。」他具體的指出：「所謂自由：一、思想的表現自由，即言論自由；二、集會、結社自由；三、立法自由，並自由選擇執政者。民主政治正代表這些自由，它是人民的心靈，聲音、命脈；它是人類靈魂中不斷燃燒的火。」再則，它認爲民主精神，即承認意見與利害不同，但仍能容忍別人，從而取得協和，而始終保持理解的習慣與政治上的大人風度。他最後把民主政治與納粹政治作了一個對比，說：「納粹政治是人類思想的夢魔，靈魂的黑夜，自有史以來的最大退化。」「納粹政治不信任人民，像賴

機假的，偵探植在人民中間，教兒童出賣父母，不經審判即捉人民入獄，智識分子則被囚於集中營。」「納粹主義只是代表新黑暗時代，象徵人類思想被投入監獄，人類精神被綑綁。」「因此，從任何方面，從任何人口中心中，都證實了全世界人民皆應為反對納粹（獨裁）保衛民主而戰。」卡爾還說他在中國短短的三年中所得最深刻的印象是：「自由思想本能的自然的潛在於每一中國人心中。」並笑謂：「諸位不信此語，可以向我抗議。」（摘自大公報紀錄）

這是一點不錯的，民主政治，自由思想，誠如卡爾所說，的確是本能的自然的潛在於每一個中國人心中的。試一翻開中國的最大文獻，類如「民為邦本，本固邦甯」「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等等說不盡的象徵民主自由思想的名言寶典。也誠如卡爾所說，正好像燃在中國人民心中的烽火一樣，幾千年來從未熄滅過。而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今天，日本強盜帝國主義處心積慮，並以最瘋狂的武力侵略想滅亡中國的今天，民主政治及各種設施的民主化，更成為團結抗戰的首要前提，因為不團結則不能抗戰，不民主則無從團結，在今天來說，已是經過了各種考驗的鐵一般鋼一般的事實。根據這鐵一般鋼一般的事實出發，民主政治，自由思想，便毫無疑義的是我們今天動員人力、物力、智力、財力的火

炬，是我們今天解決一切糾紛——黨派糾紛，地方糾紛，人事糾紛——的寶鑰，克服一切困難——政治困難、軍事困難、經濟困難、財政困難——的萬應神效劑。

關於民主自由思想的名言寶典，在中國最古的文獻中，固然是說不勝說不完；就今天來說，也是更加充實，更加具體的散在各種宣言，綱領，以至整套的三民主義，全部的總理遺教上面。如說：「國民黨之民權主義，於間接民權之外，復行直接民權。即為國民者，不但有選舉權，且兼有創制，複決，罷官諸權也。」又說：「近世各國所謂民權制度，往往為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為壓迫平民之工具。若國民黨之民權主義，則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也。」又國民黨政綱明白規定：「確定縣為自治單位。」「各省人民得自定縣法，自舉省長」「關於中央及地方之權限，採均權主義。」「實行普通選舉制，廢除以資產為標準之階級選舉。」「確定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權。」

根據上述這些寶貴的文獻以及其具體規定，則所謂民主政治以及各種設施的民主化，應該是不成問題的。而且這些宣言，綱領，整套的三民主義，全部的總理遺教，也已然是憲政的具體內容，憲法之重要組成部分；很明白的英國的「大憲章」。「人民權利請願書」，「權利法典」等，造成英國不成文憲法之基本內容者，也不過如此。今天的

問題，原不在有無良好憲法，不在有無民主理論，民主文獻，不在有無實施民主和憲政的根據，而端在我們是否有決心把過去發佈的宣言，綱領、甚至三民主義、總理遺教，一句句一字字照着實行出來。這裏正用得着下面一句古話：「為政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

如說「力行」，不要說一般的民主動員不成問題，各種設施的民主化不成問題：就是要實行人民的直接選舉及創制，複決，罷官諸權，也決非難事。例如創制權可先從改善兵役保甲制度和動員民眾自定施政綱領開始，以啟發縣鄉區人民的自治自動精神。複決權可先從審查地方政府的預算決算開始，以樹立地方廉潔政治的楷模；同時，即以養成人民監督政府的習慣。罷官權可先從人民有權控告任何官吏之非法行為開始，以肅清地方的貪官污吏；同時，即以助長真正的民權。尤其是在中央接管田賦，田賦徵實，管理糧食，糧食徵購等等於人民有直接利害關係的庶政陸續實施以後，若欲行之有效而無弊，由地方民眾直接參加，更是極妥善的必要的步驟。

這是不必等到有憲法以後——實施憲政以後才做得到的。這是訓政時期就應該開始做的，這樣做，就是憲政，就是民主，訓政的最後目標是憲政與民主，因之訓政決不是拿旁的東西——與憲政民主不相干的東西，乃至與憲政民主相反的東西來訓練人民，

而正是要爭憲政與民主來訓練人民。訓政與民主，決不是不能並存的。

這是不必等到抗戰結束以後——把仗打完了以後才做得到的。這是抗戰時期就應該開始做的。戰爭的發展，證明民主是致勝的惟一途徑，戰爭的本身，證明民主國家是爲保衞民主而戰。不民主，中國的勝利是不可能的，不民主，盟國的勝利也是不可能的，中國抗戰顯然是近百年來民主革命之繼續戰鬥。反民主的人，決不能執行保衞民主的戰爭，更不能完成保衞民主的戰爭，戰爭與民主，也決不是不能並存的。

民主政治，是「人民的心靈，聲音，命脈」，「是人類靈魂中不能燃燒的火」。卡爾的話，是值得我們玩索的。

十二　論民主的具體內容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民主主義反法西斯主義的大戰，這是大家所公認的。法西斯主義之必然潰敗消滅，不僅可由目前各戰場之連續勝利得到斷定；而且早由於一則得道多助一則失道寡助的歷史裁判得到斷定。

那麼，法西斯主義潰敗消滅之後，自然就是民主主義的勝利。因爲民主主義，在今天是世界上政治的主潮。換言之，卽今天支配全世界的政治主潮是民主主義。任何國家，任何民族，任何集團，任何個人，順此主潮者存，逆此主潮者亡；順此主潮者生，逆此主潮者死。

中國抗戰顯然是近百年來民主革命之繼續戰鬥，而其與盟國之關係，則正因爲在保衛民主，實現民主，粉碎反民主的法西斯毒害上，本然的有着共同的任務。所以不民主，中國的勝利是不可能的，不民主，盟國的勝利也是不可能的。不民主，根本就該站在法西斯一邊，而不可能與民主國家結成同盟。打仗是面對着法西斯，政治則與民主相悖，這是一個不能并存的矛盾，也就是一個不可解的死結。

今天似乎很少人反對民主了。就是過去反對民主的人，在今天也在大談民主，甚至頌揚民主，不過所談所頌揚的只是抽象的民主概念，而具體的民主內容，則諱莫如深。因為一說到具體的民主內容，則在國家與政府的機構中，不能不有選舉制度，民意機關，則在人民的權利與義務的規定中，不能不有各種自由——最基本的例如言論、思想之自由、集會結社之自由等等，而美國大總統羅斯福先生最近所規定的四大自由中，還有人民免於匱乏的自由，及不為恐怖所侵襲的自由。這些當然都是民主的重要部分，而且是我們今天最感需要的；但真正廣泛而有效的民主，其範圍還不如此狹隘，它是把民主的原則擴充到全體人民各部門的生活中去的，例如由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由工廠、農場、商店、學校到軍隊，家庭、隨處都有民主原則的運用與實踐。

因此，真正的民主，或實質的民主，並不是專門寫在一紙幾十幾百條的憲法條文上，德日意法西斯有憲法，但決無民主。把憲法或其他的法令當着一道靈符，在某一天早晨貼在國門上，以為昨晚是專制獨裁，今早就變為民主共和，這是古今中外沒有的事；正如昨晚一步都不會走的人，施一點手術，今早就能走一百步這種事絕不會有一樣。因此，我對於十一中全會決定戰後一年召集國民大會實施憲政等議決案，固然極表歡迎，而最感覺興趣的，却是在我們今天應該有些什麼實實在在的民主設施，與應該保障一些

什麼實實在在的民主權利。

遠的且不說了，民國二十八年一月，國民參政會，曾通過「請確立民主法治制度以奠定建國基礎案」；同年九月又通過「定期召集國民大會，實行憲政，保障各抗日黨派合法權利與集中人材，改革行政機構」的決議。內容分治本治標兩種辦法：關於治本者，「一、請政府明令定期召集國民大會，製定憲法，實行憲政；二、組織國民參政會憲政期成會，協助政府，促成憲政。」關於治標者，「一、請政府明令宣布全國人民除漢奸外，在法律上其政治地位一律平等；二、為適應戰時需要，政府機構應充實改進，并藉以集中全國人才，從事抗建工作」民國三十一年十月，國民參政會更通過所謂「促進民治」案，其具體辦法：「一、請政府依照既定政策，在致力抗戰之過程中，一面加緊促進地方自治，一面確定抗戰終了之時，即召開國民大會，製定憲法，俾憲政得以早日實現；二、戰時民意機關的組織與職權，應請政府考慮，以樹立憲政基礎；三、建國工作逐漸開展，各方建設需才孔般，應請政府明令各機關，今後用人務搜各方賢才，以力踐「天下為公」「選賢與能」遺訓；四、人民諸權自由當與以合法之充分保障，抗戰建國綱領，業已明白規定，應請政府明令各級執行機關，特加注意，俾人民之一切合法自由，均獲維護。」恰好本年（民國三十二年）九月國民黨十一中全會又通過了抗戰結束

後一年，召開國民大會，實施憲政案，而在十月十日召開的國民參政會議席上，　蔣主席又用席說明立即設立實施憲政籌備機構到十一月憲政實施協進會已告成立，而且決定公開討論憲章了，這都是值得我們擁護的，但按之事實，自從歷次國民參政會通過上列各案以來，各抗日黨派合法權利有保障沒有？人材集中、行政機構改革沒有？全國人民除漢奸外，在法律上其政治地位一律平等沒有？人民諸種自由得到合法之充分保障沒有？尤其是言論，思想自由，集會結社自由等等，這諸種自由，可以說是近代民主國家人民所享有之最低限的自由，即在訓政時期之中國人民亦應享有的。不要說訓政時期的中國，就是專制時代的古先聖王亦未嘗不相當尊重人民自由，康有為說：

「夫先王之治天下，與民共之。洪範之大疑大事，謀及庶人為大同。孟子稱進賢殺人，待於國人之皆可。盤庚則命衆至庭，文王則與國人交，尚書之四目四聰，皆由闢門，周禮之詢謀詢遷，皆合大衆。嘗推先王之意，非徒集思廣益，通達民情，實以通憂共患，集合民志。」（見上皇帝書第二）。

所以我以為今天應該有的一些實實在在的民主設施與應該保障的一些實實在在的民主權利，莫過於「保障各抗日黨派合法權利與集中人材，改革行政機構；」莫過於保障「全國人民除漢奸外，在法律上其政治地位一律平等；」莫過於保障「人民諸種自由得

，需要有即時切實可靠之保障。

這是國民參政會所通過的，國民政府所承認的，也是我們今天所迫切需要的，而在憲政實施籌備的步驟上，只有辦到這些才算切實可靠。

不久以前的報紙上，關於言論自由，似乎有些議論，有的說言論自由的尺度要放寬，有的說言論自由不是絕對的。放寬也需有些限制。其實這都是無謂之爭，主張把言論尺度放寬的人，根本就沒有要求無限制的自由。但自檢查制度實施以來，在標準上，或在原則上，本應是一切言論只要不違背三民主義最高原則，及抗戰建國綱領，就可准其發表，但是三民主義最高原則，及抗戰建國綱領如何解釋，則不免各有主見，以致作者在極端謹愼，極端戒愼恐懼的心情下，所寫的文章，不僅在內容上不敢有違檢查標準，即在措詞造句上，亦以盡影孫之力以避免對於讀者的刺激性，結果仍然不能通過，這種情形，負檢查之責者，固亦有其不得已之苦衷，但循此不改，不但作者遭受精神上物質上雙方之損失；即在社會方面，或政府方面，始終不能得到正言讜論之及時發抒，始終不能得到眞正民意之及時發抒，其有損於抗戰，有損於民族國家者，當亦不小。

至於檢查技術方面，亦不無可資商討者。第一、則為檢查制度之不統一性，例如在

甲地檢查通過之著作，在甲地能發表者，而在乙地則不能發表，此爲空間上的不統一。又如在以往已經檢查通過之著作，以後雖一字未改，而在某種情形下則不許其繼續出版，或再版，此爲時間上的不統一。更如有些劇作家的創作，檢查通過後，有的准其劇本出版而不准其劇本上演；有的則准其上演而不准其出版。有的在甲地准其出版並准其上演者，而在乙地則任何機關任何個人皆可任意不准其上演，雖有檢查機關通過之一切證件可憑，絕不生效，此爲檢查執行之不統一。

其次則爲檢查制度的片面性。即一切著作或譯述，無論長篇，短篇，一旦審查不登或被扣，原譯作者絕無辯訴理由之機會，而且被扣之著述，無論有無時間性，一律不允發還原稿（如屬有時間性之文字時間一過，似應發還）這都是對於作者十分苦惱的。

最後，檢查在時間上的糾葛，亦復不少，即有一些定期刊物——週刊，旬刊，月刊，半月刊等，往往因已到出版付印時間，稿件擱在檢查機關方面，不能按時或如期發下以致脫期，甚致不能出版。

更有進者，檢查員原爲國家文化政策之執行人，在檢查條例所規定的權限內，對於他所審查之稿件似應有一定自主之權，但往往有因通過某種稿件而引起檢查員嚴重責任問題，以致檢查員爲避免責任起見；對於任何稿件之審查，採取與其從寬，無寧從嚴的

辦法，以致檢查制度在原則與技術上都日趨於嚴格乃至發生不必要不必有之糾纏，亦屬事實。

今天在出版界及著作界要求把言論自由尺度放寬，決非根本反對檢查制度，更無人要求什麼無限制之自由。且在懂得要求民主的人，都懂得任何自由決不是無限制的，最明顯不過，所謂民主國家——亦即今天抵抗侵略反法西斯的國家，當然只限於把言論自由及其他自由給與擁護民主，擁護抗戰的人，絕不能把言論自由及任何自由，給與反民主反抗戰的法西斯分子。

因此，我們今天要求民主，要求言論自由等等，最主要的，不是民主的抽象概念，而是民主的具體內容。所謂民主的具體內容，即是近代民主國家人民所享有之最低限的自由。這種最低限的自由，是在訓政時期的中國人民亦應享有的，甚至在專制時代的人民，亦應享有的，而這種最低限的自由，在今天首先表現在言論、思想、集會、結社諸自由上面，所以本文最後特別注重與言論、思想自由有關之檢查制度諸問題。

十三　中國的民主革命與民主共和國

一、問題的把握

無論研究什麽問題必需科學的把握其本質，因爲科學揭出客觀現象及任何問題之法則性，必然性，示人以努力或實踐之途徑，爲人類的一切生活服務。所以它成爲我們接近眞理的手段，或爲我們把握問題的根本方法，但在這裏我們必須注意，因爲科學是實踐的，是爲人類服務的，所以任何科學（不論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眞理，都不能從人類社會生活，人類的現實利害社會生產所規定的經濟組織獨立起來。這因爲認識的眞理性是由科學的實踐性所決定的，這也就是說眞理的認識，決不能超脫社會生活，現實利害經濟組織的規定性而獲得，因此，如要科學的把握問題，必需注意下列兩個基本條件：

（一）一切社會思想，政治學說，政治制度，或社會觀點，乃至於各種問題的見解，都由於各個社會系體的社會存在，利害關係，社會物質生活條件所決定：

「一般」任何研究或分析，乃至對於各種問題的把握，都不應從抽象的人類理性原則永恆的道德命題，超現實的普遍妥當性，或人類的善良希望出發，而必需從各自的社會存在和利害關係物質生活的具體條件出發。

二、中國革命的性質

在這裏我們要研究的是中國民主革命和民主共和國的問題。近百年來的革命，即自八四〇年鴉片戰爭以後，中經太平天國革命運動，中法之戰，中日之戰，戊戌政變，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五卅」運動，以及北伐以來的各種運動，一直到目前的神聖偉大的抗戰，都是中國人民在不同的時間中與不同的程度上，所實行的民主革命，為了實行反對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為了建立一個獨立的民主主義國家而鬥爭的革命。這不是偶然的，這是具有它的特殊的歷史特點的。因為自列強資本主義侵入中國，中國周秦以來的封建社會便發生了劃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大變動，中國已逐漸變成了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八一三」以後，平、津、滬、漢、粵等淪陷區已變成十足的殖民地社會，在非淪陷區，都是封建制度佔優勢的社會，這是現在中國社會的特質，這就是現階段中國歷史的特點，中國現社會的性質，亦即現階段歷史的特點，既是殖

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它就決定中國現階段的革命，必然是民主主義或民權主義或三民主義的革命，而不是社會主義的革命，這個革命，一直到現在還未完成，還要付與很大的努力。這是因為這個革命的敵人——即這種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政治，舊經濟舊文化的支持者。帝國主義（尤其是日寇）與封建勢力，直到現在，還是非常強大的緣故，國父孫中山先生說：「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就是指的這個民主主義的革命——即沒有經過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結構，不是打破私有制的革命。不料許多人士往往對於三民主義及其革命性質，不是過左的估計它——就把三民主義的革命，認為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就是過右的估計它——如把三民主義革命，認為就是單純的民族民主革命，或等同於十八世紀的歐美的民族民主革命。換言之，許多人不是從左邊來修改三民主義，就是從右邊來修改三民主義，其實都是錯誤的。

不錯，國父三民主義革命的最後目的，是在於世界大同，然這只是最後目的或未來理想，而不是現階段的革命實踐。我們可以說：中國革命的步驟是分有兩個階段的，現階段的革命是民主革命，最後的目的是世界大同。許多人錯誤的來源是不懂中國社會的階段性。再則中國革命現階段的主導性，是由中國社會的性質，亦即中國歷史特點決定的，許多人錯誤的來源，尤其是不懂現時中國社會性質，亦即現階段的中國歷史特點。

三、民主主義的概念與民權主義

所謂民主主義的革命，即 國父民權主義或三民主義的革命，按民治、民主、民本、這些名詞，都可以說是從「德謨克拉西」一字翻譯出來的，即所謂民治主義、民本主義、民主主義，也可以說是「德謨克拉西」同一字的譯語。 國父的民權主義，雖係獨創，然其內容與涵義，仍與西名「德謨克拉西」相當，因此，所謂民權主義和民主主義，仍是異名同詞的概念。然則 國父爲什麽不沿用其他名詞，而必需獨創「民權主義」的概念呢？這是因爲 國父在「德謨克拉西」的適用上，是把「政權」與「治權」截然分開的，如果沿用其他譯名，例如民主，民治，都不免使「政權」與「治權」有概念上的混淆之故。這是首先要辯論的，其次，近來論壇上，關於民權主義的用語，都不或用音譯「德謨克拉西」或用意譯「民主主義」，乃至民本主義民治主義，尤其是民主主義一語，使用得異常普遍，這是否因爲對 國父的民權主義一語，故自立異呢？而又決不然，這完全因爲 國父把民權主權規定了如上所說的較具體的內容，因而賦與了較具體的特殊屬性，如果把它無限制的適用起來，反而有損 國父規定民權主義之具體的真理性，故嘗有沿用音譯「德謨克拉西」或民主主義，而不致被限制把民權主義適用於一般。

、那末，民主主義與民權主義就顯然容有其不同的內容了，但要注意，所謂不同不屬是「德謨克拉西」的運用上，　國父根據中國歷史的特點，把「政權」與「治權」加以區分而已。在一般上，二者是反映某一歷史階段的革命性質的東西，即在這一點上，二者還是同一意義，運用的不同，只是部份的不同，部份決不足以概全體。

四、民主主義之科學範疇

講到民主主義革命問題，當然也是一種科學的範疇，而且必然是屬於政治科學的範疇。政治科學在其嚴格的科學意義上說，必然也是實踐的，即政治科學的實踐，它和一切科學一樣與實踐統一在某種方式上，成爲實踐之不可少的因素，而爲某一政治集體服務。所以政治科學，簡言之，政治學不是別的東西，在實踐上即是某一政治集體或政治主體的戰略戰術。所以民主主義或民權主義，即是決定國體，政體的一種形式，它是由於政治集體或政治主體，乃至由於社會階層之不同，而在國體，政體所表現的形式上，反映各種政治制度，歷史內容的，因爲政治是站在社會分化的條件上，人類的思想組織的權力的一大事實，因爲政治是以社會矛盾之暴露爲其發生根源的，各種人羣有組織的權力（即公權力或政權）之行動，都是政權的行動，社會過程；確切些說，有了社會階

層的分化的歷史過程，只有通過在經濟上集中表現的有組織的權力行動，亦即政治的行動，才能實現。

因此，中國的民主革命問題，決不能外於政治科學的規律性而求得解決。政治科學的實踐，要求我們把民主革命的要求與中國歷史的特點相配合，要求我們根據中國的社會存在社會結構，社會成分的現實利害及其他種種具體的歷史條件，達到中國民主主義革命之順利的完成，在偉大神聖的抗戰經過空前困難的現在，亦即要達到抗戰建國的，政治實踐的戰略戰術之正確的提出，故此有兩點必須注意：

（一）綜合上述政治運動，是人類採取有組織的權力行動，因此歷史發展達到一定階段，必然會有政治運動發生，由於歷史之不同，而有種種國體政體的形式亦即政權形式，例如政治史上有所謂專制主義，民主主義等。

（二）即以民主主義這一範疇而論，亦有其各種不同的歷史內容，民主也是發展的，變動的，具體的，相對的，即不是空虛的，抽象的，不變的，絕對的，不是一個永恆不可逾越的界限。歷史上有古代希臘民主，有近代的歐美民主，有新式的蘇聯民主，還有在歐美民主與蘇聯民主之間的新型民主，而這些民主，都必須以一定歷史階段的社會存在為其決定內容。

五、中國民主革命獨具的類型

中國的近百年革命，按其性質來說，在這經歷的百年中，總是民主主義的革命，即其客觀要求，基本上依然還是民主主義的，基本上依然還是爲要掃除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的障礙，然中國民主革命在這經歷百年中，由於中國與全世界歷史的發展，卻由於近百年來歷史的特點，社會存在的變化，實可分爲前八十年與後二十年兩個歷史時期。這兩個歷史時期，各有一個基本的帶歷史性的特點，即在前八十年中。中國民主革命，似屬於一種歐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類型，在後二十年中，由於國內外政治形勢的變化，却屬於一種較近代歐美民主革命不同的類型，也可以說前者是壟斷資本主義以前的類型，後者是壟斷資本主義時代的類型，兩個歷史時期的劃分可以「五四」運動爲分水嶺「五四」以前不同，我們都知道世界歷史上發生了兩件驚天動地的大事，這就是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與俄國的十月革命。這兩件大事的出現，改變了整個歷史的方向及革命者與反革命者對立的營壘，在這以前，中國民主革命屬於歐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類型，在這以後，中國民主革命，則屬於新的類型了。

在世界資本主義制度，已在全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實行崩潰，而其他的資本主義國

家也陷於特殊的政治危機，經濟危機的時代，在正因為資本主義危機日深，到了非依賴殖民地半殖民地，不能過活的時代，又在社會主義的蘇聯日益壯大并宣佈它願為扶助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解放運動而鬥爭的時代，在全世界進步人類都同情并願意幫助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鬥爭的時代——在這個時代，無論那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國家，如果為了自己的生存獨立領土主權的完整，而發生對外抗戰，即反帝國主義的革命，它就不再是歐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類型，而屬於新的類型了；歐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是要在經濟組織上建立典型的資本主義，在政治組織上建立資產階級專政，甚至於在文化上建立為資本主義服務的資產階級文化。然而自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以後，這種時代已經過去了，因之殖民地國家的民主革命，再也不能完成歐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所以它不能不在新的歷史環境中，屬於另一種類型的民主主義革命了。這種新的類型的民主革命，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在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主義的戰線上，它是一支有力的同盟軍。這種為爭自己的獨立生存而反法西斯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不管參加的是何種黨派，何種個人，何種階級，又不管參加者意識着這一點與否，即在主觀上了解這一點與否，只要它的任務是反抗壓迫它的帝國主義，它就成了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就成為反法西斯的世界革命的同盟軍。中國抗戰到了今天，它

的鬪爭意義便更加增大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與俄國革命，改變了世界歷史方向，同時也改變了中國歷史方向及其社會關係。「五四」運動成爲近百年革命中前八十年與後二十年兩個歷史時期的分水嶺。實則「五四」前爲第一次世界大戰與俄國革命的過渡期。「五四」運動之偉大的歷史意義，在於它帶着辛亥革命還不會有的姿態，這就是它反帝國主義與反對封建的徹底性，它所以具有這種革命性質，又是因爲在世界大戰中，中國資產階級已經有進一步的發展，而當時中國革命的知識份子，又眼見着俄德奧三國帝國主義的瓦解，英法兩大帝國主義的受創，俄國革命的成功，因而發生了中國民族解放的新希望，「五四」運動可以說是當時各部份的智識份子聯合促成的革命運動。它的弱點，正在於只限於知識份子，與舊類型民主革命的弱點，只限於資產階級，而沒有工農大衆參加一樣，但此後「六三」運動，「五卅」運動，北伐運動，以至於目前的抗戰，便繼續發展了各社會階層的統一戰線，工人農民都跑上了政治舞台。

抗戰開始，統一戰線的範圍更放大了。上層包括了一切社會上層份子。中層包括了一切小資產者，下層包括了一切工農大衆。而工農及其他小資產階級逐漸成爲決定國家命運的基本動力。國父中山先生的偉大，不但因爲他領導偉大的辛亥革命，創造了

中華民國，而且因爲他能「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羣之需要」，不分階級，不分黨派，不分性別，不分種族，把所有革命的力量團結起來，集中於革命的對象——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而又在外交上聯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在內政上扶持工農發展，提出工農政策，而其不朽的功勳，尤在於他給了我們以偉大的三民主義原則。毫無疑義的，三民主義的民主革命，在「五四」以後也就成爲新類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再不是過去歐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了。這是因爲內外政治形勢的變化。爲中國歷史加上了新的特點之故。在這一新的歷史特點上，中國民主革命的任務，如果還要建立一個典型的資本主義社會，單純的資產階級專政或建立一種資產階級的文化，都是不可能的，很顯然的，如要這樣做，國際經濟政治趨勢不允許，世界前進人類不允許，尤其中國社會階層的複雜及其團結抗戰的任務不允許，換言之，即中國社會各階層在現實利害關係上爲求其目標與努力一致，所謂歐美過去民主革命所要求的政權形式——資產階級專政，決不能實現。

六、中國民主共和國獨具的類型

三十年來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再不屬於歐美式的民主革命，因而再不能像歐美一

謎。在中國建立歐美式的民主共和國。那麼，是否能在中國建立蘇聯式的民主共和國呢。這也不可能，因為中國還是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會，它的歷史特點，使中國的革命必須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民主主義革命，第二階段——促進世界大同。第一階段的革命，它的基本任務，是反帝反封建，在這個任務沒有完成以前，社會主義是談不到的，換言之，沒有好好完成第一階段的民主主義革命，決不能發展到促進世界大同的階段。這兩個階段決不應加以混淆，混淆的結果，就是降低對於當前任務的努力。因為兩個革命階段，各有各的一定的任務各有各的一定的時期（第一階段是第二階段的準備，二者必須啣接，如果說要把兩個革命階段的任務併作一起來完成，例如在民主革命的階段，同時要完成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那正是從左邊來修改，甚至曲解，三民主義者之所為，否則就是空想。否則就想拿第二階段的社會主義革命，來取消第一階段的（亦即當前的）民主主義革命，否則，就是有意拿左的詞句來掩飾理論家們的反革命性）。

中國革命的第一階段。即民主革命的階段，不但不容任何人漫無邊際的跳過，而且完成它的任務所佔領的時間，也是相當的長，決不是一朝一夕所能結束的。我們如果不是空想家，如果不想從左邊來修改三民主義（當然也不能從右邊來修改，）就不能忽視中國歷史的特點——不能離開當前的實際條件。而且要有自信，要特別努力把第一階段

的責任負起來，準備把革命發展到第二階段卽走向世界大同的階段。

因此，中國民主革命，及其所要完成的任務，卽其國家形式與政權形式，一面與歐美式的資本主義的共和國不同，這種國家形式已經由世界歷史方向的轉換而成為陳跡了；另一面也與蘇聯式社會主義共和國不同，這種新式的共和國，在一定的歷史時期中，還不適用於殖民地半殖民地社會的國家。在一切革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在它特有的歷史環境中，惟一的國家形式，只能是它的歷史特點所獨具的形式。這種形式，也可以說是革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過渡形式，這種過渡形式，不僅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國是必需的，卽在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如印度，朝鮮等也是必經的。縱然因各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某些特殊情形而有不同的某些特點，這也不過是大同中之小異，其本質總是同一的。換言之，只要是革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其國家構成與政權構成，基本上是必然歸於一致。

然則這種國家構成，卽其「國體」究竟是怎樣的呢？所謂「國體」，它指的只是一個問題，卽這一國家是以一些什麼社會階層作主體來構成的問題。例如歐美式的民主共和國，是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因為資產階級是那種民主共和國構成的主體，蘇聯式的民主共和國，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因為無產階級是那種民主共和國構成的主體。

我們這種國家構成的主體，是資產階級抑是無產階級呢？當然都不是的，因為我們這種國家構成是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結果。它與歐美式的國家構成是資產階級革命的結果，蘇聯式的國家構成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結果不同。資產階級革命的對象是單純的封建階級（有時也要反對民族壓迫），因此，它的革命也是單純資產階級或單純由資產階級領導。無產階級的革命對象是單純的資產階級，它的革命也是單純無產階級或單純由無產階級領導。而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對象是侵略的帝國主義法西斯主義與封建勢力，它的革命也是各種社會階層——雖然也少不了領導的社會階層，換言之，侵略的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尤其是當前的侵略國家，是各種社會階層的共同敵人。亡了國各社會階層的人，都要作亡國奴。因之，殖民地半殖民地反帝國反封建的革命，必然是不分黨派，不分階級，不分性別，不分種族的。即各種社會階層，各種革命力量，聯合的革命。尤其是作為民主革命的抗戰開始以後，以前所說這種聯合的範圍更加擴大了，再具體的說：這種對日抗戰的社會階層乃包括以下許多成份：資產階級、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地主以及金融資本家，乃至不與日本帝國主義相聯繫的買辦階級，它的革命力量，既是各種社會階層的聯合，所以它的國家構成主體，也只能是各種社會階層的聯合，即各種反帝反封建的社會階層聯合起來共同建立的一個民主共和國，這就是中國

歷史特點所獨具的民主共和國，也就是三民主義共和國，即民主義共和國，就是我們的國家構成——國體。

再則，這種形式的政權構成，即其「政體」又是怎樣的呢？所謂政體，指的是一定的社會階層取何種形式來組織那對外抵禦外侮，對內保護自己的政權機關。國家沒有適當正式的政權機關，就不能代表國家，就不能執行國家的政策，換言之，就不能有政治行動。因之任何國家，除了國家構成的形式以外，必然還有其政權構成形式，即所謂政體問題。例如歐美式的政權形式是議會制度，蘇聯式的政權形式是蘇維埃制度。中國實於以上二者，由於歷史的特點，也不會相同。最可能是採取，國父所規定的國民大會形式，由國民大會而省民大會而縣民大會再區民大會直至鄉民大會的系統。均由普選大會選舉各級政府，且要實行無財產無教育程度等差別的普遍平等的選舉制。再由選舉出來的各級政府，集中的表現民意，指揮革命鬥爭，執行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各種革命政策，這便是民主集中制。只有民主集中制的政府，才能充分代表國家，執行表現民意的國策，在抗戰過着特殊困難的時間，才能領導全國民衆克服困難，渡過難關，完成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的任務。

國家構成或國體是各種社會階層聯合政權，政權構成或政體是民主集中制，這就是

民主革命的中國真正在担負偉大神聖抗戰的中國，應該建立與不可不建立的政治體系，這也就是中國類型的民主共和國，將來「建國」工作中唯一正確方向。

七、政治是經濟之集中的表現

這種民主革命所建立的政治體系，是有一定的與之相應的經濟體系為其基礎的。國父親自領導的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說：

凡本國人及外國人之企業若有獨佔的性質，或規模太大為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如銀行、鐵路、航空之屬，由國家經營之。使私有資本制度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此即節制資本之要旨也。

這就是說把銀行、工業，商業之過大者歸這種民主共和國家所有，這就是這種民主共和國的經濟構成的正確方針，但這並沒有主張沒收其他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其「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私人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亦並不禁止，這就由於殖民地半殖民地中國的經濟還十分落後之故。即中國現實的社會存在遠不允許中國有超過資本主義生產的經濟構成。

再則，它將要採取某種適當的方法，使土地不集中於少數人，而使獨地或少地的農

民都有相當的土地耕種。消除農村中的封建關係，但不是土地公有，建立社會主義的農業而是把地權平均一下。在這樣的土地政策之下，當然也不排斥農村中的富農經濟，這就是「平均地權」的正確方法，也是這種民主共和國土地經濟的正確方針。

這種民主共和國的經濟，即民主革命完成後中國的經濟體制，必然要走 國父「節制資本」與「平均地權」的路，決不容許「少數人所得而私」即決不能讓「私有資本制度操縱國民之生計」。決不能再建立歐美式的資本主義社會，但也決不可能還是舊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

這些就是民主革命的中國。抗戰建國的中國應該建立與必然要建立的經濟體系。這樣的經濟就是中國型的民主的經濟，而中國型的民主主義的政治就是這種經濟的集中表現。

八、結論

依上所述中國的民主革命，是決定於中國的社會性質或歷史特點。在近百年來中國民主革命的過程中，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革命，變更了國際形勢和中國某些歷史條件，第二次世界大戰，自「九一八」開始，更加變了中國某些歷史條件，使中國民主

革命轉入了新的類型，使當前的抗戰建國有了新的任務，使我們在一面建國的過程中，首先要提出建國的具體內容。即我們所要建立的民主共和國，是怎樣的一個民主共和國，而我們的結論是中國型的民主共和國——三民主義的民主共和國，具體的說：

第一、這種民主共和國，是民族完全獨立的，即是說，完全解除了民族壓迫，取得了民族獨立與自由，而且保障這種民族獨立與自由，這種共和國一方面不受任何外國的干涉，同時也不去干涉任何外國；就是說，一方面不受外來民族壓迫，同時也不去壓迫國外與國內的其他民族，對內對外，都處在民族眞正平等地位。

第二、這種民主共和國，是民權完全平等的，即是說在這種民主共和國之下，國內人民的政治地位一律平等。大家都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都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各級官吏都是民選的，對人民負責的。否則可依民意罷免之。也就是說，實現眞正是大多數民衆有權利的民主政治，不是少數壓迫大多數國民的政治武器。

第三、這種民主國家，是能改善民衆生活的。它並不取消財產私有制，但必須使國民大衆都有飯吃、有衣穿、有事做、有書讀。在這中間自然是使農民有田耕，廢除苛捐雜稅；使大衆有工做，改善勞動條件，使貧苦學生能讀書，做到對他們的免費教育；使各界職業者都能因才而用。也就是說，使人民大衆生活得到眞正改善。

十四　論中國憲政的「類型」

一、憲政的本質

任何「憲政」都不是一般的，抽象的，絕對的，都有它獨特的歷史內容，主要的是因為它把獨特的政治內容，用一定的形式（法律條文）表現出來——在這裏是用憲法的形式表現出來，所以叫做「憲政」。憲法這個字，有人說就是「組織」，「政體」，「制度」的意思，即是關於某種國家組織，政體，制度之最重要最基本的法律之總和的意思。所以憲法與其他法律一樣，在一般的性質上也不是抽象的，絕對的。

所謂法律者，乃是由國家權力來維持的各種社會關係之體系，即當國家成為與社會對立的一種力量發生時，現在的社會關係，亦即人與人的關係，便在法律的形式上被裁准，被國家的權力所支持住了。因而被法律所規範着的人類關係，即法律關係，在內容上是社會關係，經濟關係，或生產關係，而不會是從這些東西獨立起來的別個東西。

那麼，憲法就可以說是由國家權力來維持的國家制度之體系，但國家制度——不論

是專制制度或民主制度，決不能由國家制度本身來決定，而是由各種社會力量的相互關係，卽各社會階層間的相互關係，亦卽各社會階層間力量的對比來決定的。所以德國的拉沙爾先生在十九世紀時期，說到憲政的本質時，他便說：憲法的本質，是包含在「各種社會力量的相互關係之中」。

誠然，那種離開經濟活動的，從實際的生產過程中游離出來的。專管法律之制定，運用，或解釋的職業政治家，「公法的理論家，和私的法律家們，都忽視或忘記了那爲公私法律內容的經濟關係，社會階層關係，而只看見法律的形式就是一切，但這只是公私法律家們的觀念論的錯覺，而公私法律的社會的本質和它的歷史內容的核心，是決不能被抛散出來的。

這樣，我們就可以很明確的理解，憲法的本質，是包含在「各種社會力量的相互關係之中」這句話的意義了。這也就可以理解「憲政」的歷史性及其獨特的內容。爲要具體的說明，本文再往下展開。

二、憲政的幾種類型

「憲政」在近百年的歷史過程中，是全世界範圍內的一個大運動，因爲它有它獨特

的歷史內容，所以在今天的有些國家內，憲法不過是反映它近十餘年來社會主義建設巨大成就的一種法律形態——「事實上業已獲得的成就的紀錄與立法」，甚至於是消滅社會最後敵對形態的，掃除民族間不平等的有力的證明與勝利的詩篇（例如蘇聯）；有些國家內，則因爲金融寡頭一個一個斷毀憲法，實行法西斯獨裁；人民大衆正在奮起爲反對中世紀黑暗的復活，爲反對野蠻的法西斯，爲保衛民主，保衛「憲政」而戰（例如德意日等國的人民）。而有些國家內，因爲政治，經濟的落後形態，外受帝國主義法西斯強盜嚴重的壓迫與蹂躪，內受腐朽的又是洋裝的封建殘餘的拖累與阻礙，人民大衆爲爭取獨立生存所要求的憲政乃至憲政運動，它是多方面的，它是各階層的統一戰綫，它不僅是對內的民主運動，同時，它是對外的民族運動。

以上是就其縱的歷史的動向說的，如果再從其橫斷面的相對的靜態來說，全世界各國的「憲政」，也可以分爲下列幾種類型：

第一，一般民主國家的憲政（資產階級的憲政）——一般民主國家的憲政，如就其主要特徵，表現於憲政上的來說，可有下列幾點（1.）一般民主國家的憲法，是從下面這些前提出發的（這些前提並非明白規定，而是實質上如此），即社會分爲各種對立階層，一部分人（少數人）佔有一切生產手段，一部分人（大多數）則窮無所歸，欲爲一

產發生產者而不可能（失業）。往往某一政黨執政，國家對於社會的領導卽屬於某一政黨，這一政黨的階級屬性，當然也是不言而喻的，憲法之所以需要，主要是為了用國家的根本大法來鞏固有利於統治者的社會秩序。（2.）一般民主國家的憲法，實際上是從下面這一前提出發的（當然也不是明白規定），卽社會分為各種對立的民族和種族，有享有完全權利的民族，也有完全不享有權利的民族。除此以外，還有看第三類的民族或種族，這就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或種族，他們較之在一國內完全不享有權利的民族，其境遇更加悲慘，卽它不斷受宗主國民族的蹂躪。所以在多民族的國家，憲法的基礎往往是建築在狹義的民族主義國家主義之上，這種憲法。完全是那一國家內佔統治地位的民族用國家的根本大法鞏固於他們有利的社會秩序。（3.）一般民主國家的憲法，還可以有如下兩類；一是直接了當否認公民權利平等和民主自由，或者在事實上玩些手法，把民主的權利與自由變為烏有；一是很明白的標榜民主主義的原則，列舉許多保障人民權利自由的條文，但馬上就來一套保留與限制的把戲。例如他們說：一切公民都有平等的選舉權，但是馬上加以居住年限，教育程度，甚至財產，資格等限制；他們說：一切公民的權利平等，可是馬上加以保留說，女子或一部分人是除外的；諸如此類，不勝枚舉。（4.）一般民主國家的憲法，通常僅在形式上，法律條文上規定公民權利，這

些權利如何使之實現，即如何使這些權利得到實現的保障，它是不注意的。他們雖也說公民的平等，可是他們忽視或忘記社會階層對立如果過於尖銳，地主與農民之間，是不能有真正平等的。他們也在說言論、出版、集會的自由，可是他們忽視或簡直忘記了如果人民大衆手中沒有適當的會場，必需的印刷廠，充分的紙張等，那麽，這些權利對於人民大衆仍是一句空話。（5.）一般民主國家的憲法，最後的一個特徵，也可以說是最基本的一個特徵，就是它通常總是從資本主義制度牢不可破的信念出發的，這些憲法的主要原則，就是資本主義制度的維持與鞏固，這些憲法的主要基石，就是土地、森林、工廠、作坊、及其他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即這些憲法的根本內容——社會經濟基礎，是一切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的私有制。

第二，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憲政（工人與農民聯盟的憲政），若就其主要特徵表現於憲法上的來說，也可有下列幾點：（1.）蘇聯的新憲法（一名斯大林憲法）是從下面這些前提出發的：就是蘇聯成立以後的社會已經沒有對立的階層，蘇聯的社會僅由兩個相互友好的階層——工人和集體農民所組成，而蘇聯掌握政權的正是他們自己，國家對社會的領導權也屬於這些工農大衆。憲法所以需要，是爲了鞏固有利於工業大衆的社會秩序。（2.）蘇聯的新憲法與一般民主國家的憲法相反，它是富有國際主義精神的，它

是以一切民族和一切種族完全平等爲出發點的，它認爲各民族和各種族間膚色和語言的差別，文化發展程度和國家發展程度的差別，以及其他差別，決不能作爲民族不平等及種族不平等的根據，它認爲一切民族與種族，不論它們過去和現在的狀況如何，不論它們是強大或是弱小，都應當在一切經濟、社會、國家、文化生活各方面享有同等權利。（3.）蘇聯的新憲法與一般民主國家憲法相反，它並不僅承認公民權利的民主自由和平等，它不是形式而是實際的執行民主主義的原則，決不在法律條文上加以「但書」，爲上述各種權利加以限制或保留。它認爲一切公民都是積極的，決不能由起草憲法的人加以積極的與消極的區別，因而加以權利的限制。它認爲不論男子或女子，不論久居與暫居，不論有財產或沒有財產，不論受過教育與未受過教育，都不應有權利上的差別，因爲一切公民權利都是平等的，決定每個公民在社會上的地位與政治上的權利的，並不是財產狀況，也不是民族出身，更不是性別以及職位的高低，而是公民個人的能力、人望、學識、勤學及其他特長。（4.）蘇聯新憲法與民主國家不同，尤在於它不僅規定了公民在法律條文上的權利，亦即形式上的權利，而且把重心放在保障這些權利的實現上面——實現這些權利的手段上面，它不單宣佈了公民權利的平等，而且把剝削制度在蘇聯已被消滅的事實，一切工農大衆已從剝削制度解放出來的事實，用立法手段把它確

定在憲法裏面，來保障公民權利的平等。它不單宣佈了每個公民都有勞動權，而且把在蘇聯社會中沒有經濟危機的事實，失業現象已經消滅的事實，用立法手段把它鞏固在憲法裏面，來保障每個公民的勞動權。此外，它不單宣佈了一切人的民主自由，而且在立法上，在事實上，拿一切實際手段，物質條件來保障一切人的民主自由。因此，蘇聯的新憲法所反映出來的憲政，并不是通常的一般的民主主義，而是社會主義的民主主義。（5.）蘇聯的新憲法，最後一個特徵，也可以說是最主要的一個特徵，就是它與一般民主國家憲法恰恰相反，它是從資本主義制度在蘇聯已經消滅的事實出發的，是從社會主義制度在蘇聯已經勝利的事實出發的。蘇聯憲法的主要原則，是社會主義制度的鞏固與發展，蘇聯憲法的主要基石，就是土地、森林、工廠、作坊、及其他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的公有制——社會主義的所有制。剝削和剝削階層的消滅。大多數人貧困，少數人荒淫無恥現象的消滅，失業現象的肅清，勞動是每個有工作能力的公民的義務和光榮的職責，所謂「不勞動者不得食」，勞動的權利，即每個公民工作保障的權利，休息的權利，享受教育的權利等等，都明白規定在憲法裏面，蘇聯憲法所依據的，所反映的，就是這些進步的東西，它把這些進步的新的人生的政治權利，用立法的方法鞏固起來，所以蘇聯的憲政是最高級的最民主的憲政。

第三，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憲政（各階層民衆聯盟的憲政）——這一憲政的主要內容，如前所說，它不僅是對內的民主運動，同時，也是對外的民族運動。這一憲政運動，在某種意義上說，已經成功了一部分的，可以土耳其爲例，而正在由偉大的民族導師民族領導着全民族英勇奮鬥而尚未成功的，可以印度爲例。中國的憲政運動，國父領導我們奮鬥了四十年，直到現在，可以說還沒有實現。如果實現了，當然也不是屬於以上兩種類型的憲政，卽一般民主國家的憲政與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憲政。然則中國憲政的特徵，究竟在那裏，我們不能不在這里特別指出來。

中國近百年來革命，不能不是一個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命，這是大家所公認了的，國父孫中山先生所手創的國民黨及其本身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所祈求其實現的，不能不是民主政治，不能不是符合於中國歷史內容的「憲政」，我想也無一人能否認。但是我們要從民國建國三十三的歷史過程，尤其是政治史的過程中，歸納出一個具體的憲政業績，或一套完整的反映中國社會經濟乃至人民權利義務的成文憲法，殊不可能，所以我們還只能從理論上，觀念上。卽從孫中山先生的政治學說或「憲政觀」上，來挖掘中國憲政的特徵與本質。然則孫中山先生的「憲政觀」究竟怎樣呢？我們又從那裏去看出他的「憲政觀」呢，這主要是根據他的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及其全部遺教，中山先生

的說：「國民政府本革命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以建設中華民國。」（建國大綱第一條）「我很希望各同志努力奮鬥，使國民會議早日開成，達到實行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的目的，那麼，我雖然死了，也是很瞑目的」。（見傳記，孫先生臨死語）實行憲政，這是他的總括的根本目的，而他所新求其實現的憲政的特徵，約有下列幾點：

（1）他以為中國的憲政應該完全是以人民（各階層民衆的聯盟）意志為依歸的政治，對國家大事，對各種政治問題，人民可以而且應該起決定的作用。中山先生曾不只一次的指出：「政府要做什麼樣的工夫，都要隨人民的志願，就是政府有了大權，一經發動做工夫之後，可以發生很大的力量，人民要停止它便停止它。」如果「管理政府的方法很完全，政府就是有大力，人民只要把自己的意見在國民大會上發表，對政府加以攻擊，便可推翻，對政府加以頌揚，便可鞏固它。」「總而言之，要人民真正有管理政府之權，要政府的動作，隨時受人民的指揮」。（民權主義第六講）

（2）他以為中國憲政是要使大多數人民真正能參與國家政治的管理，孫中山先生說：「要人民真正有直接管理政府之權。」「要人民有充分的政權，可以直接去管理國事。」「要用四萬萬人來做皇帝。」（民權主義第六條）

（3）他以為中國的憲政是人民用四種直接民權來實現人民對於國政的管理，孫中山先生指出歐美資產階級的民權，只是一個選舉權，這種選舉權，也「往往為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為壓迫平民的工具」，因此，他主張除普選權外，還應用複決，罷免，創制三種直接民權來實現管理國政，所以他說：「其次為民權，故對於人民之政治知識能力，政府當訓導之，以行使其選舉權，行使其罷免權，行使其創制權，行使其複決權。」（建國大綱第三條）

（4）孫中山先生的「憲政觀」，其反映於民族問題方面的，也同時具有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的精神，他說：「其三為民族，故對於國內之大小民族，政府當扶植之，使之能自決自治；對於國外之侵略，政府當抵禦之，並同時修改各國條約，以恢復我國際地位，國家獨立。」（建國大綱第四條）

（5）孫中山先生的「憲政觀」，其反映於社會經濟方面的，是他的民生主義，是他的「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的兩大號召。其比較具體的設施，他說：「建設之首要在民生，故對於全國人民衣食住行四大需要，政府與人民協力，共謀農業之發展，以足民食，共謀織造之發展，以裕民衣，建築大計畫之各式屋舍，以樂民居；修治道路運河，以利民行。」（建國大綱第二條）

（6）尤其值得我們欽崇的，是孫中山先生不僅注意在政治上，憲法上關於人民權利之規定，而尤其注意在政治上，憲法上關於人民權利之保障，他說：「將來中華民國的憲法，是要創立一種新制度，叫做五權分立。」「實行普遍選舉制，廢除以資產為標準之選舉」。「確定人民有集會、結社、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

（國民黨政綱對內政策）此外對於勞工、農民、婦女、兒童之特殊保護，尤為注意。

很顯然的，從上述各點，可以看出孫中山先生對於中國「憲政」比較具體的主張，亦即中國「憲政」之另一種「類型」來。蔣主席一段話說得最好，他說：「總理貫通中西學理，深知世界潮流和國內現狀，本其四十年革命的經驗，手創三民主義，期致中華民族於富強康樂的境界。總理對於民主（亦即憲政——著者註）的理想，是要實行比并世各國更徹底，更切實的民主政治，在民權主義中，一則批評天賦民權的學說，而主張革命的民權。二則要使人民完全享有選舉、罷免、創制、複決的四種直接民權，這是總理以後來居上的精神，着眼於最高遠的所在。」（第三次參政會閉幕詞）

三、憲政與抗戰

根據上述，孫中山先生的「憲政觀」，卽完全以人民意志爲依歸的憲政，使大多數人民眞正能參加國家政治管理的憲政，人民用四種直接民權來實現參加國家政治管理的憲政，主張弱小民族自決自治的憲政，以及以「民生主義」爲社會經濟基礎的憲政，一句話，這種新類型的憲政，是否只適用於平時呢？今天的中國，從事於對日寇法西斯的抗戰已有八個年頭，在抗戰的砲火中我們提出憲政問題來，正是要加強抗戰。一句話：「憲政與抗戰是不相衝突的」，憲政決不單是粉飾太平的平時的裝飾品，而也是戰時打起作戰鼓，動員人民，團結各階層以擊潰敵人的最有力的武器。

毫無疑義的，反抗日寇的直接行動，就是戰爭。然而我們千萬不要忘記，「戰爭是政治的繼續」這句話，所謂「戰爭是政治的繼續」，卽戰爭本身就是政治性質的強力行動。自然，自古以來，我們都沒有見過不帶政治性質的戰爭，我們的抗日戰爭——抗戰，決離不開戰爭的政治目的，決離不開政治動員，決離不開擧國上下的精誠團結，離不開全國總動員，離不開官兵一致，軍民一致，乃至離不開爭取國際上的外援，離不開爭取敵國人民的有力援助，一句話，離不開政治。戰爭就是政治，如有人在戰爭的砲火中

，就爲火藥氣神昏了頭腦，看不見戰爭之政治意義，放棄了戰爭之政治性的各種活動，乃至硬把戰爭與政治分開，硬在戰爭與政治中間築一道萬里長城，把戰爭孤立起來，把戰爭看做絕對的，認爲戰爭就是一切，戰爭就是戰爭，乃至爲戰爭而戰爭，他就要變成戰爭的絕對主義者，這不僅是錯誤，而且是罪惡。

但戰爭亦自有其特殊性。從這一觀點來看，戰爭畢竟不同於政治。例如戰爭的基本原則，是：「保存自己，消滅敵人」；而政治的基本原則，以中國對日抗戰的政治目的來說，則是：「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強盜出中國，建立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幸福的三民主義新中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然而戰爭的基本原則，如果不聯繫於政治的基本原則，則戰爭爲無意義，中國的對日抗戰爲無意義，所以戰爭畢竟是不同於政治的這句話，至多也只能解釋爲「戰爭是政治的特殊手段」。即戰爭是用以達到政治目的的手段，政治往前發展着，忽然受了意外的阻礙，即在政治的道路上有了阻礙，用盡種種方法，例如外交的方法，和平談判的方法，國際仲裁的方法，都再也不能消除往前進展，於是必然要用戰爭的手段來掃除政治道路上的阻礙。最好的例子，中國的半獨立地位，在日本帝國主義看來，一定是他一貫的侵略政治——大陸政策的障礙，於是它感覺不利，非不成就發動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來企圖滅亡中國，掃除它政治道路上的障礙，反之，

近百年來各帝國主義，尤其是日本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侵略與壓迫，在中國的政府與人民大衆看來，也一定成爲它近百年來一貫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憲政運動的障礙，它也曾用盡種種和平方法想來掃除它政治道路上的障礙不成，曾經爆發過很多次的民族解放戰爭以及民主革命戰爭。九一八以來，尤其是七七以來，日寇已開始用戰爭來壓迫，希圖從根斷絕中國民主革命的道路，所以不得不下決心，舉國上下從事於英勇抗戰，發動中國歷史上不曾有過的大規模的光榮的反侵略戰爭，務必徹底掃除中國政治道路上唯一的重要的障礙，障礙如果徹底掃除了，戰爭結束，政治再現。但障礙如果沒有斬草除根，掃除乾淨，戰爭便決不能中途停止，例如對日抗戰，沒有徹底把日寇驅逐出中國，要是中途妥協了，三民主義的新中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決定建造不成，即政治的目的，決不能達到，說不定戰爭仍要起來，廣大的人民大衆，也一定不服。這樣，我們可以說：「政治是不流血的戰爭，戰爭是流血的政治」。

這樣說來，戰爭爆發之時，必然要有一切動員——經濟動員，文化動員，政治動員，而最迫切最基本的動員，必然是政治動員。什麼叫做「政治動員」呢？粗淺的說，就是把戰爭的政治目的，很明白確切的告訴人民大衆，希望他們根據一種政治認識與覺悟。來自動的做到有力的出力，有錢的出錢的動員精神。但是單單把戰爭目的告訴人民大

衆還不夠，即單喊一句：「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建立三民主義的新中國」的口號還不夠，必需是把這一戰爭的政治目的，一切政治口號，聯繫於人民大衆的實際生活及其切身利害。要他們都明白爲什麽戰爭，戰爭和他們的生活，生存有什麽關係，亦即和他們有什麽切身利害，然而這就是非人民大衆有說出他們有切身利害的機會不可，有提出他們自已要求的機會不可，有陳述他們實際生活狀況的機會不可，乃至有言論、思想、出版、集會、結社等等的自由不可。即有最低限度的民主自由不可。然而這種民主自由權利，在一般民主國家的情况下，都是用憲法——國家的根本大法來確定，來固定，來保障的，所以眞正的政治動員——最有效的政治動員，是把人民大衆的民主自由權利，亦即戰爭之政治目的，戰爭所要完成的政治任務，乃至具體明確的政治綱領，用憲法來明白規定，而且用憲法來保障其實現。抗戰到了今天，政治動員還不能說已經做得很夠了，甚至大後方還感覺不到戰時的氣氛，人民的大多數，關於戰爭的慘烈酷虐，毒害等等，差不多是從敵人的砲火與飛機炸彈那里聽到消息的。一切戰爭，都需要拿政治動員去戰勝敵人，何况我們武器不如敵人，一切物質設備不如敵人，所恃者地大人多，所恃者就是要以廣大的政治動員來動員全國的老百姓。而眞正的最有效的動員，即是以澈底的民主政治爲內容的憲政，則憲政便是加強抗戰的有力因素了。

但歷史上也不是沒有因戰爭而催毀憲政，損失人民大衆自由權利的事實。例如二十年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協約國與同盟國，在戰爭開始，都不約而同的組織所謂戰時內閣，特別加強政府的權力，尤其是軍事權力，統制人民的言論、思想、出版、集會、結社等等自由，統制生產，消費、乃至統制一切，這是鐵一般的事實。此次戰爭爆發，英國也頒佈了所謂戰時強制勞動令，法國把在法國法律上原來許可公開活動的共產黨——一個合法的政黨解散了，并大捕共產黨籍的國會議員（但法國很快的潰敗，也就因於此等措施），這也是鐵一般的事實。再則敵寇——日本，在未發動對我國的侵略戰爭以前，是掛着一塊金字輝煌的『憲政』招牌的，在憲政的美名下，言論、思想、出版、集會等等，確具有相當的自由，許多進步的書籍，在戰前，中國的文化人，多是從日文翻譯的，日本進步的文化人——教授、作家、律師等等，亦能自由執行其職務。但自侵略戰爭發動後，戰時內閣，由近衛、平沼、到阿部變本加厲的法西斯化，野蠻化，政府的權力，尤其是軍部的權力日益加強，而對於言論，思想等等的壓迫，也登峯造極，連一個自由主義者的和合，都不能聽其任帝國大學的教授，而文化人——大中小學教員及學生之被捕者日有所聞，這更是鐵一般的事實。

然而這只是事實之一面；另一面，我們請看一七八九年法蘭西大革命戰爭的事實，

請看一九一七年俄國大革命戰爭的事實，不，我們還要看一九一一及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中國兩次大革命戰爭的事實，這都是民衆自己發動，自己進行的戰爭。在這些戰爭中，決沒有剝奪革命民衆的自由權利，並且鐵一般的事實證明：一面戰爭，一面制憲。例如一七九一年的法國憲法，一九一八年的俄國憲法，一九一一年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都沒有因內外敵人的圍攻，而停止憲政的進路。

以上是歷史上兩類事實，這兩類事實是由兩種戰爭性質不同決定的，歷史上的一切戰爭，依其性質不同也可分為兩類：一是革命的戰爭；一是反革命的戰爭。例如就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及日寇對於中國侵略戰爭性質來說，都是帝國主義企圖搶奪市場重分世界的侵略戰爭，亦即反革命戰爭。那樣一些帝國主義政府都是強迫人民為帝國主義利益作戰的，根本違反人民大衆的利益，所以它要壓迫人民，統制一切，不許人民說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話，任何表現這種民意的機關與集會都不許存在，即令有國會也是御用來通過戰爭預算的。戰爭所要達到的政治目的，政府與人民不一致，政府就必然要在戰時反「憲政」。反之，就過去法蘭西大革命戰爭，俄羅斯大革命戰爭，中國大革命戰爭，以及此次對日抗戰的戰爭性質來說，都是被壓迫民衆和民族，反封建反侵略的民族民主革命戰爭，即其性質是革命的，戰爭的政治目的，政府與人民完全一致。這種戰爭，可

以說是人民自己發動自己進行的，因此政府決不怕人民反戰，政府的一切戰時政策建築在人民的支持之上，所以政府不但不怕人民，而且必須喚起民衆，以便積極參戰。中國此次對日抗戰是人民極端擁護，極端要求的，而且抗戰的勝利沒有人民參加又是不可能的，所以民主與憲政成爲迫切的需要。戰爭的性質決定政府與人民的關係，決定戰爭與政治的關係，這是一個歷史的規律。

四、當前中國憲政的具體方案

照上面所說看來，我們顯然不能拿「抗戰」來取消「憲政」，即不能拿戰爭的特殊性來取消政治的一般性，戰爭是不能外於政治的東西，革命的戰爭必然要有革命的政治配合，革命的政策必然要由革命的政府來執行。反之，我們也要注意，任何人也不能拿「憲政」來取消「抗戰」，即不能拿政治的一般性來取消戰爭的特殊性。基於戰爭的特殊性，就有戰爭的一套特殊組織，特殊方法，特殊過程，所謂特殊組織，就是軍隊以及與軍隊組織有關的一切的東西；所謂特殊方法就是指導戰爭的戰略戰術；所謂特殊過程，就是互相敵對的軍隊，互相使用有利於已不利於敵的一種特殊的社會活動形態。因此，戰爭的經驗是特殊的，一切參加戰爭的人，參加戰爭的機構，必須脫出尋常生活習慣

，使生活習慣於戰爭，方能取得戰爭的勝利。這就是說政治一般性，也要配合或服從於戰爭的特殊性，例如政治機構的強化，政府責任的加重，權力使用的集中都是。這就是說抗戰的具體要求，形勢、環境、動向、產生出特殊的，非常的，多變的複雜的某些條件，不能拿政治的一般性完全束縛住它。所以抗戰開始時，也曾適應着當時非常的特殊的多變的軍事條件，國民黨，國民政府把預定在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要召集的國民大會，明令停止了，這一國民代表大會即是預定要通過憲法，結束訓政的。所以我們在抗戰的某一時期，都還只能提出與戰爭相適應的民主，或為戰爭的任務所迫切要求的憲政。然而這只是告訴我們政治的一般性，有時（非常時）不能不適應戰爭的特殊性，而決不是說戰爭可以離開政治，抗戰可以取消「憲政」。

然則，當前的中國憲政所要求的是什麼？當前中國憲政的具體方案應該怎樣？我們如果不是觀念論者，空想的空論家，當我們在決定一種政治原則，國家制度，或關於一種政治原則和國家制度的最重要最基本的大法時，便絕不能拿自己主觀的願望——儘管是良善的願望做出發點，而最重要的是根據這一國家的特點，根據這個國家民族的，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社會生活的，歷史傳統的各種條件的特點，根據這個國家特殊的歷史環境，社會階層的相互關係及其各種力量的對比，根據這個國家特定時期中民衆

政治覺悟性，組織性，和其戰鬥經驗及其一切文化水準等來做出發點。

那麼，今天的中國還是在抗戰中，「抗戰」是我們要緊緊抓住的歷史的一環；同時為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由於中國社會之半殖民地性與半封建性，都不免陷於落後形態，所以它的抗戰是艱苦的，持久的，勝利的前途是要依靠廣大的，普遍的，深入的政治動員的。再次，抗戰是在中國國內有了革命黨——中國國民黨及其他黨派的新形勢下，是在中國有了革命民衆——民族意識，政治認識，都相當的堅強與提高了的新形勢下，尤其是抗戰經過了七年又五個月的現在。此外，國際的形勢也是嶄新的，法西斯統治的潰崩，革命勢力，反帝反戰反侵略的各種運動的高漲，各種不可調和的矛盾，日趨尖銳化，而日本帝國主義對於侵略中國的前途，也已達到了生與死的最後關頭，這時中國需要下列的政治原則和國家制度：

（十一）統一的民主共和國——只有統一的民主共和國，才能把中國變成強有力的中國，只有統一的和強有力的中國，才能真正做到驅逐日寇對內實行民主的政治原則上，才能達到國內政治上精神上真正的統一。

（十二）三民主義是統一的民主共和國的真實內容——只有在三民主義的領導之下，即對外有求民族解放的民族主義，對內民主自由的民權主義，及增進人民幸福改善人

民生活的民生主義之下，領導着全國人民實行起來，才能完成統一的民主共和國的任務，才能完全適合於中國革命歷史的要求。

（三）統一的民主共和國的建立——只有建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只有三民主義的共和國，是中國革命歷史的要求，是抗戰勝利的保障，因此統一的民主共和國的建立，必需從國民大會的選舉與召集，憲法的起草與批評，都能自由發表意見做起，直到製定和通過真正的民主憲法，召集真正的民主國會，選舉真正的民主政府，執行真正的民主政策爲止。

（四）統一的民主共和國的性質與前途——在統一民主共和國之下，它所包括的成分，是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及一切國內同意民族與民主革命的分子，即各階層民衆的聯盟，它基本上還是具有資本主義性的，但它的前途可能走向非資本主義，即走向社會主義（中山先生的理想是社會主義一直到世界大同；請注意）！

（五）統一的民主共和國當前的任務——在抗戰未停止以前，亦即最後的勝利還沒有取得以前，當前的任務，自然是很複雜的，例如堅持抗戰，堅持團結，堅持進步，而最主要的，是要它能真正執行四萬萬五千萬人民所付託給它的最負責的最困難的和最複雜的國防任務，保證動員全國一切軍力、人力、和物力、去實行驅逐日寇法西斯出中國

。在今天來說，起碼要能抵禦敵寇勢如破竹的進攻。

（六）統一民主共和國政府的組織原則——統一的民主共和國的政府要執行他們抗戰中的繁難的任務，不能不在執行上使其強有力，因此，它的組織原則應該採取「民主集中制」，即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例如一方面，我們需要真能代表民意的政府，即政府要建築在民意上，要得到全民眾的擁護，這是民主制的意義；另一方面，行政權力的集中化是必要的，當人民所要求的政策，一經通過民意機關而交付於自己選舉的政府時，即由政府執行，再不受任何阻止（除非他們的執行違反民意時），這是集中制的意義。民主集中制是當前一個最好的組織形式，它是政治生活發展到現在的人類歷史的總結，而這一組織原則是通用於平時與戰時的最進步的一切組織形式，尤其適應於抗戰的非常時期。

具有以上各種特徵的三民主義的統一的民主共和國，不是由於我們個人主觀的善良的願望產生的，而是由歷史的規律性，尤其是由於許多內外新的歷史條件。那麼，我們如果要把這樣一種政治原則，國家制度，在立法上反映出來，尤其是在關於國家制度的最重要基本的大法上確定下來，把它當做已經走過的道路的總結，已經達到的目的總結，即把它當做在事實上已經獲得和存在的東西而用立法的手段鞏固下來，則它在憲法上

所表現的主要特徵是怎樣的呢？我以爲必然有不同於「一般民主國家憲政」和「蘇聯的憲政」的下列幾點：

（一）一般民主國家的憲政，在上述第一種特徵上，它所由出發的前提是：社會分爲各種對立階層，一部分人佔有生產手段，一部分人則窮無所歸，而國家對於社會的領導，卽實際上的政權是掌握在資產階級手上；蘇聯的憲法，在上述第一種特徵上，它所由出發的前提是；社會係由兩個互相友好的階層——工人和農民所組成而掌握政權的是工農自己，卽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中國的憲法在這一點上，不同於一般民主國家的憲法，亦不同於蘇聯的憲法，將是另一種「類型」，它所由出發的前提，不是在社會各種階層的對立而是各種階層的聯盟，不是一階級專政，而是全民族的民主。

（二）一般民主國家的憲政，在上述第二種特徵上，它所由出發的前提是：是民族與各種族間的不平等，有享有完全權利的民族，也有不完全享有權利的民族，甚至無理侵略弱小民族；蘇聯的憲法，在上述第二種特徵上，與一般民主國家相反，它是富有國際主義精神的，它是以一切民族和一切種族完全平等爲出發點的。中國的憲法，在這一點上，根據孫中山先生的遺敎，例如前引建國大綱第四條，將不同於一般民主國家憲法，而與蘇聯一致。

（三）一般民主國家的憲法，在上述第三種特徵上，有如下兩類：或是直捷了當否認公民權利平等和民主自由，或者在事實上玩一些手法，把民主權利與自由變爲烏有，它是很明白的標榜民主主義的原則，列擧許多保障人民自由權利的條文，但是馬上拿一套把戲把它加以保留和限制；蘇聯的憲法，在這第三種特徵上，也與一般民主國家憲法相反，它直接承認公民權利的民主自由和平等，它不是標榜，而是實際上執行民主主義的原則，決不在憲法條文上加「但書」，馬上把各種權利加以限制或保留。中國的憲法，在這一點上，根據孫中山先生的憲政觀，是不同於一般民主國家憲法的，有些地方也不同於蘇聯，因爲採用四種直接民權來實現人民對於國家政治的管理，這一點最能表現中國憲政的徹底性。

（四）一般民主國家的憲法，在上述第四種特徵上，通常僅在形式上，法律條文上規定公民權利，這種權利如何使之實現，它是不注意的，它們雖也說公民平等，可是它們忘記階級對立如果過於尖銳，是不能有眞正平等的，此外，其他言論，思想等等自由，也無確切保障。蘇聯的憲法，在上述第四種特徵上，則與一般民主國家不同，即它不僅在法律條文上規定公民的權利，而且把重心放在保障這些權利的實現上面。中國的憲法，在這一點上，當然也不同於一般民主國家，而是同於蘇聯的，中山先生主張「政權

」與「治權」的分立，特創五權分立的憲法，在對內政策上，「確定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都是鐵證。

（五）一般民主國家的憲法，在最後一個特徵——最基本的一個特徵上，它是從資本主義制度牢不可破的信念出發的，這些憲法的主要原則，就是資本主義制度的維持與鞏固，而它的主要基石，就是土地、森林、工廠、作坊、及其他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即資本主義的所有制。蘇聯的憲法，在最後一個特徵，最基本的特徵上，它與一般民主國家的憲法恰恰相反，它是從資本主義制度在蘇聯已經消滅的事實出發的，是從社會主義制度在蘇聯已經勝利的事實出發的，蘇聯的憲法最主要原則，是社會主義制度的鞏固與發展，它的主要基石是土地、森林、工廠、作坊及其他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即社會主義所有制。中國的憲法，在這一點上——在最基本的一點上，它是不同於蘇聯的，因為它顯然沒有社會主義勝利的事實，但在本質上或原則上反而與一般民主國家的憲法相同，因為孫中山先生「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兩大經濟原則，仍未超出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範疇，而在現實的社會經濟狀况上還是一個半殖民地性半封建社會，不過它是不滿足於資本主義制度的，它對於資本主義制度决沒有牢不可破的信念，因此。它的前途是非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但它現在還沒有實現社會主義所有制的現成

事實，憲法上是不能作爲存在的東西反映出來的。

具有以上各種特徵的中國憲法——中國的憲政，也不是由於我們主觀的善良的願望產生的，而且由於歷史的規律，由於許多內外新的歷史條件，更由於孫中山先生精深博大的「憲政觀」的理論指導所得出的中國憲政的總結，這裏仍歸結到本文開始所提出的論綱：「任何「憲政」，它不是一般的、抽象的、絕對的，它有它獨特的歷史內容」。

十五　論現階段的中國民主

一定發展階段的歷史規律性之把握，是一切歷史課題之論究的前提。那麼，我們該不能否認近百年的中國革命歷史——不論是戊戌變法以前的民本主義思潮，辛亥革命運動、五四運動、五卅運動、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國民革命運動，一直到一九三七的七七、八一三，抗戰開始的所謂「抗戰建國」的偉大運動——都是民主性的革命吧！

這一民主性的革命，又正是中國近百年歷史發展的規律性所規定的。民主性的革命一根紅線似的貫串着近百年中國歷史每一革命運動的環節，而且從這一環節到另一環節的推移，其民主性的發展也配合着時代環節的發展，愈是最近的一環，愈是把民主性包藏得豐富，充實——愈是顯得時代的環節與民主性要求之不可分。那麼，中國今天是正處於砲火掀天的苦難抗戰中之最後一環，今天客觀上全民抗戰的任務，推翻異民族壓迫的任務，即是民主的任務。這一對於民主之劇烈性的要求，還不僅是歷史發展規律性的一般所規定的，而且是配合着時代環節之特殊的規定。即在今天中國民主的要求，正是中國歷史發展的規律性一般與特殊之統一。這是本文重要論點之一。

民主、民治、民權，都是「德謨克拉西」一字的譯意，因此，民治主義，民主主義，民權主義，也都是名異實同的概念。所謂民主性的革命，即是民主主義，民權主義的革命，按照中國歷史發展的規律性所規定的來說，也可以說是三民主義的革命。三民主義如中山先生自己所說：雖具有與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同一性，發展性，然在今天來說，沒有也還不可能超越民主革命的界限。不錯：今天是全民對日抗戰，是偉大的民族解放戰，但我們決不能把抗戰與中國歷史發展的規律性所規定的具體的革命內容分開，而且我們要知道：民族問題是民主問題的一部分，同時，也是以「民生問題」為基本內容的。民族、民權、民生在社會基礎上，因而在政治任務上，具有不可分裂性；儘管它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具有各自對於一個時期的主導性。就其不可分裂性說：今天是三民主義的革命；就其主導性說：今天是民主性的革命，這是本文重要論點之一。

近代外邦輸入的名詞，概念，範疇，尤其是社會科學方面的，不論是什麼都好，例如「資本主義」，「民主主義」，一到中國來，它的意義，內容，就兩樣了。不：這正是真理的具體性的具體表現。無論什麼名詞，概念，範疇，都不是抽象的，絕對的東西，即都有它一定的特殊的歷史內容。民主政治，「決不是一個不可超越的界限」，它因為社會經濟條件的發展運動，即因歷史內容的不同，可以由低級的民主逐漸擴大為較高

級的民主，由形式的民主逐漸接近於實質的民主，純粹的一般的民主是沒有的。它又因社會經濟條件的變動，可由肯定走向否定，即由民主轉變爲它的反對物：專政。例如德意日有產者的民主轉變爲金融獨佔資本的法西斯獨裁，有產者的形式民主，即是實質的專政；形式的轉變是導源的實質的。反之，專政亦可轉變爲它的反對物——民主，例如蘇聯無產者的專政轉變爲斯大林憲法的民主，專政與民主，是互變的互相滲透的。民主呢，專政？不把握其一定的社會經濟條件，不把握其歷史內容，脫離現實的理論思維之空虛研究，必然要變成經濟主義，形式主義的符號玩弄。今天的中國民主，應該如何配合其社會經濟條件，配合其歷史內容，配合其特殊的時代環節，一句話，如何切合抗戰砲火現實的要求，導出民主的內容與實質，導出今天民主的具體規定，這是本文重要論點之三。

所有這些論點是互相聯繫不可分的，但其根本特徵，是一定發展階段之歷史的規律性，決定一定發展階段之民主的規律性。「民主不是一個空虛的絕對的概念。」

根據以上三個論點，我們便可展開民主發展的歷史階段之論述，同時，便可確認中國現階段民主內容之具體的規定。

從大體上說來，歷史上有過古代式的民主，有過資本主義下的民主，也有着社會主

義下的民主。但嚴格的說，「政治是經濟之集中的表現」，民主只能是資本主義商品生產關係的產物，我們對於民主政治的論述，也只能從資本主義社會開始。

資本主義下的民主形式有如下幾個特徵。

第一、在形式上，爲資本制下民主之特徵的東西是規定國家組織，政府職權，人民權利義務等的憲法及其他一切公私法律。法律之前萬民平等，即「在人類個性平等一標準下，資產階級民主聲言無產階級與私有財產者，被壓迫者與壓迫者在法律上的平等：……」，並且在憲法的規定中：立法、行政、司法三權是分立的。

第二、在民主制的國家形式之下，代議制也是它最重要的一個特點。民主國家在憲法中規定了由人民選舉而組織的議會，並且在形式上它是國家最高權所在的首領機構。英、美、法、大多數國家的國會是由兩個獨立的部分組成的，即由下議院與上議院（上議院議員有終身被任命的）組成的。

第三、在形式上，自由、平等、博愛是民主政治最輝煌最基本的三大標幟。人生而自由（包括言論、思想、結社、集會、居住、信仰、營業等自由），沒有自由就沒有民主：人生而平等（包括法權公民權等平等），沒有平等就沒有民主。博愛是民主制度之倫理的轉化，民主之另一側面，這在絕對的資本主義的民主理論家看來，也是很重要。

所謂絕對的資本主義的民主理論，即由一人性論機之民主理論。

這些特徵，並不是各自孤立的，它由一定歷史階段的規律性聯繫着，但這些都不過是有產者的自覺手段之一側面，「民主」之現象形態，或形式騙局。法國號稱民主政治的母親，然羅伯斯比爾於臨死時高呼：「共和國家滅亡了，強盜們勝利！」「理性的王國」，不過是「資本主義的王國」，而且民主制度原是一種國家形式——國家的各種形態之一，因此，同一般國家的本質規定一樣——國家只是社會矛盾的產物。而所謂自由平等，當然也和民主一樣，不是形式與內容一致的絕對物。老實說：資本主義下的民主，在其具體的歷史內容上，只是實質的專政。

資本主義之下形式的民主，實質的專政，不僅存在於資本主義社會，而且導源於封建社會內部。因為資本主義的經濟關係是在封建社會的內部孕育着的。資本主義對封建關係的革命，其目的並不在取消為封建關係服務的貴族專政——取消封建關係的榨取制度，只企圖改變榨取形式，把榨取的專政特權，從王公貴族手裏轉移到資本家手裏，所以資本主義民主制的國家形式，並不要求根本破壞封建國家的國家機構，只是改造這國家機構，加強這國家機構，使適合於有產者的需要。所以資本主義形式的民主在其初建

立時並不徹底消滅封建特權，時而愛好他們，羨慕他們，即它對於昨天的敵人——王公貴族，不但不仇恨，而且友愛起來；反之，對於昨天的戰友——人民大衆，不但不融合，而且表現極大的恐懼與仇視。這不是偶然的。復次，資本主義露骨的專政，由隱蔽的形式到公開的法西斯獨裁，更加回去寶貝那些殭死的落後的中世紀的東西，甚至公然採用宗教裁判，野蠻屠殺，焚書坑儒等殘酷暴行，把世界歷史硬拉回農奴制的黑暗世紀，更不是偶然的。

再則表現得極明顯的例子，因爲形式民主所具有的國內階級矛盾，把它拘限於有產者的根本利益，雖在今天，民主政治因了法西斯的瘋狂，爆發了民主國家反法西斯主義的戰爭，爭取民主，成爲世界革命的中心問題，然而由於民主的狹隘性，對於從法西斯鐵蹄之下解放出來的某些國家，仍然站在反動流亡政府的立場，幫助壓迫該國內的人民力量，不自覺的露出了形式民主之狐狸尾巴。

但縱然是形式的民主，也不是沒有歷史發展之進步因素，例如它提高了社會的生產力，取消了封建制之超經濟的剝削，造成了社會轉變革命發展的條件，而且即在其形式與內容之對立上，也並不是沒有某些對立的一致，因而開闢了某些有限性的自由條件，使人民大衆的革命鬥爭更加容易。

社會主義下的民主，是民主之更高階段的發展形態，它也有它的諸種特徵：

第一、它的民主——它的國家形式是新型的獨創的蘇維埃。這種新型的國家，導源於法國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和舊俄一九〇五年的工人代表蘇維埃，它徹底破壞了舊國家機構，在官吏的選舉和武裝人民來代替常備軍制等的新的基礎上建設了自己的系統。

第二、蘇維埃政權的根本特點，在於它把那些被資本主義所壓迫的剝削的廣大工農羣衆，提拔爲國家機關的柱石。它不是虛僞的，而是真正的吸引廣大勞苦羣衆參加國家大事和社會事業的管理。

第三、蘇維埃把一切政權（立法、行政、司法、）都放在蘇維埃手中，蘇維埃代表大會和聯邦最高蘇維埃以一方面頒佈法律，同時直接管理國家，執行和考察被頒佈了的法律是否實現的。

第四、蘇維埃的選舉，不是按照地域，而是以生產機關（工業、企業）作單位。不是蘇維埃代表由選舉的一切官吏（包括法官）都是選舉的，因爲預定要把公民來代替官僚。選民與被選舉則關係密切，一個或千個選舉人，想以實行訓練極廣大的羣衆來參加國家機關。選舉人還有罷免權要——例如被選舉者不努力工作或違反大衆利益，選舉人隨時可以撤回或改換他。

第五、蘇維埃實行對於人民大衆較徹底的民主，給予人民大衆以各種自由（言論、思想、結社、集會、出版等自由）平等（國內各民族平等與公民平等）。同樣並給予國家武裝力量的新的組織形式，卽爲了自衛，爲了防止帝國主義的侵略，組織了以工農大衆爲基本分子的自己的紅軍。

第六、蘇維埃憲法，尤其是斯大林憲法，在生活中曾引起了羣衆的政治積極性之空前未有的高漲，使國家與人民密切接近，使國家機關與民衆溶和的途徑上有了一種新的進步。國家對羣衆的骨肉的聯繫，同時，鞏固了增強了蘇聯國家機關的威力——對羣衆的聯繫越密切，勞苦大衆被吸引來管理社會和國家大事的越多，則蘇維埃國家的威力與力量也越大。

所有這些特徵，也爲其歷史的規律性貫串着。但它對於人民大衆是民主的，而對於舊俄時代的貴族、地主、官僚、政客、軍官、警察、僧侶等則是專政。這是多數人民大衆對於少數特權者的專政。它是把專政建築在人民大衆的廣泛基礎之上，專政與人民大衆骨肉相連，專政天天吸引廣大的下層民衆來管理社會和國家大事，專政如同用數千萬條與民衆密切聯繫着，專政如同把千百萬隻眼睛和耳朵與民衆通聲氣通情報，所以它受到全體蘇維埃人民的尊敬與擁護，加強了專政的力量與威權。它的領導者，也就敢

於個人專政」這一粗暴的名字，在全世界一切人們面前公開。這種專政，是歷史上最後一款的專政，它是要拿專政制裁壓統治者的反動，聯合並改造勤勞大衆的全部生活，建立新的合理的生產制度，亦卽消滅一切生產手段的私有權，消滅一切社會階級的對立和鬥爭。到那時，自然也消滅了專政本身。」

這種以專政消滅專政的「無產專政」，卽以加强國家力量來消滅國家的「無產專政」，無疑是要依先創製相當的經濟條件與準備先使國家機關與千百萬羣衆溶合起來，其在實質上無疑是較高級的民主——與資本主義下的民主相較。同時，它又是由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過渡的民主，猶之資本主義的民主，是由封建制到資本主義過渡階段的民主一樣。所以它有着它不可掩蓋的優點：

第二，由於其民主的高度性，不僅逐漸消滅了國內任何階級差別，不僅擴大了國內勞苦大衆享受文明幸福的自由和選舉權，卽擴大了實質的民主，而且在舉世法西斯瘋狂侵略威脅所有民主國家之際，成爲爭取世界民主之有力的支柱，成爲世界民主統一陣線的組織者，領導者，在一切戰線上，例如在目前弱小民族的反抗異族壓迫的民族戰線上，都盡了它爲民主制作普遍的鬥爭上的任務。

第三，由於其民主的徹底實行，爲的是要消滅歷史過程中作爲一切矛盾所淵源的根

本矛盾之階級矛盾，它已經與世界上被壓迫階級站在一邊；不，它已經是世界上被壓迫階級本身，所以它必然與世界上被壓迫民族站在一邊。所以它對國內一百多種文化和生活不同的民族，不僅有着相互間的自由平等，把它們聯結成保衛和建設社會主義的要素，而且建立從國內各民族平等到援助世界弱小民族的真正友誼。

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下的民主，既如上述。那麼，現階段的中國民主，究竟是那一種的民主呢？我們可以這樣得着解答，即現階段的中國民主，是與現階段中國的政治任務，歷史使命，尤其是民族解放戰爭——對日抗戰的時代環節不可分的。抓住時代環節來談現階段的中國民主，一句話，就是：新型的民主。

新型的民主又是什麼呢？我們最好一讀中山先生關於民主的意見。中山先生說：

「今日我們主張民權，是要把政權放在人民掌握之下，那麼，人民成了一個什麼東西呢？中國自革命而後，成立民主政體，凡事都該由人民作主的，所以現在的政治，又可以叫做民主政治。」（見民權主義講演）

「中國人從前反對民權，常常問我革命黨有什麼力量，可以推倒滿清皇帝呢？但是滿清皇帝到辛亥年一推就倒了。這就是世界潮流的效果。世界潮流的趨勢好比長江，黃河的水一樣，水流的方向，或者有許多曲折，向北流或向南流的；但是流到最後，一定

是向東的，無論是怎麼樣，都是阻止不住的，所以世界的潮流……由君權流到了民權，現在流到了民權，便沒有方法可以抵抗。」（同上）

「中國現定名爲民國，總要以人民爲主，要讓人民來講話，如果是帝國，才讓他們去講話。假若一天不改國號，他們總要聽人民的話」（他們按卽指當時官僚軍閥，見「國民會議爲解決中國內亂之法」）

這肯定的說明民主政治，卽是凡事讓由人民作主的政治。民權是不可抗的世界潮流，一天不改國號，就要讓人民來講話。再則中山先生說：

「照現在世界上民權發達的國家講，人民在政治上是佔什麼地位呢？得到了多少民權呢？就最近一百年來所得的結果，不過是一種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不過一種代議政體。」（見三民主義第四講一三二頁）

「歐美平等的流弊，究竟是怎樣呢？簡單說來，就是他們把平等兩字認得太呆了。歐美爭得平等以後，爲什麼緣故要生流弊呢？就是由於民權沒有充分發達，所以自由平等還不能夠向正軌道去走。」（見第三講一一二頁）

「德國的民權雖然發達，但是沒有力量去反抗政府。……然而到了德法戰爭以後……另外發生一種東西，就是社會主義。這種主義就是我的民生主義……德國的社會主義

，在那個時候，便非常發達。社會主義本來和民權主義相連帶的，這兩個主義發生以後，本來要應該同時達到的。」（三民主義第一三六頁）

「美國自脫離英國獨立以後，把從前政治的階級完全打破，創立共和制度；以後法國革命亦是照美國一樣，把從前的階級制度根本推翻。

「延到現在六年以前又發生俄國革命，他們打破階級制度變成共和國家。就這三個革命成功的國家比較，發起最後的是俄國，成功最大的也是俄國，俄國革命的結果，不但把政治的階級打倒不平等，並且把社會上所有的資本階級，都一齊打倒不平等。」（第三講一〇七頁）

「法國美國現在還是革命，我們就是學到了歐美，到了百十年之後，一定也是免不了再起革命的。……我們提倡改革決不能夠學到了像現在的歐美，便算是止境，……若是再起革命，豈不是現在的革命徒勞無功麼？」（第六講一五九頁）

此後民國十三年一月三日中國國民黨宣言及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對於民權主義即民主的解釋便更加具體了：

「現行代議制度已成民權之弩末，階級選舉，易為少數所操縱。欲踐民權之眞義，爰有下列之主張：（甲）實行普選制度，廢除以資產為標準之階級選舉；（乙）以人民

集會或總投票之方式，直接行使創制，複決，罷免各權；（丙）確定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居住、信仰之絕對自由權。

「國民黨之民權主義，於間接民權之外，復行直接民權。即爲國民者，不但有選舉權，且兼有創制，複決，罷免諸權也。……近世各國，所謂民權制度，往往爲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爲壓迫平民之工具。若國民黨之民權主義，則爲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者所得而私也。……民國之權，惟民國之國民乃能享之；必不授此權於反對民國之人，使得藉以破壞民國。詳言之，則凡眞正反對帝國主義之個人及團體，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權利；而凡賣國罔民，效忠於帝國主義及軍閥者，無論其爲團體或個人，皆不得享有此等權利」。

綜合上述兩段文字，第一、是主張民權不能爲少數資產階級所專有；第二、是主張直接民權，人民經過集會或總投票方式直接行使創制，複決，罷免各權；第三、是主張人民集會、結社、言論、出版、居住、信仰之絕對自由；第四、是主張剝奪賣國罔民的人們關於上述權利。中山先生民權革命的精華，是完全表現在這四點上了，上述的四點完全表現了三民主義的民權主義的眞正性質。亦即表現了新型的民主主義的眞正性質。

我們試再一讀蔣主席對於民主的意見。國民參政會第一次會議開幕，蔣主席在其致辭中，曾經講到爲了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第一必須完成的任務，就是加强團結，鞏固統一，第二就是要建立民主政治的基礎。

國民參政會於民國二十八年二月十二日舉行第三次大會，蔣主席又以議長資格在其閉幕辭中說：

「本會的歷史的使命，是要建立民主政治的基礎，尤其是在建立永久的眞正的民主政治基礎，這一點，中正在第一次開會的演辭中已經提到了。總理倡導三民主義，其民權主義的最終目的就是民主政治。一國的人民，如果不能關切他們自身的幸福，管理他們自己共同的事務，就是說，如果人民不能積極參加政治的話，他們就不能造成強固的國家。所以世界上最有力最鞏固的政治，一定是建築在民意之上，一定是以人民之利害爲利害，人民的視聽爲視聽。總理的民權理想，是造成一個民有、民治、民享的國家，古今中外，理無二致。」

這種說法，也是合於新型的民主主義之眞正性質的。

但這裏所謂新型的「民主」不是一個抽象的絕對的概念，這是半殖民地民族解放過程中特有的一種國家形式，亦即反法西斯世界戰爭中半殖民地的革命任務所自已規定的

一種民主制。它的諸特徵（亦即其總原則）如下：

第十、新型的民主是全民性的民主——是在民族利益高於一切的原則下，全民族一致抗日的民主。（這自然不是絕對的）因此它不能是「資本主義的民主」，不能有「資本主義民主」的狹隘性，階級性，虛偽性，同時它也不能是「社會主義的民主」，社會主義的民主較之資本主義的民主雖是較高級的——雖無「資本主義的民主」的狹隘性，虛偽性，但仍有其強烈的無產階級專政的階級性。

不錯，那怕就在九一八以後，中國的革命前途，國人還在由各自（不論是個人或集團）不同的狹隘的偏見出發，紛紛辯論着許多煩瑣哲學的問題，歷史電影似的一幕一幕演着，人們兒戲似的談着，笑着。但是日寇法西斯的七七砲火，以及接着的屠殺姦淫，畢竟把中國歷史立刻推進到了一個「生」與「死」的十字街頭——一個非「生」即「死」而不許彷徨猶豫空論的關頭，這正是一個人類歷史中很難找到的偉大關頭。

這時工人階級、農民、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地主、民族資產階級，甚至封建階級、業買辦階級，不管那一個階級的要求，利益；這時，漢族、滿族、蒙族、回族、藏族，乃至苗猺等族，不管那一個民族——即全民族的要求，利益：這時國民黨、共產黨、第三黨、青年黨、國社黨，甚至三五人的小組織，不管那一個黨——即各黨各派

的要求，利益；這時，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不管那一個人——即不分男女老少的要求、利益，都匯合起來，雲瀑布似的匯合成一個總的巨流，來反對共同的兇惡敵人——日寇法西斯。這是殖民地化的深刻民族危機的新歷史階段。在新歷史階段的新形勢前，立刻改變了中國國際國內關係，日寇法西斯與其他（英法美等）國家在中國利益的矛盾，一時降低了中國與其他國家的矛盾，中華民族與日寇法西斯的矛盾一時降低了國內各階層的矛盾，規定了中國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必然要轉變爲全民族統一抗日的偉大民族解放戰爭，並規定了整個中華民族的解放之路，再沒有第三條路可走，除了全民抗戰外。一切煩瑣的問題，也再沒有爭辯的餘地。

這是一個堅強真實的基礎，來在其上建立全民抗戰的「民主」。即是「全民性的民主」。無階級、黨派、宗派，性別之分的「全民性」是它的根本特徵。同時，全民抗日的統一戰線，也建立在這一個堅強真實的基礎上，統一戰線不是別的，只是一個革命的抗戰民主機構。

第二，新型的民主，在一國範圍內，是全民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全世界範圍內，亦與各民主國家和國際工人階級反法西斯，反侵略，反戰爭，爭取民主保衛世界和平的統一戰線不可分，因了「帝國主義的好戰性」，「法西斯主義即是戰爭」尤其是法

西斯暴徒的強盜行為，幾乎把歷史倒拉回中世紀可怕的黑暗愚昧和對異教異族及農工下層民衆的殘酷壓迫；爭取民主成為反戰爭，反法西斯，反侵略的中心問題；所以各民主國家，例如英美等民主國家——儘管它仍不脫資本主義的民主性之較狹隘的形式的民主運動，立刻和我們的全民性的民主有了革命的一致性；再則國際工人階級，例如英美法乃至德意日等法西斯國家的工人階級的民主運動——儘管它是一時的手段性的消極性的民主運動，也立刻和我們的全民性的民主，有了革命的一致性，更如社會主義的民主國家蘇聯所發揮的較高級的接近於民主實質的民主運動，更和我們的民主及一切民主國家之建立了生死與共的關係，所以中國的民族解放戰爭，必然形成全世界民主運動的一個具體問題，中國民族問題的解決，必然形成全世界民主運動的一個節目，這畢便充分說明了新民主的內容是有歷史性的，是進步的，所以是隨歷史而變質的，不是一個先天的範疇」。這也說明了新型的民主不是一個抽象的絕對的概念。

由於第三，新型的民主的歷史性，進步性，究竟為抗戰的自覺手段所拘限，即為抗戰的客觀環境之具體適應性所拘限，所以它決不能立刻走上相對固定的較高級民主，同時，它又確確實實在不斷發展的階段中，例如在不斷的走向接近高級民主的階段中。因之新型的民主不只是一個形式的號召，而且應該是一個逐漸擴大的民主制。

這一方面說明新型的民主不能不與抗戰的客觀環境相配合，不能不與抗戰的某些特殊性，非常性，多變性相配合；一方面說明新型的民主，究竟不是資本主義的民主。

第四，新型的民主，是抗戰勝利的基本條件，是與抗戰勝利不可分的。同時，新型的民主，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基本條件，是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可分的，沒有民主條件，就不能形成不分階層、黨派、性別、宗教、國內少數民族等廣大的堅強的統一戰線；沒有民主條件，就不能容納「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動員精神，沒有民主條件，就不能鞏固擴大國內統一戰線，進而與全世界的民主統一戰線取得革命的一致；沒有民主條件，就不能完成抗戰的任務，取得抗戰最後勝利。因為在抗戰過程中民主的發展，同時就是抗戰力量的發展，就是新社會因素，各種進步力量，各方面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教育各方面改進因素的發展，這種本身自力方面不斷的改進，是抗戰最後勝利主要的決定條件。

因此，新型的民主，在抗戰的新歷史階段的新形勢前，便溶成了與抗戰不可分，與抗戰勝利不可分，與全民性的根本特徵不可分。

所有這些特徵都是相互聯系而不可分的，但是具有特殊決定意義的，則是新型民主的特殊性：一、我們在這裡的任務是無論如何不讓任何不合時代要求的抽象的民主理

論（左的右的）來破壞、擱置、甚至取消，絞殺這「全民性的民主」。那麼，新型的民主最低限度的任務，在於「反貪汚反腐化」，在於「遂行積極動員民衆的政治機構」在於「積極淘汰腐朽動搖不定的份子，而廣泛容納進步抗戰最力的社會力量」，這誠然是必須的最低限度的，然爲要配合抗戰之特殊的迫切的要求，根據新型民主之全民性的根本特徵，竊以爲

（一）新型民主之最低限度的任務，還在於立刻採取一切具體辦法，把抗戰建國綱領的全部，及整個國策，一切抗戰建國綱領所規定的「於抗戰期間不違反三民主義最高原則及法令範圍內，對於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與以充分之保障」；「發動全國民衆，組織工農商學各職業團體，改善而充實之，使有錢者出錢，有力者出力，爲爭取民族生存之抗戰而動員」，此外則經國民參政會前後通過之「切實保障人民權利案」，切實「保障出版自由案」，「加強民權主義的實施，發揮民力以利抗戰案」，「實行選賢與能以澄清吏治案」，「確立民主法治制度以奠定建國基礎案」等等，自亦應即刻與以切實執行。

（二）新型民主之最低限度的任務，還在於立刻建立各級民意機關，並加強民意機關的發展，即把現存的國民參政會及省參議會等，逐漸變爲眞正代表民意機關

，其最直接的方法，是廢除指派，實行民選。

（三）敵後方工作的發展，敵後方民主制的建立，在目前佔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新型民主之最低限度的任務，即應努出全力來協助敵後方民衆運動之組織，及游擊戰爭之發展，擴大抗日根據地，擴大抗日軍隊與民主政權，並以敵區的民主地方政權破壞漢奸偽組織及擊敗其偽軍隊。

（四）新型民主最低限度的任務，必需使民主與抗戰在具體要求上密切配合；一方面固然是要加強全國民衆的動員，阻止敵人的進攻，同時更要緊的是號召一切努力準備新生力量來向敵人反攻。因此，今天最迫切的需要，是組織民衆幫助軍隊作戰，動員壯丁入伍，解決兵役補充問題，動員全國物質生產，進行後方開發問題，改善人民生活加強抗戰力量，提高生產性興趣。但這都是需要採取民主辦法，民主條件來發動廣大民衆的問題。

（五）新型民主最低限度的任務，尤其應該即刻承認各黨各派的合法地位，使國共問題迅即獲得圓滿之政治解決，並由各黨各派人士及其他社會有力人士，開誠佈公，商討挽救當前危機之有效辦法，並確立真能擔負對敵執行反攻，對內實現民主之軍事政治機構，以增強抗戰建國力量，以促進經濟政治進步，以提高政府威信

與國際地位，達到最後戰勝日寇，配合全世界民主反法西斯的任務，共同建立戰後世界之持久和平乃至永久和平。

以上已經明白指出這些只是新型民主之最低限度的任務。至於其根本的政治原則，當然不能外於三民主義的原則。在新型的民主主義或三民主義的根本原則下，其表現於政權構成之國家形式者：第一、這個國家，必然是一個民族主義的國家。它在民族的分野及其地位上，是一個獨立國，它不受任何外國干涉，同時也不去干涉任何外國，即是說，它在抗戰過程中，掙脫了中國原來之半殖民地的地位，它獨立起來了，並且會要還前走上強盛的道路，但同時，無論它強盛到什麼程度，決不把自己變為帝國主義。而是[illegible]

開大原則下，必須使工人有工作，並改良其勞動條件；農民有土地，並廢除苛捐雜稅，及重租重息，學生有書讀，並保證貧苦者入學；其他各界人等都有事做，並能夠充分發揮其天才，「一句話，就是使人人有飯吃，有衣穿，有事作，有書讀。

新型的民主主義國家，就是這樣一種國家，就是真正三民主義的中華民國，不是蘇維埃，不是社會主義，同時，也不全是代議制，不是資本主義，這種新型的民主主義，及真正三民主義的中華民國，是中國一定發展階段的歷史規律性之必然的產物，同時也與全世界民主反法西斯的歷史規律性有其一致性，換言之，即為這個歷史規律性的特殊與一般之統一。

十六　如何實現民主及實現民主的具體辦法

過去存在人們腦中經常不免懷疑，甚至感覺焦慮的三個問題，今天都應該作新的估計，而且可以說已得到明確的解答。

第一、是以蘇美英爲主的民主國家反法西斯的統一戰綫，是否可能把反法西斯戰爭進行到底，中途不至破壞團結的問題。

第二、是民主國家不至在中途破壞團結，把反法西斯戰爭進行到底了，在戰後民主國家間，尤其是蘇美英間，是否再上會形成新的尖銳的對立，乃至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問題；

第三、是在蘇德戰爭初期，一部分人斷言蘇聯必敗，後因蘇聯人民愛國戰爭剛勇的強烈的扭轉了敗北形勢，一部分人又懷疑蘇聯勝利後將要爲上赤化全世界的問題。

關於第一個問題，今天可以說沒有什麼可以焦慮的了；而且不必懷疑——反法西斯戰爭，一定在蘇美英三個主要民主國家的堅強團結之下，進行到底，不讓戰後世界任何角落還有法西斯殘餘及其流派存在。

關於第二個問題，蘇美英間在社會經濟制度上的基本矛盾，雖然在戰後依然存在，但雙方必然努力預防新的對立的形成，乃至設法消弭原有的矛盾的生長。這是因為戰前組織反蘇者是上過當的，戰後蘇聯的強大，自更加使反蘇者不敢輕於嘗試。而且凡屬略具頭腦而稍有遠見的資本家，都很清楚的知道戰爭是去孳生新的一個猛獸，對於資本制度是極端不利的。因而今天也可不必惴惴然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立即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懷疑與焦慮。

最後關於第三個問題，早由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性質得到明確的解答。此次戰爭，為民主主義反法西斯主義戰爭，決非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反法西斯主義戰爭。因為支配全世界範圍內的政治主潮，仍是民主主義——雖然不是舊型的民主主義，而是新型的民主主義——蘇聯在客觀條件上無赤化全世界的可能，在主觀要求上也無赤化全世界的任何企圖。它的歷年來一貫的和平外交政策，援助世界上被壓迫民族的政策，尤其是表現於戰時各種文告及聲明上的無領土野心，不變更被收復國家內的社會制度及干涉其內政等等，近來已在事實上，日益證實其不僅徒託空言，而且見之於行事。所以對於蘇聯勝利後馬上將要赤化全世界的懷疑與焦慮，在今天更屬不必要的了。

民主國家必然始終團結把反法西斯戰爭進行到底，戰後世界的永久和平必然由於民

主國家間之努力預防新的對立的形成所獲得；民主主義反法西斯主義戰爭的勝利，是民主主義壓倒的勝利，這一時沒有赤化全世界的可能，這就是今天我們可以確實指出的三件事或三個問題。

一個問題中的最後一個問題——戰爭性質的問題——是最基本最有決定性的問題。什麼東西使得社會經濟制度不同的蘇美英三個國家非聯合團結起來不可，而且非把反法西斯的戰爭進行到底不可呢？爲着爭取民主，保衛民主，鞏固民主，發展民主，換一句話說，反法西斯戰爭的主要任務，是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務——革命戰爭的任務，決定革命戰爭的性質。什麼東西使得社會經濟制度不同的蘇美英三個國家，在戰時要團結起來把反法西斯戰爭進行到底，在戰後還要防止新的對立的形成，建立戰後世界的永久和平呢？爲着在戰爭過程中，民主勢力的日益成長，人民力量與反人民力量的比重的變化，亦即階級比重之變化；爲着戰後民主力量的更加強大。什麼東西使得戰爭性質的本身，是民主主義反法西斯主義的，而不是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反法西斯主義的呢？爲着世界各國經濟政治發展的不平衡，在世界革命的範圍內，要有兩個戰略階段：一、民主革命階段；二、社會革命階段。在民主革命這一戰略階段，其經濟內容，不是徹底反對私有制，其政治內容，是新型的民主。

從爭取民主，保衛民主，鞏固民主，發展民主，到民主力量的生長，強大，一直最後完成新型的民主主義，這一民主革命的任務——民主革命戰爭的性質，便支配了今天的一切，決定了今天的一切。

所謂新型的民主，與舊型的民主的，其主要區分點，究竟在那裏呢。在一切民主革命都是資產階級性質的革命——而舊型的民主，是資產階級在聯合工農各社會階層的力量去推翻了封建地主的統治以後，獨佔了革命的果實，因而舊型的民主，即是資產階級專有的民主，或者說，即是資產階級專政。至於新型的民主，其革命性質雖然仍是資產階級性的，在革命成功以後的革命的果實，則不能爲資產階級所獨佔，而爲各革命階級——尤其是工農階層所分享，換言之，即其政治領導或國家權力的行使，不是資產階級能獨佔的，而是各革命階級所分享的，因而新型的民主，決不是資產階級專有的民主，而是各革命階級各革命黨派的聯合政權。

各革命階級各革命黨派共同起來完成了反法西斯的新型的民主革命，他們又能以共同的力量佔有新型的民主革命的果實，這是新型的民主不同於舊型的民主的一個特點。在新型的民主革命過程中，各革命階級的力量，尤其是工農階級的力量，亦即眞正人民的力量，在不斷的生長，壯大，乃至使人民的力量與反人民力量的比重，發生基本的轉

化，最後必然要由人民的力量來決定一切，這又是新型的民主與舊型的民主不同的一個特點。

蘇聯受到德寇法西斯猝不及防的進攻，終於扭轉千鈞一髮的勝敗形勢，以至最後致勝，所靠的不是別的，是蘇聯人民的力量，美英也在歷經挫敗之後，開始轉守為攻，生長抗戰力量，這種力量不是別的，也是人民的力量，歐洲許多被佔領國，德寇法西斯的附屬國，乃至中立國家，於某些反人民力量出賣祖國，某些反人民力量流亡異域，某些反人民力量標榜中立之下，人民自始至終沒有屈服，他們在地下生長了他們的力量，組織了他們的游擊隊，發動了血與火的，法西斯戰鬥，像南斯拉夫鐵托元帥所領導的，自由法國戴高樂將軍所領導的，尤其是法國內地軍為柯寧將軍所領導的，這是大衆週知的事，其他像希臘、波蘭、羅馬利亞、保加利亞、荷蘭、比利時、隨着盟軍的進展，無一處不是由本地人民力量起來迎接了勝利。

如果民主革命戰爭的性質，是支配了今天的一切，決定了今天的一切，人民力量的逐漸生長，強大，便保障了今天的一切，鞏固了今天的一切，在人民力量的控制之下，是沒有任何一個民主國家，敢於中途破壞團結，不把反法西斯戰爭進行到底的。在人民力量控制之下，是沒有任何一個民主國家，敢於造成新的對立，醞釀反蘇陰謀，像小諸

了玩火一樣，自己燒自己的手的，在人民力量的控制之下，蘇聯更加能從容完成其兩個戰略階段的任務，首先在世界範圍內爭取新型的民主主義的勝利，以便把革命向下一戰略階段發展，而無所爱發於冒然的明知其不可能爲上現實的赤化全世界。

在民主主義反法西斯主義戰爭過程中，動員了各階層人民力量的積極參加，也就決定了各階層人民力量的迅速生長。今天人民的力量，不僅是生長了，而且是強大了，強大到足以保障民主主義反法西斯主義的勝利，乃至戰後世界的永久和平。中國是世界之一部分，也作爲反法西斯戰爭的參加者，成爲民主國家之一員，對日寇法西斯進行了決到八年的長期戰爭。人民的力量也在不斷的生長，強大了，對日寇法西斯的最後勝利是沒有問題的，對於配合盟國把反法西斯戰爭進行到底，對於戰後世界永久和平的建立，也是沒有問題的。

但無論是蘇聯，無論是美，英，對於東西法西斯強盜的殲擊，差不多都由一個偶然的規律支配着，先行敗仗，後打勝仗；也可以說由一個必然的規律支配着，三個民主大國，民主反法西斯的力量，都由於政府的肯眞誠的動員人民的力量。卽都由於政府的民主化，把抗戰的力量從抗戰的艱苦過程中，一天一天生長，強大起來了，而中國則不然，中國在八年長期抗戰中，不是沒有生長，強大人民力量，但還不夠，由於這種原因，所

以在世界任何戰場——歐洲戰場，太平洋戰場——都在每天打勝仗的時候，中國的戰場，卻在中原失陷，湘桂繼之，而桂柳兩城又頻危殆的情況之下，發生極可焦慮的現象。

這無可疑，挽救這種危機，只有依靠人民的力量，只有民主的把人民力量動員起來，把大後方人民力量的萎敗，退縮，乃至阻礙，麻痺等奇怪現象掃除，使其能配合敵後的人民力量的生長，強大，在此千鈞一髮之際，準備強有力的反攻，扭轉最後的勝敗形勢。然而這怎樣才能夠呢？仍只有依靠人民的力量，只有民主的把人民力量動員起來，也由於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特點，中國人民力量在民主反法西斯的戰爭中，得到了生長，也受到了阻礙。因而在其他民主國家，只有很單純的一個對外反法西斯的任務；而在中國，則較複雜的要奔雙肩擔負兩個任務——對內爭取民主的任務和對外反法西斯的任務。對外反法西斯的任務，是民主國家共同的，對內爭取民主的任務，是中國單獨的，特有的，而在日寇法西斯雖受同盟國嚴重的懲創，日寇法西斯尚能垂死掙扎在中國戰場發揮兇性，最後絞殺中國反法西斯戰爭，因而影響整個反法西斯戰爭的時候，中國人民對內爭取民主的任務，是遠較對外反法西斯的任務尤為重要的（至少是一樣的重要）。

所以如何實現民主以及實現民主的具體辦法，便成為今日惟一嚴重迫切的課題。

如何實現民主？實現民主的具體辦法是那些？這已不是枝枝節節頭痛醫頭，脚痛醫脚的辦法所能奏效了，也不是空喊一陣和假幾個人等領導與無稽幻想所能爲力。一切只有依靠粗糙大手的人民站起來，親手操着民主的所有權。人民自己參與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各種設施。換一句話說，人民自己掌握對外抗戰，對內實施民主的機構，民主的真諦，才能發揮，民主的政治方案，才能實現。

在八年長期抗戰過程中，中國人民力量雖然生長，強大得還不夠。雖然發展得不平衡。但在全世界民主主義反法西斯主義的幾個勝利中，在全世界人民力量生長，高大起來，足以保障，控制，沒有任何一個民主國家敢於中途破壞團結，不把反法西斯戰爭進行到底，沒有任何一個民主國家敢於造成戰後新的對立，醞釀反蘇陰謀，而蘇聯又能從容完成其兩個戰略階段，爭取新型的民主主義的勝利的情況之下，中國人民力量一定不會太弱，中國人民力量一定能徹底解決中國當前許多盤根錯節，光怪陸離看起來好像地老天荒都得不到解決的一切問題。

該死的死下去，該生的生出來，人民是最後的判定者，我們把一切交給人民吧！

十七　只有人民是最後的公斷者

——讓人民的聲音被大家聽見——

一切都是有尺度的，而一切人事（亦即社會現象）最準確的尺度（如是非，曲直，善惡等道德上的尺度，民主與反民主，一黨一派專權與各黨各派聯合政權等政治上的尺度），一定是人，一定是大多數的人，老實說就是人民。一月三十日益世報社論說：「使我們痛心的，就是一些人的功利思想，毀滅了他們應有的責任感。社會本有是非，但他們不講是非，他們明知道某些事於國家有利，也知道某些事於國家有害，但他們所斤斤計較的，却是個人和團體的利害，而不是國家民族的利害。在政治上他們會喊口號，但行爲却與他們喊出的口號不相干，自己在磨擦，却駡人磨擦；自己在破壞團結，却駡人不團結，反視箇呼籲團結」。這些現象，言之也真令人痛心；但這在人民心中總有一個尺度的，究竟誰在磨擦？究竟誰在破壞團結？究竟誰在只顧一黨一派私利不顧國家民族公利？最後由人民拿出尺度來量一量——最好由人民加以公斷。

該社論接着說：「強調民主政治的人，實際就是最不民主的人。要求自由的人，實際就是在自己的勢力範圍裏，最不使人民自由的人。他們一開口就是人民福利，但他們心目中的人民，就是自己的「一派」，自己的「黨」，而所謂人民，祇是供他們成功的芻狗，至於國家，不過是供他們少數人馳騁分贓的舞台」。這也夠痛心，但這在人民心中也總有個尺度的，究竟強調民主政治的人，實際是否就是最不民主的人？究竟要求自由的人，實際是否就是在自己的勢力範圍裏最不使人民自由的人？也應該由人民拿出尺度來量一量，最好也由人民加以公斷。至於說「人民祇是供他們成功的芻狗」，亦即供他們一黨一派成功的芻狗」，這卻太看不起人民，而且太侮辱人民了。古人說：「民猶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人民自古已是國家主人。

該社論接着又說：「更使人痛心的，這種人的行爲表現，本已十分明顯，但有些自命在言論上具有權威的人，却不認爲這是罪惡，反而隨聲附和，如像在內心對他們之能橫衝直撞，在欣賞，在豔羨，他們自稱不顧國家亂，但却在民主的口號下，造亂源，他們最會迎合社會的幼稚心理，是非可以不管，因爲一講是非，難免會有人說他們偏在一方，這未免太不生意！實際不管有意或無意，他們已在爲騙子張目，也許是不想偏於一方，但已在偏於一方了」。這才真夠「更使人痛心」！究竟誰「好」誰「壞」？究竟「

隨聲附和」的是「罪惡」，這是天理？究竟要求「民主」的人是否「禍亂源」的人，究竟誰「偏於一方」？究竟誰爲「騙子」面目？更應該由人民拿出尺度來量一量，更應該要求人民加以公斷。因爲人民的尺度，才是客觀的眞理，個人再高明些，怕不免仍是主觀作用。

該報社論說：「什麼叫肓倫道德？那就是爲對公衆負責，對國家民族負責。」「我們最愛護自由，但它必須是民族的自由，每個人民的自由，而不是少數玩弄政治的人們的自由，我們也最愛護民主，但它也必須是眞正主權在民的民主，而不是一個或少數政黨包辦的民主。」但可惜作者接着說了這樣一句：「我們看在國家民族的面上，承認今日的『一黨專政』。」『既說』一個或少數政黨包辦的民主，都是與國家民族利益不相容的，而又說：「我們看在國家民族的面上，承認今日的『一黨專政』」，這種思維邏輯我就不懂了。作者口口聲聲「公衆」、「民族」、「國家」、「道德」好像也甚尊重客觀眞理，但必需知道公衆、民族、國家、道德等等，都不是抽象的，沒有無人民的「公衆」，也沒有無人民的「民族」與「國家」，更沒有無人民作尺度的「道德」。只有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交由人民公斷，你我才可以都不必多費唇舌。

美國前副總統華萊士提出了「人民的世紀」這一象徵人民至上的輝煌詞句。人民的

力量的確在此次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砲火中，熔鑄成了歐洲一些新國家新政權。如果從正式臨時政府成立之日起算，則從去年（一九四四年）六月二日法國民族解放委員會改稱正式臨時政府算起，到現在僅僅八個月時間，歐洲就有法蘭西、意大利、比利時、南斯拉夫、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波蘭等新國家新政權出現。這個最初由黨派會議發動民主團結抗戰，一直到各黨各派支持的民主團結建國，決不是偶然的，各黨各派各果在人民共同一致要求反對法西斯侵略，建立獨立自由的新民主國家之下，就不能不毅然決然放棄「一黨一派的私利」，放棄各黨各派不同的政治意見，放棄個人的野心而慾，服服貼貼跟着人民走。像這樣明智的果斷態度得最卓越的成功的，是法蘭西的戴高樂將軍。

戴高樂將軍於貝當叛賣民族利益簽定康邊森林協定之第二日，隻身出走倫敦，領導自由法國運動，最初不過一亡國之後的「難民」耳，乃自由法國，而戰鬥法國，而民族解放委員會，每向前走一步即與國外內地抗戰人民抗戰黨派接近一步，每與抗戰人民、抗戰黨派接近一步，即將他的政權基礎、個人地位擴展一步。前年（一九四三年）六月三日「戴吉談判」簽字，在阿爾及爾成立法國民族解放委員會，由民族解放委員會成立到去年（一九四四年）改稱正式臨時政府以後，中間曾經改組三次，第一次改組在前年

合（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九日，參加了各黨各派，共產黨人也被邀參加，但以其爲請客式的，法共拒絕出席）。去年（一九四四年）四月一日進行第二次改組，各黨各派參加政府，取得共同主人資格，法共格魯尼、比勞二人亦由其中委會批准，代表法共出席新委員會，參與一個重要國家之決定。等到改稱正式臨時政府後，於去年（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三日，巴黎由內地軍解放，人民力量特別高漲，以各黨派尚未盡量容納，又於同年九月十一日，重新進行在民主原則下的第三次改組，這才充分容納各黨各派乃至文化、工農界抗戰有力代表，而新法蘭西的新民主聯合政權，也才最後完成。世界上有眼睛的人，都看得很清楚，正是在這種不斷接近人民，容納各黨各派抗戰人士，實行民主團結的基礎上，戴高樂將軍個人和法國人民乃至國家地位，才一天一天增漲、擴大、鞏固起來，湔洗了亡國的恥辱，擺脫了四年的苦難，而獲得今天的新生，並恢復了法國民主革命的光榮傳統。

「戰鬥報」載一月二十七日社論，「我們的國是主張」一文，乃有如下的說法：「我們近四戰爭所謂建立聯合政權與召開黨派會議的時局主張，據提出這一主張的人說，目的在自救有收，在加強團結，一在與同盟軍的勝利局面相配合。現在人人皆治，人人在對抗戰建國的前途關切關係，像這樣的主張，——也許能迎合於干不求甚解與企求偉離之人的

對於心理・但我們有血性，有良心，還有理智，對這樣的分贓主義，我們絕不贊同一。[illegible]者以[illegible]的口號下說：「聯合政權」就是有力的政權嗎？「黨派會議」就能代表國民的公意嗎？聯合政權的目的，與分贓政權有什麼不同？所謂黨派會議，是否就是少數投機分子的[illegible]合，企求爭取個人的勝利？這在[illegible]沒有事實表現之前，我們不敢妄[illegible]過[illegible]些問題只有誰能解答呢？我以為只有人民能解答，因為這在人民的心中，[illegible]

[illegible]

我堅決相信只有人民是人事最準確的尺度，一切人事問題的最後解決，也只有人民享有這個權利。所以凡屬本文範圍，最後如有任何見教之處，恕不作答。因爲假令盡我的精力再有所解答，對方也不肯承認這就是最後的客觀標準，公正的解答，還是交付廣大樸實的人民吧！讓人民的群情被大家聽見！

十八 人民的世紀

社會發展的歷史，基本上就是物質財富生產者本身的歷史，亦即人民大衆本身的歷史；或者說歷史就是由人民大衆依循着歷史自己運動的規律創造出來的。但人民創造了歷史，而歷史的過去紀錄上，却只有過奴隸主人的世紀，封建領主的世紀，資本財閥的世紀，一言以蔽之，却只有過暴君、獨夫的世紀。一直到今天，人民才從暴君、獨夫的世紀，慢慢翻過身來，摧毀它、粉粹它、而自己創立自己的世紀，這正是美國副總統華萊士所說的『人民的世紀』。

『人民的世紀』的眞實意義，是人民一面在創造歷史；一面就在支配歷史，他是歷史本身的眞正創造者；同時，也就是歷史本身的眞正主宰者。爲着人民大衆眞正的永久的共同利益，共同幸福，在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的各方面，人民有最高和最後的發號施令權。不待說，人民在政治生活方面，可以管理國家，組織政府，起碼可以自由選擇政府。大西洋憲章第三條決定『尊重各民族自由決定其所賴以生存之政府形式之權利』，此即人民可以自由選擇政府之公開宣言。此外，羅斯福所標舉之四大自由，已經深深印

在全世界愛好自由人民的腦海裏，最近（本年八月二十八日）邱吉爾告訴意大利人民「什麼是自由」的問題，又標舉出七個重要標準：「一、人民是不是有自由發表言論反對或批評他們政府的權利？二、人民是不是有推翻他們所不贊成的政府的權利？人民能不能合法得到實現他們意志的立法方法？三、人民的法庭能不能發行政力量的干涉？四、這種法庭能不能執行在人類心目中看作與守禮，公正兩大廣泛原則符合的公開而穩定的法律？五、無論貧富或私人及政府官吏是不是都能夠得到公平的待遇？六、是不是每一公民對他的國家應盡責任的各種權利，都能夠永久維持，保護並且增強？七、是不是普遍自食其力維持一家生計的農工都能夠避免一黨控制下的祕密警察組織的威脅？」（如德西斯納粹的政治警察就是一例）這七個標準，是自由與不自由的標準，同時，也是法西斯與民主的標準，更是是否「人民的世紀」的標準。在「人民的世紀」裏，一切是人民在那裏發號施令，再不是暴君獨夫或政府在那裏發號施令，是人民大衆為着他們真正的永久的共同利益，共同幸福，要政府跟着人民走，再不是政府，尤其不是暴君獨夫為他們的私圖，要人民跟着他們走，總之暴君獨夫或政府的至高命運，都繫在人民手裏。

不是的，就是在過去的世紀中，暴君獨夫的命運，也未嘗不決定於人民，「秦為無道，二世而亡」，即其顯例。然而那時人民之決定暴君獨夫或政府的命運，是消極的，被

動的，不自覺的，暴君獨夫不顧人民大衆的死活，激起了人民原始的反抗，去了一個暴君獨夫；又來一個暴君獨夫。今天人民之決定暴君獨夫或政府的命運，是積極的，主動的，自覺的，政府不能跟着人民走，激起了人民不能忍受不能抑止的自覺的憤怒，人民就要把違反人民利益的暴君獨夫或政府，永遠拋擲在歷史的拉圾桶去，使它再也不能死灰復燃。

在經濟、政治、文化生活的各方面，都是人民在那裏發號施令：爲着人民自己眞正的，永久的共同利益，共同幸福，要政府跟着人民走；暴君獨夫或政府的全部命運，都拿在人民手裏；人民積極地，主動地，自覺地排斥和摧毀那些違反人民利益的暴君獨夫或政府，這便是「人民的世紀」及其主要的基本特徵，這也便是「民主主義」「或民主」的基本的主要特徵。

不過並不是歷史上有了形式上的民主主義，即由法律條文所表現的民主主義，歷史上便有了「人民的世紀」，如說「近世各國所謂民權制度，往往爲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爲壓迫平民之工具」，則顯爲形式上的民主主義與眞正「人民的世紀」之不相符，而眞正的民主主義，必需是實質的，普遍平等的，眞正的「人民的世紀」，必需所謂民權，是爲「一般平民所共有，而非少數人所得而私」，民主主義的發生已有將近四百年的

歷史（如從十六世紀後半期尼德蘭的民主革命算起），而眞正的民主主義，或者說新型的民主主義——從國內的民主擴展到國際的民主，從政治的民主擴展到經濟的民主主義，亦卽眞正的『人民的世紀』，實在說起來，只是在最近幾十年內才發其端。（約爲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把人民的粗壯身體鍛鍊得更加強固，人民的熱烈心腸鼓動得更加熾熱，人民坦白純潔天眞的正義感和人類同胞愛，激發得更加坦白純潔天眞，是黑暗就打破它，是敵人就消滅它，有胆有識的劃分時代，有權有力的支配歷史，有勇有謀的對付那些暴君獨夫和違反人民利益的政府，而最後決定他們的命運——這才是眞正的『民主主義』。眞正的『人民的世紀』，恐怕還是這空前慘酷悲壯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砲火——全世界民主主義反法西斯主義的砲火中所支付的幾千百萬人民生命血汗的代價吧！

歷史上暴君獨夫的世紀，人民與政府的關係，顯然是不一致的——兩樣的，對立的——一邊是奴隸主人，一邊是奴隸；一邊是封建領主，一邊是農奴或農民；一邊是資本財閥，一邊是僱傭工人，但任何與人民不一致的政府，却都自命爲『體天行道，仁民愛物』的政府，自命爲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同時把社會、國家、民族等等，也僞裝或粉飾爲和諧、平等、毫無利害衝突之整體，而政府則尤爲超出於此整體上的公斷者。這樣一種僞裝或粉飾，使得今天有些國際觀察家們，在觀察某一國家時，還不能把某一國家

和其政府與人民分別來看，而把某一國家的政府就代表某一國家和某一國家的人民，如把希特勒德國代表整個的德國，或把某些國家政府的無能、反動、不民主，對反法西斯任務的不積極，當做某些國家人民的無能、反動、不民主，對反法西斯任務的不積極。這眞是一種不可饒恕的錯誤。很顯然的。（被略）

然而暴君獨夫的偽裝、粉飾，決不是徒然的。他們曾經用種種花言巧語，把自己裝點成代表一切，公斷一切的整體，同時，也把自己神化爲「體天行道」的超然象徵。這樣便掌握了人民的全部命運，迫使人民無條件地跟着他走，在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的各方面來對人民發號施令；而又不對人民負任何責任，（只對天或上帝負責任）。人民在被壓榨得不可能生存的條件下起而反抗時，就是「造反」，就是「叛逆」，就是「犯上作亂」。這種情形，在歐洲歷史上，只有一六四九年一月三十日，英國人民英勇的判決英國皇帝查理士第一的死刑，一七九二年九月二十日，法國人民英勇的把法國皇帝路易十六送上了斷頭台以後，這才不客氣的揭穿了暴君獨夫的偽裝、粉飾；這才很鮮明的把歷史倒轉過來，人民要課政府以責任，人民不僅有權批評，反對政府，人民還有權推翻他們所不贊成的政府——即人民有權革命，自此人民起來革命的就風起雲湧了。在亞洲歷史上，一九一一年，中國人民也起來推翻了滿清政府。這就是人民起來要求自己

的政府與要求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不許僞裝、粉飾。任何政府如果不是人民自己的政府或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人民就不要他。這就是「人民的世紀」，「和暴君獨夫的世紀」的不容混淆的界線。

不過如前所說，這裡眞正的「人民的世紀」，不是一開始就把人民的力量表現得那麼壯大結實的，只在這次全世界民主主義反法西斯主義的砲火中，才在支付了幾千百萬人民生命血汗的重大犧牲中，人民壯大結實的力量，才在每個新的暴君獨夫——如希特勒，墨索里尼等傢伙的面前經歷着重大深刻不容假借的考驗。不要說，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的各方面，都要由人民在那裏發號施令；不要說，暴君獨夫或政府的全部命運，都掌握在人民手裏；自然任何政府就必須都要跟着人民走，不管你是忠實的或者是虛僞的，不管你是自願的，或者是被迫的，如果你能跟着人民走，你就能生存；否則便只有被歷史抹去你的名字。看吧！希特勒，墨索里尼之流，率直的，公開的，爲着金融寡頭或軍火大王，鋼鐵大王等少數人的利益，站在與本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相反的方面，張開血口肆其貪饞，企圖奴役全世界，建立法西斯匪幫的新秩序，他便當然只有自取滅亡，自絕於人類。今天全世界民主國家的人民，乃至德意日本國的人民，正以雷霆萬鈞之力，進行撲滅法西斯野獸的工作，墨索里尼早經跨台了，希特勒的末日也迫在眼前，

日本強盜的命運，又何能久延？

最近（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五日）羅馬尼亞對德宣戰，向盟國投降，開始了法西斯匪幫附庸國的解體。緊接着是保加利亞向英美提出議和，匈牙利也在改組政府，醞釀改變，整個巴爾幹，在紅軍勝利及其本國人民壓迫之前，表現出極不安定的狼狽失措，北歐一角的芬蘭本早經動搖，但還在掙扎，今日（一九四四年九月五日）報載，正式提出與蘇聯休戰，也就是到了不能不作最後決定（非投降不可）的時候。尤其是目前接二連三一串的消息，都是法國內地軍起義，佔領巴黎，維琪等中部城市，貝當、賴伐爾傀儡政府解體，比利時、荷蘭、以至挪威的法西斯統治，在人民英勇反法西斯鬥爭面前垮台的垮台，搖擺的搖擺，在在都證明着人民力量之不可侮。

此外還有墨索里尼垮台以後投降盟國的巴多格里奧政府的遭遇及其崩潰過程，也表現了人民力量之最後勝利。同時，還顯出人民是不可能長久受欺騙的，因爲以半法西斯僞裝出現的巴多格里奧政府終於被人民趕走了，這都是一面一面亮晶晶的鏡子，值得一切違反人民利益的或類似南、希、波流亡政府，乃至巴多格里奧政府者，引爲殷鑒。

我們先從南斯拉夫說起，南國在被法西斯頭子希特勒的閃擊打垮以後，國土淪陷，人民飢溺，彼時，除與德寇勾結的陸軍部長米海洛維奇外，南國政府即流亡在埃及首都

開羅，三度連任開羅南國流亡政府軍政部長的米海洛維奇，自然是南國最卑劣的民族叛徒；他在南國除與納粹勾結外，並專門殺害人民抗戰的勢力，即由南國地下發展起來的游擊軍。南國的游擊軍，最初當然是一支不大的人民軍隊，可是由於鐵托元帥的正確領導，雖然受到納粹軍隊與米海洛維奇軍隊的內外夾攻，反而一天一天成長和發展起來了；最近他已發展到三四十萬人，而且在與蘇聯軍隊會師之後，更可能無限的發展，只有他們才是認眞從事爭取自己祖國獨立自由的人民力量，而反對法西斯鬥爭的貢獻最大。據英國首相邱吉爾的報告：「他們所抗擊的敵人的數目，要比美國第五軍和英國第八軍在意大利抗擊的敵人多得多。」因此，在去年（一九四三）十二月間就成立了以鐵托元帥為主席的南斯拉夫的民族解放委員會，這便是雛形的南斯拉夫臨時政府，它團結了各社會階層、各黨派、各民族、各宗教的民主力量；它頒佈了保障人民言論、思想、集會、結社各種權利的民主憲法；它建立了各民族平等的聯邦制度，它是新型的民主主義的政權，也就是全國人民大衆的政權，這種人民政權的政府當然就是人民自己的政府。由於人民自身力量的成長和發展，南國人民自己的政府，不僅得到本國全體反法西斯侵略人民的支持和讚擁，而且得到全世界反法西斯侵略的各國人民及其代表人民的政府所支持和擁護。蘇聯是不待說的了，英美也一天一天的認識了它的力量，表示和它密切合作

，給以積極的援助。自去年（一九四三）七月起，英美就正式承認了南國人民解放軍，此後英美蘇三國與南國人民政府互相派出了軍事代表團，建立了廣泛的聯繫和接觸，而南國流亡政府呢？却一直袒護人民公敵米海洛維奇，反對人民愛戴的領袖鐵托，甚至做了納粹或希特勒的應聲虫，硬說南國人民解放會議（南國臨時政府的前身）是蘇維埃政權，硬說南國人民解放軍是共產黨軍，這樣與南國人民利益不一致的政府，甚至與人民為敵出賣南國人民利益的政府，當然要為人民所拋棄，只好徘徊躑躅於國門之外。但他們還死不甘心，死不肯放棄高高在上的政府地位，然要謀取政府地位的存在，就得跟着人民走，不管是自願的還是被迫的。最後方由南國國王彼得出面，毅然決然改組流亡政府，以剛從美國回來的蘇伯西奇組織新內閣，而蘇伯西奇担任組閣的條件，就是能免米海洛維奇的陸軍部長。并聲明：「任何流亡政府，如不能獲得在祖國領土內奮勇抗戰的人民的承認，則不能成立」，在新閣組成後，蘇伯西奇本人立刻潛赴祖國領土內解放區去和鐵托元帥會商合作的辦法。蘇伯西奇與鐵托在今年（一九四四）六月十六日簽定了協定，規定南斯拉夫現政府（亦即流亡政府）必須以進步的民主分子組成，必須以幫助人民解放軍為任務，南國臨時政府和流亡政府，共同任命一種機構以便合作抗戰，並儘速成立單一政府；至於國體問題，則留待將來人民作最後決定。這證明了什麼呢？恰恰證明：「

人民的世紀」，政府要跟着人民走，才能生存；暴君獨夫或政府的全部命運，都操在人民手裏；人民積極的主動的自覺的排斥和摧毀那些違反人民利益的暴君獨夫或政府。

其次，我們說到希臘。希臘自淪陷後，人民的勢力，也在他們自己艱苦奮鬥中長成，代表這種勢力的希臘民族解放陣綫，是在納粹軍隊進攻佔領希臘後一個月便成立了的。它的目的是不要軟劣無能的政府，反抗法西斯侵略，解放祖國希臘，建立人民自己的政府。它也同一般地下運動一樣，首先組織了人民自己的游擊隊，漸漸發展爲人民解放軍，在極端艱苦危險的環境中，反抗打擊法西斯侵略者：它網羅、團結各社會階層、各黨派、各民族、各宗教的民主勢力，得到了全國人民的擁護。因此，希臘的民族解放陣線，便在人民大衆的支持和擁護之下，很快地就更進一步發展爲希臘的臨時政府。但希臘在被佔領後就出亡在英國倫敦的流亡政府，對於這些留在祖國領土內抗戰的人民力量怎樣呢？他們不但不支持，贊助他們，反而忽視，甚至仇視他們。試看正如吉里摩柯斯所說：「整個解放運動，不但被忽視，而且被阻擾着。在國外，對於爲自由而奮鬥的英勇戰士們的目的，竭盡造謠誹謗的能事，說他們的目的是險惡的，無政府的」。還不只此，希臘流亡政府並拉攏一部分在國內趁伙打刼的盜匪式的「游擊隊」，來反對民族解放陣線領導下的解放軍，造成內部摩擦，幫助敵人，這種下流的把對內看做比對外更重要

的政策，眞是一種『可嘆的政策』（「宗教論壇」指摘希臘流亡政府語）！但人民的力量，是不可能抗拒的，與人民爲敵的流亡政府，自不免爲人民的力量所拋棄的時候，希臘流亡政府也和南王彼得一樣，終於被迫不能不開始改變自己的作風，希臘流亡政府在不長的時間，曾經過兩度的改組。最後，著名反動的維居希洛斯內閣於本年四月二十六日提出總辭職，希王另行任命社會民主黨領袖裴邦德里歐組織新閣，新閣組成後，裴邦德里歐，即於本年五月下旬和參加希臘臨時政府的各黨派在黎巴嫩山舉行會議，以謀全國的團結合作，在會議未舉行前，英外相艾登於月十日在英下院報告，對於這一會議，寄與無限希望。他說：「希臘內閣總理將與各政黨和抵抗組織舉行會議，旨在成立國民政府，充分代表愛國分子的意見，英政府甚盼希臘總理能順利促成基礎鞏固的政治團結。」這種會議的目的，原是代表希臘人民利益的各黨派所一向要求的，他們必然會一致擁護這種會議的圓滿成功，所以參加會議的共黨代表盧索斯等首先向英首相提出保證說：「我們決將竭盡全力，以求民族統一目標的實現」。會議的結果，據倫敦太晤士報說：「至少已成立了友誼的保證」，但據近所傳；黎巴嫩會議之後，希臘政府及其國王仍是一再違背諾言，形成了目前僵持之局，按照黎巴嫩協定，國王和首相，在國民公決是否要他們回國之前，不得回國；可是現在希王又在說他在考慮是否將在

公民投票以前回國了，這是僵局的原因之一，其次，希臘流亡政府，依靠其他方面的幫助，把國外的希臘海陸軍人中贊成民主，贊成代議制政府的人大批逮捕，打算恢復舊觀的王公大臣們正在作最後努力，企圖使人民無法掌握自己將來的命運，這樣，自然要造成為目前希臘團結反法西斯共同任務的暗影，但祖國及整個巴爾幹都已是人民戰勝一切火放光明的今天，希臘流亡政府最後也只有跟着人民走才能生存，否則，只有長期的永久的徬徨蹓躂於國門之外。

最後，又如意大利這個軸心國家，去年七月二十五日墨索里尼垮台後，它的最初政權，是以巴多格里與半法西斯政權，代替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權，當此之時，巴多格里與自以為是做了很大一件事，可以滿足人民的要求，在斯國的改良政策之下，可以用一套敷衍的辦法來穩定他半法西斯政權，但意大利人民要求巴多格利與把一切法西斯賣國賊處死，洗刷，肅清軍隊和國家機構中的法西斯分子，對納粹德國立即作戰，并採取與蘇英美盟國友善合作的忠實政策。「自由米蘭」於一九四三年九月十日，向意大利人民廣播的最後一段說：「意大利今天需要的政府，是公開而毫不遲疑地保衛意大利，反對希特勒侵略的政府；如果巴多格里與採取保衛民族的政治路綫，人民是擁護他的。但我們有權利要求政府要倚靠人民，信賴人民，把民族中一切健康的力量團結在政府的

周圍，政府的一切措置，其目的要是真正的在組織反德反法西斯鬥爭，那必定會得到一切公民的擁護。同時，我們希望政府以激烈的辦法來根絕法西斯和德方的第五縱隊，我們希望政府立即恢復民主自由。這樣，人民才能組織起來，發展爭取國家生存的鬥爭的主動性，立即把墨索里尼、齊亞諾、博台、格蘭第，以及其他一切法西斯賣國賊處死，激烈的洗刷軍隊和國家機構，驅逐法西斯第五縱隊，立即沒收國內的德人及其走狗的一切財產，採取和民主盟國英蘇美友善和合作的忠實政策，反對意大利的敵人希特勒和法西斯主義」，這顯然是巴多格里奧的半法西斯政權所不能辦到的。因此，在今年（一九四四）三月十二日，意大利人民又舉行了意大利解放區空前盛大的公開的羣衆大會，意大利反法西斯各黨派，亦即意大利各民主政黨，如行動黨、社會黨、共和黨、共產黨等，一致斥責國王和巴多格里奧，通過決議，要求肅清包括國王愛麥虞限在內的現政府，成立由反法西斯各黨派組成的真正的人民的政府，這樣，雖然迫使巴多格里奧不能不與各黨派談判，不能不在政府內容納各黨派民主分子——不能不改組內閣；但因為在半法西斯的本質上，巴多格里奧不能不是徹底反法西斯和建立人民政權的障礙，終於不能不為人民所趕走。溯自墨索里尼垮台以來，意大利人民就在繼續不斷的鬥爭，繼續不斷的要求肅清軍隊及國家機構中的法西斯分子，巴多格里奧與半法西斯的偽裝，終於不能遮掩

人民的耳目，終於因爲不能很忠實的跟着人民走，爲意大利人民起來積極地主動地自覺地把他趕走了，現在代巴多格里奧而起的，是波諾米內閣。波諾米本人雖然在墨索里尼羅馬進軍時，也犯過拱手把政權讓給墨索里尼的嚴重錯誤，但他并不像巴多格里奧那樣，長期的參與過法西斯政權而助長其罪行。并且以他爲首班而組織成的新內閣，總算比較切實的包括了各黨派的領袖，共產黨領袖愛爾柯里也出任不管部大臣。各黨派及共產黨也參加了這個政府，其意義不是單純的因爲它是一些黨派，一個政黨，而是因爲他們代表着廣大的人民，人民決定一切，人民不僅反對率直的公開的暴君獨夫如希特勒、墨索里尼之流，人民不僅把南、希、波不跟着人民走的流亡政府，拒絕於國門之外；即使投降過來的，裝着跟人民走的半法西斯，如巴多格里奧之流，也逃不過人民徹底肅清法西斯的燃犀之明，終於把他趕走了。

這眞是值得接受的教訓，這眞是值得認識的力量，這眞是不同於「暴君獨夫的世紀」的「人民的世紀」。

在這「人民的世紀」眞正到來時，這幾年來，歐洲是一片的血；同時，也是一片的火，暴君獨夫如希特勒、墨索里尼之流，用血淹沒了整個歐洲；歐洲人民也就以反抗的怒火來回答它，在這遼闊寥漠的舊大陸上，從納維克直到雅典，從法國沿海直到喀爾巴阡

由，到處都掀起了人民反暴君獨夫反法西斯的怒火，歐洲淪陷被佔領國家，如南、希、波等國的人民力量，我們已經樣詳細的說過了，此外還有戴高樂將軍領導下的法國民族解放委員會及內地軍，還有貝奈斯總統領導下的捷克人民自己的政府，丹麥，比利時，荷蘭等國，地下愛國人民組織，也在繼續不斷的鬥爭着。就是希特勒最接近最忠實的附庸，如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這些國家的人民，也一直沒有放下武器，停止鬥爭，在匈牙利賣國賊霍爾綏的週圍，已經織成了一座人民憤怒的鐵牆，在所謂「敗窮」的喀爾巴阡烏克蘭，兩年前就有一枝國際的遊擊隊，在那裏活動，在羅馬尼亞的迭蘭西里瓦里亞省和摩爾達維亞省，大批的逃兵、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也組織了游擊隊，進行着英勇的鬥爭。在保加利亞，擁有二十年光榮鬥爭歷史的「勞工同盟」，團結着全國人民，組成了民族陣綫，進行着反對索非亞「吉斯林」集團的艱苦的鬥爭。此外，在西班牙、葡萄牙等中立國家，反法西斯，反暴君獨夫的力量，也是一樣的不可侮。

看吧！這是多麼波瀾壯闊的江河巨流，這是多麼強大而不可抗拒的人民力量。它象徵着「人民的世紀」的光輝。在「人民的世紀」光輝之前，任何暴君獨夫，任何反動政府，都將要現出它的原形，露出它的狐狸尾巴，世界雖然是很廣大的，他們的最後避難所是無處可以尋覓了。

十九 人民的政權

人民的政權，是「人民的世紀」的一個最主要、最基本、最鮮明具體的標記。如果沒有人民的政權，人民的世紀，就只是一句空話。我在前著「人民的世紀」一文裏，曾說：「人民的世紀的真實意義，是人民一面在創造歷史，一面就在支配歷史。他是歷史本身的真正創造者；同時，他就是歷史本身的真正主宰者，爲着人民大衆真正的永久的共同利益，共同幸福，在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的各方面，人民有最高和最後的發號施令權」。接着又說：「在「人民的世紀」裏，一切是人民在那裏發號施令，再不是帝制獨夫或政府在那裏發號施令，是人民大衆爲着他們真正的永久的共同利益，共同幸福，要政府跟着人民走，再不是政府，尤其不是暴君獨夫爲着他們的私圖，要人民跟着他們走。總之暴君獨夫的全部命運，都拿在人民手裏」。

「人民的世紀」的真實意義，既是這樣，然則「人民的政權」的真實意義又該是怎樣的呢？我以爲（一）它是由人民自己創造出來的政權（由人民自己打出來的天下）；（二）它是真正掌握在人民自己手裏的政權（非任何民賊獨夫所能竊據）；（三）它是

時時刻刻不放鬆的緊緊的密切的依靠人民自己的全部力量保障其實現、生長、鞏固、發展（離開了人民、沒有人民真實力量的支持，它就要夭折）；（四）它是為人民大眾真正的永久的共同利益，與福利而奮鬥的，——換句話說：它是為人民服務的（它是人民的勤務員）。

這樣的一種「人民的政權」，它必然要有其理論基礎，它的理論基礎，就是新型的民主主義；它必然要有其實踐形態，它的實踐形態，就是各黨各派的聯合政府或聯合政權；而且它必然還要有其一定的歷史背景，它的歷史背景，是由於資本主義經濟體制的沒落，引起了舊型民主的沒落，因而需要有新型民主的改革。而它的產生，可以說在這次全世界民主主義反法西斯主義戰爭以前，亦即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就在歐洲的政治舞台上，有過若干嘗試。例如希特勒納粹匪幫攫取政權以前，德國人民大眾為了阻止德國大資本所有者絞殺民主的陰謀而醞釀的人民革命的政權，就是一例；一九三六年西班牙共和政府反法西斯的人民陣線的共和國政權，又是一例；一九三六——一九三八年，以法蘭西各階層人民聯合組成的人民陣線為支柱的反法西斯反獨佔資本的勃魯姆內閣，是第三個例子。此外，還有第四個例子，例如芬蘭民主共和國的人民政府，在當時還提出了要實行如下的政綱：「一、建立芬蘭人民軍隊；二、設立國家對於大的私人銀行與大

的工業企業的監督，並實行幫助中小企業的設施；三、實行完全消滅失業的設施；四、減少工時到每日八小時，保證工人有兩星期的暑期休假，並減少工人與僱員的房租；五、沒收大地主的土地，但不觸犯農民的土地和財產，並把所沒收的土地轉交給無地或少地的農民；六、農民不償付所欠的賦稅；七、國家實行多方幫助來提高貧苦農民的經濟；首先是從所沒收的大地主土地中分給他們以加添他的土地，牧場，以及可能範圍內的供給家用的森林；八、實行國家組織機構與法庭的民主化；九、增加國家對於文化需要的津貼費，改組學校教育事業，保證工人及其他貧苦人民的子弟有可能入學，並且多方促進國民教育、科學、文學、藝術，在進步精神之下的發展」。（見人民政府宣言）這不僅是嘗試，而且相當具體化。不過它們都曾暫時遭受失敗了。只有經過這次全世界民主主義反法西斯主義戰爭的砲火，亦即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砲火，才把這個「人民的政權」熔鑄成器，而且一個跟一個的壯大，結實，更具體化起來。試看它一往無前波瀾壯闊的精神，表現在一九四一年八月十四日羅邱大西洋憲章裏面，表現在一九四二年一月二日廿六國共同宣言裏面，更表現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莫斯科會議公報及四國普遍安全宣言，以及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德黑蘭會議公報及其宣言裏面，再看它壯大、結實、具體化的實際形態，則表現在法蘭西、意大利、希臘、比利時、南斯拉夫、羅馬

尼亞、保加利亞、波蘭、匈牙利等所有從法西斯侵略解放出來的各國政權裏面，現在就請從這幾個國家新政權（亦即人民的新政權）的樹立，試開一篇流水賬單如下：

一、法蘭西——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盟軍開闢了西歐第二戰場。在第二戰場開闢前夜，即一九四四年五月十五日，法國民族解放委員會，根據國內抗戰運動的要求和臨時諮議會的決議，正式改稱法國臨時政府。但政府雖經改稱，政權構成成分是不能充分包括各抗戰黨派及團體。乃於本年九月十一日來了一次改組。二十三名閣員中，新參加九人，這是把國內外抗戰運動各黨派及團體的領袖都包括進來了。如狄龐、比勞是共產黨領袖，賴谷斯脫、巴洛第是總工會領袖，其他人員不是戴高樂派，便是其他中間黨派的人士。這在政權構成上，表示出來是全國民主力量大聯合的聯合政府。

二、意大利——意大利自一九四三年九月八日向盟軍投降，一九四四年六月四日盟軍攻入羅馬，意王遜位，太子安托衛為王儲，內閣改組，由巴多格里奧連任內閣總理；至七月，內閣又改組，由波諾米任內閣總理；至十一月二十六日，波諾米內閣又總辭職，幾經波折，於十二月十日，再由波諾米組成新閣，基督教民主黨領袖加斯巴萊任外長，共產黨領袖陶格利亞特（現任意共總書記）任副總理。內閣中包括自由黨五人，共產黨四人，基督教民主黨三人，勞工民主黨三人。經盟國意大利管制委員會正式批准，

新聯合政府正式成立。

三、希臘——希臘於一九四四年三月，原已宣佈成立希臘解放區臨時政府，臨時政府的主席兼外交委員爲巴吉爾吉斯（按即於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回到希臘組織人民解放軍者），其他委員，係自由黨議員集里密可斯，著名克里特游擊隊領袖曼蒂卡斯主校，共產黨議員錫安托斯，農業黨議員卡佐里尼斯等。同年九月經過一次改組，內閣中包括共產黨四人，其他兩個重要抗戰黨派代表各二人。同年十月十八日，希臘流亡政府總理巴本德里歐和英軍司令斯考比將軍一起回希臘，不久雅典發生了內戰，改由希臘大主教達馬斯基諾斯爲攝政，組希臘新政府，時在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年（一九四五年）二月二日，希臘新政府正式成立（不過這還不是一個爲人民所擁護的政府）。

四、比利時——比利時聯合政府成立於一九四四年九月底，比埃洛任總理，部長十九人中，天主教黨佔七人，社會黨五人，自由黨三人，共產黨二人，無黨派三人。

五、南斯拉夫——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三日路透電：南斯拉夫宣佈鐵托元帥和蘇伯西奇總理，已在今天成立協定（月前有南王彼得希圖推翻此協定之說）。雙方同意成立聯合臨時政府，並選舉國會。

六、羅馬尼亞——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塔斯社電：羅馬尼亞各黨派成立民主

陣線，商討組織聯合政府。同年十一月四日，路透社電：羅王已下令，宣佈組織新政府。又柏林五日廣播：羅馬尼亞新政府經過幾天的困難商討之後，已由史泰塔尼斯哥將軍組成，副總理爲葛洛查，史氏并兼陸長、內長兩職，前駐荷公使維維索加爲任外長。

七、保加利亞——保加利亞各黨派，也於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一日聯盟組織聯合新政府。新政府由攝政團三人及內閣總理喬琪也夫組成，外有不管部閣員二人，担負副總理的職務，此二人中一爲農民共和黨人，一爲共產黨人，內政部長伊凡諾夫，亦爲共產黨領導人之一。在新政府內，包括共產黨、農民黨、社會黨、過激黨、合作黨、及軍人同盟，共和同盟的代表。

八、匈牙利——匈牙利臨時政府成立於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該日路透電：匈牙利已成立臨時政府，由軍界，超黨派，名流學者，前議會議員及民主黨等知名人物聯合組成，密克洛斯中將任總理，卓尼基博士任外長，哲登尼博士任內長。

這是一篇流水賬，如果把它總結一下，我們就可以總結出：自去年（一九四四年）五月十五日法國臨時政府正式成立起到本年（一九四五年）一月二日希臘新政府正式成立（雖然這還不能作爲希臘人民一致擁護的政府）止，不到八個月的時間，而在炮火中湧現出的新政權，就有了八九個之多（這還只是概數，此外如芬蘭，捷克，實亦應算進

去。這決不是偶然的。

再，我們從這篇雖然是過於簡單的流水賬裏，還可以指出在各國樹立的新政權，有如下幾個共同點：一、這種新政權的產生及其成立的過程，都是從各該國人民反抗希特勒強盜，反抗國內國外的法西斯及一切親法西斯份子，在法西斯份子的血與火的鬥爭中產生出來以至於具體形成起來的。二、這種新政權一成立，立即發表成立宣言，在宣言中公佈其施政的民主綱領。三、這種新政權所包括的組織成分，都是各階級，各黨派的民主大聯合。這在上述各種新政權中，都有說明，不多贅。

這種新政權，亦即人民的政權，是否僅限於上述歐洲新產生的這幾個國家呢？不，決不僅限於這幾個國家，將來凡屬從法西斯侵略下解放出來的國家，或在法西斯政權被消滅以後的德國、日本、乃至反法西斯的民主大國如英、美、如中國、都將是這種新政權。並且最基本的理由或其根據，就是戰後的世界，必然是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世界，戰後各國的新政權，必然是各黨派各階級聯合的民主政權。

這裏我們似乎要把所謂新民主與新政權所以「新」的究竟，交代一下，它「新」到什麼程度，它「新」的內容怎樣？概括的說，就是新民主主義與新政權，它一面還不是蘇聯型的社會主義民主及其政權（這是最新型的民主與政權）；它另一面也不是歐美型

的資本主義民主及其政權（這是舊型的民主與政權）。這裏聯合政府與聯合政權，並不是一般民主的特徵，因爲蘇聯無產階級一階級與其共產黨一黨派執政的政權，仍是民主的政府與政權，且是最高級的民主與政權。歐美過去資產階級一階級與其政黨一黨派（在英國或是保守黨，或是自由黨；在美國或是共和黨或是民主黨）執政的政權，也是民主的政府與政權，不過是較形式的虛僞的民主與政權。這裏聯合政府與聯合政權，恰恰是「新」民主、「新」政權的特徵。因爲新民主與新政權的基本內容，正在於：就「新」民主說，它再不僅僅是政治民主，同時是經濟民主與社會民主；再不僅僅是國內民主，同時是國際民主，世界民主。民主是擴了的，是「新」的。再就「新」政權說，它再不是一階級一黨派來執行統治權力，政治領導，而是由各階級、各黨派來聯合執行統治權力，政治領導。政權是擴了的，是「新」的。任何東西都不是一種超歷史的奇跡，這就是說都有它的歷史背景，前面已經說過，新型的民主與政權，也是有它的歷史背景的，舊型的民主與政權，新型的民主與政權，最新型的民主與政權，都是一種歷史的範疇，或階段的實存，亦即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這是歷史的，這就是說它不能出現於那一歷史階段以前，亦將不能立足於那一歷史階段以後；這是歷史的，這就是說它並非一成不變，永遠如此。例如舊型的民主與政權，它是否定中世紀封建制而興起的資本主義時代

的產物；新型的民主與政權，它是否定沒落的資本制而興起的帝國主義階段的產物，即資本主義最後階段的產物，它完成了它過去的歷史階段所付與它的使命以後，將要消滅的是為另一更高體制所揚棄，即為最新型的民主與政權所揚棄。讀者若不明此理，硬派別人把聯合政府當做「新」民主的特徵之一，非是，因此發為謬論，說什麼聯合政府是單的，聯合政府，不是民主的特徵，「一黨的政權」也是民主。（見去年十二月三日莫青年「歐洲底聯合政府」一文），根據為他把蘇聯的「一黨政權」，也認為民主政權，而實際是在排斥法西斯「一黨政權」，也是民主政權，殊不知這是絕對不容混同的，「社會主義」與極權為民主政權，法西斯的「一黨政權」，決不是民主政權。這裏頭奇妙（說不限），說來是「一黨政權」，為什麼「一為民主，一非民主」呢？這沒有什麼奧妙，這就是孟老夫子說的「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的淺近道理，今之伊尹，就是人民大眾。社會主義的「一黨政權」，是掌握在無產階級，亦即大多數人手裏，所以是民主。法西斯的「一黨政權」是掌握在少數統治者手裏，政治流氓的手裏，所以不是民主。因此民主是最準確的尺標，然不是掌握在大多數人民手裏的政權，「一黨政權」固然非民主，各黨聯合政權，亦不是民主。掌握在大多數人手裏的政權，各黨聯合政權固然是民主，「一黨政權」也是民主。因此，這裏所謂「新」民主與「新」政權，是以各階級各黨派聯

爲其特徵的，亦卽以聯合政府或聯合政權爲其特徵的。因爲它旣不是已經達到最新型的社會主義的民主及其政權，如果是，它將是無產階級一黨政權；它也不是已過去了的舊型的資本主義的民主及其政權，如果是，它將是資產階級一黨政權，兩者都不是，所以各階級各黨派的聯合政府或聯合政權，便成爲其『新』民主與『新』政權的惟一特徵了。不過其統治權力，政治領導，儘管是聯合的，但其聯合的結合紐帶，則是人民自己，人民大衆才是聯合政權的眞正重心。人民大衆才是支持聯合政權的堅強柱石。任何黨派、任何階級、聯合執行政權時，都要服從於大多數人民的利益，任何黨派、任何階級、聯合執行政權時，都要使政權成爲表達和執行大多數人民意志的有力工具。這就是說要做到使廣大人民，不僅享有政治民主（政治的平等）而且享有經濟民主（經濟的平等）。政治民主的實現，要以經濟民主作條件，因爲「貧窮的人決不是自由的」（見羅斯福國會咨文），反之，經濟民主的實現，也要以政治民主作條件，因爲「經濟民主之能否實現，也要決定於革命民權的力量」（見沈志遠著「戰後世界新民主體制之兩面觀」）。這就是說要做到使廣大人民，不僅享有國內民主，而且享有國際民主（民族的平等）；國際民主的實現，要以國內民主作條件，因爲「對外要求民族平等獨立的國家，對內決不容許實行獨裁政治的。假如硬要實行，其必歸失敗無疑」（同上引）；反之，國內民

主的實現，也要以國際民主作條件，因爲「對內實行民主政治，對外決不能實行侵略併吞或法西斯式的民族奴役。假如眞是這樣實行了，那就證明這種民主是少數人的民主，是大資產者形式的民主，它非被送進歷史博物館去不可」（亦同上引）。從這些地方我們都可以完全看出這種新民主與新政權，是人民的政權，是由人民自己創造出來的政權，是掌握在人民自己手裏的政權，且是由人民自己的力量保證其實現、生長、鞏固、發展，爲人民自己的共同利益，幸福、忠實服務的政權，它是大大不同於舊型民主及其政權的，一言以蔽之，它是新型民主新型政權，舊型民主政權沒落的終點，正是新型民主政權興起的起點，這次全世界民主主義反法西斯主義戰爭的砲火，就做了它臨盆出生的助產婆。

因此，這種「人民的政權」，就成爲「人民的世紀」這一歷史階段的重要標記，也就成爲這次民主主義反法西斯主義戰爭的重大目標，這次戰爭的目標不是別的，就是爲的要建立各階級各黨派聯合的新民主政權。所以在這次戰爭以後必然要使人人有豐衣足食的生活，人人有安居樂業的保障，人人有參與國家事業和社會事業的全部權利，也就是說要使過去一切人對人的壓迫與榨取的罪惡，不再存在於世界；而且最後還要在世界各國家各民族的人羣間，建立起互助合作的友愛關係，而永遠不再有法西斯的侵略與奴

役行爲。

因爲政權是「人民的政權」，一般發展的規律，也可以說是它的共型，是它的主流。但它發展的具體過程，絕決不如此簡單，我們如果就其各自不同的特點，亦卽其發展的不同性，分別加以各別的考察，必爲還可以從其共型中找出其特殊的類型來，如新民主政權（亦卽人民的政權）之法蘭西型，新民主政權之南斯拉夫型，新民主政權之中國型等等。一這我們不能在這裏詳加分析，只好另立專篇來論述。此外，我們必然還可以從其主流中發見其許多迂迴曲折的逆流，例如：其具體發展過程，在上述各國新政權中，我們就可以舉一下指出以下一些不同之點，試看有些國家的「新」政權，是在各該國被納粹匪幫佔領後，各該國政府隨卽倉卒逃難，流亡海外，再由各該國眞正熱愛祖國的人民團結起來和游擊，從而治中樹立起來的，如南斯拉夫、希臘、波蘭等國家，有些國家的新政權，則是在各該國政府甘心附逆，與納粹匪幫結成一夥，各該國人民受雙重壓迫，採取地下行動，一直到盟軍勝利，壓迫各該國政府投降後，才由人民出頭樹立起來的，如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等國家，這是新政權所由樹立的國家背景之不同，卽或爲納粹的被佔領國，或爲其附屬國，法蘭西與意大利是例外，法國開始敗退巴黎，它的大批國土是被佔領了，是佔領國，但只甘心出賣民族利益，投降納粹，又可以說是納粹的附

屬國，而它的新政權，則是由海外戴高樂所領導的自由法國，戰鬥法國，及其後團結國內外的抗戰黨派，抗戰人民共同樹立起來的。意大利則是在墨索里尼倒台後，軸心自行瓦解，來了一次內部政變，才由抗戰各黨派樹立起來的新政權。從這一發展具體過程的不同點，就發生以下不同結果。大概凡是從被佔領國中樹立起來的新政權，不管波蘭也好，希臘也好，都不免多多少少要鬧一些流亡政府的糾紛，而從附屬國中樹立起來的新政權，反而沒有這些麻煩。

再則有些國家的新政權，是樹立在盟軍蘇聯軍事解放區域中的，例如波蘭、南斯拉夫、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等國家。有些國家的新政權，則樹立在盟軍英美軍事解放區域中的，例如比利時、意大利、希臘等國家（但希臘則完全在英國軍事解放區域中）。這是新政權所屬軍事解放區域之不同。根據這些發展具體過程的不同點，遂發生如下不同的結果。這就是，不論被佔領國與附屬國，因為所屬軍事解放區域之不同，有的則比較安定、繁榮，有的則比較動盪、不穩，甚至發生不幸的內戰。這法國也是例外，只有它能超然、主動、不受所屬區域的任何影響。

此外則在各國聯合政府或聯合政權的形式與實質上，還可看出有領導的階級和領導的黨派之不同，有的為少數資產階級及其政黨所領導（實質上這一階級及其政黨的單獨

領導是不可能的。；有的爲大多數無產階級及其政黨所領導；有的爲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及其政黨所共同領導，但在新民主政權的實質上，卻只有這種可能，不是兩個階級共同領導，就是一個代表大多數人民的階級與政黨單獨領導。否則不是新民主政權。這是單獨領導與共同領導之不同。根據這一不同點，也可以發生以下不同的結果，即領導的階級與黨派，愈能代表大多數人民的，其政權愈有基礎，愈鞏固，否則將不免發生波折，將不爲人民所擁護，而遭受失敗。

第三，由於以上各新民主政權國家發展的具體過程之不同，有的鬧流亡政府糾紛，有的沒有糾紛，有的安定、鞏固，有的動盪、不穩，有的得到人民擁護，日益擴大，鞏固其政權基礎，有的則否，因而總結爲有的新政權國家則沿着新民主與新政權的大道，較爲順利的放開人民沉重而快捷的腳步，一直往前邁進了，如法蘭西、南斯拉夫、匈牙利等國家，尤其是法蘭西，在其內政外交的成就上，於短時間就恢復了它已往革命的光榮傳統，建立了新民主新政權的第四共和國。有的則遭遇種種挫折，一折三波，如比利時、意大利、希臘等國家，尤其是希臘，因爲親法西斯分子巴本德里歐，回國不久，即與手執干戈爲祖國的解放付了血的代價的人民及其解放軍爲敵，不惜援引外力，屠殺自己的同胞，以致爆發了相當長時期的內戰，而真正人民的政權的建立，直到現在還無把握。這

縱使我們明白看到不僅於新政權的典型中，現有其特殊類型，而且明白看到於新政權的主流中還不免隱伏一股逆流。這股逆流，一則是由於匪幫的無恥的流亡政府，迷戀着舊統治的影子，企圖重建戰前親法西斯的軍事獨裁，拒絕與人民合作，甚至仇視人民，畏懼人民（這種仇視，畏懼，較之對於希特勒匪幫的仇視，畏懼，是只有過之無不及的），「一朝權在手，就要解除那條衛國土有功，把他們請回來的人民軍的武裝」，這在比利時的比埃洛是如此，希臘的巴本德里歐也是如此。再則由於民主大國的某些綏靖分子，迷戀着舊歐洲秩序的傳統，希圖在便於私圖的打算上，把某些小國變成自己的衛星，因而造成自己的勢力範圍，不能真心的「尊重各民族有權自由決定其所賴以生存之政府形式」的大西洋憲章，而且希圖為擴張的舊秩序留一個最後的避亂所。在這裏自然就不能不發生舊秩序與新秩序之爭，因而就不能不發生主流與逆流之爭。本來是隱伏的逆流，在這種情況之下，也就公然表面化了。

這不是別的，這正是由於一切法西斯流派，對於人民的政權的恐懼，對於人民的仇視。他們——一切綏靖主義者，擁立主義者，親法西斯分子，半法西斯分子，黨棍惡徒、政治流氓，封建餘孽，流亡紳士，一言以蔽之，一切法西斯流派，確有恐懼，仇視人民和人民政權的充分理由，因為人民和人民政權，代表戰後世界燦爛的將來，不代表戰

前世界領袖們過去，使法西斯把自己創造出來的政權——一個自己獨裁統治的天下，掌握在自己手裏，而忘記自己服務的人民；讓法西斯蒂們，以[illegible]的獨裁統治的機器，以民族獨立[illegible]大血就不能不使出各種卑劣手段，下流的辦法，來作最後的掙扎，把偉大的朋友——蘇聯人民及美國人民，當做敵人，把[illegible]的敵人，[illegible]是敵人，還是強大的敵人——法西斯匪徒，當做朋友。企圖阻擋歷史的發展，往絕路上推人民政權的主流。殊不知歷史的意志，人民的力量，是誰也阻擋不住的。[illegible]人民的政權，[illegible]被打倒[illegible]，最後的成功與走向最後的勝利。[illegible]它的[illegible]是太重了。若說[illegible]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當担，法西斯的殘酷統治和野蠻侵略，沒有各該國內人民的政權，決不能把各該國從法西斯的統治與侵略下解放出來。因而也不能把各該國從法西斯的統治與侵略下解放出來。

其次，它和自由與和平世界戰後復興的事業有關。法西斯戰敗的結果，將還有殘存在個國及其附屬國，戰敗的殘餘勢力，絕滅了，鬥爭剛於政治經濟建設的全部文化，沒有各該國內人民的政權，則對於殘餘勢力的清除，各該國內的法西斯分子殘餘實國的戰鬥，及從事於政治經濟之改造與建設，皆不可能；而其復興計劃不能實現，甚而於影響全世界的復興事業。復次，它和戰後全世界的和平有關。戰後的持久和平，不論是在國際國內，都要建築在新民主主義與新民主政權的堅實基礎上，都要建築在經濟平等、政治平等、民族平等

、的根本原則上，沒有各該國內的人民的政權，則經濟民主與政治民主，國內民主與國際民主，都不可能實現，因而戰後的世界持久和平亦不可能實現。最後，它担負着全世界反法西斯聯盟精誠團結，友好合作的重担，東西法西斯殘孽，都是把它們的希望，或屠殺奴役我們的陰謀詭計，寄託在被侵略的各該國內或各聯盟國間的內部摩擦，內部不團結上，因為恰恰是只有被侵略的各國內或聯盟國間的內部的精誠團結，友好合作才是反侵略反法西斯戰爭最後勝利的保障。沒有各該國內人民的政權，亦即沒有各該國內廣泛的民主生活與廣泛的聯合陣線，反法西斯聯盟的國內團結與國際團結，都將是不可能的。

因此，人民為勝任歷史所付與他的重担，必然要突破千難萬劫，走向最後勝利與成功，而人民政權的主流，也必然要淹沒任何反動的逆流，全世界的人民，尤其是在多年戰爭的苦難中，用血和淚洗清了他們視線的人民，正在努力要依據新的，更廣大的，更健全的原則，把法西斯侵略使他們喪失掉的國家地位、經濟地位、人民地位、民族地位，恢復起來，把形形色色的法西斯主義，綏靖分子，孤立分子，政治流氓，一齊永遠連根剷除掉，而且要使他們的新政權，在全世界到處勝利。

這就是說，人民自己的力量，就足以阻遏住種種反動的逆流，不管它是潛伏的，或

者是已經表而化了的。也就是說人民自己的力量，就是阻遏或淹沒種種反動逆流的最可靠的保障。前文已經指出，人民大衆才是聯合政權（亦卽人民的政權）的眞正重心，人民大衆，才是聯合政權的堅強柱石，因此，舉凡舊統治秩序與新統治秩序之爭，抑或主流與逆流之爭，人民才是最後的判決者。服從人民利益，依靠人民力量者勝，否則敗，慘敗！

除了人民自己的力量，是消滅種種反動逆流最可靠的保障以外，另一個可靠的保障，就是這次全世界民主主義反法西斯主義戰爭中，蘇聯這一社會主義國家之有關戰爭勝敗，戰後和平，以及建立民主新世界之左右全局的決定作用，前文已經指出：不論納粹統治的被占領國與附屬國，舉凡樹立新政權的國家之在蘇聯軍事解放區域者，則以安全，鞏固；否則顯明、不穩、甚至發生不斷的內戰，就充分足以說明蘇聯也越爲阻遏種種逆流的有力因素，今後蘇聯是一定要面向全世界上一切被解放的人民爲建立人民的政權而奮鬥到底的。最近報載蘇聯英勇的紅軍於解放匈京布達佩斯、波京華沙而後，已數路直搗柏林，納粹德國的最後喪鐘響了，人民的勝利，人民政權的建立，也已獲得更充把握的保障。

此外，保障英美蘇三個民主強國之始終一貫的合作，也是撲滅種種逆流之前途的保障。

前文雖然已經指出逆流的來源之一，就是由於某些民主諸國的統治分子，還不肯放棄其歐洲已經破產的制度，還迷戀着舊統治秩序的傳統，但這是不能超過三大民主諸國之共同需要的，尤其不能破壞在三國中起決定作用的蘇聯的和平外交政策的，而且客觀的情勢，使他們在戰後新民主大家庭的建設中，非密切合作不可，美國是特別懂得這一點的，蘇聯的捷報頻傳，美國太平洋的攻勢，也一日千里的進展得特別快，你說其餘一國能不跟上來嗎？史羅邱三巨頭會議的日期已見告了，任何不愉快的心情及任何潛伏的逆流，都將要在這一次會議中，得到徹底的清除與最後的阻遏。

逆流總只是逆流，「人民的政權」，必然要在「人民的世紀」中最後勝利，徹底勝利，永久勝利！

附錄

一　論古代宗教及其他意識形態之政治作用

在人類歷史裏面，無古今中外，都存在着各種人類的各種活動，歷史是人類活動的紀錄。人類的活動是多方面的，種種色色的，但歸納起來說，則不外經濟的活動，政治的活動，文化的活動三者，人類為什麼要有活動，而且事實上是不斷的無休止的活動着呢？一言以蔽之，為適應其生物性之自然要求，為着生活。人類要生活，便要活動，經濟的活動也能，政治的活動也能，文化的活動也能，都圍繞着生活中心。那麼，歷史又可說是人類生活的紀錄。

生活之最基本的條件是經濟生活，因之，活動之最基本的條件是經濟活動。人類歷史從採集經濟到生產經濟，從蒙昧時代到野蠻時代，或者說從原始社會到氏族社會，甚米的活動，主要的活動，都是經濟的活動，這是無可懷疑的事。但因生產力的逐漸提高

，生活的欲望擴大，生活日益複雜化，於是人類除了經濟的生活與活動外，便還需要政治的，文化的生活與活動。

不過政治的，文化的生活與活動，仍是爲着服從於經濟的生活與活動，由於民族共同體內部生產力的提高，尤其是農業生產力的發展，引起民族內部的矛盾，主要由於氏族成員間貧富的分化，身份，等級的出現，則關於政治範疇的國家，政權，法制，政事等等也出現了，屬於文化範疇的宗教，藝術，哲學，科學等等，有的不僅在氏族社會已出現（例如宗教，藝術），而且已帶着濃厚的政治性，甚至政教不分，而爲神權政治服務了（尤其是宗教）。

關於這種歷史發展的道路，是任何國家，任何民族必經的道路。中國歷史的發展，雖由於某種具體的條件而具有獨自發展的特殊性，但也不能外於這種一般性，據近代中國歷史家們的研究，大抵把伏羲以前——即自盤古至伏羲這一傳說時代，劃爲中國歷史的採集經濟時代，蒙昧時代，亦即原始社會；把伏羲以後——即由伏羲至殷這一時代，劃爲中國歷史的生產經濟時代，野蠻時代，亦即氏族社會，然亦有把殷（並包括西周）劃爲奴隸社會的，奴隸社會的出現，於是氏族社會崩壞，而種族國家就應此需要產生出來了。

當此之時，這一國家的政權，毋寧說就是「神權」，這一國家的形態，毋寧說就是父家長的家族之擴大型，這種奴隸制度的種族國家，爲維持及鞏固對於奴隸的統治，自然就要維持，鞏固其種族，國家的政權，同時，也就不能不維持，鞏固其「神權」。實際上神權是先於政權的，因爲宗教的起源，是早於國家的起源的，不過歷史上最早的宗教，是「萬物有靈論」卽是「庶物崇拜」的宗教。等到國家出現，地下的國家有了惟一無二的國王，於是天上的神靈才有了惟一無二的「上帝」「或天」卽是說宗教有了一神教。因爲國家是父家長制家族的擴大型，對於祖先崇拜，更是維持，鞏固國家政權的重要條件，於是「尊祖」「祀天」，便成爲當時最有權威的大事，所以說：「國之大事，惟祀與戎」，詔尊於說，「國之政事，惟祀與戎」，這便充分表現了當時的「政教不分」。

關於殷人「尚鬼」「尊祖」的文獻，商書中隨處可見，如太甲上：「辟不辟，忝厥祖」，大甲中：「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盤庚上：「茲予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罰」，盤庚中：「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說命下：「佑我烈祖，格於昊天」等等都是。其次關於「祀天」也一樣，如太甲：「天作孽，猶可違」，高宗肜日：「非天夭民，民中絕命」，商頌：「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一類的話，也散見各處，這裏的「天」是人格化

了的「天」，也可以把它叫做「帝」或「上帝」。不過殷人尤其崇拜祖先、卜田、卜年、卜牲畜、卜風雨、卜征伐，都去問那些先王先公。

到了西周，對於天的崇拜更注重，這因爲它新起而代替了殷的統治，當然不再推尊殷的先王先公，便集中其崇拜信仰於天，而且自以爲是受天之命來代替殷統治者，不過因那時的農業生產力更加發達，對於土地價值的認識，也便日益提高起來，於是「天」之下，更臆想出一個后土——「社」以配「天」，但是推尊自己的祖先以自別於他族的一點，究竟是父家長制家族之擴大型的國家統治上不可少的條件，於是一方面說他們的祖先文王、武王，是受天之命，一方面更將他們的遠祖宗，推尊爲稷神——「稷」，和后土——「社」一同來配天。因此，周之奴隸制的國家，除了「天」和「祖」以外，還有「社」和「稷」，而且社稷二字聯繫起來便轉化爲國家的意義，例如後來「國君死社稷」之說，就是國君應該爲國家犧牲的意義。這不僅說明「神權」與「政權」不可分，「政」與「教」不可分，而且說明國家與「社稷」不可分。這就在政治的要求上，把國家本身也神化了。

自然，無論殷商與西周，在政治的任務上，除了尊祖祀天以外，其他日、月、星、辰、山、林、川、谷、丘、陵、也因和生活的要求有關，都在崇拜之列，即除了祖先與

天的崇拜外，庶物崇拜仍是盛行的，因爲這都是爲當時生活要求，尤其是政治目的所需要的。所以說：「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材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這顯然說明一切祀典，都爲着生活與政治目的。

他們爲着生活要求，政治目的，便不能不有天與祖先的崇拜，同時，也不免有庶物崇拜。因爲在事實上，一神教既然出現，庶物崇拜就因之消除。而且更要利用這種種宗教崇拜來達成政治任務——種族國家統治者的政治任務。宗教崇拜，或者說文化方面，亦即意識形態方面，一天一天走向強烈的政治化，而宗教崇拜的儀式，也就更更加具體化，組織化，所以宗教崇拜便漸漸發展爲有一定儀式的「祭」，當時祭祀之典，使在國家的政治中居最重要的地位，所以說：「禮有五經，莫重於祭」。而「祭」到後來，簡直就是一切政教的大源。於是祭時有所謂「十倫」，以爲於此「可以見事鬼神之道，可以見君臣之義，可以見貴賤之等，可以見親疏之殺，可以見爵賞之施，可以見夫婦之別，可以見政事之均，可以見長幼之序，可以見上下之際」，這「十倫」都是父家長制家族廣大型的國家統治上不可少的條件，然而這「十倫」却都出之於祭。由宗教崇拜演出了「祭」，由「祭」演出了「十倫」，本來對於父家長制的國家統治已算得很嚴密的了

」但由於生產力的提高，生產欲望的擴大，社會生活的複雜化，把統治國家性的需要也提高了，而祭時的儀式，又有所謂「禮」者來表示。

禮——不僅在祭時用其儀式來表示上述之「十倫，」而且將祭祀的精神，推之於祭祀以外之一切大小事務。所以說：「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以之國內有禮故三族和，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是由此可知宮室得度量，味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哀，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凡一切措施都無不得宜，」總之一切大小事務，一切公私生活，一切舉動，都要「禮」的支配，這就成為周代「禮教精神」之所寄，在這裏「禮」與「祭」就是政治，就是法制，就是治國之要具。試看孔子說：「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這就再明白沒有的把「禮」與「祭」在政治上的作用表現出來了。

此後中國歷史上「法出於禮」之說，在這裏有極深厚的根據，孔子而傳弟子——荀子的「隆禮尊君」之說，不外就是這麼一套，而作為荀子嫡派的韓非、李斯，又倡為「法治主義」之說，而法治主義之根本觀念，即為「尊君」「奉法」，更不是偶然的。但由「禮治」而轉入「法治」，則是社會生活更趨複雜的表現，也就是神權政治漸趨末路的表現。

然而屬於文化範疇之宗教、藝術、哲學、科學等等，在屬於政治範疇之國家，政權、法律、政事等等出現以後，則在任何場合，都具有強烈之政治性而服從於統治者之政治任務，尤其是宗教，在父家長制家族之擴大型的國家裏面，幾成為與政治不可分的治國之具，成為政治史上之不可分的部分，而且是以神秘外衣掩蓋政治本質的部分。

在這裏，充分證實了，文化的活動——即任何特定的意識形態；依存於政治的活動——即依存於特定的政治機構諸特徵，而特定的政治機構諸特徵，又依存於經濟的活動——即依存於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社會構造的諸特徵。

這樣就是理解古代政治與宗教及一切特定的意識形態間的關係之鎖鑰，而近代宗教及一切特定的意識形態與政治的關係，在某種程度上，也要這樣來理解。這樣就更加容易理解為什麼在今天還有人提倡復古，提倡尊孔祀天，提倡制禮作樂之深意了。

二　論古代天道觀念之政治作用

我在「論古代宗敎及其他意識形態之政治作用」一文裏，曾說：「……歷史上最早的宗敎，是「萬物有靈論」，是「庶物崇拜」的宗敎，到得國家出現了，才人造宗敎的（不是宗敎遺人）地下有了國王，天上便有了「上帝」或「帝」「天」。」又說：「到了西周，對於天的崇拜更注意，這因爲它新起而代替了殷的統治，當然不再推尊殷的先王先公，便集中其崇拜信仰於天，而且自以爲是受天之命來代殷統治的。」這可以看出「尊祖」「祀天」的眞正意義就在這裏，就在把自己的統治看做是受天之命的，甚至於把統治者自己或其祖先看做是繼承着天之血統的。由於統治者觀念的製造出了這樣的關係，其統治便被特別的賦與一種權威，便產生了一種尊天命而統治的神授說，所以古代社會意識的天道觀念，仍不外是爲完成政治任務而生出的東西——仍不外是「神權政治」的附庸。有人說：「歐洲中世紀，哲學不外是神學的婢女」，我們也可以說：「中

國古代的天道觀念，不外是神權政治的擺設。「這一點，在反映西周或殷周之際的各種人事活動——經濟、政治、文化等各種活動的詩經和書經中，記載得非常清楚，試看詩經大雅的生民篇說：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即祈求生子之意），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周之始祖）。」

這就是說周的始祖后稷，是天生的，或上帝生的，是承繼着天或上帝的血統的。此外在詩之各篇有曰：

「商之子孫，其麗不億，上帝旣命，侯於周服。」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國名），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保佑命爾，燮伐大商。」

這就是說周之勝王，也是由天帝選擇出來爲王的，周的伐殷滅殷也是順天意而伐殷滅殷的。像這種說法在書經中所有的就更多了。

「予（周）天降威，用文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天休於文王，興我小邦周，文王惟卜用，克綏受玆命。……天明畏，弼我丕丕基。」（書大誥）「天亦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與）厥邦厥民。」（書康誥）「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

」（書酒誥）「皇天旣付中國民越（與）厥疆土於先王」（書梓材）「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書召誥）「旻天大降喪於殷，我有周佑（有）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勑殷命終于帝。……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割殷，告勑于帝。」（書多士）「惟我周王靈承於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書多方）

這簡直是何何在宣傳：周之伐殷亡殷，完全是俯順天命。周之所以代殷而爲統治者，完全是天所給予它的任務，自然周所統治的土地與人民，都是天授與它的（皇天旣付中國民越（與）厥疆土于先王」。因此，梁啓超氏便斷然的說：「於是神意政治進爲天意政治，吾得名之曰天治主義，」（見所著先秦政治思想史三十四頁）

其實天意政治，仍是神意政治。因爲這樣的天「純爲有意識的人格神」，梁氏已經明白指出之。因此，他於引用詩書各種關於「天道思想」以後，又斷然的說：「要之古代思想，極爲素樸，其對於天之觀念，與希伯來舊約全書所言酷相類，天有感覺有情緒有意志，與人無殊，常直接監察或指揮人類之政治行動，若此者亦得名之曰具像的且直接的天治主義。」（同前揭書）

其實此「具象的且直接的天治主義」，「純爲有意識的人格神」的神治主義。天「

治」，「神治」，總之是服從於當時的政治任務的。

不過因為生產力的不斷提高，生活日趨複雜，社會意識亦不斷發生變化，關於天道觀念，即在當時也不是一致的。試看南宋時之朱熹，有人向他問經傳中之天字，應作如何解釋，他說：「有說蒼天者，有說主宰者，有時說單訓理。」（見渡邊秀方中國哲學史概論〔五頁引〕）朱氏所說的蒼天，是指有形體的天，是單純表示對於天體的自然觀；朱氏所說的主宰，是把天人格化，神化，是把天看成一種超自然的力，看成統治宇宙和人類的主宰；朱氏所謂理，是把天看做一種理法，把天看成可以從它尋求道德原理的根源，亦即把天作為理法根源的觀察法。

第一種的天道觀念，如詩有：「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悠悠昊天，曰父且母，無罪無辜，亂如此憮！」「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等等就是。這是把天當做自然的天看的，凡人在無可如何時，則呼天以自慰藉，這種觀念也是自然的。

第二種的天道觀念，就為一種政治的附屬，成為一種有利於支配者的意識而作用了。這已在前面說過。

第三種的天道觀念，如詩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上帝之載，無聲無臭

」，「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等都是，梁啓超氏在其所著「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引起上述詩說，接着他寫道：

「孟子釋之曰：『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再以今語釋之，則謂凡一切現象，皆各有其當然之法則，而人類所秉之爲幸也。故人類社會惟一之任務，在「順帝之則」（詩皇矣）。然則所謂「帝之則」者如何能示現於吾儕耶？其在書洪範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書洪範）右所說者，恰如舊約書中摩西在西奈山上受十誡於上帝。其爲神話的而非歷史的，自無待言。雖然，此神話在國民思想上有絕大意味焉。蓋「人格神」與「自然法」兩觀念，從此確立。申言之，則宗教的「神」，變爲哲學的「自然化」也。周語載王子晉之言曰：「伯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象物天地，比類百則，儀之於民，而度之於羣生，……克厭帝心，皇天嘉之，胙以天下。」」「比類百則，儀之於民」，即「物則」之假託於人以實現也。此觀念最圓滿的表示者，如皐陶謨所說：「天工人其代之」，「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五庸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則也、典也、敍也、秩也，皆表自然法則之總相。因則而有彝，因能

而有嚀，因敍而有典，因秩而有禮，則自然法則之演爲條理者也，此總相即後世儒家道家之所謂道，前此謂有一有感覺有情緒有意志之天直接指揮人事者，既而此感覺情緒意志，化成爲人類生活之理法，名之曰天道，公認爲政治所從出而遵守。若此者，吾名之曰抽象的天意政治。」

其實這種「抽象的天意政治」，仍是「抽象的神意政治」。正如梁氏所說：「蓋人格神與自然法一致之觀念，從此確立，申言之，則宗教的神成爲哲學的自然化也。」「前此謂有一有感覺有情緒有意志之直接指揮人事者，既而此感覺情緒意志，化成爲人類生活之理法，名之曰天道，公認爲政治所從出而遵守，」但此公認爲政治所從出而遵守之「天道」，可見乎？抑不可見乎？實有是物乎？抑終爲觀念的神秘之幻想乎？我們可以大胆的說：彼終爲不可見的神秘之幻想也，申言之，此公認爲政治所從出而遵守之天道，正是支配者爲完成其政治任務而幻出來的神秘——亦即看不見的上帝。總之，「具象的且直接的天治主義」也罷，「抽象的天意政治」也罷，都不外是服從於當時的政治任務，成爲一種政治的附庸，成爲一種有利於支配者的意識而作用的東西。

中國古代政治與天道觀念，我們必需這樣來理解它，也必需這樣才能理解它。

關於天道觀念，如前所說，即在當時也不是一致的，例如「有說蒼天者，有說主宰

者，有時或單訓理，」此外人們對於天的態度，也在不斷變化；例如梁啓超氏說：「愈古代則人類迷信的色彩愈重，此通例也。細讀詩書兩經，按其年代，其對於天道觀念變遷之跡，蓋略可見。商周之際，對於天之寅畏虔恭，可謂至極。……迨幽厲之交，宗周將亡，詩人之對於天，已大表其懷疑態度。如「昊天不傭」，「昊天不惠」，「昊天不平」（節南山）。「天命不徹」，（十月之交）「浩浩昊天，不駿其德」，「昊天疾威，弗慮弗圖」，「如何昊天，辟言不信」（雨無正）……諸如此類，對於天之信仰，已大動搖。……故春秋時一般思想之表現於左傳者，已無復稱說天意之尊嚴。………及老子用哲學家眼光，遂生出極大胆的結論，所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孔子持論最中庸，亦云：「先天而天弗違」（易文言）。……及戰國末而人智愈進，荀子遂大聲疾呼，論：「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裁之？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天論篇），此實可謂人類對於天之獨立宣言，非惟荀子，當時一般思想家之觀念，殆皆如是矣。其後，董仲舒又採墨氏天志論以解儒家言，其著書家言「天人相與之際」，兩漢學者，翕然宗之。此爲天道說之第二次復古運動。……數千年間關於此事之思想變遷略如此。」（同　前揭書）

但這種變遷或變化，春秋戰國較之西周時或殷周之際，是確有其事的，其變遷或變

化的原因，或亦由於生產進步和人智進步使然。然決不能說這種社會意識——天道觀念的變遷，是包括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全社會結構有了質的變化之反映，而人們對於天的態度之不同，亦即天道觀念之不同，至多不過由於一時所處環境，及所要說話之對象不同而已。如前引詩「悠悠蒼天，此何人哉」之句，正是人們在無可如何的一種悲歎。所謂「昊天不惠」，「昊天不平」等等，也是人們在無可如何時的一種尤人怨天的情景，老子雖然說過「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的話，可是他也說過「天網恢恢，疏而不失」（道德論第七十三章），「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第七十九章）的話，孔子雖然說過「先天而天弗違」的話，可是他也說過「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論語子罕第九）「獲罪於天，無所禱也」（論語八佾第三）的話。荀子雖然不承認天能支配人事，支配人類的命運；——天不過是盲目地活動着的自然力，但在他把天作爲物質的自然力處理的時候，還是殘留着很濃厚的神祕的要素，即纔令人覺得在那兒還留着自然力以上的某種臭味。例如他說：「天行有常，不爲堯存，不爲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天論篇），是天仍能因人之應付如何而有吉凶之不同也。

再則即在殷周之際的同一時候，也有一面在信仰天，一面在懷疑天的事實。例如書大誥有「天棐（非）忱，爾時罔敢易定」，書君奭有「天不可信」的話，詩大雅文王篇

有「天命靡常」，「命之不易，無遏爾躬」的話。這據郭鼎堂（按即郭沫若）先生說：「凡是極端尊崇天的說話，都是對待着殷人或殷的舊時的屬國說的，而有懷疑天的說話是周人對着自己說的，這是很重要的一個關鍵。」（見所著先秦天道觀之進展二四頁）再則是統治者拿來訓誡其子孫，當心失掉了統治權的說話。總之或則是周人把殷人敬天的思想只當做政策上的繼承，把天的思想當做愚民政策；或則是怕自己的子孫失掉了統治權，於是拿「天命靡常」一類的話來啟發或提高其警覺性。說不定就在當時，統治者已在理智上不大信仰天了，不過拿他來統治羣衆來信仰它的民族或訓誡其子孫，總是「要得」的。這就是說天道觀念乃至原始宗教，在歷史發展的某一階段，自然要成為有目的意識的一個騙局，而其本質是為某種政治目的服務的，而且這一騙局，往往長時期的被支配者利用着，除非在包括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全社會結構有了質的變化的時候，方失掉其利用性。梁啟超氏及其他許多人，以為在春秋戰國時代，天道觀念，就發生了根本動搖或起了根本變化，是不免陷於一孔之見的。

附註：天的思想，如我在「中國古代政治與宗教」所說：「尊祖祀天」的兩件事，在殷已經是并重的，不過在周朝才特別注意，特別發展。從這一點，即從「天」，「上帝」這種至上神的出現，可以證明（反證）殷代奴隸國家已形成了。

三 對於中國古代倫理的政治之評價

由於生產力的逐漸提高，社會生活的日趨複雜，人類活動範圍的擴大，政治，國家等等權力組織，成爲必要的時候，神權與政權不分，即教與政不分，甚至形成一種宗教的政治，這是任何國家所必經之一階段，在中國古代政治史上，也不能有例外。

此外，政治與倫理的結合，政治即倫理，從有了政治科學以後政治學還許久不曾從倫理中區分出來，也是任何國家必經的階段，在中國古代政治史上，不但不能有例外，而且特別密切吻合，形成一種倫理的政治，這是由於國家皆起源於氏族社會崩潰以後，國家爲氏族社會崩潰後之產物的原故。

氏族社會的崩潰，據其發生，發展，與沒落的規律來說，總是由於物質生產力的發達，使得氏族公社內發生了個人的家庭。家庭的發展是循着一定路線來分解氏族社會，例如由一個氏族分化出許多小家庭，而各個小家庭們包括在原來的氏族系統之下，形成

一個大家庭，因此，形成各個小家庭同時擁戴一個大家庭的大家長，後即由家長變成國，由家長變成皇帝。這正是中國儒家國家之家族起源說的根據。

中國氏族社會的崩潰，大概是在殷末，已爲一般歷史家所承認。如更就中國古籍之較可靠的詩、書、易來說，殷末已有如詩所詠：「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的借取制度，「經始靈台，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的力役之征；（這雖是周詩，然而却是周初，並且在周文王時代，還沒有滅殷，仍是殷末）如書所說：「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的奴隸制度；「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的怕做奴隸的恐懼心理；如易所說：「噬嗑，利用獄」的監獄；「何校滅耳，其人天且劓」的刑罰，這都是證據。

家長對於一家之內的動產不動產是有完全的處分權的，甚至家長對於其家內的妻子兒女也有生殺予奪之權。所以易說：「家人有嚴君焉」，由家長變成的皇帝，在「土地國有」的名義之下，便佔有了氏族公社所有的土地，由於氏族公社的崩潰，土地佔有面積更加擴大，皇帝於是成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大地主，而且這一大地主的皇帝，還可以把這些土地自由賜與他所喜歡的任何人，如書云：「錫土姓」，詩云：「錫之山川，土田附庸」，這一大地主的皇帝，由於古之宗教性的「天」的觀念與倫理的家族

觀念相結合，在中國政治上遂產生一個很好聽的名詞——即大家所熟知的「天子」，天子之稱。始於書之西伯戡黎，此外在書之洪範，詩之雅頌中，亦屢見不一，如洪範云：「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一面為天的兒子，一面為民的父母，這把「國」與「家」一例看待，「政治」與「倫理」一例看待的精神，更充分表現出來了。

後來天子能將其土地，用封建的方式，隨便給與其諸侯；諸侯也能將其土地，隨便給與其大夫，大夫還能將其土地給與其家臣。總之把國家當做家看，把皇帝當做家長看，把國家之土地當做皇帝及其各級首長的私產看，甚至把國家也當做個人私產，此種以國家為個人私產的觀念，遺傳至後代乃至漢唐時代一統的專制君主，都未嘗改變，試看漢劉邦作了皇帝以後，向他的父親誇嘴說：「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又看：唐、李世民將要造反的時候，他的父親李淵起初不贊成，後來贊成了。對李世民說：「破家亡國由汝，化家為國，亦由汝矣」。這一種以國家為個人私產的心理，真是表現得再明白沒有了。

總之，國與家不分，政治與倫理不分，這種倫理的政治，更可於古代所謂「宗法」證之，古之宗法，論者極多，「世謂吾國自古迄今，皆在宗法社會中（社會通詮序）、而所謂宗法，實成立於此時（指西周時）……天子為天下之宗主，天子封子姓為諸侯

，由宗主封爲大宗；諸侯封子姓爲大夫，由大宗封爲小宗，所謂封建政治，實亦宗法政治。由其合天下諸侯公卿大夫嫡庶男女以其宗於天子，故能以尊祖敬宗之說，維繫上下，而修身齊家之效，其極至於治國而平天下。……試卽三代之宗法考之，一爲帝王之宗，天子爲王室之宗子，天子封子姓爲諸侯，諸侯用子姓爲大夫，大夫以子姓爲家臣，以服制之遠近，制爵位之崇卑，天子兼操宗父之權，故公劉之詩曰：「君之宗之」，且當此之時，視父猶子，視君亦猶父，觀帝堯之殂落，百姓如喪考妣，而後世以降，人民亦爲天子服喪，足證君主政治，係由家長政治而推。小宗庶服於大宗，故臣民卽受制於天子，諸侯以降，凡庶子有祿位，亦得爲私出之宗，特受氏雖殊，仍爲大宗所統轄，卽晉師服所謂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也。爲庶人之宗，古代天子按畝授田，行劃井分疆之法，故農夫授井百畝，轄農民者爲主伯，務農事者爲亞旅，故亞旅統於主伯，亞旅長子，世承父業，卽大宗之制度也。父必傳子，子必紹父，餘子必尊其兄，而農宗以立，卽晉師服所謂士有隸子弟（杜注士卑自以其子弟爲僕隸），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也。故當時之民，上使之統於君，下使之統於宗，故宗有常尊（荀子），以宗子爲保家之主，故有統治一族之權。……」（見繆鳳林著中國通史綱要第一册）。

宗法之組織，見於禮記喪服小記及大傳，其梗概如下：「別子為祖，繼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

因大宗為始祖之後，百世不遷，小宗則五世而遷，則向以小宗為宗之人，皆由大宗收恤之，故有一大宗之子，則其始祖之後，皆能團結不散，小宗之子分封者，對其本國雖為小宗；而在其所封之國，則為大宗。如周公在周為小宗，在魯則為大宗也。諸侯更以其地分封其大夫，也是這樣，再則天子死後，例由嫡子繼承，對於庶子只好另分封地讓他自成一家，這種自成一家的，就是所謂「別子為祖」；別子之後，當然仍由別子的嫡子承繼，即所謂「繼別為宗」；別子的庶子又自成一家，即所謂「禰」；而禰的嫡子，便是所「繼禰為小宗」了。不過雖然這樣一層一層的分出去，遇有祭祀從戎等大事，小宗仍須統於大宗，由宗以統於國君，由國君以統於天子。凡同姓之國，稱為宗國，所以魯公稱晉為吾宗，滕君稱魯為宗國；各同姓之國互相宗以上統於天子，這正是所謂「是謂君主政治，係由家長政治而推」，所謂「上使之統於君，下使之統於宗」，所謂「故能以尊祖敬宗之說，維繫上下，而修身齊家之效，其極至於治國平天下也」。這樣，宗法組織，遂成為政治組織之主要因素，倫理體制，遂成為政治體制的惟一礎石。

因之清末夏曾佑氏遂把宗法看做完全是定「君權」的手段，並且把它看做完全是孔

子之術，孔子之教。試看他說：「考我國宗法社會，自黃帝至今，可中分為二期：秦以前為一期；秦以後為一期。前者為粗，後者為精，而為之鈐鍵者，厥惟孔子，孔子以前之宗法社會，沿自古昔，至孔子時，已與時勢不相適，故當時環瑋之士，各思以其道易之，顯學如林，而孔墨為上首。墨子貴義尊賢，節葬兼愛，皆革宗法社會之勁者，然與習俗太戾而不行，孔子之說遂浸淫而成國教。孔子之術，其「的」在於「君權」，而「徑」則由於「宗法」，蓋藉宗法以定君權，而非借君權以維宗法，然終以君權之借徑於此也，故君權存而宗法亦隨之存，斯託始之不可不慎矣」。（見嚴復譯社會通詮夏序）

這種看法，是有根據的，根據什麼呢？根據孔子的政治觀及其全部的政治理論，論語說：「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又說：「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孟子說：「施由親始」，又說：「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最系統化的說法，則莫如大學所云：「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修身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暴，一國作亂，其機如此」再則論語：孔子答或人問更有意義。「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這就是說，一個人在家庭內能孝友於兄弟，就是在辦政治了。並不一定要在朝廷做官

，方叫做辦政治。這種倫理本位的政治理論，怕是再無出其右者了。

儒家這種政治理論，本於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的邏輯便把倫理本位的政治，一轉移間而變爲「人治主義」的政治，如所謂：「君子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論語）「君子篤恭而天下平」（中庸）「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孟子）「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論語）「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論語）。「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論語）。「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大學）「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孟子）「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孟子）於此便結論到：「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中庸）

這種倫理本位的政治，「其的在於君權，其徑在於宗法」，則又以宗法爲「的」，而以其他一切，例如教化，刑法等等爲其「徑」，上述種種，有如正己正人，教化也；好禮好義，教化也，興孝興弟，亦教化也；以政治與倫理不可分，政治與教育也不可分。再則書康誥云：「元惡大憝，惟不孝不友；子，弗祇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於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於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

於弟，惟弔茲，不於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這就是以「刑罰」爲「徑」來助成倫理的義務之實踐，也就是說明以刑罰爲「徑」來助成宗法之「的」。

這種古代倫理政治，並不是與古代宗教的政治相背反的，倒可說是相輔相成的，倫理的政治與宗教的政治相結合而其效力將更宏。禮郊特牲云：「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宗法必尊祖，尊祖必崇祭，崇祭必明禮，故曰：「明乎郊社之禮，蒸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中庸）

這種倫理的政治，其在當時的利弊如何？我們不必申論；其影響於後世的利弊又如何？亦不能一概論之，要之此爲歷史的產物——爲古代某一特定歷史階段的產物。亦即古代社會經濟之反映，歷史的車輪轉到了現代，社會經濟的背景已是大大不同了，這就要用另外一種政治體制來適應它，「政治學」必需嚴格的從「倫理學」區分出來，政治必需嚴格的從「倫理」區分出來。

四　論中國政治上的「禮治主義」

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由於社會內在矛盾而使政治活動政治關係政治生活成爲必要，則其一切活動、關係、生活、都不能不具有政治性而服從於其政治目的，這是歷史規律所告訴我們的。例如「宗教」，「倫理」，準宗教的「天道觀念」，一言以蔽之，所有社會意識形態領域裏面的東西，都是圍繞着政治生活而作用的。

中國春秋戰國時代，在社會意識形態方面。又由儒家抬出了「禮」這一東西，就其政治意義說，則可以叫做「禮治主義」。「禮」這一東西，雖在春秋戰國時代，始由儒家把它抬出來——亦即特別強調它而形成了一個很完整的系統，但它並不是在春秋戰國時代才有的。試看孔子說：「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論語）又說：「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同前）足見「禮」是在「夏」「殷」就有了的，也可以說在很早就有

了的，而禮在最早的時候，不但是一種宗教的儀式——祭祖祭天的一種儀式，卽是一種「祭禮」。所以說：「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由此我們簡直可以說「禮出於祭」了。然而這種「禮」也賦與了政治意義。

據說：孔子兒時嬉戲，常陳列俎豆之類的祭器，模做禮容，中國古代凡是一個熟悉一切禮文的人，就可以受到尊崇。春秋時孔門及其他兼通詩書禮樂的人們，所長也就特別是典禮的嫻熟，好多人於失職之後，就是專靠幫助人家的喪、葬、祭祀等事或傳受詩書和禮文以爲生活。這都可以證明禮在最初是很簡單的一種儀式，尤其是一種祭祀的儀式。後來逐漸把祭禮擴大於冠、婚、喪、祭等典禮，甚至於把它擴大爲貴族交際中的禮貌和儀節。各種典禮和儀節又逐漸成爲固定的秩序——例如升降拜跪之類，現在還可看見的「儀禮」一書，大概就是總括過去典禮和儀節的一種秩序單。然而這種繁文縟節的秩序單——這種「儀禮」也不是沒有政治意義的，

祭禮的擴大，後來不僅是冠、婚、喪、祭，不僅是交際的禮貌和儀節而且推之於一切大小事務。如我在論古代宗教及其他意識形態之政治作用一文內所引：『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以之閨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嫻，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更由此可使宮室得其度量，味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

其式，鬼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哀，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凡一切措施都無不得宜。」總之一切大小事務，一切公私生活，一切舉動，都要受「禮」的支配，這就成爲周代「禮教精神」之所寄，在這裏「禮」就更加政治化了。

作爲六藝（六經）之一的「禮」或禮經」，或已在周初形成，孔子之前，已有稱六經教人的。據國語：「士亹教楚太子之功課表中，已經有「詩」、「禮」、「樂」、「春秋」等」（見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六八頁）孔子當時教人的東西，也不外當時一般貴族子弟所學習的，「禮」、「樂」、「詩」、「書」、而尤其看重「禮」。他說：「不學禮，無以立」（論語）。不過他感覺「禮」到後來，不免徒有繁文儀節的虛偽形式，把「禮之本」看得比禮文更重，所以他說：「禮云禮云，玉帛之云哉！」「禮，與其奢也，甯儉。」「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均見論語）因此，孔子之所謂「禮」，在論語中，還有如下諸說：「克己復禮，一日克己復禮爲仁，天下歸仁焉。」「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人而不仁，如禮何」「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禮之用，和爲貴」。「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恭而無禮則勞，愼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從這些說法中便顯然

可以看出「禮」就是從外部施於個人之一種社會規範，也就是兼指一切風俗習慣政治社會制度的。因此，朱光潛先生也說：「禮的範圍極廣，個人的言行儀表，人與人的倫常關係，人與人交接的儀式和道理，政府的組織與職權，國家的制度典章，社會的風俗習慣等等都包含在內。」（見朱著「樂的精神與禮的精神」一文，載「思想與時代」第七期）而給與政治的關係，亦即禮之政治的作用，便更加密切而有力了。

時至戰國，荀子禮論，更循此而發展，其禮論篇論禮之起源說：「禮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這明明說出「禮」就是給「求」的「度量分界」。又於其修身篇說：「凡用血氣志意　慮，由禮則治通，不由禮則勃亂提慢，食飲衣服居處動靜，由禮則和節，不由禮則觸陷生疾，容貌態度進退趨行，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固僻違，庸衆而野。故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家無禮則不寧。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此之謂也。」這裏明明指出「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家無禮則不甯。」「禮」就是持身，處事，治國之一切衡量尺度。而尤其是禮論篇有如下一段說：「禮豈不至矣哉！立隆以爲極，而天下莫之能損益也，……故繩墨

誠陳矣，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縣矣，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設矣，則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於禮，則不可欺以詐僞。故繩者直之至，衡者平之至，規矩者方圓之至，禮者人道之極也。」這裏說的「禮」的內容，簡直就是法家所說的「法」的內容，試把下面法家所說的幾句話——「有權衡者不可欺以輕重，有尺寸者不可差以長短，有法度者不可誣以詐僞」（見愼子）拿來與「故繩墨誠陳矣，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縣矣，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設矣，則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於禮，則不可欺以詐僞」相對照，則「禮」就是「法」，「法」也就是「禮」了。換言之，荀子所謂「禮」，也就是法家所謂「法」了。

在春秋戰國時代，儒家把「禮」的規範作用，當作「法」的作用，亦即政治的作用來強調，鼓吹、提倡，固然是直接服從於當時的政治生活——政治目的，即把「禮」的規範作用，當作一般的——人或的事的規範作用來強調，鼓吹、提倡，也是在服從於當時政治生活——政治目的。儒家習稱以「禮」爲政治之具體辦法，梁任公把它叫做「禮治主義，並且說：「儒家之禮治主義，得荀子然後大成，亦至荀子而漸滋流弊。」（見所著先秦政治思想史一五八頁）然則依梁氏之見，「禮治」原是很好的，不過到荀子時就漸漸有「流弊」了，這種看法自是不錯。假如儒家把「德」，「禮」的政治作用估計在

「政」「刑」的政治作用之上，卽如前引：「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的說法，也是不錯的。但所謂作用的「上」「下」，只是爲達到政治目的，在上之治者所用方法不同——亦卽統治形式之不同，並不是政治作用的本質有什麽不同。換言之，卽施政的政策有「硬」「軟」的不同，而不是施政的根本方針有什麽不同。只要社會內部有了政治生活，則任何治者施政的根本方針，卽在維持其等級名分的差別，而使其上可治下，下不犯上。在古代社會關係比較單純的政治環境中，施政上運用一種「軟」的方法，——例如「禮治」的方法，或者是比較「硬」的方法——例如露骨的殘刻寡恩的法治，對於治者是更爲有利的，因此，我們對於「禮治主義」之本質的研究，必需從其等級名分的內容而有徹底的認識。「禮」是從外部加於個人的一種規範，而其具體內容卽是等級名分。所以傳謂：「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左莊十八年）「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左莊二十三年）關於等級名分的差別，梁任公謂「荀子更揚其波。禮論篇中歷陳天子應如何，諸侯應如何，大夫應如何，士應如何，庶人應如何；戴記中禮器郊特牲，玉藻……等篇，皆同此論調，斷斷於貴賤之辨數，其爲出荀子前抑出其後，雖未能懸斷；要之皆荀子一派之所謂禮。」（見所著先

秦政治思想史一六二頁）再引荀子在其榮辱篇有一段論：「夫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則從人之欲，則勢不能容，物不能贍也，故先王案爲之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貴賤之等，長幼之差，智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後使穀祿多少厚薄之稱……故或祿天下而不自以爲多，或監門御旅抱關擊柝而不自以爲寡。故曰：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一。」這就是荀子以爲人類身分境遇年齡材質上，本來是萬有不齊，因此，只有各依於萬有不齊，區別爲貴賤、貧富、長幼、智愚、能不能諸等級名分，以爲物質上享用之差等，使「或祿天下而不自以爲多，或監門御旅抱關擊柝而不自以爲寡」這就叫做「各得其宜」，也叫做「義」，把此義循爲公認公循之制度者，就叫做「禮」，所以梁任公於引用荀子榮辱篇如上一段話以後，也說：「荀子以爲只須將禮制定，教人晓安本分，則在社會上相處，不至起爭奪（以羣則利——荀子語，任公註）；爲個人計，亦可以知足少惱（以獨則足——同上）。彼承認人類天然不平等，而各還其不平等之分際，所謂眞平等。故曰：「維齊非齊」（亦荀子語，即眞平等就是不平等之意——筆者註）。然則荀子此說之價値如何？曰：長幼知愚能不能之差別，吾儕絕對承認之。至於貴賤貧富之差別，並非先天所宜有，其理甚明。此差別從何而來，惜荀子未有所告吾儕。推荀子之意，自然謂以知愚能不能作貴賤貧富之標準。此說吾儕固認

爲合理耳。然此合理之標準何以能實現，惜荀子未能予吾儕以滿意之保障也。」（見所著先秦政治思想史一六一頁）對任公這段話，假謂長幼知愚能不能之差別，是先天的，而貴賤貧富之差別，則非先天的。荀子一律看做天然的不平等，已不合理；即推荀子之意，以知愚能不能作貴賤貧富之標準，而此合理之標準，亦不易使其實現，即未能以滿意之保障使其實現。這或者就是任公所謂禮治主義至荀子而漸滋的「流弊」，但從禮治主義之本質來看，即從任何治者的施政根本方針都在維持其等級名分的差別，而禮治的眞實內容就是等級名分來看，則「禮治主義」的「流弊」，也就無所謂至荀子而漸滋了。

任公亦曾認定：「荀子所謂禮與當時法家所謂法者，其性質實極相逼近。」又昌言：「用禮之效率不如用法。」他說：「法度嚴明，詐僞不售，吾能信之；謂禮則不可欺以詐僞，則禮之名義爲人所盜用，飾貌而無實者，吾儕可以觸目而舉證矣。」（見所著先秦政治思想史一六三頁）其實天下事「飾貌而無實，吾儕可以觸目而舉證者」甚多。要在對於一切事理作本質的研究，方可揭發其眞象而不爲所欺。禮治主義之本質，就是要維持其等級名分的差別，尤其是荀子自己已盡情暴露，不擬持以欺任何人，惜任公之不諢煩而自欺也。

五　略論傳統的官僚政治

一　中國之傳統的官僚政治

社會生產關係的存續及生產關係的固定化，便要形成各種生產形態及特定的法律關係，更進而形成統治形態，這是一個必然的規律。因此，一切政治制度的存在，必由社會經濟基礎來規定，決非偶然發生的。

中國三千年來的政治制度，都是在連綿的專制體系中演變。而官僚則爲專制政治中之重要機能。

什麽是官僚？它是由所謂「士」出身的，「士」在中國非農非工非商，而是脫離了社會的生產過程，居於四民之首的一種特殊身分。

欲了解中國過去之政治組織及以後所謂新政治建設，必先由傳統的官僚政治之分析

出發。同時，官僚政治的禍根及其危機，「士」的身分之形成及其崩壞之過程，也不能不有所理解。因此，我們必須要從東方一般官僚國家之特質加以考察。

二 東方官僚國家之特質

一切社會雖在其生產不甚發達的時代，就必須有專門從事於勞動的指導者；同樣，還須有技術的發明者，及管理社會上之共同事務的精神勞動者，因此，便形成社會上的各種階層；社會遂陷於其自身不能解決的矛盾及不能調和的對立狀態。因此，在表面立於社會之上，而實際則為緩和社會矛盾衝突的一種公共權力，即所謂國家機構便成為必要了。

這是一般國家之形成過程。

東方的官僚國家是怎樣形成的呢？自然也不能外於這一過程。

所謂東方官僚國家，是指古代埃及、波斯、印度、巴比崙、中國等文化古國，及後起之土耳其國家等。這些國家之政治，以官僚制度之集中的表現為其特徵。支配者有無限之特權，把人民放在絕對的被支配地位，官僚是政治組織中的中堅人物，這些是東方官僚國家與歐洲中世紀的政治形態不同的地方。因此，如把東方各主要國家的政治組織

總括起來，就可叫：「東方專制國家」或「東方的官僚政治」。

從浮面看來，古代東方諸國在最早的極幼稚的農業經濟階段中，在許多無組織的村落下，營自給自足的生活，似乎不能使都市發達，交換範圍擴大，這樣，似乎很缺乏形成集中的廣大的官僚政治的物質條件；但下列二事，却補足了這種物質條件。這就是：

（一）共同的農業設備——例如治水、灌溉、築堤、及一切經濟利益與穀倉之設備等。這些都是與大衆生活有極密切之關係，而非一地方或少數人所能獨力經營者。

（二）對外的軍事防衛——例如爲防胡而建築萬里長城，以及其他軍事的攻擊與防衛，防衛要廣大的羣衆動員等。

以上二者，咸與民族之生存問題有關係，如果沒有一個集中的統一組織，便不能完成維持民族生存之任務，而這就是東方官僚國家所以形成的理由。即由分散的農業經濟趨向着政治的集中組織的理由。

而且埃及在金字塔時代（公元前三十一世紀到二十七世紀），巴比倫在漢謨拉比帝國時代（公元前十三世紀到九世紀），波斯在科士名王時代（約爲公元前五世紀）中國在秦漢時代（公元前三世紀到公元後三世紀），社會經濟已相當發達，地主，商業資本

家，也要求集中民權與統一的龐大帝國。

在這樣的國家內，最高的支配者欲維持其政權，就不能不把他的腹心爪牙分配社會事業的各部門，而形成一龐大的御用機關。這個龐大的御用機關，就是官僚的組織，官僚的職務是專門化了的，他們是脫離了社會生產過程之一羣，而站在支配社會的地位，因此，官僚系統，漸已形成一種社會制度，更進而形成一種在政治上具有特殊機能之一種力量，站在這官僚制度之上層的是帝王，帝王雖是世襲的，然至多不過數百年便倒；但官僚制度卻當然不發生動搖。處在這種官僚制度之下層的是老百姓，老百姓在小農的生產方式之下，只知安守天命，縱然因不堪壓迫而激起，原始的反抗，但其目標，亦在帝王，只要有新帝王一登場，老百姓又相與勝歌太平。所以官僚制度仍然不能動其分毫。因為官僚之一羣，是完全從社會生產過程脫離了的。其勢不惟無補於社會的生產，而且連生產上之指導的作用也不能盡，因此，只能成為特殊的落後的「東方專制國家」的柱石，與侵削老百姓的害虫。

三　士大夫身分之形成及其崩壞

具有東方官僚國家之本質的特徵的中國，由秦代至現在，差不多有二千年官僚統治

之歷史，與二千年之間的政治組織，形式上雖不無多少變化，其本質則無任何差異，同時，在這一過程中，官僚個人雖有新陳代謝，而官僚制度則始終一貫，即由選舉與考試，不斷的把所謂「士」者而升為「官」，使他繼續其官僚制度。

「士」進而為「官」，退而為「紳」，士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所以當時的學問，完全在造成一種「士」，由學而「士」，由「士」而「官」而「紳」，為當時士人終極之理想，這樣便形成所謂士大夫身分，亦即所謂知識分子。

士大夫的本身，雖然不能形成一個階級，實質上亦有其本身的階級性，關於士大夫階級的成因：

（一）他是封建貴族之擴大，其個人的生活由於地租或賦稅。其身分的信仰，由統治者的獨占，因之一面與地主有共同之利益；另一面在生產組織中與任何生產階級利益不相共同。

（二）士大夫與庶人之間，雖也有極少之流通性。例如選舉或科舉制度，能使庶人之優秀分子，加入士大夫群，或與士大夫通婚者及士大夫之近親，也常能取得士大夫身分。再則官階可收買，由於考試的更不待論，自然取得士大夫身分，而士大夫的子孫，更能繼承父祖之光榮。這就是少數庶人也間或有能成為士大夫之故。但士大夫之所以成

會生產矣，不是從體力勞動可以得到的，所以庶人之上昇爲士大夫究竟是不容易的。

然而由於專制國家的需要，中國之士大夫數量，總是隨時代之經過而增加……數量不斷增加的結果，又使智識分子之數量顯著的超過社會的必要以上。

中國在春秋時代，隨着諸侯的爭雄與民衆的興起，原始的封建制度早已開始崩壞。在這中間，便使得士大夫者流，在社會上有了相當的活躍。那時，齊之孟嘗君，趙之平原君，楚之春申君，魏之信陵君等，其門下就有食客數千，而養士之風特盛。但這不過是中國士大夫階級形成之始，那時的士大夫還沒有在社會上形成何等具體的力量。

秦始皇代表地主商人的要求而登場，由武力統一中國，「焚詩書，坑儒生」，「成爲歷史上之有名插話。跟着他廢封建立郡縣，要把中央的權力，直接達於民間，又不得不僱用一般由儒生而來的官吏。

所以這個時候，士大夫階級雖不免少受秦始皇之打擊，而在這裏官僚制度却已有萌芽

漢高祖係當時泗上亭長，仍是代表地主商人的，雖是由馬上取天下，「馬上得之」，總不能「馬上治之」。於是詔令天下，謂有「賢士大夫，願從我遊者，吾人尊顯之」

，這樣便助長了士大夫階級的發達。

至於漢武帝，罷黜百家，表彰六經，中國士大夫階級的社會基礎便漸告確定。此後政客，學閥、及新官僚，其階級屬性，依然爲士大夫，其對於社會的作用之一種，完全助長了官僚制度。

中國歷代的封建軍閥，都是武力取天下，由文治的補助而維持其勢力，這一點是與歐洲中世紀的封建社會大不相同的。

在歐洲是諸侯之下，農民之上，有一個武士階級，在中國是皇帝之下，農民之上，有一個士大夫階級，但是無論中國或歐洲，都是建其社會基礎於土地所有權，卻完全一樣。

士大夫的身份之取得，如前所說，也是依存於社會的經濟機構的，當然要隨着經濟機構之變化。由於最近數十年來資本主義列強經濟勢力在中國之發展的進步，與依附封建勢力之士大夫階級，便開始變化與崩壞，變化與崩壞雖開始了，但同時由於封建制度還未根本變革，而民族資本之不振，又不能容納新的智識分子於其生產組織之中。更由於在政治方面，皇帝被打倒了，舊的士大夫失却根本的依存者，與由於軍閥之興起無常的結果，還增進了一般士大夫無人格之投機性。而軍閥又多年喜引用私人，與優秀的

知識分子不相容，於是一部分士大夫官僚就更加無恥、卑鄙、下流、阻止了中國發展的前途，成爲中國不能徹底近代化之一因素。

四　官僚政治之特徵與其危機

中國士大夫之參加政治機能者，便是官僚，中國官僚政治以士大夫階級爲其背景，已如前述。

因此，官僚制度與士大夫，便形成在一個社會中之陰陽的兩面，官僚系統，不過就是士大夫階級在政治機構中最活躍的一部分。而士大夫身分，也就是官僚之後備與退伍的場所。

原來官僚是集權國家之一種必然的產物，因爲集權國家所需的是權力之集中與指揮之統一；然而這不是一個帝王或少數的最高統治者所能做到的，必需僱用一批有學問會較能學專門人材。這些所謂專門人材就是官僚。

中國的官僚制度，發生於原始的封建制度開始崩壞的時期，而建立於統一的專制主義的封建的秦代。但因秦代交換經濟的發展程度，不能適應秦代之過度擴張的領土，因之，那時官僚制度，也就還沒有形成一種堅固的具體的力量，所以不久秦始皇的天下，

就由破產的農民及地方之豪族士紳所倡。西漢初期的復古運動，以地方的農業經濟與城市的商業經濟相對抗為其表徵，而繼承着由高度的跳躍的中央集權解體而來的分離運動，是當時之客觀的情勢。

但在爾後的中國，文化的確定了以孔學的士大夫之階級基礎。所以為士大夫階級之學面的官僚制度，便在中國具有堅實不破的二千餘年之歷史。

秦代是地主商人之官僚制度的商業化，西漢以後，便轉換於以地主利益為主之分治共同的官僚制度，所謂孔學定於一尊，就是當時（西漢時）社會關係之固定的反映，也就是封建地主社會意識形態的最高表現。

現存之社會關係，產生孔學的意識形態；孔學意識形態之固定、擴大、深化，又統治了當時的社會關係。這便是歷史上主觀與客觀相互影響作用之好例證，也就是二千年之地主，官僚孔學三位一體的標準形態。以上就是中國官僚政治之形成的全部過程。

在中國官僚政治的形成過程中，若而縝密分析其特徵，則有如次之諸點：

（一）官僚政治以士大夫階級為背景，士大夫是脫離了社會的生產過程的一羣，因為，官僚是不生產的，而是寄生的。

（二）官僚政治是受着從上而下的機械的一層一層之節制，自然無自愛的意識與創

性發展之餘地，不過是受動的壓制過程中之一機械，惟一的任務，就在聽長官的命令。所以其結果，是「私僕」，而非「公僕」。

（三）官僚政治是與地主孔學相聯絡的保守的逆時代的，官僚非地主而擁護地主的利益，極力維持封建的保守的社會秩序。

在官僚政治的特徵之中有以上的結果，所以便包含如左之危機：

（一）政權既操縱在不事生產的士大夫階級手中，當然是得過且過，不能進步。因此，使生產技術的進步陷於不可能，而招致生產力之衰退，中國社會二千年來無何等進步亦其原因之一。

（二）官僚既是「私僕」而非「公僕」，所以他是爲君的，不是爲民的，那種廣大的政治體系，高高的建築在下層群衆之上，使得廣大的人民大衆與政治脫離關係，政治是政治，人民是人民。結果，便使中國二千年來的政治都與人民不相干。

（三）官僚在某一時期既轉換於以代表地主利益爲主，故重農輕商，官僚所擁護的社會文化既是復古保守，故厭新喜舊，絕不適於二十世紀之今日。

總括上說，足見官僚政治是反近代化的，是「私僕」而非「公僕」，是爲君的不是爲民的，大與近代民主政治不相容。士大夫階級的官僚系統不打破，政治而民主化，簡

然談不上，整個歷史的發展也會停滯下來，由於近數十年來經濟機構之急遽的變化，由於洋務、維新、立憲、革命之政治上的遞嬗，由於表面上之堂而皇之的新政治建設，原來依附封建勢力之士大夫官僚，確實是在開始變化與崩壞了，但又由於上述某些原因（如皇帝的被打倒）軍閥之興廢無常等，卻反而助長了士大夫官僚之更加卑劣下流，無恥。這尤其是更為「確然」的事實啊！

六　俄國民主革命及沙皇制度的崩潰

「沙皇專制是人民最兇惡的敵人」，「在沙俄之下工人和農民沒有任何的政治權利」，「沙皇俄羅斯是各民族的牢獄」，「沙皇專制實在是非俄羅斯民族的劊子手和暴君」，「沙皇的俄國是歐洲的憲兵」。這一串形容沙皇制度的可怕可恨的名詞，是我們聽得很熟很慣了的，因此有人一提到沙皇專制，就使人聯想到比一切專制政治更兇、更毒、更可怕、正如我們現在一提到法西斯主義及其野蠻獸性的獨裁一樣。

但這兩者——沙皇專制與法西斯獨裁——究竟是有其區分點的，這由於後者是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時代大資本家支持其瀕於崩潰的統治的一種專制政治形態；前者則是封建主義時代大地主支持其瀕於崩潰的統治的一種專制政治形態，兩者亦有其共同點——這便是它們都反民主，反理性，反人民大衆，反一切進步的東西。

當十八世紀末——一七八九年法國反封建奴役的民主大革命從打破巴士的監獄的人

民力量展開出來的時候，農奴制度的奧國和普魯士，都曾經是支持路易十六及封建貴族的柱石，極力想把他們從民主革命的火燄中解救出來，而沙皇俄羅斯尤其是支持全歐封建王權的最後堡壘，為了反對歐洲的民主革命，為了穩定搖搖欲墜的封建王權的統治，沙皇俄國，奧大利及普魯士農奴王國相互之間曾締結了一個反動的「神聖同盟」，（一八一五年九月二十六日，由俄、奧、普、三國君主的名義公佈神聖同盟宣言）他們立下誓約，在反對民主革命運動中，互相幫助，奧相梅特涅利用這個同盟的名義，着實摧殘了各地人民的自由權利，而這一個反動同盟的首領，則為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一世，於是沙皇的俄國便成了歐洲的憲兵。

但是這個憲兵是一個蹩腳的憲兵，它不但沒有用它的武器把全歐的封建王權保持住，把民主革命的烽火熄滅，而且不曾用它的力量把俄國沙皇專制保持住，把俄國民主革命的烽火熄滅。

原來俄國比之西歐各國，是一個經濟落後的國家，十八世紀末的法國大革命確立了近代的民主政治，可是俄國還是一個專制主義國家，即有名的沙皇專制，在沙皇專制下，地主對於農奴有絕對的生殺予奪之權，有各種掠奪的方法，工人的狀況也是非常困苦的，工作時間至少為十二時半，而在紡織工業中則往往達到十四至十五小時；站在農民

和工人之上還有整套的一串軍隊、保衛團、保甲、憲兵、警察、警衛隊、哥薩克兵等，農民因極小的過失，時時遭受鞭笞，工人在能工的時候，警察和哥薩克便任意毆打工人，於是在沙皇專制之下，工人和農民便沒有任何的政治權利，沙皇專制便成了人民最兇惡的敵人。在沙皇專制下，許多非俄羅斯民族更完全沒有權利，沙皇政府唆使俄羅斯人民對於各小民族當作下等民族看待，公開稱他們為「賤種」，鼓勵鄙視和仇視他們，故意製造各民族間的摩擦，激動這一民族反對另一民族，組織對猶太人的蹂躪，在南高加索地方則組織韃靼人和亞美利亞人的互相殘殺，於是沙皇專制便成了非俄羅斯民族的劊子手和暴君，沙皇俄羅斯便成了各民族的牢獄，但它總以為這種沙皇專制，是鞏固封建王權的奴役統治，阻止人民民主革命的絕好方法和手段，殊不知任何專制魔王，也阻止不住歷史車輪的前進，任何反動力量，也不能與前進的時代精神相悖逆。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經濟落後的俄國，亦跟着西歐步入工業革命的階段。在十九世紀前半期，俄國手工紡織工業的發達非常可驚，五十年間棉花消費量增加到五十倍之多，貨物的銷路既大，採用機器開設工廠的可能性便已存在，所以一八〇八年，莫斯科便出現了第一個應用機器的紡綫工廠，一八一三年（神聖同盟締結前兩年）機器紡織工廠增至十一個，至一八五〇年（中國太平天國起義之年）俄國紡織廠已佔世界之第五位，鐵道也於此

時開始敷設。一八八〇年以後，工業革命的進展更加迅速，所以自一八八七到一八九七的十年間，俄國大工廠製造品的價值增加三倍，鐵路增至二萬二千六百英里，各種重工業如煤鐵礦也相繼開採。

近代工業發展的結果，在沙俄也正如西歐一樣，首先便引起工人階級的抬頭，據統計：一八八七年，俄國工廠工人數約一百三十餘萬，十年後增至二百一十萬，逐漸超出三百萬以上，勞工運動在沙皇專制底下居然也發動起來了，近代工業發展的影響，不僅直接促使勞工運動的興起，同時，且引起農民運動及其他政治問題，思想問題，招致所有人們生活的全面變革。所以我們的西洋史專家何炳松先生說：「普雷味（Plohvo 一九〇二年尼古拉二世的內政部長，著名毒辣殘忍，當時凡是胆敢批評政府的人，無不被其逮捕，受其毒刑——筆者註）以為俄國政局的不安，完全由於少數叛徒的搗亂……其實當時反對政府腐敗的人，有專門職業家，有大學教授，有開明的商人，并有熱心國家的貴族，……他們的希望在於召集民選的國會，努力改進農民和工人的困苦生活。他們亦主張言論、出版、和集會的自由；并主張廢止秘密偵探和異教慘殺等黑暗的手段」。（見所著外國史下冊二三九——二四〇頁）這些話是說得不錯的，果然，在法國大革命爆發不久，亦即接近於俄國產業革命的十八世紀九十年代，在俄國已有同情於革命的人。

而那時同情於革命的，正是那時最有教養的人物之一——拉第布夫貴族，他寫了一本書，名叫『從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記』，在書裏面公開反對農奴制和專制政體，而表同情於農奴反地主的暴動。那時俄國沙皇是卡切林二世（亞歷山大一世前兩個皇帝——筆者註）。卡切林二世是怎樣對付這個革命者的呢？她便把拉第布夫充軍到西伯利亞，並下令燒毀了他的書。

接着又有『十二月黨人』的暴動，十二月黨人就是一些貴族出身的軍官，他們於出征國外時，看見法國沒有農奴制，農民的生活要好些，農場和工廠裏面的僱傭勞動，而且要比農奴制有利些；同時，他們看到西歐各城市人們的生活，要比俄國富裕而有教養些，這些貴族的軍官們幻想着自己的祖國也應有這種生活，他們便組織了秘密的革命團體，準備打倒沙皇專制政體。因為他們曾起義於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故歷史家叫他們做『十二月黨人』。那時俄國的沙皇已是尼古拉一世（亞力山大一世之弟，嗣兄位），他是怎樣對付這些起義者的呢？他在壓服暴動以後，便大肆逮捕一切參加暴動的人。那時參加的有好多是農奴，也有好多是工匠及建築工人，尼古拉一世把五位主要領導者的貴族軍官絞決了，把一百多謀叛的軍官充軍，把一些參加的羣衆則派到高加索的現役軍隊中去作苦工，但『十二月黨人』是首先有組織和公開的拿着武器在沙皇首都反對

沙皇制度的人，他們的事業並沒有因失敗而湮沒。

尼古拉一世自經過一八二五年（卽他卽位的一年）十二月十四日的暴動以後，他爲了反對革命，曾成立了一種特務組織，對於全體人民，都由他們予以嚴密的監視，他們暗中偵察人民的一切假尺行動或竊聽人民的一切私人談話，稍有嫌疑，或根據一點不確實的情報，便加以逮捕。而尤其是接二連三做了許多摧殘前進文化人的事。

在尼古拉一世時代，產生了一個天才的俄羅斯詩人普式庚，他寫了好多優秀的作品，猛烈的指斥農奴制和專制政體。因此禁止他的作品發行；後來又因爲他與十二月黨人接近，竟至由宮廷方面派人把他謀害了。謀害的方法是決鬥。另一有名詩人萊蒙托夫，尼古拉一世也把他派到高加索現役軍隊裏去作苦工，最後也是派一個軍官與他決鬥被暗殺的。還有當時俄國第三個有名的大作家戈果里，在他的名作「死靈魂」和「巡按」裏面，把農奴俄羅斯的痛苦生活，描寫得淋漓盡致，也受盡了憲兵警察的各種迫害。此外文藝批評家柏林斯基，大作家格林加，烏克蘭的詩人，革命家和藝術家謝夫欽科，都是在尼古拉一世之下被迫害死掉的。柏林斯基患着肺病，時時被憲兵偵緝；格林加的歌劇被禁止上演；謝夫欽科被他們交給憲兵看管，罰作現役軍隊苦工十年。

不久（一八六一年以後）民粹派的革命運動及其暗殺的恐怖主義出現了。這些革命

著感受一八六一年農奴解放之不澈底，很快就在俄國好多城市內，尤其在俄國青年中（大半爲大學生）組織革命研究會，在研究會裏，熱烈的討論如何幫助農民革命的問題。最後決定到鄉下去與農民生活在一起，號召農民起來暴動，反對沙皇和地主，所以當時他們的口號，就是「到民間去」！同時，并組織了一個秘密團體，叫做「民意社」，準備採取恐怖手段，刺殺沙皇，亞歷山大二世，就是被他們炸死的。這些革命者被當時人稱做「民粹派」，當時民粹派中最偉大的俄羅斯學者，還要推車爾尼什夫斯基，他在兒童時代，就目睹了農奴和伏爾加河船夫的艱難生活，後來寫了好多論文，主張給農民以完全自由，并把地主的全部土地無代價的交給農民，一八六一年的農奴解放既不澈底，車爾尼什夫斯基便跟其他民粹派革命家共同決定號召農民舉行暴動以反對沙皇和地主。因此，他曾寫了一篇「告領主的農民書」，秘密散發，結果，被沙皇的憲兵搜去了，當時，尼古拉一世已死，嗣位者爲亞歷山大二世，亞歷山大二世便把這位革命者囚在彼得羅巴洛夫要塞內，後來又把他充軍作苦役。他的一生在監獄和充軍裏，整整被羈押了十九年，然而這位堅定的革命家，并未放棄他的信仰，反對沙皇地主，至死不變。當時民粹派所領導的革命，從基本理論到戰術策略，雖然都是錯誤的，而其革命者的堅定勇敢，任何人都不能不給以很高的評價。

對付革命者的殘酷，亞歷山大二世較之尼古拉一世並無遜色，然這只是大風暴前的「月暈」「礎潤」，揺撼沙皇專制的眞正革命力量還在後頭。就在亞歷山大二世時代，俄國的工人革命運動就開始了，爲了革命運動的便利，還成立了工會。不僅如此，一八八三年，出現了第一個俄國馬克思主義的集團——「勞動解放社」；一八九五年（中午中日戰爭結束之一年），出現了馬克思主義工人小組的聯合組織——「爭取工人階級解放鬥爭同盟」：這是依靠於工人運動之上的革命政黨的第一個重大的萌芽。一八九八年（中國戊戌政變之一年）出現了第一個馬克斯主義的政黨——「社會民主工黨」。（後來分裂爲孟塞維克與布爾塞維克兩派，依賴着後者，最後打倒了沙皇，完成了十月革命，革命後改稱共產黨）一九〇三年社會民主工黨召開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黨綱，正式成立，這個黨綱分爲最大限度與最小限度兩部分。在最大限度的（亦卽最高的）黨綱中，講到工人階級政黨的主要任務，是社會主義革命，推翻資本家政權。建立無產階級政權。在最小限度的（亦卽最低的）黨綱中，講到黨最近時期的任務，是推翻沙皇專制政體，建立民主共和國。最小限度的黨綱所規定的革命，還不是社會主義革命，而是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命，「在最好的情況下，它只能夠實現有利於農民的土地私有的徹底的重新分配，施行徹底的完全民主主義共和國，從根剷除鄉村中和工廠生活中的一切亞洲

式的奴役的成分，鄭重的改善工人生活狀況及提高他們生活水準，最後把革命的火延燒到歐洲去」，「并從資產階級革命轉到社會主義革命」。根據俄國最近時期的革命形勢，亦即根據最小限度的黨綱所提出的主要政治口號，便是：「民主共和國，八小時工作制，沒收地主階級一切土地」，沙皇俄羅斯自從有了上面所說那樣一個革命的政黨之後，在它的領導之下，工人們便不斷的舉行罷工示威，紛紛奮起參加反對沙皇政府和工廠主的鬥爭，農民、兵士、也配合着起了不少的反對地主，反對將官的暴動。而在各種革命起義的事件中，最重要的震動全世界的革命，則是一九〇五年的第一次革命和一九一七年二月第二次革命。

一九〇五年一月初，彼得堡一個很大的工廠罷工，很快的就發展為總罷工，五月初，紗廠中心——伊凡諾夫開始特別頑強的罷工，并成立了一個蘇維埃，這是俄國的最初工人代表蘇維埃之一。一九〇五年秋季，革命運動蔓延到了全國，每天都有新的工廠和作坊的工人加入罷工的隊伍，十月間，莫斯科各鐵道開始罷工，小學教師、醫生、大學教授、學生、也都隨着工人而捲入鬥爭。到十二月七日，罷工很快的轉變為武裝起義，工人糾察隊與沙皇警察軍隊，互打了好幾天，沙皇利用大砲和機關槍才擊敗了起義者。在這一期間，差不多全俄的農民，都受了工人運動和布爾塞維克號召的影響，都奮起

反對沙皇和地主，奪佔地主的土地，砍伐地主的森林，并燒燬他們的房屋，而且黑海戰鬥艦「波喬姆金」號亦於一九〇五年六月爆發了水兵的起義，沙皇是怎樣對付這些起義者的呢？這已是尼古拉二世的時候了，他的昏愚殘酷較其前皇尤甚。他把一九〇五年一月二十二日，變成「流血的禮拜日」，這是舉世皆知的，這就是他屠殺赤手空拳向他請願的男女工人及兒童的結果。一九〇六年他還命令他的大臣，亦即人民劊子手的斯托里賓，頒佈了一種無情消滅革命者的法律，從一九〇六年到一九〇九年，根據這個法律，絞決的達二千以上，派作苦工，充軍及囚在獄中的共有兩萬五千人。還有未經法庭審判秘密槍決或烤打死的，不下數萬人。殘酷啊！毒辣啊！他滿以為一味高壓就可以保持沙皇專制及其少數人的封建特權，但第一次民主革命并未壓下去（只是獲得短時間的革命低潮），第二次的民主革命又來了。

俄國第二次的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命，是爆發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諸年——一九一四到一九一七年——而革命的新高潮，實自一九一二年春間林納（在遼遠的西伯利亞荒原的林納河畔有幾家英國資本家金礦）各金礦的工人罷工開始，一九一二年五月一日，俄國罷工人數達五十餘萬，鄉村農民也重新拿起斧頭鐮刀。毀壞地主的莊園。自一九一〇至一九一四年，農民的革命義舉達一萬三千次以上，人民掀起新的鬥爭來迎接新的革

命了。一九一四年秋，第一次世界大戰揭幕，七月十四日（俄歷）沙皇宣佈總動員，十九日德國向俄國宣戰，俄國也欣然的踏入戰爭的砲火中。沙皇及俄國的地主資本家，滿希望他們的專制政體或沙皇制度，成為一個裝甲拳頭，能夠保障他們鞏固舊的封建王權，奪取新的市場和新的土地，另一方面壓服工農革命運動，不料戰爭進行到了第三年（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七），犧牲了的性命已不下千萬人，有的陣亡，有的受傷，有的死於瘟疫。同時，戰爭普遍的破壞了國民經濟，工人農民日益窮苦不堪，居民和前線兵士，都在餓着肚子，赤着雙脚，穿着破衣，而資產階級和地主及一切政治上的權勢者，却都在戰爭中發了大大的橫財或國難財，在沙皇的宮廷裏面，宵小如拉斯普丁（Basputin著名妖僧，皇后的嬖臣）之流，還在那裏操縱一切，勾結敵人。所有這些都引起了工人、農民、兵士及知識分子對沙皇政府的痛憤，不論在後方或前方，不論在中央或在邊疆，都加強了民衆反對戰爭反對沙皇制度的革命運動。

一九一七年的革命，是以一月九日（俄曆）的罷工開始的，二月十八日，二月二十三日，二月二十四日罷工運動更加展開，二月二十五日，革命運動包括了全彼得堡的工人，二月二十六日晨，政治罷工和遊行示威，開始轉變為武裝起義的形勢，工人解除了警察憲兵的武裝而武裝了自己。二月二十六日午后，彈壓工人的軍隊開火了，但不是向

工人開火，而是向射擊工人的城防騎兵隊開火。這時（二十六日）布爾塞維克發表宣言，號召繼續反對沙皇制度的武裝鬥爭，成立臨時革命政府，二月二十七日彼得堡的駐軍轉到起義的人民方面。起義的工人和兵士，開始拘捕沙皇的各部長及軍官，釋放獄中的革命者及政治犯，當彼得堡革命勝利的消息，傳到其他各城市和前線的時候，工人和兵士到處都起來推翻沙皇及其官吏了。從此三百餘年來統治俄國的羅曼諾夫皇族——沙皇專制，沙皇制度，乃一旦崩倒。從此封建主義時代大地主賴以支持其封建主權的最後堡壘，乃歸於毀滅，臨時革命政府，便把皇帝和皇后及皇太子等送到烏拉山外，西伯利亞的荒村中監禁起來，連所有沙皇的高級官吏都一併監禁在歷代沙皇監禁革命黨人的同一地方。同時并下令，釋放所有國內各處的政治犯，和尚在西伯利亞監禁的老革命黨老政治犯。一時工農民衆，無不歡聲雷動。

俄國二月革命勝利了，這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對沙皇專制主義，封建主權的勝利；還不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但沙皇制度總是最後失敗了。沙皇專制在當時可以說是超等的專制，它的失敗，决不是由於它的高壓手段不夠；沙皇當時也可以說是最嚴密最機巧的專制，它的失敗，也决不是由於它的防範不周，用心不深，我們除了看見上述歷代沙皇對付革命者，對付工農，對付前進文化人的種種直接的，赤裸裸的，毫無掩飾的慘

無人道的高壓外，他們也製造自己的御用團體，去間接的側面的打擊革命者，如「黑色百人團」「俄國人民同盟」，「保皇派」，「貴族聯合會」以及「十月十七日同盟」（十月黨），「工商黨」，「和平更新黨」等團體，都是他們所支持的對革命行兇的御用機關，尤其是「黑色百人團」，當時曾公開的在警察幫助之下，毆打、殘殺革命的工農，及先進的智識分子，並搗亂人民的大會或小集會。而在革命一天一天尖銳化的時候，自由派的「立憲民主黨」，小資產階級的「社會革命黨」，「孟塞維克」，也曾經是有意無意的直接間接的爲沙皇所御用了的。他們還採用過玩弄手腕的政策，即分化革命陣營的政策，一方面經過自己在各工人中間的內奸，唆使工人走向死路，如一九〇五年工人罷工正走入高潮時，以加朋牧師爲首的「工人社」，就是領導工人向沙皇請願，而造成流血的禮拜日」的內奸組織，另一面經過自己在各民族中間的內奸，挑起俄國境內各民族間的惡感。如故意把非俄羅斯民族看做賤種，組織虐待猶太人，並使韃靼人與亞美利亞人互相殘殺，就是這一種內奸作用。更其巧妙的是他們也有過對人民允諾維新，立憲、召開國會等等的欺騙。例如，一八六一年亞歷山大二世頒佈的農奴解放令，這叫做沙皇俄羅斯的維新，農奴解放令頒佈後，農民身體雖然比較自由了，但所得土地比在維新前還要少些，而負担卻反而重些，這不是欺騙是什麼？一八八一年三月，亞力山大二

被迫不得已的又宣布立憲，關於一九〇五年，尼古拉二世發表其十月十七日宣言，在宣言中明確指出公民自由的不可忘却的基礎，是「人身的眞正的不可侵犯，信仰、言論、集會、結社的自由」。并允許立即召集國會，讓人民一切階層都參加選舉，但所謂立憲，召集國會，也是對人民的欺騙，即是說，很顯然的，它還是沙皇的詭計，用以求得沙皇所必需的喘息，以便安靜那容易輕信的人，取得時間，集中力量，然後猝不及防的來打擊革命，甚至消滅革命。後來的事實都證實了它的欺騙，當時在民間流行着關於沙皇宣言的歌曲道：「沙皇駭怕了，將宣言發表，死者得自由，生者坐監牢」。

所有上述種種，已夠沙皇最後掙扎的了，但沙皇制度總是最後失敗了。這是封建王權的專制主義對民主主義失敗之歷史法則的必然。沙皇制度并不是沒有掙扎便情願自己倒下去的。獨佔資本的法西斯主主義對於民主主義失敗之歷史法則的必然又在顯現了，一切野蠻獸性的獨裁制度也并不是沒有掙扎便情願自己倒下去的。

所怪的是前一個倒下去了，後一個偏偏還要學它的樣兒——儘管學得并不大像——跟着倒下去！

七　從政治上觀察蘇德戰爭

以蘇德戰爭為主體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它的最後勝敗歸在那一方面，是決定整個歷史方向的，所以無人不關心着它，自蘇德戰爭展開以來，從各方面來分析它，觀察它的異常之多，尤其是從軍事方面。雖然軍事方面的分析與觀察，仍然需要軍事家各方面的認識水準，尤其是政治水準，但單從政治方面，或特別強調政治方面的分析與觀察，究覺比數的少。所以我不揣冒昧，特乘蘇聯十月革命二十四週年的光榮節日，來從政治上對於蘇德戰爭作一淺薄的觀察。

從政治上觀察蘇德戰爭，並不是撇開軍事因素，而是要把軍事與政治配合起來看，或者說要把軍事放在政治的總目標總任務下來看。如果我們單從軍事上來觀察蘇德戰爭，它的前途，顯然有三個：一、蘇勝；二、德勝；三、相持。但相持之後的最後勝敗是無定的。如果我們把軍事與政治配合起來，或把軍事放在政治的總目標總任務下來觀察

蘇德戰爭，則相持之後的最後勝敗，是有定的。卽最後的勝利必定歸於蘇聯方面。把這一原則用來觀察中日戰爭，也是如此。如果我們單從軍事方面觀察中日戰爭，它的前途，顯然也有三個：一、中國勝；二、日寇勝；三、相持。但相持之後的最後勝敗，是無定的。如果把軍事與政治配合起來或把軍事放在政治的總目標總任務下來觀察中日戰爭，則相持之後的最後勝敗，是有定的。卽最後的勝利必定歸於中國方面。這一原則不僅可以用來觀察中日戰爭，而且可以用來觀察一切戰爭，任何戰爭。我們常說，世界大戰的最後勝利是蘇聯的，中日戰爭的最後勝利是中國的，其科學的根據就在這裏。

有人說這很奇怪，兩個民族國家的矛盾衝突，到了在戰場上砲火相見，難道決定最後勝敗的，還不是看那個的兵堅，砲利，那個的坦克多，飛機兇些嗎？一句話，還不決之於軍事的強弱嗎；殊不知「無重工業卽無國防」，「無科學卽無國防」，一個近代國家的有機構成是政治、經濟、外交、文化、軍事各種要素的有機配合，多了一樣，少了一樣，固然不行，卽是那一樣過於突出那種要素的發展不平衡，都要減少它的力量。而且政治在成爲各種要素之一部門的條件下，參加國家有機構成的各種要素是平列的；而在政治的總目標、總任務、總方向、總路綫的意義上，它便在各種要素中取得決定根本圍裏的「政治性的」主導地位，軍事、外交、乃至經濟、文化，都得追隨着它，都得跟

着它的方向走，都得服從它的領導，以它爲依據而決定經濟計劃該怎樣定，文化政策該怎樣立，外交該怎樣辦，仗該怎樣打。這就是我們常說的政治問題才是根本問題，政治問題解决了，一切才能解决，政治有了辦法一切才有辦法，所以表現在我們抗戰過程中的有些問題，例如戰時經濟財政政策，戰時教育文化政策，乃至較現實而且具體的糧食問題，物價問題，兵役問題，前綫士氣問題，後方民氣問題，甚至軍紀、風紀問題，歸總都不外是一個政治問題——一個政略的總目標，總任務、總方向、總路綫的主導問題。

一個生於一七八〇年，死於一八三〇年的德國軍事理論家克勞塞維資將軍，在他所著的戰爭論裏面說得好：「戰爭不外是以別種手段來進行的政治繼續。」又說：「戰爭決不能脫離政治關係來觀察。」他甚至在其戰爭論的第六章，就拿「戰爭是一種政治底手段」作標題，來展開下述的理論：「不用說，所有的人都知道，戰爭是由各國政府和各國人民底政治關係所引起的，但是大家常常把這件事這樣的想着，即隨戰爭底開始，這種政治關係就中斷了，而現出一種遵循獨自的法則的完全不同的狀態。但是我們底主張却相反。即戰爭只是以別種手段來進行政治關係的繼續。我們說明別種手段來進行，但是有時就是爲了要強調下面這件事，就是說這種政治關係不是由於戰爭本身而中斷，而

種成完全另外一種東西，不管它所用的手段採取怎樣的形態，這種政治關聯在本質上是體戰爭看的，並且與它相關係的軍事上諸事件發展的主要方向，一直到媾和為止，都是由影響戰爭的政治所描畫出來的……。」戰爭既是政治手段，戰爭既是不能離開政治關係來觀察的，戰爭從開始一直到媾和為止，既都是由影響戰爭的政治描畫出來的。這就是充分說明沒有無政治目標或政治任務的戰爭，戰爭只是為要完成它的政治目標政治任務。在它的政治目標，不能用政治手段達到或政治任務不能用政治手段完成時，這才爐火相見，就如納粹德國的政治目標或政治任務，是要以少數匪類征服奴役全世界全人類，牠未嘗不想用政治方式外交手段或欺騙政策達到或完成，然而遇着了非用武力不能解決的因世界全人類堅強反納粹反侵略的障礙，才有「西侵略戰爭及本年六月二十二日爆發的侵蘇戰爭；反之社會主義蘇聯的政治目標或政治任務，是要建設社會主義，與這全世界全人類民主自由永久和平的基礎。更必須只在埋頭建設，互不侵犯，因此用外交方式與各國簽定了許多互不侵犯協定，蘇德協定，正是墨瀋未乾，然而遇着了希特勒強盜匪軍的侵略來阻止他的政治目標或政治任務的達到與完成，所以也不能不踏進全世界反侵略反法西斯抗德戰爭的範圍。這正是充分證實了無論侵略戰爭與反侵略戰爭，從開始到終斷，都是由影響戰爭的政治描畫出來的。所以有人說：「戰爭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

不流血的戰爭」。

根據軍事力量是從政治、經濟、文化、外交等之適當有機配合發生出來的這一點來看，蘇聯是一個各種要素都有着高度發展的國家，而且是各種要素都有着適當的配合，各部門的發展都極不平衡的國家。所以它能夠擁出空前無比的力量，把納粹德國希特勒野心的膨脹，長期牽制在列甯格勒，莫斯科的外圍，一寸土，一寸地的退出，務要納粹所需付出十分重大的代價，它能長期消耗納粹使有一天納粹要自己倒斃在自己的血泊之中，自己踏進自己掘就的墳墓。納粹的墓地也許就在莫斯科四周，也許就在逐漸迫近嚴寒的冬季，總之最後的勝利必屬於蘇聯而不是納粹德國。

這一點一定會有人提出反駁說，如果根據軍事力量，是從政治、經濟、文化、外交等之適當的有機配合發生出來的這一點來說，這豈不僅是蘇聯特有的優點，而且也是納粹德國同樣的優點。納粹德國之所以能一舉而殲滅歐洲十四個國家，能一舉而使法蘭西投降，能一舉而攻入社會主義蘇聯，進而威脅着蘇聯的新舊首都莫斯科、列甯格勒。也正由於它是從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外交等各種要素都有着高度發展的國家，而且是各種要素都有着適當的配合，各部門的發展都極不平衡的國家。在這一點上，與其說它同蘇聯一樣，毋寧說它更超過蘇聯。它的高度的工業化、機械化、技術化，而是舉世聞名，

[illegible]的。那末，納粹德國為什麼不能獲取最後勝利的戰果呢？而最後的勝利反而必然是屬於蘇聯的呢？

不錯！納粹德國在這一點上的確與蘇聯具有同樣的優點，甚至它的優勢反而超過蘇聯。但如果把軍事放在政治的總目標總任務下來看，即根據「戰爭不外是以別種手段繼續進行的政治」這一根本論綱來看，納粹德國與蘇聯就有着本質上的不同。即納粹德國政治的總目標總任務總方向總路線，是與蘇聯有着本質上的不同的。這由於納粹德國在本質上是一個最後階段的帝國主義國家——垂死的帝國主義國家，逆着歷史方向的少數匪幫；而蘇聯則是一個新興的社會主義國家——走着向上發展的少壯國家，順着歷史方向走的天之驕子。垂死的帝國主義國家，它的一切——無論政治、經濟、文化、軍事、與外交，都維繫在少數匪幫的私利上，換言之，它的政治的總目標總任務總方向總路線，都是為着少數匪幫的私利。高度發展的經濟也罷，軍事也罷，文化也罷，都是少數人的，沒有國民的基礎——民衆的基礎，反而在經濟上是剝削民衆，在軍事上是以民衆當砲灰，在文化上是愚民政策的巧妙發揮，是變相的焚書坑儒，是以技術教育絞殺政治教育；是拿自然科學，技術教育中的三角幾何理化學一類的東西來阻塞青年民衆的政治認識，只把青年民衆造成這樣那樣的事務主義者，技術主義者，乃至這樣那樣的機械或工具

，而絕對防阻他們的自動性、自覺性、政治性，總之，為了少數階級的利益，有時必須教他們活，而不許他們知道為什麼活，有時必須教他們死，而不許他們知道為什麼死。因之，在政治上就是極端的希特勒的個人獨裁，即是對某人為他們粉飾的什麼極權國家，極權主義。在希特勒的個人獨裁之下，文化人，也就是說自己有一個腦筋的人，例如什麼哲學家、科學家、文學家、藝術家等等，不惟不能論政，而且不准講學，有的逐出國境了，有的捉入集中營了，有的請上斷頭台了，更有無數的就那麼失蹤暗殺了。小百姓更說不上，政治上最低限度的民主自由，例如言論、思想、集會、結社的一切自由，自然一律加以剝奪。所以，任何部門的高度發展，都是沒有民眾作基礎的，而且是以民眾為敵的。它以少數的利與全人類對立，它死硬的逆着歷史的方向走，它以殺人放火，無惡不作的種種罪行所壓迫造成的一時的事上的強力，不是真強，而只是垂死的帝國主義國家沒落前的最後掙扎——只是與民主世界的退兵一戰。蘇聯則不然。它的一切，無論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外交都建築在大多數人的公共利益上，換言之，它的政治的總目標總任務總方向總路線，都是為着大多數人的公眾利益。高度發展的經濟、軍事、文化，都是大多數人的——工農群眾的，都有堅實的國民的基礎——民眾的基礎。它的經濟，是真正健全的國民經濟，它的政權，是真正民

民一體，兵將一體的工農軍隊——民衆自己的武力；它的文化教育政策，是要消滅文盲，教育國民，提高工農羣衆一般的知識水準，文化水準，尤其是政治水準，為的要使工農大衆都能直接參與國事，參與國家的政治領導，都能瞭解事業的正確性，政治的運動向前發展的前途，都能在國內國際複雜的環境中自由確定方針，能夠決定政治領導的問題，而不能[illegible]認識，換一句話說，都能把握着政治總目標總任務總方向總路線，特別注重政治教育，[illegible]開政治教育。它是深怕人民不懂政治，不過問政治，在平時與亂時，不對國事關心，不能自動的自覺的對政事提供積極的意見，不能在國事上，政治上有很詳細的很嚴格的自我批評，而僅僅是一個盲從的機械的執行上級命令和指示的事務主義者，技術主義者，甚至僅僅是一個能言的工具和機械。但這它並不是抹殺或輕視技術教育，它的幹部的培養和造成，通常也都是按着個別的自然科學和技術部門進行的，按着各種專門知識進行的，它需要各種技術人才，專門人才，需要醫科專家，理工科專家，甚至喊出「幹部決定一切」，「技術決定一切」的口號來。決沒有說要使一位醫學專家，同時又是物理學專家，工程學專家，但各種專家也決不能以專家為理由，把自己拘限於數學，[illegible]學或化學等等專門知識，而除了自己的專門知識外，而看不見其他什麼東西，再不管其他什麼東西，即不能以為自家是專家就不為與國事，過問政治，甚至到了國家最危險

的時候，還不從「政務性」的根本決策上來注意、研討、努力，仍然在於政治上照顯微鏡如放，在實驗室裏照顯微鏡如放。蘇聯所加於其國民的重視，所要求於其工農民眾的，是在教育上使他們除了各自的專門知識之外，各自的技術以外，必需具有共同的任何國家都不能逃避的政治知識，政治技能，即任何人都必需是國家的政治領導的積極參加者。換言之，即蘇聯在教育上所要求於其國民的，絕不能僅是他自己所愛好的科學部門的專家，他應該同時又是社會活動家，積極參加國家政治領導的政治家。因之，在政治上所表現的就是蘇聯的民主──廣大的工農的民主。在廣大的工農民主之下，全體蘇維埃人民都有言論、思想、集會、結社之民主自由權，而且由於民主的政治領導之正確與積極，使得社會主義制度在國民經濟所有部門中確立，並將工業與農業發展，使得勞動大眾物資生活改善，使全國民一般的文化水準提高，尤其是政治水準，政治積極性的提高，而所有這一切，都是在民主的政治領導下完成的，結果就不能不引起蘇維埃政權更進一步的鞏固。現在蘇聯與納粹德國及其他資本主義國不同的一個特點，就是在蘇聯已沒有互相敵對的階級，而構成社會主義社會的工農及知識分子，則在觀念上合作的基礎上生活着，和諧着。從階級衝突之下解放出來的蘇聯社會，表現出一幅工人、農民、知識分子親密合作的圖畫。在這個一致的基礎上，就發展了如下許多動力，例如蘇聯社會的精神

上國政治上的一致，蘇聯各民族們的友誼，蘇維埃的高度的愛國主義，而其總結的表現，則為蘇聯廣大人民的斯大林的新憲法。這就是蘇維埃政權所以更進一步的鞏固的基證，和蘇維埃政權的無盡藏的無可比擬的堅強偉大力量的泉源。這一強固力量的集中運用，在形式上也表現為獨裁，並且表現為有力的獨裁。所以民主不僅不是集權的反對，而且是集權的實質。沒有真正的民主，就沒有真正的集權，這樣，就使得當戰爭發生時，蘇聯紅軍的後方和前方，由於政治的民主和內部的團結，將比任何國家更為堅強，使得蘇聯人民發揮着了舉世無比的堅強抵抗，使得抗德戰爭顯現着許多可歌可泣的奇蹟，使得「蘇聯」這個神奇的字眼，它所使每個男子變為士兵，每個女子變為工人，它所使孩子們因嫉妒而痛哭，為了她們不是男子漢，使老人們因嫉妒而痛哭，因為他們已不能再拿起武器。」（見蘇聯P巴甫連珂致郭沫若先生的一封信）所以在蘇聯，它任何部門的高度發展，都是有民眾作基礎的，它現有任何事業，任何成績，都浸透着工農大眾的血汗。它站在全人類的前衛，與她反侵略反法西斯的大眾，與少數匪幫作殊死戰，它順着歷史的方向向前進地很沉着而又堅決的往前走，它以人民大眾所一致要求的政治的總目標總任務總方向總路線，擬發了無盡藏的無可比擬的堅強偉大力量的泉源，更進一步的鞏固了蘇維埃政權，它的強是真強，它不是準備與歷史告別作退兵一

爭，它正在要為歷史寫出輝煌光明的新的篇章。

所以，無論在希特勒的法西斯匪軍，是如何猖獗，如何在蘇聯的領土內，還在尺進寸展，如何在蘇聯工農大眾用血汗浸透着的各種事業上，各種成績上，還在瘋狂的加以毀滅。甚而正在威脅着首都莫斯科，而最不幸時可能為法西斯匪軍所蹂躪，總之，最後的勝利當然屬於蘇聯。它的根據，不但在我們不僅把軍事力量是從政治、經濟、文化等之適當的有機配合發生出來的一點來看，而且是把軍事放在政治的總目標總任務下來看。由於「戰爭不外是以別種手段來進行的政治的繼續」，由於蘇聯政治目標或政治任務與納粹德國有着本質的不同，於是結論到蘇德戰爭的最後勝敗是有定的。這，並不是主觀的希望，而是客觀的必然結果。

由於政治目標或政治任務之不同，決定了區別與最後勝敗有決定性的三點：

第一、它決定了蘇德戰爭的性質——納粹匪軍侵蘇的戰爭，是侵略的，非正義的，反動的戰爭，蘇聯人民英勇抗德的戰爭——是反侵略的，正義的，革命的戰爭。

第二、它決定了蘇德戰爭的陣容——由於蘇德戰爭的爆發，使新的世界大戰分成了兩大陣容：一是民主國家反侵略的陣容，一是軸心法西斯國家侵略的陣容；而站在民主國家背後的，是全世界的工農大眾，是全世界被壓迫的民族與被壓迫的人民；而站在法西斯

各國的人民在內），乃至全世界的民主國家，站在軸心國家背後的，便只有法西斯匪首及其匪黨匪徒匪軍。

第三、它決定了蘇德戰爭的後果——如果納粹德國最後勝利了，全世界都要為生番希特勒所奴役，全世界都要復返於中世紀式的黑暗狀態，世界歷史也要轉變方向往後倒退，也就是全世界的一切都要歸於毀滅；如果蘇聯最後勝利了，那就不是蘇聯單獨的勝利，而是全世界民主國家的勝利，全世界人類特別是工農大衆的勝利，眞正社會新秩序（希特勒歐洲的新秩序，日寇東亞的新秩序，只是強盜匪幫的新秩序）的勝利，也就是整個歷史的勝利。

以上三者，都是對於蘇德戰爭的最後勝敗有着決定性的，只有反侵略的、正義的革命戰爭，才為民衆所擁護，才為全世界的工農大衆所擁護；歷史發展的方向，只有和民衆的利益一致，和民衆和全世界人類的生存要求一致，才沒有任何魔鬼的暴力能使其違背，只有民衆的力量，才眞是超過一切的強大之中的最強大的力量。

蘇德戰爭發展到了今天，有些朋友，不，全世界無成見的公正人士，都很為蘇聯擔憂；但我以為單從軍事上觀察，好像是可憂慮的，如配合着政治或直接從政治上觀察，則絕無可憂慮。此外又有好多人，喜把拿破崙的例子來比希特勒，因此，對於納粹侵蘇

攻勢，很顯然，德國納粹匪軍已進逼莫斯科。拿破崙不是到了莫斯科後一敗塗地的嗎？我們不然，我們並不把莫斯科當着一座神祕的不可侵犯的城市，也不把什麼冬季嚴寒，堅壁清野當着致勝盾牌。打敗拿破崙的並不是莫斯科，也不是其他一切，而是反拿破崙主義的政治目標，反拿破崙主義的歷史方向，換一句話說，即是反拿破崙主義的民衆要求，拿破崙以一人與全世界爲敵，與歷史爲敵，所以最後不能不受到歷史的裁判。在這一點上說，希特勒誠然是拿破崙的難兄難弟。

八　蘇聯抗戰一週年與中國抗戰五週年

蘇聯對納粹德國的抗戰，到本年六月二十二日，恰恰滿了一週年；中國對日本法西斯的抗戰，到本年七月七日，恰恰滿五週年。蘇聯在歐洲所遇着的是一個武裝到了牙齒的敵人，中國在遠東所遇着的也是一個武裝到了牙齒的敵人——雖然比起納粹來還不免稍遜一籌，但中國在各方面却也不能與蘇聯相比。

當納粹開始進攻蘇聯時，瘋魔希特勒曾大言不慚，向世界宣佈：幾個星期就要攻下莫斯科，使蘇聯屈服，當日寇開始進攻中國時，也大言不慚的說：三個月就要使中國滅亡。結果，蘇聯抗戰已是一週年了，中國抗戰已是五週年了。一週年當然不只是幾個星期；五週年當然不只是三個月。蘇聯與中國，不但沒有屈服或滅亡，而且正在繼續抗戰；不僅正在繼續抗戰，而且蘇聯與中國正是愈戰愈強，納粹與日寇則反是愈戰愈弱。

以蘇德戰爭的現局來看，自本年五月八日納粹發動春季（其實已是夏季）攻勢（其

實攻勢還是從蘇聯發動」到現在，我們所能看出的特點如下：

一、新的猛烈的戰鬥雖正在開始，但紅軍的裝備，後備力量，士氣民心，都與納粹成相反的對照，使蘇聯對於必能戰勝納粹具有不可動搖的信心。

二、斯大林「五一文告」——並「一九四二年必須成為希特勒主義最後徹底消滅之一年」已不是一句主觀自慰或安定國內人心的誇大語，而等於是一道命令。

三、自然斯大林從來就沒有放鬆警惕世人，說納粹還是頑強的敵人，也從來沒有否認納粹軍隊有暫時的或局部的勝利的可能。但正如紅星報社論所說：「總之，已不懷疑是能夠取得戰略上的勝利的軍隊了。」「無論我們前面會遭遇到什麼，最危險的生死關頭總已成爲戰爭第一階段的過去的事情了。」「紅軍將克服戰爭中的一切困難和危機，而沿着到達我軍最後勝利和敵軍最後敗消的路勇往邁進。」

以中日戰爭的現局來看，自去年十二月八日日寇發動太平洋戰爭以後到現在，也有如下幾個特點：

一、世界民主陣線與侵略陣線兩大營壘的對立，已非常明顯，尖銳，而民主陣線顯得更整齊，堅強。並形成了兩方勝則俱勝，敗則俱敗之局。

二、最後確定了我國抗戰的有利形勢及其在國際上的地位，尤其是因我政府對德義

日寇必同時作戰，重申國際聯合反侵略的號召，更提高了和鞏固了我國抗戰在國際上的地位，而這一英明措施對國內政治上的影響，則是斬斷了政治法西斯化的前途，消滅了抗戰中途妥協的危機，同時，即是堅定了「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的信心。

誠然，今天的中國，還是敵騎縱橫，全浙，滇邊，華北等區正在歷戰；敵人還有可能在中國戰場取得暫時的，局部的勝利的可能，乃至還有很沉重的打擊中國使中國走到更堅苦更慘痛的局面的可能；但決不能使中國屈服，投降。也可以說，「無論我們前面會遭遇到什麽，最危險的生死關頭總已成爲戰爭第一階段過去的事情了。」

四、誠然，敵人在太平洋的戰爭已獲得初期的勝利。正如一切侵略戰爭的開始都是侵略者的勝利一樣——英德戰爭的開始，是納粹的勝利——蘇德戰爭的開始，也是納粹的勝利，把戰爭初期的結果表現爲戰爭的規律性之一。但日寇的第一行動，獲得相當的戰爭初期勝利後的次一行動，就不能不徬徨起來了——南進攻澳，攻印？抑北進攻蘇，或西進攻我？已陷於舉棋不定，儘管有人估計攻蘇的可能性會要大些。但這種估計決無補於日寇南進北進的徬徨，及其陸海軍派的意見對立，而終不能免於最後潰滅的命運。

二

要。

在蘇聯抗戰的一週年與中國抗戰的五週年中，第一敵人愈戰愈弱，我們愈戰愈強的形勢，這是靠什麼力量取得的呢？這一點，就我們看到的，將是蘇聯與中國具備着同一個最可貴的優點——或者說自然條件下，那便是：地大、物博、人衆。誠然，應該從紅軍及偉大的蘇聯人民，吸取教訓，廣大的領土，無窮的後備力，的確在鬥爭中大大的補充了蘇聯人民的力量，這對希特勒是致命的。可是，只是因為蘇聯人民無論在什麼環境下，從來都不放棄戰鬥，只是因為利用了每一分鐘的和敵人進行勇敢的無情的戰鬥，才能使地大物博發揮作用。時間，空間，和自然界，都沒有什麼技巧的，征服希特勒。蘇聯的人民，把希特勒打退，並且擊潰希特勒匪幫。莫斯科好在羅斯托夫的下，不是蘇聯人民的英雄的人，堅強和不怕死的精神罷了。二十八個紅軍戰士，在伏洛科拉姆斯克公路上阻擋了敵人的坦克部隊，而保衛莫斯科到最後一息；動人的女孩的犧牲了自己的生命，用自己的肉體，擋了純粹的機關槍；年青的女孩嘉婭，參加了游擊隊，在前頭上，從事作戰，而自己即從容就義，找們看到來的勝利的戰鬥。——這就是莫斯科的奇蹟。這些而與此同樣的壯烈，但需

戰術綜實現了局勢偉大的轉變。技術和馬達的確是重要，原料和後備力也是一樣，但是決定局勢的卻是人——人的力氣，人的熱情，和高度的自我犧牲的精神。」（見國際[illegible]的九八說論」、但這種人——人——人的勇氣，人的熱情……決不是從[illegible]的[illegible]，[illegible]人發生出來的，而是[illegible]社會的、政治的、歷史的產物。所以說：「工農統治的蘇聯的高，是[illegible]一個吉斯[illegible]林（挪威賣國奸首領）沒有的，在工人階級對社會的全部結構都[illegible]了他們的[illegible]國家，人民在精神上和政治上的統一，這是那擴大鞏固。」（同前）而且對於[illegible]人一問[illegible]戰爭中，不僅是某一個民族或階級的命運問題，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獨立，都在生死存[illegible]已關頭。這是把他們從那些[illegible]人民的權利，自由、和民主的字眼的解[illegible]就在[illegible]起的[illegible]人的魔掌下拯救出來的問題。」（同前）四之是所有的[illegible]人、[illegible]的[illegible]研究學家，[illegible]抓[illegible]裏的研究工作者，勤勞的農民和作家，教師和工人，[illegible]技術家，[illegible]的[illegible]，都開始[illegible]的[illegible]，[illegible]經驗，都認識到新的[illegible]，[illegible]在[illegible]人類，[illegible]在揭發了[illegible]他們的[illegible]，在[illegible]的生活[illegible]。[illegible]在[illegible]納和[illegible]新的[illegible]，[illegible]他們在[illegible]，不[illegible]的[illegible]一德國法西斯[illegible]義，使他不再存在，使能[illegible]他們所[illegible]的[illegible]，以保[illegible]的形[illegible]事一受生活的愉快。」（同前）那麼，蘇聯在一週年的抗戰中之所以取得[illegible]的形勢

，「使蘇德前線實現了局勢偉大的轉變」，它所象的力量，決不是「地大、物博、人衆」這一個單的自然條件，而是另有所在。同樣，中國在五年的抗戰中之所以取得愈戰愈強的形勢，「地大、物博、人衆」，或者說，廣大的領土、無窮的後備力，的確也曾在鬥爭中大大的幫助了中國人民，曾證明了這對日寇法西斯是致命的。可是也只是因爲中國人民無論在什麼環境什麼情況下，從來都不曾放棄戰鬥，也只是因爲利用了每一分鐘去和敵人進行勇敢的、無畏的、技巧的、英勇的戰鬥，才能使地大物博發揮作用。時間、空間，自然界，都沒有在中國征服日寇法西斯，中國的人民將日寇的泥足陷着，並且要繼續擊潰日寇法西斯所以，中國抗戰五年的奇跡，不過是中國人民的英雄主義，堅強和不怕死的精神罷了。八百壯士的驚人舉動，上海之戰全營殉難的壯烈，敵後游擊區的殺寧死不屈，自我犧牲的輝煌的模範，成了最後勝利必然到來的象徵——這就是抗戰五年的奇跡。這些和與此同樣的壯舉，使中日戰爭呈現了敵人愈戰愈弱，我則愈戰愈強的局勢偉大的轉變。機器和錢，的確是需要的，地大物博的雄厚後備力，當然也是一樣：但是，決定勝負的卻是人——人的勇氣，人的熱情，和高度自我犧牲的精神。自然中國人及其勇敢發揮，也都是一種社會的、政治的、歷史的產物，九一八以後中國歷史，首先是由於日寇法西斯的侵略直接威脅着中國民族整個的生存，在中國人民面前，簡單明瞭

的擺着兩條路：或者抗日，那就還能生存；或者降日，那就只有死亡。這就不能不引起中國社會內部各階層各黨派各集團相互之間的變動，而使得中國所有的人、農民、工人、民族資產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地主、富農、乃至金融資產階級，不與日寇相聯繫的買辦階級等等，都開始清楚的認識到，日寇法西斯危害着他們的生命和生存，只有澈底驅逐日寇出中國境界，使他不再在中國出現乃至在世界出現，才能澄清他們所呼吸的空氣，保持蔚藍的天空，和享受生活的愉快，那麼，中國抗戰五年所係的力量，也決不是「地大、物博、人衆」這一簡單的自然條件，而是另有所在。

然則究竟在什麼地方呢？這又很可能使人們首先從單純的軍事方面下觀察。這自然也是不錯的。戰爭總是戰爭——蘇德戰爭，中日戰爭，都是戰爭，決成敗勝負於飄搖砲火之上，當然要以軍事的強弱爲準。那麼，蘇聯抗戰一週年，中國抗戰五週年之所以能取得愈戰愈強的形勢，也不能不歸之於蘇聯與中國軍事力量的強大。蘇聯的紅軍，紅海軍，及其空軍，自然是都不弱，但其抗戰，對於希特勒野獸的無情閃擊等等之所以能招架得住，並且克服一年時期的種種困難，除軍事外，究竟不能不說是靠了政治、經濟、文化、外交等等其他要素之有機配合。中國的軍事方面，則與蘇聯相反，雖然有龐大數目的陸軍，而裝備並未完全近代化，空軍須靠友邦接濟，海軍根本說不上，但其抗戰

能支持五年之久而屹然不動，則更不能不靠其他要素的有機配合和其他歷史條件，才能得到說明。

然則其他要素的配合和其他歷史條件究竟又是什麼呢？一言以蔽之，蘇德戰爭也能，中日戰爭也能，都需從政治上下觀察——從戰爭的政治的總目標，總任務，總方向，總路線下觀察。或者說從蘇德戰爭，中日戰爭的根本性質上觀察。

三

關於蘇德戰爭的全過程，亦即其最後勝敗的估計，我曾寫過「從政治上觀察蘇德戰爭」一文，內有云：「從政治上觀察蘇德戰爭，並不是撇開軍事因素不談，而是要把軍事與政治配合起來看，或者說要把軍事放在政治的總目標總任務下來看。如果我們單從軍事上來觀察蘇德戰爭，它的前途，顯然有三個：一，蘇勝，二，德勝；三，相持。但相持之後的最後勝敗是無定的。如果我們把軍事與政治配合起來，或把軍事放在政治的總目標及總任務下來觀察蘇德戰事，則相持之後的最後勝敗是有定的，即最後的勝利必定屬於蘇聯方面。把這一原則用來觀察中日戰爭，也是如此，如果我們單從軍事方面觀察中日戰爭，它的前途，顯然也有三個：一、中國勝；二、日寇勝；三、相持。但相持

之後的最後勝敗是無定的。如果把軍事與政治配合起來，或把軍事放在政治的總目標總任務下來觀察，中日戰爭，則相持之後的最後勝敗，是有定的，即最後的勝利必歸於中國方面。這一原則，不僅可以用來觀察中日戰爭，而且可以用來觀察一切戰爭，任何戰爭。我們常說，世界大戰的最後勝利是蘇聯的，聯合國的，中日戰爭的最後勝利是中國的，此科學的根據就在這裏。有人說這很奇怪，兩個民族國家的矛盾衝突，到了在戰場上砲火相見，難道決定最後勝敗的，還不是看那個的兵堅砲利，那個的坦克多，飛機凶猛嗎？一句話，還不決之於軍事的強弱嗎？殊不知「無重工業即無國防」，「無科學即無國防」，一個近代國家的有機構成，是政治、經濟、外交、文化、軍事各種要素的有機配合，多了一樣，少了一樣，固然不行，即是那一樣過於突出，各種要素的發展不平衡，都要減少它的力量。而且政治在成爲各種要素之一部門的條件下，參加到國家有機構成的各種要素裏面去，雖然與各種要素是平列的；而在其決定根本國策的「政務性」的領導地位，由它指出政治的總目標、總任務、總方向、總路線的意義上，其他的各種要素，例如經濟、文化、外交、軍事等等。就都得追隨着它，都得跟着它的方向走，以它爲依據而決定經濟計劃該怎樣定，文化政策該怎樣立，外交該怎樣辦，仗該怎樣打。

……德國軍事理論家克勞塞維茨將軍說過「戰爭不外是以別種手段來進行的政治繼續」，

又說：「戰爭決不能脫離政治關係來觀察」，「戰爭是一種政治底手段」，「戰爭從開始到媾和爲止，都是由影響戰爭的政治描畫出來的。」這就是充分說明沒有無政治目標或政治任務的戰爭，戰爭只是爲要完成它的政治目標和政治任務。……所以有人說：「戰爭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戰爭。」根據軍事力量是從政治、經濟、文化、外交等等有機配合發生出來的這一點來看，蘇聯是一個各種要素都有着高等發展的國家；……所以它能發揮出堅強無比的力量，把納粹德國的鐵蹄，長期牽絆在列甯格勒，莫斯科的外圍，一尺土，一寸地的退出，都要納粹匪幫付出十分重大的代價。……這一定會有人提出反駁說，如果根據軍事力量是從政治、經濟、文化、外交等等適當的有機配合發生出來的這一點來說，這並不是蘇聯特有的優點，而是納粹德國而具的優點，納粹德國之所以能一舉而夷滅歐洲十四個國家，能一舉而使法蘭西投降，能一舉而攻入社會主義蘇聯……也正是由於它是一個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外交等各種要素都有着高度發展的國家……那麽，納粹爲什麽不能獲取最後勝利的戰果，而最後勝利反而必然是屬於蘇聯的呢？不錯！納粹德國在這一點上的確與蘇聯具有同樣的優點，甚至它的優勢反而超過蘇聯；但如果把軍事放在政治的總目標總任務下來看，卽根據「戰爭不外是以別種手段來進行的政治繼續」這一根本論綱來看，納粹與蘇聯就有着本質上的不同

。……這由於純粹在本質上是一個侵略的帝國主義國家，逆着歷史方向走的少數匪幫……而蘇聯則是一個反侵略的民主國家，順着歷史方向走的天之驕子。侵略的帝國主義國家。它的一切——無論政治、經濟、文化、外交、軍事、都建築在少數匪幫的私利上……高度發展的經濟也罷，軍事也罷，文化也罷，都是少數人的、沒有國民的基礎——民衆的基礎。反而在經濟上是剝削民衆，在軍事上是以民衆當砲灰，在文化政策上是愚民政策的巧妙發揮……所以它任何部門的高度發展，都是沒有民衆作基礎的，而且是以民衆爲敵的，它以少數匪幫與全人類對立，它死硬的逆着歷史的方向走，它以種種罪行所強迫造成的一時的軍事上的強力，不是眞強，只是與歷史告別的退兵一戰。蘇聯則不然，它的一切——無論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外交都建築在大多數人的公共利益上……高度發展的經濟、軍事、文化、都是大多數人的——工農羣衆的，都有堅實的民衆基礎。它的經濟是眞正健全的國民經濟，它的軍隊是眞正的民衆自己的武力，它的文化教育政策，是眞正提高一般工農羣衆的文化水準，尤其是政治水準。它爲的要使工農大衆都能直接參與國事，參與國家的政治領導，都能瞭解事業的正確性，政治運動向前發展的前途，都能在國際國內複雜的環境中自由確定方針，能夠決定政治領導的問題不犯錯誤，換一句話說，都能把握着政治的總目標總任務總方向總路線，特別着重政治教

背，它是深怕人民不過問政治，不能自動自覺的對政治提供積極意見的……所以在蘇聯，它任何部門的高度發展，都是有民衆作基礎的，它順着歷史的方向脚踏實地的很沉重而又捷敏的往前走，它以人民大衆所一致要求一致擁護的政治的總目標總任務總方向總路綫，擴發了無窮藏的無可比擬的堅強偉大力量的泉源，更進一步鞏固了它的蘇維埃政權，它的強是真強，它不是與歷史告別的退兵之戰，它正要爲歷史添進新的篇章。」這就是蘇聯抗戰一週年所依靠的真正力量，也是它最後致勝的真正力量。

關於中日戰爭的全過程，亦即其最後勝敗的估計。曾於我與友人集體創作之「抗戰形式的總檢討」一文中說了如下一段話：「這次中日戰爭決不是偶然的，因爲它是通過了國際關係之總的矛盾過程以存在於中日兩國的特殊條件中而必然爆發的日本法西斯侵略與中華民族之爭求解放的鬥爭。在這個戰爭中，包含着自掘墳墓的日本法西斯之反動的殘酷的侵略和創造光明的中華民族之爭求解放的進步的兩種本質不同的力量，作生死的決鬥。由於這個戰爭，決定了日本法西斯，只有本着帝國主義之沒落的必然性，加緊向反動的死滅的路上奔馳；同時，又決定了中華民族從反日本法西斯的鬥爭中，將自身躍進到時代的前線，成爲創造光明世界的一個基石。這個戰爭不僅對於日本法西斯的崩潰和中華民族的解放，有着決定的意義，且對國際法西斯的存在和一切民主主義的前途

，尚有着決定的意義。」我們從敵我兩方的基本矛盾出發，對於抗戰形勢作了一番總檢討之後，「得出了下述幾個原則上的結論：一、中日戰爭是通過了國際資本主義總危機之日本法西斯的侵略，同中華民族的解放鬥爭之根本矛盾的爆發；二、這個戰爭是以反動的「迴光返照」的日本法西斯之侵略與進步的向上發展的中華民族的解放而鬥爭着的，這兩個本質不同的因素，結成了一個「契機」，并決定兩者不同的動向以互相乘除；三、如果承認戰爭是表現社會發展的矛盾之噴火口，是社會飛躍的槓動機，那麼，敵人是踏着腐朽的反動的矛盾根據的一方面；我們是踏着新生的進步的矛盾根據的一方面。在敵我力量之對比中，最爲人所迷惑的是敵人的軍備超過我們的軍備，殊不知敵人之此種優式條件，正是從其劣勢根據上表現出來的，且以此種優勢條件之發展，助長其劣勢根據之發展，召致滅亡；同時，我們此種劣勢條件，正是一切半殖民地半封建落後性的產物，我們不僅會以民族解放戰爭之優勢根據，克復此種劣勢條件；并且可以其優式根據之發展，助長敵人劣勢根據以邁於向上線。在敵我力量之對比中，同樣爲人所迷惑的，是敵人物質生活方面之發展水準也高於我，殊不知敵我物質條件的基礎則完全不同。在敵人方面，其物質生活完全支配在自相矛盾，自召滅亡的體系上，其物質力量之動員愈緊急，則其崩壞的速度愈迅速；而我們方面，其物質生活，則建築在否定帝國主義之

侵略和腐化勢力之束縛的「質」的變化，其物質力量的動員愈緊張則愈集中。何况他大物博人衆，在這種條件下，是能對敵人佔絕對優勢的，至若在文化方面，以敵人之法西斯殘暴和反動的本質，不僅一切進步的思想和文化，完全被窒息着，就是較進步的自由主義，民主主義，也常個的被腰斬；但是我們則因民族解放戰爭之廣泛的開展，民族意識也隨着普遍發展，結果，自然會將過去少數人的舊文化，或外鑠的新文化，變做與大衆生活不可分離的中國文化。因此，日本法西斯的愈戰愈反動，愈戰愈縮小力量，我們則愈戰愈進步，愈戰愈增加力量，日本法西斯之侵略戰的前途，只有沒落，我們反侵略戰的前途，是誕生一個新中國。這就是中國抗戰五年所依靠的眞正力量，也是中國最後致勝的眞正力量。

這種力量是從戰爭之政治的總目標總任務總方向總路線發生出來的，是從戰爭的根本性質及其歷史條件發生出來的。這種力量成爲支持蘇聯抗戰一週年，中國抗戰五週年的根本力量，而且保障蘇聯與中國抗戰之最後勝利。由於它——戰爭的政治總目標……及戰爭的根本性質，——決定了蘇德戰爭與中日戰爭的陣容——一是民主國家反侵略的陣容；一是法西斯國家侵略的陣容。而站在民主國家背後的，是全世界的工農大衆，是全世界被壓迫的民族與被壓迫的人民（連德日的人民在內），站在法西斯國家背後的，

便只有納粹匪首及其匪黨、匪徒、匪軍。二、決定了蘇德戰爭與中日戰爭的後果，如果納粹德國，日寇法西斯勝利了，全世界要為納粹及日寇所奴役，全世界都要復返於黑暗世紀，甚至於全世界都要歸於毀滅；如果蘇聯與中國最後勝利了，那就不單獨是蘇聯與中國的勝利，而是全世界民主國家的勝利，全世界工農大衆的勝利，全世界真正新秩序（不是強盜匪幫的歐洲新秩序與東亞新秩序）的勝利，也就是整個歷史的勝利。這種戰爭的陣容與後果，必然成為蘇聯與中國抗戰最後致勝的重要因素，同時，也必然成為歷史發展規律性之總暴露總體現。

四

那麼，戰爭之政治的總目標——戰爭之根本性質，使得蘇聯抗戰支持到了一週年，中國抗戰支持到了五週年，而且使得蘇聯抗戰一週年中國抗戰五週年的現勢，已轉變為對於蘇聯與中國有利，今後可能，甚至必然使最後勝利能歸到蘇聯與中國方面。這是否在說蘇聯與中國的勝利，今後就可順利的獲取，而且一切的困難都會沒有了呢？不，決不。全世界反侵略，反法西斯的鬥爭，這是人類歷史上空前艱巨空前偉大的鬥爭，毫無疑義的，今天法西斯侵略者還在繼續肆虐，納粹在蘇聯，日寇在中國，還有暫時的局部

的勝利的可能，甚至也可以說我們是正臨到一個鬥爭最艱巨最困難的時候，尤其是中國今天的局面。我們要爭取最後勝利，要保障最後勝利的必然來到，或者如斯大林所說的「一九四三年，必須成為希特勒主義最後徹底消滅之一年」，同時，我們也要在遠東早速日寇的崩潰。那就還需要在戰爭政治總目標總任務之下，更加努力，更加利用我們「地大、物博、人衆」特具的優越的自然條件，更加促軍事、外交、經濟、文化等等與政治的總目標總任務，得到適當的有機配合，以「盡其在我」的主體立場完成「自力更生」的根本任務。同時，還需要英美的援助能夠再接再厲——對於蘇聯，需要歐洲第二戰場早日開闢，對於中國，需要重兵器，坦克、大砲、飛機等等的趕速輸進，尤其是飛機。此外，還需要歐洲被佔領國內及中國淪陷後方游擊戰爭之更加發展，還需要納粹與日寇內部矛盾能夠更尖銳化。不過英美的援助以及整個聯合國家及時的適當的配合作戰，在今天更是必需的。

關於聯合國之配合作戰，實早已奠基於去年七八兩月中之英蘇協定與羅邱宣言，今年元旦的二十六國共同宣言，更為此基礎之擴大，而五月二十六日英蘇所締結的軍事同盟及戰後二十年的合作與互助條約，同時，美蘇之有重大意義的談話，美蘇軍火租借協定之簽字，及六月十一日之美蘇協定的正式成立，內定歐陸今年開闢第二戰場，英美軍

火援練將更積極進行，一面表現了聯合國間在反法西斯侵略上的堅強團結和援蘇的增強。同時，使一九四二年是徹底消滅希特勒主義之一年的斯大林號召，得到最可靠的保障。我們行將看見在一九四二年的歐洲，反侵略的鬥爭將展開決定性的勝利。

復次，在遠東方面，英美已徹底認識中國戰局在聯合國家間的全盤戰局中的地位，同時，也已關切到中國目前的嚴重艱苦的戰況，所以近兩月來，英美兩友邦，不論朝野上下，都一致呼籲援華，至於聲嘶力竭。尤其是美國，更具體的指出：中國決心抗戰到底，中美休戚相關，成敗與共，月前，更將這一切呼籲，具體化於美國政府當局經由宋外長向我國政府提出之軍火租借協定的建議中。六月二日下午中美間軍火租借協定也已舉行正式簽字，此外，美海軍已先後在珊瑚海及中途島重創日寇，使中英美間對日寇的協同作戰及援華實力有增無已。這樣，日寇潰崩的日子，也可能更加提早。

蘇聯於年前在歐洲舉起反納粹反侵略的義旗，歷盡千辛萬苦，撐持了一年的抗納粹匪幫的戰爭，成為歐洲反侵略的一大堡壘；我中華民族，首先在亞洲舉起反抗暴日的義旗，歷盡千辛萬苦，撐持了五年的抗日戰爭，成為東方反侵略的一大柱石。今於其抗戰一週年與五週年的紀念，特撰此文以祝之。

九　世界現勢與中國

當前很明朗的擺在我們面前的世界，其特徵是世界範圍內的兩大陣營或兩大戰線：「一、是反法西斯侵略的民主戰線；一、是法西斯的侵略戰線。由於法西斯侵略兩條戰線的相交——亦卽由於兩者根本矛盾的爆發，便展開爲比第一次世界大戰規模更爲擴大，手段更爲殘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戰。

這裏有三個問題，需要最先有一個說明。卽

一、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性質；

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途；

三、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後果；

關於第一問題，我們可以說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性質，是關於民族性，民主性的戰爭——亦卽民主主義反法西斯主義的戰爭，而不是共產主義反法西斯主義或法西斯主義

反共產主義的戰爭。但因爲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果產生了社會主義國家的蘇聯，而第二次世界大戰蘇聯參加爲民主主義反法西斯主義戰爭之一員，且爲最主力之一員，於是有人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民族性，民主性不免懷疑。這種懷疑，或者是善意的——即或者是由於對世界規模戰爭的複雜性模糊不淸，而納粹德國及其幫兇——日、意諸國，則故意要把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性質，宣傳爲共產主義反法西斯主義或法西斯主義反共產主義的戰爭，亦即故意要把它們的侵略戰爭宣傳爲全世界的反共戰爭。這自然是有它們一貫的政略根據的，即法西斯侵略者，是想拿反共欺騙其他中立國家，來分散與它作戰的民主國家，并以之擊敗全世界反法西斯的民主統一戰線。然在我們則不可以不辨、我們說第二次世界大戰是民族性、民主性的，這裏有幾點可以證明：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不久（當蘇聯參加戰爭後），即有羅（羅斯福）、邱（邱吉爾）共同宣布的大西洋憲章，繼之則有二十六國的共同宣言，其主要內容，均爲消滅法西斯主義，爲爭取全世界的民族自決、民主自由，及戰後世界永久和平。二、是由於全世界的反侵略以及像中國、印度這樣半殖民地、殖民地的被壓迫的弱小民族的抗戰運動亦即其反侵略反法西斯的民族革命運動，在本質上只能是一個民主革命運動，儘管在今天來說，世界政治的內容，民族矛盾已不過是社會矛盾的一個側面，但大部分仍由於侵略反侵略這一主要矛盾所

引起的戰爭，其當前所要完成的任務，也仍只在於拿戰爭來完成民族自決，民主自由，消滅法西斯主義，則其戰爭的性質，便當然只能是民主主義反法西斯主義的戰爭，而不是共產主義反法西斯主義的戰爭。惟此才是英美與蘇聯以及全世界反法西斯民主統一戰綫所由形成的根據，也由此方能找得出英美與蘇聯並肩作戰的共同而實際的目標。

關於第二個問題，我們可以說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途，其最後勝利必然在反法西斯侵略的民主戰線方面。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根本是爆發於世界經濟總危機的情況之下，那些為跳出世界經濟總危機的黑闇，少數先天不足（如資源缺乏）後天亦不強備（如市場狹小）的帝國主義者，如德日意諸國，正由經濟的獨佔進上政治的獨裁，亦即由備戰的經濟的國際主義走到好戰的政治的法西斯主義——「法西斯就是戰爭」。法西斯就是甚不留情的用非法手段摧殘，壓迫，屠殺國內的一切進步人士及勞苦大衆，乃至毀滅一切文化與一切人性。法西斯就是極端殘忍的用非法手段搶奪，刼掠，侵佔國外的市場、資源、土地，乃至奴役，毀滅全世界的人類與文化。所以法西斯的國內政策，尤其自侵略戰爭發動以後，在政治生活方面，則是以軍閥財閥獨裁為中心的法西斯主義，代替那原為一般有產者所要求的民主主義；在經濟生活方面，則是以軍需生產為中心之對勞動大衆的壓搾榨取，代替那原為一般有產者所要求的資本體制。其對外政策：則不僅

要以烏克蘭，巴庫為其糧食與石油的倉庫，而且要以倫敦，華盛頓為其遊樂與賞玩的離宮別館；不僅要以中國，印度為其農場，牧場，而且要以英美蘇聯為其射獵走馬的場所。這樣，就把全世界範圍內，不論是資本主義國家也好，社會主義國家也好，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也好，都逼得非大家聯合起來反對它不可。這樣就形成了全世界反法西斯侵略的民主統一戰線。這樣就把一國範圍內，不論是工人也好，廠主也好，農民也好，地主也好，甲黨也好，乙黨也好，宗教不同，思想各異的人也好，也逼得非大家聯合起來反對它不可，這樣就形成了一國內的反法西斯侵略的民族統一戰線。不僅此也，在法西斯國家內也有我們的兄弟朋友。因為其政治的反民主與經濟的反正常反資本體制，必然要引起在民主與獨裁的矛盾軍需品工業與必需品工業的矛盾，乃至引起獨佔資本與中小資本，工業部門與農業部門，一般有產者與封建殘餘的種種矛盾。這樣矛盾，都必然爆發為反法西斯的內在的生力軍，由於法西斯侵略的本質，是建立在以上各種內外矛盾的尖端上，乃決定它的命運，只有愈戰愈反動，愈戰愈減弱其力量，愈戰愈加深其矛盾，愈戰愈沒有出路，愈戰愈沒落到滅頂的深淵，最後必然歸於潰敗。而反法西斯侵略的民主國方面，則恰恰與之相反。因此，它們最後必然獲得勝利，自然其勝利也必然是奮鬥、努力、拚命爭取的結果。

最後，關於第三個問題，即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後果，這是可以不言而喻的。如果法西斯的侵略戰線方面，亦即德日意軸心國方面最後勝利了，則全世界的善良人類都要爲法西斯侵略者所摧殘，壓迫，屠殺，奴役，全世界的文明都要被摧毀而復返於中世紀的黑暗野蠻狀態，乃至全世界的一切都要歸於毀滅。反之，如果反法西斯侵略的民主戰線方面，亦即中蘇英美同盟國方面最後勝利了，那就不是中蘇英美同盟國單獨的勝利，而是全世界善良人類共同的勝利，全世界民主國家共同的勝利；亦即是民族自決，民主自由的勝利，乃至是整個歷史的勝利。

第二次世界大戰進行至今，如從一九三七年中國「七七」抗戰開始算起，已是六個整年了，如從一九三九年九月德侵英法開始算起，已是將近四個整年了，如從一九四一年六月德侵蘇聯開始算起，已是兩個整年了，如從一九四二年一月日寇偷襲珍珠港算起，已是一個整年有半了。在這許多年（不論從那一年算起）的戰爭過程中，法西斯侵略者，是始勝終敗，現在還沒有最後失敗；反法西斯侵略的民主國家，是始敗終勝，現在也還沒有最後勝利。由於戰爭過分的複雜性，就中又各有勝敗。這就使得我們要認取戰爭過程中清楚明白的教訓，究竟是什麼東西使得我們會失敗，又是什麼東西使得我們會勝利。這從已往的教訓看，可以說使得我們失敗的，是我們沒有堅定的站在民族，民主

的立場；使得我們勝利的，是我們堅定的站在民族，民主的立場。例如太平洋戰爭初期，英美荷屬新加坡、菲律賓、爪哇、蘇門答臘等處的失敗。與其認為英美荷軍事的失敗，毋寧認為其傳統的對付各該處土著民族的民族政策之失敗；反之，日寇當同期的勝利，與其認為日寇軍事的勝利，毋寧認為其對付各該處土著民族欺騙的民族政策之勝利。而在安南、緬甸、泰國等處之一勝一敗，亦無不可作如是觀。如果我們再追溯一下，歐洲波蘭，法國相當有實力有準備的國家，為什麼在納粹德國的閃擊之下，很快就失敗？我們可以率直的回答，就是因為他們的政府不信任人民的力量。當時波蘭與法國的政府，可以說都是與人民為敵的，他們不去好好動員人民，且不給人民以愛國的民主自由。接着蘇聯被侵參加戰爭了，馬上使風靡全歐的法西斯狂瀾一挫再挫，把勝敗之局扭轉到一百八十度，其主要原因，可以說就是蘇聯政府信任人民的力量，好好把人民動員起來，充分給人民以民主自由，在前方拼命，擋住敵人，在後方拼命增加生產，而且由於它自十月革命以來一貫的執行了正確的國內外的民族政策，如國內少數民族之一律平等，國外被壓迫的弱小民族之儘量扶助，堅定的站在民族，民主的立場，對國內各階層人民，各不同黨派，多給以愛國的民主自由，集中其政治實力；對國外殖民地，弱小民族，多給以自動自決的機會，亦即多給以愛國的民主自由，擴發其為民族而犧牲的熱情，使它

們自發自願的站到民主國家方面來參加反法西斯侵略的戰爭，起碼不至爲軸心國家集團的民族政策所利用，便能在已往戰爭過程中得到勝利，這是一點奇怪沒有的事，：總結二次世界大戰的性質原是民族性，民主性的。戰爭的民族性民主性規定了反法西斯侵略戰爭的勝利。

這樣戰爭的規律性（或歷史的規律性）就給與了民主國家以惟一致勝之道。最後的勝利雖還沒有到來，已往勝敗的教訓，卻爲民主國家奠定了最後勝利的基礎，而造成目前極端有利於反法西斯的民主國家與極端不利於法西斯侵略國家的現勢。

在戰爭過程中，由於反法西斯侵略的民主戰線方面，亦即中蘇英美諸民主國家方面，懷於戰爭過程中清楚明白的教訓，或則自始即堅定的站在民族，民主的立場，或則日益接近於堅定的民族，民主的立場，艱苦作戰以迄於現在，於是使得始勝終敗的法西斯的侵略戰線方面，亦即德、日、意、軸心國家方面，在軍事上、政治上、國際形勢上，都已經日益嚴重的惡化了。

德、日、意武裝力量的削弱及其軍事的嚴重惡化，首先從它們的軍事實際的失敗中看出來，就是德國去年到今年冬季在蘇德戰場的失敗，尤爲是斯大林格勒的慘敗，此外在埃及、利比亞的黎波里、和突尼西亞，都是一敗塗地，最近——七月五日在蘇德戰場

上發動的新攻勢，最初三天之戰果已被毀坦克——一五三九輛，被擊落飛機——一六四九架，被殲兵數三萬餘人。日寇在阿圖島的失敗，以及最近在所羅門羣島，在新幾內亞，在新喬治亞，在新不列顛島等處的失敗。尤其是不可掩飾的事實：意大利近來連日遭炸，更只有招架之力而無回手之可能，由所可見，戰爭迄於現在，德、日、意軍事的實力已根本受了損害，法西斯侵略者的軍隊，都在經歷着嚴重的危機。

德、日、意法西斯政治形勢的惡化及其後方之不穩，也可以從下面的事實很明白的看出來。就是厭戰、反戰、罷工、怠工、不相信戰爭的勝利而驚惶失措的情緒，以及對於法西斯統治慘無人道的厭惡憤慨的情緒，在德、日、意內部，民間滋長着，尤其是在被德、日、意侵略佔領的國家內，佔領者與被佔領者之間，征服者與被征服者之間，恰如火山將要爆炸的裂口一樣，日益擴大，正在醞釀着巨大的爆炸。德、日、意所統治的各被佔領國的人民，都是一座一座的火山，例如德寇所統治的波蘭人民，荷比人民、法蘭西、希臘、南斯拉夫、羅馬尼亞、保加利亞人民、奧匈人民；日寇所統治的中國人民、朝鮮、台灣人民、南洋各地人民。不僅此也，就是法西斯侵略者所統治的各國人民，也是一座火山，也是一隻從法西斯心臟內炸裂法西斯的大軍。由此可見，戰爭迄於現在，德、日、意的政治形勢已日趨惡化，反法西斯侵略者的鬥爭，已在其本國內及其被佔

領國內滋長着蔓延着。

德、日、意的國際形勢也日益惡化了。這一方面可以從下面事實中看出來，就是法西斯侵略國家，企圖拉攏現在尚未加入戰爭的各中立國家，但是有些被法西斯原想拉入侵略戰線的中立國，如西班牙，現在眼看它們的大勢已去，不願加入了；有些原來傾向反侵略國家的中立國，如土耳其，但因怵於侵略者的初期勝利而表示猶豫與動搖，現在已在結束其猶豫與動搖。這便使一切法西斯侵略國在國際上處於孤立地位。另一方面還可以從下面事實中看出來，就是法西斯國際地位的孤立，不僅表現在中立國方面，而且表現在侵略戰線以內，因為在法西斯的軍事危機與國際形勢的惡化之下，就使法西斯侵略戰線內部的不協調生長起來，並已造成了內部分裂的危機。這種危機不但生長在德、日、意之間，也不但生長在德國與其附庸國之間，而且也生長在德日之間。意大利內部固然正在生長着一種要求退出戰爭的力量，日寇也正在準備其不與希特勒同失敗命運的某些勾當。法西斯侵略者感覺其國際地位的孤立及其戰線內的分裂，對於其所發動的戰爭，已喪失從早有利結束的信念，於是就施行其和平詭計，企圖離間中蘇英美的神聖同盟關係，妄想有一國能與它訂立出賣盟友的和平，以便先擊破另一者來挽救它垂死的命運。但同盟國的團結，由於蘇聯在斯大林格勒與英美在北非的第一個有計劃的配合作戰

而更加鞏固了。由此可見，戰爭迄於現在，法西斯在國際上的孤立，日益加甚，法西斯的侵略戰線已瀕於解體，而希圖挑撥離間反法西斯同盟內部的和平陰謀也被粉碎了。

所有這一切都表示出：法西斯侵略者在軍事上、政治上、國際形勢上，都變得對它們極端不利，法西斯陣營，正處於深刻危機的情況中。當法西斯的各種形勢，已急劇惡化的時候，而反法西斯侵略的民主國家的軍事的、政治的、國際的形勢，卻變得對於它們極端有利了。

在爭取民族自決、民主自由、消滅法西斯主義的戰爭中，反侵略陣營的軍事力量已日益成長，這首先從下面的事實中可以明白的看出來，這是蘇聯在去年對今年冬季攻勢的勝利，以及最近對德寇夏季攻勢反攻的勝利，英美在北非的勝利，美國在北太平洋，西南太平洋的勝利，中國在鄂西的勝利。尤其是盟軍在西西里島的登陸，證明第二戰場的接近開闢，而且又有最大勝利的表現。由此可見，戰爭迄於現在，反侵略國的戰鬥精神和士氣，以及一切軍事實力。都已經成長得更加堅強，對法西斯侵略者爭取勝利而獻到無限興奮，心中燃燒着要把法西斯細菌徹底消滅的烈火。

同時，在爭取民族自決、民主自由、消滅法西斯主義的戰爭中，反侵略陣營的政治實力，也在日益成長，這也可以從下面的事實中很明白的看出來的。就是在中英美蘇諸民

主國家的內部，決無反戰、厭戰，對戰爭勝利不相信而驚惶不安的情緒，亦決無對政府的抗戰措施不擁護而憤恨的情緒。因此，後方極爲鞏固，生產日益增加，出錢出力日益踴躍。工廠以全部能力開工，供應戰時所需要的一切，尤其在蘇聯，勞動人民在創造紀錄的短時期中，就在戰爭的基礎上改組了經濟。第二期戰爭公債，在二十四小時內，就募足并超過定額，以二百萬萬盧布以上的鉅款獻給戰時國庫，這便是人民在對痛恨的侵略者進行鬥爭中愛國情緒無限高漲的生動的示威，這便是人民要對它們萬惡的敵人進行鬥爭直到完全勝利而後已的不可動搖的決心的明證。在全部歷史中，廣大人民參加保衛自己的祖國，從來不曾有過像現在反法西斯戰爭的時日中這樣奮不顧身的精神。由此可見，戰爭迄於現在，反侵略陣營的政治力量及其鞏固的後方，也已經成長得更加強壯更加鞏固了。最後，在爭取民族自決，民主自由，消滅法西斯主義的戰爭中，反侵略國方面的國際形勢，也在日益好轉中，有許多事實證明：法西斯侵略者妄想拉攏中立國，而中立國却日益傾向反侵略方面，法西斯侵略者妄想施行和平詭計，離開反侵略同盟國，尤其是英美蘇的關係，而英美蘇却日益團結。自從英蘇關於納粹德國及其歐洲伙伴作戰同盟暨戰後合作與互助條約締結以來，已過去一年多，在這一年多的時間中，已在時間上充分的考驗過這個盟約的穩固性。現實已經證明：在這個期間蘇聯和英帝國的盟邦關

係已經增進。此外美蘇一九四二年六月締結的進行抵抗侵略戰爭適用互助諸原則的協定，也已完全顯示出它的效力。尤其是在最近幾個月間，由於對德意法西斯進行一致的同時的戰鬥，反法西斯的同盟關係，已經格外強化了。蘇聯從東綫給予德國法西斯以強有力的打擊，英美同時在北非也給予德國法西斯以強有力的擊敗。同時，盟邦空軍更給予德意以越來越兇的襲擊，而且已在準備開闢第二戰場，以謀東西夾擊更進一步的配合。所有這一切，都足以證明民主同盟的國際關係與形勢，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的強固。由此可見，戰爭迄於現在，反侵略國的國際形勢也已更進一步的團結起來了。

以上所述，就是世界現勢的大概情形，而世界現勢的特點所在，就是戰爭迄於現在，無論軍事的、政治的、國際的形勢，都已起了根本變化。這一根本變化，是極端有利於反法西斯侵略的民主戰綫與極端不利於法西斯的侵略戰綫。

在極端有利於反法西斯侵略的世界現勢之下，已經具備了打敗德、日、意法西斯的先決條件，今後的一年，就將是一個決戰的年頭，中蘇英美打敗德日意法西斯的決戰，將在今後一年中決定的展開。只要歐洲第二戰場能夠及時的開闢，只要太平洋方面對日寇的打擊，也能同時奏功。則在今後一年中打敗德日意法西斯是毫無疑義的（對於日寇擊敗的時間，或許也長一些，但也決不能有過長的距離），最後的勝利必然在反法西斯

侵略的民主戰線方面，也是毫無疑義的。

世界現勢，對於反法西斯侵略的同盟國家極端有利，同時對於同盟國之一員的中國自然也是極端有利。中國參加反法西斯侵略的抗戰，已經進入了第七個年頭。但我們也有與我們盟邦不同的地方，因爲我們的盟邦——尤其是英美蘇，它們都是先進的工業國家；我們却是落後的農業國家，我們最初幾乎是以獨立担當抵抗武裝到了牙齒的日寇，所以我們的抗戰是在極端艱苦的情形之下進行的。而且獨戰的時間之長，超過了任何盟邦抗戰的時間，這自然是由於全國人民與全軍將士的努力。繼續澈底擊潰法西斯侵略者，戰勝西方與東方的敵人，還需給以更大的努力。如果沒有這種努力，縱令世界現勢對於我們是極端有利，敵人還是不會馬上倒下去的，我們的勝利與解放也還是不可能的。那麼，我們中國應在目前這極端有利的世界現勢之下，我們應該怎樣努力呢？我們應該怎樣努力，才能克服長期抗戰中許多消耗明白的教訓，并檢討記取這許多教訓，藉以求得比較過去更多的成績，克服已有與有并正在生長的許多困難，而且切實的做到一點真在我一的職責呢？同時，我們應該怎樣努力，才能好好的配合英美蘇各盟邦的作戰，使極端有利的世界現勢更加有利，盡到我們對於盟邦應當盡的職責呢？

我以爲：

首先應該堅定站在民族，民主的立場，質言之，就是堅定的站在三民主義的立場。要正確的執行戰時的民族政策，極力顧到國內各民族的物質利益與政治權利，極力提高國內各民族的文化水準，接受國父扶助國內弱小民族與聯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的遺教。尤其要防止日寇在中國淪陷區，在緬，越，在南洋各地的欺騙的民族政策。（戰略）要貫徹反法西斯侵略戰爭的爭取「民族自決，民主自由」的最後目標。領袖告聯合國人民書中，明確的指示出：「我中國軍民明確認定世界祇有一個前途，便是正義與自由民主的澈底勝利」。

其次，應該實現三民主義，應該實現抗戰建國綱領。三民主義是 國父所手訂的中國近百年革命的政綱政策，也就是中國近百年革命的輕重武器，它的一字一句的威力，都是擊潰敵人的長槍大砲，它曾經推翻了滿清二百六十餘年的龍宮御座，它也一定能深入日寇爲國的斷潰絕港。抗戰建國綱領，是領袖於抗戰開始不久召集國民參政會所制定的反日寇法西斯侵略的憲章寶典，它也就是打倒日寇法西斯的輕重武器，它的一字一句的威力，也都是擊潰日寇的長槍大砲，它支持抗戰進入了第七個年頭，它也必然能保障抗戰的最後勝利。只要澈底實現三民主義與抗戰建國綱領，除了某些技術問題外，我們就無須再有什麼新的東西值得主張，值得提出。

再次，應該檢討過去，策勵將來，領袖「七七」文告說：「在抗戰第七年度，世界各戰場上，必將到處發動制敵死命的大攻勢，而且將不斷的有光榮勝利的消息傳來，然而我們必需以自身積極的奮鬥來共同創造勝利的成績，尤應隨時痛切反省，要檢討我們國家對世界盡了多少責任，我們個人對於國家盡了多少義務」。我以為我們「反省」、「檢討」，尤其應該着重在三民主義，抗戰建國綱領，應該着重在究竟是什麼東西使得我們會失敗；究竟是什麼東西使得我們會勝利？誠誠實實的接受抗戰過程中一切清楚明白的教訓。這樣才能對將來有所策勵，有所糾正，提高「全民的奮鬥精神」（亦七七文告中語）。

再次，我們應該特別努力的恰還是我們本身的精誠團結。由於第二次大戰中新新的瘋狂的法西斯的侵略，把世界範圍內不同民族不同國家不同制度的許多人民逼得非大家團結起來反對它不可，而形成了全世界的反法西斯的民主統一戰線；把一國範圍內不同黨派不同階層不同宗教信仰的許多人民也逼得非大家團結起來反對它不可，而形成了一國內的反法西斯的民族統一戰線。這兩種統一戰線是有機的聯繫着。它卽是反法西斯侵略的兩把鋼刀，兩把利劍。沒有全世界反法西斯的民主統一戰線，決不能澈底打倒法西斯侵略者，沒有一國內反法西斯的民族統一戰線，也不能澈底打倒法西斯侵略者。所謂

民主統一戰綫與民族統一戰綫，它的主要內容只是一個，這便是精誠團結，所以精誠團結，無論在全世界範圍內，一國範圍內，都是惟一制勝的武器。所以我們最後所應努力的目標是精誠團結。第一是團結，第二、第三，還是團結。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性質是民族、民主；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途，是我們最後勝利；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後果，假者敵人勝利了是那樣可怕。我們還不趁着世界現勢對於我們極端有利的情況之下，努力爭取民族自決，民主自由，消滅法西斯主義，建立世界永久和平之[illegible]的勝利嗎？

民上的

價 元

有版

禁翻

民仁社○號館局

中華民

7105

本書業經重慶市審查處審訖准予刊印

文治

8

1100